



周作人传

止庵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周作人传

止庵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作人传 / 止庵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713-686-6

I. 周… II. 止… III. 周作人 (1885~1967)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8801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20 印张 27 幅图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自序

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了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

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上述诸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尽用。前者非个人力所能及，只能尽量少点儿遗漏；后者则不妨略予甄别。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掺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譬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发生冲突，有云：“……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录》中有所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此外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知堂回想录》亦偶有此病。凡此种种，我们均须多加小心。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关想法，恐怕“卑之无甚高论”。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目录

自序	1
第一章 一八八五——	1
第二章 一九〇六——	25
第三章 一九一一——	49
第四章 一九一七——	61
第五章 一九二三——	119
第六章 一九二八——	157
第七章 一九三九——	217
第八章 一九四五——	249
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	263
结语	303
参考书目	307

第一章

一八八五——

—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櫛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櫛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¹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¹ 《鲁迅的青年时代》（部分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榭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¹；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²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一八九九年一月七日作《有感》、《读华佗传有感》，一月二十九日作《冬夜有感》、《长短句》，均系感逝之作，是现存他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

1 《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

2 周建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乎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乎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¹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²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³

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本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⁴以后他爱读此类书

1 《鲁迅的青年时代》。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认为此事对于周氏兄弟后来的人格有所影响，谈及周作人说：“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的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

2 《先母行述》（一九四三年四月作）。

3 《伯宜公》（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4 《花镜》（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收《夜读抄》）。《毛诗品物图考》，[日]冈元凤著。

籍，如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湜子《花镜》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说：“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来，应用在思想问题上，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¹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时，接触了祖父的妾潘大凤，女仆宋妈，邻居石家妻子余氏，邻居姚家干女儿杨三姑娘等，对于她们的不幸命运深感同情，乃至终生不忘，其妇女观或许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南京狱中，所作《花牌楼》之三有云：“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姬，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变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髻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飘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关于杨三姑娘，他还写过一篇《初恋》²，说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

1 《我的杂学》（前十二节连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新报·文学》，全文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古今》第四十八期、七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古今》第五十至五十二期、九月十六日《古今》第五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2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谈虎集》、《知堂文集》。

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¹这对于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²。

至于大哥，取《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³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⁴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楔》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他们各自的学问乃是发祥于同一来源。譬如，周作人回忆说：“《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⁵讲到鲁迅有云：“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

1 《我学国文的经验》（一九二六年十月《孔德月刊》第一期，收《谈虎集》、《知堂文集》）。

2 《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3 《鲁迅读古书》（一九五六年九月《读书月报》第九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4 《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九期，收《瓜豆集》）。

5 同上。

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¹讲到自己则说：“《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²

周作人就学南京水师学堂，不仅得到大哥帮助，³也是步其三年前的后尘——鲁迅先由叔祖椒生介绍，进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退学，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一点，从周作人当时所写《送戛剑生往白下步别诸弟三首原韵》之三即可看出：“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戛剑生”即大哥；周作人效仿他，给自己起了个“躍剑生”的号。以后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无不追踪大哥足迹。直至在北京大学任教为止，鲁迅一直是他的人生榜样。

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⁴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

1 《鲁迅读古书》。

2 《我的杂学》。

3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作致大哥信两纸，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

4 《地方与文艺》（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作，曾载《之江日报》，收《谈龙集》）。

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¹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²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滕，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

1 《华侨与绍兴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乡土》第四卷第十一期）。

2 如陈源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致志摩》，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曹聚仁对此加以评论道：“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是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鲁迅评传》，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¹

一八九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榷寿同音的“奎绶”²。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³

那个年代，科举“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⁴。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作《题天官风箏》一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翻，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羨君平步上青云。”⁵可见对此“正路”尚很热中。两次落第，所受打击无疑很大。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日记所云：“转瞬仲冬，学术

1 《我学国文的经验》。又，周作人在三味书屋的业师寿洙邻回忆说：“鲁迅学名樟寿，知堂学名榷寿，鲁迅先来，师事镜吾公，称我为四哥，知堂次年始来，师事于我，称我先生。鲁迅在作品中，自言来我家读书时，年十二岁，是年为公元一八九一年，即光绪辛卯年。知堂壬辰年始来，年才九岁，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我既担任助教，我的教法，每日授课，先讲当日所授之书，详细讲与学生听，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知堂年只九岁，我亦不讲与他听，反令其先讲与我听，他却已讲得清楚，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亦从未违犯学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所云入学时间或有误差，但提供周氏早年生平资料，殊为难得。

2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日记。然而据周作人《先母行述》所说：“庚子变后一年，辛丑，令榷寿往考江南水师学堂，易名作人。”似乎“榷寿”并未为“奎绶”所取代。又据《知堂回想录·考先生》：“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好像不曾采用“奎绶”一名。

3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予往贯珠楼领落卷，回卷皆圈。”胡适曾经为此感慨：“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按，周作人共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

4 《知堂回想录·县考》。

5 “满腹经纶皆在握”一句后改为“举目山河皆有异”。

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恹然。”颇能反映当时心境。一度曾经游荡街头，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成为小流氓”。他曾记述与一位名叫阿九的“破脚骨”的来往经过：“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作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并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¹这也给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态度打上深深烙印：“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²

第一次落后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³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⁴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⁵。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

1 《知堂回想录·几乎成为小流氓》。

2 《十字街头的塔》（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3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第三十一期）。

4 《介孚公二》（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5 《知堂回想录·脱逃》。

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¹“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²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³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⁴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⁵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达南京下关。即往水师学堂，见着叔祖和也在该处就学的叔叔周伯升，以及从矿路学堂赶来相会的大哥。暂

1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

2 一八九八年四月七日日记。

3 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至三日日记的眉批。

4 《知堂回想录·义和拳》。

5 《知堂回想录·义和拳》。

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参加额外生考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师对他的试卷批曰“文气近顺”。出榜，计取三名，周作人列备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参加复试，题为“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¹十月十四日，开始上课。

关于这所学堂，他介绍说：“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班，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²周作人“属管轮班”³。

上课第一天，进的就是“洋学馆”，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触英语。幸得事先补习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云：“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复云：“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参加汉文分班考试，题为“问孟子曰，

1 《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2 《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按文中所言，系阴历月日。

3 《知堂年谱大要》（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作）。

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发榜，共分三班，他列头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同学曾“戏作花榜”，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内蕴不露，接物谦和”，而他自己并不是认：“予哑然笑其皮相也。”¹

以后他回顾学堂生活说：“从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名称是当水师学生，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那时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可是那生活却也着实不错，不但是公费供给，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间房里住两个人，各有一个板床，桌子，书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两个，油灯一盏，大概可以点到半夜，也可改点洋灯，只须贴两角钱给听差就行。宿舍两排，中间一个大院子，前窗和门开在这面，后窗外是一大片空地，体操场和桅竿都在那里，这所说的是管轮班的情形，驾驶班宿舍还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异。……一日中功课不多，兵操打靶也没有陆师那么严重，晚饭后便很自由，买几两白干与花生米或牛驴肉，招同学共饮，或看违禁书报，作革命运动，亦无不可。”²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³。

然而谈起学业本身，周作人却说：“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⁴至于出操、打靶，亦无甚所得。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即如其所说：“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⁵他在南京就学初期，阅读范围尚且限于中文作品，包括原著与译作在内。“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

1 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2 《学堂生活》（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亦报》）。

3 《怀旧》（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4 《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5 《我的负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

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¹，而这首先仍应归功于鲁迅。从前在杭州、绍兴时，他就托人带书给弟弟看，现在二人同处一城，借阅自更方便。譬如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译《天演论》，皆得自他之手。以后鲁迅去到日本，依然关照弟弟阅读，或寄，或带，或嘱就近购买。严译亚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书断断续续读了许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记还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这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当初读到《天演论》的热烈反应，似乎颇有差别。后来周作人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幾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期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²也许开始对《天演论》的兴趣还在文字方面，意义正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相当；思想上接受影响，尚待循序渐进。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记，即为一例：“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

周作人说：“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³或许因为读了梁启超意思浅显，言辞生动的著述，他才真正接受进化论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这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相联系，是非常具体，非常切实的道理。他当时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载。如一九〇

1 《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2 《我学国文的经验》。

3 《我的负债》。

二年八月六日云：“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八月九日云：“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八月十七日云：“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板，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十一月六日云：“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二百余帧，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等等。就中不少读物，亦由鲁迅提供。

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以后他回顾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¹对他来说，已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寔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对比过去矻矻于科举得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了。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写了一首《焚书》，最能体现当时的思想立场：“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臾。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巧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

¹ 《知堂回想录·考先生》。

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谭嗣同著《仁学》经鲁迅提供，就在此前读过；以上所说，颇有谭氏“冲决网罗”之概。

周作人水师学堂日记记录了他当时读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无所偏废。所受启发自不限于思想方面，还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国文的修养”、“文学的影响”在内；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许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云：“看小说《经国美谈》少许，书虽佳，然系讲政治，究与吾国说部有别，不能引人入胜，不若《新小说》中《东欧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动手移译作品，正是循的这一路数。对于文学本身的兴趣，始终体现在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之中。

不过此时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与向所追随效仿的大哥有关。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兄弟又要分离，周作人一时难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记有云：“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出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予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辗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记所云：“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鲁迅除了供给弟弟许多读物外，还不时通报有关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新的信息。这也在周作人日记中留下记载。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来函，又摄影三纸，以壹贻予，披图视之，宛然东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来信，尽二纸，尽白话。”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断发照相一张”。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断发小照一张”。所有这些，为周作人勾画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时之日本，犹如从前之南京，成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题为《春日坐雨有怀

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诗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枫树春日社，满地樱花小石川。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收到鲁迅“断发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佗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断发”尚不可能的国内的他，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鲁迅回国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著洋服，路人见之，竟以为“红毛国人”¹。

于是周作人希望再次追随大哥，也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一月，听说新任总办要去日本调查水师章程，拟择学生四人随往，遂争取此一机会，然而未能如愿。²嗣后更因此与担任学监的叔祖发生冲突：先是鲁迅着人带书来，来人言及所在之日本弘文学院闹学潮事。周椒生知道后“大恐惧”，切责作人，并要他写信给大哥，“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作人“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私下另写一信，“述此事，力阻其行”。他为此大发感慨，四月十八日日记有云：“呜呼，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何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仳仳倪倪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此时之南京，亦犹如从前之绍兴；“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仳仳倪倪居于此”，与当初在家感受，何其相似乃尔。不过现在的周作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关于“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仳仳倪倪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来说：“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

1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日记（题为《白话报馆之寄宿》）。

2 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日记：“饭后予等（胡张李周）四人见总办请往东洋，后伊云所派者皆毕业生，遂辞出。”

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¹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起先近似时症，继而脚肿、脸肿，此后又患颈疽。于十一月随已被水师学堂辞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记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一则：“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从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所谓“学事”，仍指争取赴日留学。然而日记所说，似乎预告他将有一番新的作为。

三

《女子世界》一九〇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此前一场大病，或许是“说生死”的由头；然而该文着眼于“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乃是鼓吹民族主义革命之作。后一文则将这个意思移过来讲中国女子当自强独立。该年七月，祖父病逝，寿六十八岁。长孙鲁迅远在日本，遂由暑假在家的周作人顶替“承重”，“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²。嗣后，周椒生介绍他去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两月后期满，学堂方面因学生发音不大准确，未予续聘，遂于十一月下旬返回南京。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起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至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完稿。以《侠女奴》为题，在《女子世界》连载，署名萍云女士。该杂志此后陆续刊出周氏著

1 《学堂生活》（一九一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2 《知堂回想录·祖父之丧》。

译，包括《题〈侠女奴〉原本》、《好花枝》、《女猎人》、《女祸传》、英国陶尔（Conan Doyle）¹作《荒矶》和法国维克多·雨果作《天鸚儿》等。一九〇五年六月，上海小说林社印行了周作人的两本译作，其一为《侠女奴》；其一为《玉虫缘》，即美国作家安介坡（Allan Poe）²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说《黄金甲虫》（*The Gold Bug*），署会稽碧罗译。此书于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脱稿。“《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³

《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也是小说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述二书均系其经手，且注明“初我润辞”。出版《玉虫缘》“以书五十部见酬”⁴，《侠女奴》则获赠《女子世界》一年。关于与《女子世界》及丁初我的因缘，周作人说：“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⁵周氏成为一代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与某些媒体以及担任编辑的人关系密切；《女子世界》是他最初的园地，而丁初我则是第一位合作的编辑。类似情形，此后还会出现多次。

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作者就以“我女子”身份讲话；以后在《好花枝》、《女祸传》中也一再说“我女界”。这自是替《女子世界》写稿，又假冒女性作者的缘故。以后他说：“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⁶其实意义可能不止于此。周氏毕生关心女性，同情女性；而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立场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虽然未必出于自觉，却由此建立了一个更接近于本质的视点。以后他讲“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⁷，而对清人俞理初“好为女子出脱”、“似谢夫人所谓出

1 通译柯南道尔。

2 通译爱伦·坡。

3 《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4 一九〇五年三月九日日记。

5 《学校生活的一页》（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6 《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

7 《观世音与周姥》（一九四〇年八月《新光》第五期，收《药堂杂文》）。

于周姥者”的态度极表赞同，道理正在这里。

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¹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莎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葛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²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³“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

1 《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2 《我的杂学》。

3 《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¹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²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³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⁴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⁵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⁶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⁷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

1 《知堂回想录·老师一》。

2 《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一》。

3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女子世界》第十二期。

4 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5 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

6 不妨提到秋瑾，宣扬女性自强独立尤为着力。一九〇五年四月，周作人曾经两次与她见面。

7 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版，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奇怪的。”¹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底旅行》文白夹杂，周作人所译纯系文言。对于这最早两种译作，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并不高：“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冷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²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³，“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⁴，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⁵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⁶“我在二十岁前

1 《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2 《丁初我》（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亦报》）。

3 一九〇五年二月三日日记。

4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日记。

5 《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6 《读戒律》（一九三六年九月《青年界》第十卷第二期，收《风雨谈》）。

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世间为限耳。”¹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²，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器俄’，我就成了器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器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 *Claude Gueux* 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器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 *Claude* 了。”³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

1 《我的杂学》。

2 《说生死》。

3 《学校生活的一页》。器俄 (Victor Hugo)，通译雨果。Claude Gueux：《死囚末日记》，雨果一八四三年作短篇小说。

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¹

《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器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²，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匹夫匹妇不能得多助于天，其残忍以死，可无论矣。即试推之一国一群，其理亦莫不视此。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仍，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器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履器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³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⁴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

1 《知堂回想录·鱼雷堂》。

2 《《孤儿记》凡例》，收《孤儿记》。《哀史》即《悲惨世界》。

3 《《孤儿记》绪言》，收《孤儿记》。

4 《《孤儿记》缘起》，收《孤儿记》。

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¹，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恹恹，……”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²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1 《人的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收《艺术与生活》）。

2 关于周氏兄弟此次赴日时间，鲁迅向无说明。周作人计有三说：一，《墨痕小识》（约完成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云：“夏，往东京。”二，《鲁迅在东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说：“秋天再往东京。”《知堂回想录·吴一斋》也说：“于秋间出发。”三，《遗失的原稿》（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说：“丙午九月我到东京。”《知堂年谱大要》也说：“九月往东京。”按《知堂年谱大要》自民国元年起注明“以下均是阳历”，实则此前亦不尽用阴历，尤其是在日留学时期。

第二章

一九〇六——

—

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¹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

1 《知堂回想录·最初的印象》。

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¹“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经验上正面感到亲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²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迹未出东京之外，以后不止一次把这城市称做“第二故乡”。先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后，³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号，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为止，均与鲁迅同住。后两处系与许寿裳等合租。周作人说：“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⁴其间虽与陶成章等革命者有所交往，但并未参与具体活动。

到日本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周作人说：“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有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的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语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我因为中学普

1 《日本的衣食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收《苦竹杂记》）。

2 《怀东京》（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五期，收《瓜豆集》）。

3 《鲁迅在东京》说“春间”迁居，《知堂年谱大要》则说是在“六月”。

4 《知堂回想录·结论》。

通知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¹

周作人来日本所要做的“其次是预备文艺杂志的事”。——下面将会介绍，此事并未成功，对于他今后人生，却是关键的一环。这要从鲁迅讲起。弟弟此次来日之前，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已有所转变。鲁迅本来在仙台读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却退学来到东京，据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艺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²周作人说：“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葦和袁文蕪。”³此前他自己虽然已有几种译著面世，但若说打定主意专事文艺，却是未必；现在因为大哥的新计划，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周作人是因为鲁迅改变人生方向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响，而以此次最为重大。鲁迅此时“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⁴，也牵连到周作人，所以他来日本，前后几次上学——如前述法

1 《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有关周氏兄弟的日语水平说法不一。清水安三说：“鲁迅的日语不像周作人那么流利，但完全是运用自如的。周作人的日语声调多少有些不准确，而鲁迅的日语却没有。”（《我怀念鲁迅》）长与善郎却说，鲁迅“的日语没有弟弟周作人好，大概因为曾在东北的理科大学留过学吧，语调稍许有点不好听”（《会见鲁迅的夜晚》）。一九四一年见过周作人一面的谷崎润一郎则说，周氏讲着“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其实我没有料到他的日语会如此出色）”（《昨今》）。

2 鲁迅：《〈呐喊〉自序》（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晨报·文学旬刊》）。

3 《知堂回想录·筹备杂志》。

4 《鲁迅的青年时代》。

政大学特别预科，以及后来的立教大学——仅仅是学习语言而已。

关于他们准备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¹一九〇七年秋，兄弟俩与几个朋友一起，曾向俄国人孔特夫人（Maria Konde）学习俄语，目的也在从事翻译。惟因学费太贵，不久即告中断。“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²正因为如此，周作人“这时学日本语，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³。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着手译介日本文学作品。

周作人说：“我到东京的那年（一九〇六），买得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⁴当时他据此为《新生》写过一篇《三辰神话》，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国学者安特路

1 《鲁迅的文学修养》（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艺学习》第十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2 《知堂回想录·学俄文》。

3 《知堂回想录·〈炭画〉与〈黄蔷薇〉》。

4 《知堂回想录·拾遗癸》。该莱，通译盖利。安特路朗，通译安德鲁·兰。

朗的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影响很大，以后又对希腊神话和神话学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译《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正是由打这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他的学问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进一步精进，及有机会公表出来；虽然这多半是自家凭着兴趣阅读，在学校里只掌握求学的工具即几门外语而已。

《新生》尽管准备许久，到底没有办成。“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蕪，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¹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²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周作人根据英文翻译了三本小说：《红星佚史》、《劲草》和《匈奴奇士录》。³其中一、三两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会稽周遑译。前者得稿费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种因已别有译本，未获出版。译稿几年后寄给某日报社，没有登出，反被遗失。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上述译作当属筹备中的《新生》的副产品；从他的文学历程来看，却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

1 《鲁迅在东京》。

2 《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

3 据《墨痕小识》，三部译稿分别完成于“丁未二月”、“丁未九月”和“戊申五月”。《遗失的原稿》则说，《劲草》“大概是在丁未之冬完成的吧”。

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¹英国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²著书已经林纾等翻译多部，风行一时；与安特路朗合作长篇小说却止此一种。原书出版于一八九〇年，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或者说，以哈葛德的“笔法”来写安特路朗的“内容”——这两方面，恰恰分别是周作人迄未终止和刚刚萌生的兴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详细稽考书中事迹出处，又作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的注释，似乎说明关注点已经明显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时，“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³，令他耿耿于怀。周氏晚年翻译古希腊作品，注释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其实还是这个路数，不过更其精深罢了。

《〈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1 《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

2 通译哈格德。

3 同注1。

《劲草》(《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¹系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²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而《红星佚史》中的二十来首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这两本书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周作人说:“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珂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匈奴奇士录》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 Mór)³一八七七年所著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 az 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 Nisbet Bain)⁴。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⁵林纾译过司各得(Walter Scott)⁶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为轰动,周氏亦很爱读;而育珂摩耳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从这一点看来,选译《匈奴奇士录》,仍然多少受到林纾的影响。但是匈牙利——也许还可以提到《劲草》所属的俄国——已经属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何况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此外一项原因,则如周氏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

1 通译《谢列布良内公爵》。

2 《遗失的原稿》。

3 通译约卡伊·莫尔。

4 通译贝恩。

5 《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下》。

6 通译司各特。

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¹

周作人翻译这几本书，说得上自有一己寄托在焉，同时也合乎大众口味，所以能够“卖钱”。后一方面，乃是与拟议中的《新生》以及随后问世的《域外小说集》区别所在。周氏曾说：“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²《红星佚史》与《匈奴奇士录》行文流利，易于阅读。这两本书，可以看作他对于一度景慕的林纾的告别式。

二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因为偶然的机缘，已告流产的《新生》计划陆续以别种形式实现，尽管未能取得周氏兄弟所期待的成功。——且按下这一话头不表，先说其间发生的另外一件相关的事：一九〇八年夏天，他们开始听章炳麟讲学。“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葦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葦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

1 《匈加利小说》（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九日《晨报》，收《书房一角》）。

2 《我的负债》。

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¹

对周作人来说，这仍是一种语言学习。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他曾说：“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²这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得到国学大师真传，兄弟二人于此造诣甚深；是以多年后与章士钊、陈源等论战时，才会那么轻蔑对手。至于当下直接的作用，则体现于文章之中，无论写作还是翻译。即如周作人所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³这在当时，明显带有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色彩。——后来他有所说明：“革命精神的怀古，是一种破坏现状的方便，与对于改革而起的反动的保守的运动很不同，譬如希腊复活古语，貌似复古，其实却在驱逐闯入的土耳其语。中国革命以前的复古思潮也如此，与革命后的反动的复古完全是两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怀古的思想要能客观的理解他，不可将他认作民族的传统精神。”⁴周作人的复古立场，前后坚持了将近十年。除此之外，他还讲到一层：“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

1 《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钱玄同一九〇八年七月二日日记云：“将《说文》札记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句中弥觉糊涂，一则初抄时更外行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等要听讲，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旁听。)”据许寿裳称为时“不满一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致林辰信)，周作人则谓“大约持续了一年多的光景”。

2 《鲁迅的青年时代》。

3 《关于鲁迅之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收《瓜豆集》)。

4 《〈神父所孚罗纽斯〉附记》(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七号，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¹此即传承了浙江“深刻”一脉文风，对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无启发作用。民报社听讲的同学中，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将来继续出现在周作人的世界里，有的还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后钱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写挽联有云：“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²

周作人说：“鲁迅计画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³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就明显有着章式“文字上的复古”的倾向：“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⁴——关于此事缘起，周作人说：“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⁵计第一号有鲁迅的《人间之历史》，第二、三号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四、五号有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五号有鲁迅的《科学史教篇》，第七号有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藕息(Emil Reich)⁶作《裴彖飞诗论》(未完)，第八号有鲁迅的《破恶声论》(未完)，周作人译亚伦坡作《寂漠》⁷、契诃夫作《庄中》⁸，第九号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⁹，二人所写多为长文。

1 《我的负债》。

2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实报》，又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乙刊》第八期，收《药味集》改题《玄同纪念》)。

3 《知堂回想录·〈河南〉——〈新生〉甲编》。

4 鲁迅：《〈坟〉的题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第一百零六期)。

5 《鲁迅的青年时代》。

6 通译赖希。

7 收《域外小说集》时改题《默》。

8 收集时改题《威施》。

9 鲁迅：《〈坟〉的题记》。

编辑《河南》的刘师培，此前还曾主持《天义报》。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这里发表过一些作品。其中以《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¹及两篇《读书杂识》²较为重要。《读书杂识》列举俄国斯谛勃鄂克（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i，笔名S. Stepniak）³、匈牙利裴象飞（Petofi Sándor）⁴等，实为鲁迅《摩罗诗力说》及周作人自己的《哀弦篇》之先声；而针对当时人们“竞趋实质”、“尤薄文艺”所说“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湮灭，故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使生种种因缘”，又系《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之雏形。《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介绍俄国克罗颇特庚（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⁵有关虚无主义的解释，也可以视为《河南》上“《新生》甲编”的必要补充。以后周作人将克氏列为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虚无论的意思实在只是中国所云无征不信，换句话说就是唯物的人生观，重实证而轻理想”⁶。

通过给《河南》撰稿，以鲁迅为主，周作人为辅，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纲领即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十年之后，他们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发难，实系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扬光大。一九二五年鲁迅出版论文集《坟》，将《河南》上自己的几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继续认可其中观点；周作人则始终坚信“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⁷，也是脱胎于“任个人而排众数”。当时二人所作，既相互呼应，又相互补充，应该是长久酝酿、反复切磋的结果。《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着眼点都在“掇物质而张灵明”这一方面。《论文章之意义暨

1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义报》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按清末民国报刊经常脱期，致有“文章发表时间”反在写作时间之前者，以下各章遇到此类问题，不另说明。

2 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五日《天义报》第七期，十月三十日《天义报》第八、九、十期合刊。

3 即斯谛普虑克，通译斯捷普尼亚克。

4 通译裴多菲·山陀尔。

5 通译克鲁泡特金。周氏又译克鲁巴金。

6 《关于自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五期）。

7 《北沟沿通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世界周报·蔷薇周年纪念周刊》，收《谈虎集》）。

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这是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位置当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之间。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说法，可见作者视野广阔——这一点此前在《天义报》上已有所显现；而对于文学理论的特殊兴趣，则使我们联想到他后来的《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周氏自谓开有“文学小店”，应该说由此揭幕。该文后半部分虽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具体批评对象，矛头却指向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所言：“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既以存古化。”正是《摩罗诗力说》所谓“攫人心”者也。

《摩罗诗力说》云“求新声于异邦”，《哀弦篇》则谓“介异邦新声”，所介绍者亦有重合，如波兰诗人密克威支（Adam Mickiewicz）¹、斯洛伐支奇（Juliusz Slowacki）²、克刺莘斯奇（Zygmunt Krasiński）³等，彼此都曾讲到。《哀弦篇》后出，述及密、斯二氏生平，径曰参看《摩罗诗力说》；个别处则予以订正，如《摩罗诗力说》讲密克威支等“本裴伦”，《哀弦篇》则说：“波阑当时文章，虽受裴伦感化，顾所咏人物性情，迥不相合。”指出波兰诗人并不如裴伦（George Gordon Byron）⁴般“轻其国人”、“以咎责国人”。更为重要的是，《摩罗诗力说》与《哀弦篇》虽然宗旨相去不远，却是兄弟二人分别本诸一己性情，对于世界文学有选择性

1 通译密茨凯维奇。

2 通译斯沃瓦茨基。

3 通译克拉辛斯基。

4 通译拜伦。

接受。哥哥激越，标榜“摩罗”；弟弟沉郁，强调“悲哀”。如果套用现成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其一侧重浪漫主义，其一侧重现实主义。《哀弦篇》“兹所言者，首波阑，次乌克刺因，駉以斯拉夫小国，次犹太终焉”，都属于所谓“弱小民族文学”；归结为：“如上所述，列国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声逸响，迸发其间，故其国虽亦有黯淡之色，而尚无灰死之象焉。若在吾国，则何有矣。……今于此篇，少集他国文华，进之吾土，岂曰有补，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漠耳。”似乎更足以概括继乎其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书。对于周作人来说，《哀弦篇》上承《孤儿记》，下启二十至四十年代诸作；在其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周作人说：“《新生》式的论文，既然得在《河南》上边得到发表的机会，还有翻译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别一种形式发表，这就是《域外小说集》了。”¹起手翻译应该稍早，其中周作人所译斯谛普虐克作《一文钱》，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民报》第二十一期发表。着手编辑出版，则在搬进波之十九号以后，乃是得到后来的一位住客的资助：“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葑相识，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本，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²——附带说一句，蒋抑卮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对此周氏说：“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³

中国现代文学实发轫于周氏兄弟未获成功的《新生》，——如果说“甲编”《河南》所载理论是以鲁迅为主，那么“乙编”《域外小说集》所收翻

1 《知堂回想录·〈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2 《袁文数与蒋抑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3 《知堂回想录·蒋抑卮》。周作人的笔名“鹤生”，即出典于蒋氏的说法。

译就以周作人为主。《域外小说集》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第一册于一九〇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其中周作人译五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作人译八篇，余为鲁迅所译。二人分别据英、德文翻译或转译。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所撰序言有云：“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所说正相一致。他们原本有个庞大规划，即如该书“略例”所说：“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惟仅出两册即告中止，未及完成。¹鲁迅说，当时“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²。从已出版的两册来看，这一愿望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弱小民族文学”本来是个内容概念，以后他们倡导的“人道主义文学”实即孕育于此；但是当时因为材料有限，遴选不易，也就退而成为一种地域概念。即便如此，《域外小说集》所收亦不尽是“弱小民族文学”，“叫喊和反抗”者尤其不多，——虽然这不应从社会层面，而应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相比之下，倒更接近《哀弦篇》说的“哀声逸响，迸发其间”，周作人所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³的《乐人扬珂》、《灯台守》和《天使》，可以作为代表。

《域外小说集》以译者的审美趣味决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悦于人，这在周氏兄弟的翻译生涯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该书序言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从此二人彻底走出林纾的阴影，拥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风格，而这涉及对原著的选择、译法和文体诸方面。与他们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一样，《域外小说集》也体现了“文

1 两册《域外小说集》书末均有“新译预告”，未经译出者尚多。其中匈牙利作家密可札忒（Mikszáth Kálmán，通译米克沙特·卡尔曼）的《神盖记》（*Szent Péter Esernyője*，通译《圣彼得的伞》），周作人译了一部分，未发表，稿藏上海鲁迅纪念馆。

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创作的经验》）。

3 通译显克维奇。

字上的复古”，较之周作人此前几种译著，读来艰涩得多。蔡元培曾评价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¹以后译者自己对此有所反思，认为是不成功的尝试。²而“收录至审慎”和“这译亦期弗失文情”两点，则为他们所坚持始终，所谓“直译”，即由后一方面发展而来。“尤其注重于短篇”，也是别具一格的眼光。虽然，“《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³。以后周氏兄弟继续此种“注重”，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都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情有独钟。要论《域外小说集》的贡献，侧重“弱小民族文学”是其一，倡导短篇小说是其二。十年以后，这两方面都蔚为大观，发端正在最初两册薄薄小书。尽管当时曲高和寡，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不过当年五月一日，东京《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倒有一则关于“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报道，这是周氏兄弟首次为外间所公开评论。

周作人还据寇丁（Jeremiah Curtin）⁴的英文本转译了显克微支一八七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炭画》（*Szkice weglem*）⁵。译稿曾经鲁迅修改善正。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受到勃兰兑思（Georg Brandes）⁶很大影响。《摩罗诗力说》和《哀弦篇》极力表彰波兰文学，正是当时读到勃氏所著《波兰印象记》的缘故。周作人说：“波兰小说家中我最喜显克微支，这也是《印象记》的影响。其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及《火与剑》三部作正风靡一时，勃兰兑思却说他的短篇更好，举出《炭

1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公言报》）。

2 上海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出版《域外小说集》增订本，鲁迅用周作人名义所写新序有云：“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并说，“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

3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4 通译柯廷。

5 通译《炭笔素描》。《关于〈炭画〉》（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第八十三期，收《炭画》）：“一九〇八年在东京找到了寇丁译的两本显克微支短篇集，选译了几篇，把《炭画》也译出了，过了些时，才写这首小引。”按《〈炭画〉小引》末署“己酉二月，译者记”。又《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卷末“新译预告”列有此书，似乎该项译事略晚于《域外小说集》。

6 通译布兰代斯。

画》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与《灯台守》。我很高兴能够把这三篇与《乐人扬珂》以及《酋长》都翻译成中文，只可惜还有一篇《得胜的巴耳忒克》没有译出。”¹比起《域外小说集》中某些篇章，《炭画》似乎更合乎“弱小民族文学”的本义，尤其体现了《哀弦篇》所说的“悲哀”。与他当年“半偷半做”的《孤儿记》相仿，《炭画》写的也是弱者的悲惨命运，似乎仍然体现周氏对此的特殊关注；不过《炭画》堪称杰作，写法从容多了。正如周作人所云：“显克微支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尔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²以后他说：“这是我的译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因为原文实在太厉害了。”³该译作当时未获出版。五年后投寄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回信有云：“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的确道着《域外小说集》、《炭画》和继乎其后的《黄蔷薇》难为读者接受的原由。鲁迅后来也说《炭画》译文“生硬”⁴。一九一四年四月，《炭画》才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乃是周作人用本名出版的第一本书，只是“三十元的板税却一个大都不见”⁵。

三

民报社听讲，旨在“文字上的复古”；嗣后周作人学习古希腊文⁶，也

1 《关于自己》。

2 这是周作人著《欧洲文学史》未印行的十九世纪一篇中的内容，见《关于〈炭画〉》。戈戈尔（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通译果戈理。

3 《关于〈炭画〉》。

4 鲁迅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致周作人信。

5 《关于〈炭画〉》。

6 《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说：“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知堂年谱大要》也说戊申年“入立教大学”。但是立教大学的学籍登记表上，周作人“入学时间”一栏却写着“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十日”，所读系“商科豫科”，如此则是一九〇九年的事了。“退学时间”则为“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是出于同一目的。“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培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进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教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憾。”¹

这一计划后来被周作人放弃，因为据他说，“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²。不过掌握古希腊文，却别具重要意义。西方文明构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头古希腊，并非“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³；进而更揭示“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接近”，“于人生最适用，他的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⁴，这与能够直接阅读原典不无关系。

1 《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克什诺芬，通译色诺芬。《进军记》，通译《长征记》。

2 同上。

3 《北大的支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作，收《苦竹杂记》）。

4 《希腊闲话》（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生》第一卷第二期）。

他也曾利用这一能力，译介了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es）¹、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²、海罗达思（Herodas）³和路吉阿诺斯（Loukianos）⁴等古希腊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周作人还与章太炎一道学习梵文，但仅听两课，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为此来信，将周作人的号“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鲁迅的号“孤孟”为自己所起——写作“启明”，以后被他采用为“字”⁵，并衍生出“岂明”等名号，算是留下一点纪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发表作品，出书多署“周启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一，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⁶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回国。据他说：“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⁷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当在其列。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

1 通译阿里斯托芬。

2 通译忒奥克利托斯。周氏又译台阿克利多思。

3 通译赫罗达斯。

4 通译卢奇安，又译琉善。

5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日日记。

6 正如梁实秋所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忆周作人先生》）

7 鲁迅：《鲁迅自传》（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作）。

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在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¹周氏视川柳为风俗诗，对可以称为风俗画的浮世绘也很喜欢，但于前者“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则强调“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怅然之感”²，所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多年以后，他还提到自己“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未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³。当时他开始搜求柳田国男等人的乡土研究著作，也是“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⁴，特别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妇迁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⁵以后周作人说，其“杂学”“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⁶；只有通过后来这番阅读与际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层面去理解日本文化，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构成，——这里他更将“狂言”、“滑稽本”与川柳等作为对比的一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⁷周作人因此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点，晚年所译《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即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曾对长谷川如是闲“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的意见表示赞同。⁸这与周氏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为作为读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学的见证人：“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

1 《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

2 《我的杂学》。

3 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致鲍耀明信。

4 《我的杂学》。

5 《知堂回想录·赤羽桥边》。

6 《我的杂学》。

7 同上。

8 《怠工之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作，收《苦口甘口》）。

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日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¹可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兴趣，始终限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年代；他特别强调当时日本还未被“西洋化”，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之中。后来他将坂本文泉子反映“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²的《如梦记》（《夢の如し》）译成中文，也是寄托某种怀念之情。对于明治文学，周作人亦自有所取舍。他在日本期间，自然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夏日漱石、森鸥外等则不为所动；周作人的口味明显偏向于后一方面，所喜欢的作家均属非自然主义文学阵营。这与鲁迅非常接近，他也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日漱石和森鸥外。”³日后兄弟二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将自然主义之作排除在外。这似乎体现了某种倾向，即对于文学本身的成就更其看重，同时又要求它能够传达人生更普遍、更具概括性的东西。周作人离开日本之前，唯美派的谷崎润一郎，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石川啄木等已陆续登场，也都为他所关注。武者小路实笃以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尤为显著。

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一九一〇年据丹福特（Beatrice Danford）⁴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A Sárga Rózsa*）。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从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

1 《与谢野先生纪念》（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益世报》副刊，收《苦茶随笔》）。保登登几寿，即ホトトギス；寿波留，即スバル。

2 《〈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4 通译丹福德。

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葑赶来劝开了。”¹现在大哥不在身边，他则过着如自己所说的“游惰的生活”²。

《黄蔷薇》系育珂摩耳一八九三年所著“牧歌小说”，“原本很长，经英译者节译成了中篇”³，译本初名《黄华》。周作人说：“育珂作小说，数及二百，顾独取此者，有二故焉，一以人国言，一以艺术言。育珂此作，记其国土人情，善见特色，且文思富美，盎然多诗趣。以是重缘，特推《黄华》一书，为育珂绝唱。而以爱古希腊二诗人之情，重爱是匈加利牧歌著者也。”⁴所谓“以人国故”，仍可归结到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一贯立场；“以艺术言”，则为译者素所强调，而这小说更写得宛如优美的诗篇一般。由此书还可上溯至古希腊牧歌诗人谛列克列多思和田园小说作者朗戈思(Longos)⁵，这与有关风土人情的介绍，都属于周作人新的兴趣所在。以后他更直接译介了谛、朗两位的作品。对周作人来说，《黄蔷薇》好似一座桥梁，把“弱小民族文学”与古希腊联系起来；就像当初他译《红星佚史》，将曾经推崇的林译小说与希腊神话联系起来一样。此书译成，久久未能面世。也许是仍取《域外小说集》一路译法，小说内容又不以情节取胜的缘故。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托蔡元培以六十元卖给商务印书馆；又过了七年，方获出版。

周作人侨居日本，对该国政治无所关心，然而一九一〇年日本政府以谋杀天皇罪名处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却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⁶。后来他说：“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为一转折点。”⁷这可能也是周作人认识日本的转折点。谈到日本，他总是

1 《知堂回想录·邬波尼沙陀》。

2 《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

3 《知堂回想录·〈炭画〉与〈黄蔷薇〉》。

4 《序说》（一九一一年一月作），后辑入未出版的《秋草园旧稿》（鲍耀明收藏）。

5 通译朗戈斯。

6 《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

7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王金发》。

赞颂其美好者而攻击其丑恶者，后一态度大约即肇始于此，虽然写为文章，还在多年以后。而在当时，他所论议的却是中国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初为《炭画》写的小引有云：“民生颡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乃系针对朝廷当时所搞的假立宪而发，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¹。此种不为表象所蔽而直达本质的眼光，嗣后论及时事，常常有所体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绍兴公报》揭载的《文明之基础》一文则云：“第以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使民德不昌，短于智慧，则物质之事且难达其高深，超形之学更不足论，于文明何有乎？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可闻当初与鲁迅同为《河南》撰稿的遗响。周氏发表了两篇《古希腊之小说》²，分别讲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诺斯的《信史》（*Aléthôn Diégênmatôn*）³，是他有关古希腊文学最早的介绍文章。这一年里，他还曾“为《绍兴公报》作《安兑尔然传》、《希腊拟曲》、Ephtaliotis 著《老什诺思》”⁴。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五月鲁迅东渡，促其返国。大约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携妇回到绍兴家中。⁵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预言的，故国“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

1 《关于〈炭画〉》。又，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刊登了一批署名“顽石”的时评，其中《宪政编查馆致各督抚稽查自治员电文书后》一篇亦云：“自治，美事也，在我国则不美。地方自治，善政也，在我国则不善。自治团体，法人也，在我国则不法。”“顽石”为周作人曾经用过的别号，但这批文章是否为其所作，论者颇有质疑。

2 一九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绍兴公报》。

3 通译《真实的故事》。

4 《墨痕小识》。Argyris Ephtaliotis，周作人译为蔼夫达利阿谛斯。

5 《墨痕小识》：“辛亥六月，归越。”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则云：“起孟及ノブ子已返越。”据此可知，《知堂年谱大要》所云“辛亥八月返绍兴”、《〈绍兴儿歌集〉小引》所云“辛亥年秋天我从东京回绍兴”均不确。

觉得难受”¹。不久周作人写诗一首，抒发对于将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怀念之情：“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1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王金发》。

第三章

一九一一——

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后来他回顾说：“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¹不过他自己并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²虽然那时“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³，但却未始不关心，不思考。两个多月后，问世不久的《越铎日报》接连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对于这场革命自有深刻理解。这是周作人一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

周作人在《望越篇》⁴中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出要害在于“种

1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2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3 《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4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越铎日报》。

业”：“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駉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袭的国民性加以批判，而在当时，则对辛亥革命不无期待：“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怵怵倪倪，以求禄位乎？于此于彼，孰为决之？”——此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实为后来倡导“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炭画〉小引》，以及更早与鲁迅一起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

不过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以后他说：“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又说：“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彩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¹在因革命元勋陶成章被暗杀而作的《望华国篇》²中，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为鉴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观”³，实即肇始于此；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⁴

1 《知堂回想录·〈望越篇〉》。

2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越铎日报》。

3 《灯下读书论》（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4 《问星处的豫言》（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

周作人有关革命运动的思考，归结为《庸众之责任》¹中所说：“人类不齐，有贤有不肖，故其责任亦因之有积极消极之异。积极者贤者之责任，重在建设，以利民为事，消极者不肖之责任，其事但在自持，不为害而止耳。”正与鲁迅当年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一脉相承。不久后，曾经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友人范爱农之落魄、惨死，²似乎从反面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周作人因而发出“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³的感慨。《望越篇》曾经鲁迅修改；周作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也与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中所揭示的正相一致。《越铎日报》上周作人这组文章，可谓鲁迅所倡导的“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⁴的具体体现。

一九一二年三月，经朱逸先向司长沈钧儒介绍，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后改本省视学，但他因妻子即将分娩而未到任。五月十六日，儿子出生，取名丰丸，后改丰一⁵。因需服待产妇，从日本接来小姨羽太芳子，两年后成了他的弟媳。六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职，旧同门朱逸先、钱玄同等皆与共事。“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七月，因患疟疾，告假回家。“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⁶周作人第一次官员生涯就此结束。——在此之前，鲁迅已于当年二月赴南京教育部任职，五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1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越铎日报》。

2 可参看鲁迅作《范爱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又，周作人作《关于范爱农》（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宇宙风》第六十七期，收《药味集》）和《鲁迅与范爱农》（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文汇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对此多有补充。

3 《哀爱农先生》（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民兴日报》）。

4 鲁迅：《〈越铎〉出世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越铎日报》创刊号）。

5 周丰一于一九九七年逝世。

6 《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一九一三年三月，周作人被选为县教育局会长，继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又请他教英语。他在日记中分别说是“允暂担任”、“暂任之”，两样差事却都干了整整四年。与第五中学所订合同规定：每周课时十四小时，月俸墨银五十元，超时加奉。四月十四日，周作人首次赴校授课，学生为二三年级，每周十六小时。至八月，改为每周十八小时，月俸六十八元。在教育会的工作，亦于这年四月开始。“我在教育会里，也是无事可做，反正是敷衍故事罢了，但因为县署有每月五十元的津贴，所以要办点事业，除雇用一事务员和一名公役及支付杂费之外，印行一种教育杂志，以及有时调查小学，展览成绩，有一回居然办过一回教科书审查的事。”¹教育会先组织学术讲演，后议决“改讲演为月刊及调查”²，所办《绍兴县教育局月刊》，由周作人编辑。十月，第一期面世。一九一四年八月《月刊》第十期印行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篇幅有所增加，仍由他编辑，于十一月出版第一期。周作人说：“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³他曾将这与《域外小说集》、计划改译《圣经》一并列为自己失败的“复古的经验”⁴。从一九一三年九月起，周作人还在成章女中兼课一学期，仍教英语。他的两个女儿静子⁵和若子，分别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五日和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间，周作人共在《绍兴县教育局月刊》和《绍兴教育杂志》发表了五十余篇文章，有作有译，以关乎儿童问题者为主。此固为其职司以及杂志性质所决定，也是他这段时间主要兴趣所在。周作人用儿童学的理论来考察儿童教育，侧重以人类学为依据的儿童文学研究，兼及儿童教育的其他方面，说得上是认认真真做的一门学问。这可以溯源于留日时期：“以前因为涉猎英国安特路朗的著作，略为懂得一点人

1 《知堂回想录·在教育界里》。

2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

3 《知堂回想录·在教育界里》。

4 《我的复古的经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5 周静子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开始对于‘民间故事’感到兴趣，觉得神话传说，童话儿歌，都是古代没有文字以前的文学，正如麦卡洛克的一本书名所说，是‘小说之童年’。”¹于是由人类学而及于儿童学：“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莱贺尔(Stanley Hall)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来(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²周作人起手从事该项研究，尚在进入教育界之前。一九一二年十月，作《童话研究》；次年八月，又作《童话略论》，“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篡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³现在自己办有杂志，遂又写了《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几年后他到北京，重新提倡儿童文学研究，就中基本看法，在上述文章均已有所揭示。周作人尝自我评价其“儿童文学小论”云：“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⁴

关于此项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衰运转轮，犹若旦莫，其源竭也。将兴之国，靡不重其种息，故富进取之气，而有未来之望。”⁵不无藉此实现《望越篇》所谓“种业更除”之意。至于所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后来他提出以“子孙崇拜”替代“祖先崇拜”，或

1 《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2 《知堂回想录·拾遗丑》。斯丹莱贺尔，通译斯坦利·霍尔。塞来，通译萨利。

3 《〈儿童文学小论〉序》（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作，收《儿童文学小论》、《苦雨斋序跋文》）。

4 同上。

5 《儿童问题之初解》（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六号）。

即发端于此。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关键在“以儿童为本位”¹，而对“儿童”的理解实有别于既往：“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影。……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²“小儿的发见”以后被他归为“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³之一。这几年的研究工作，是周作人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儿童作为一种独立存在，自具其一应特性；据此而施行合宜的教育方法，旨在保障他们享有健全完善的生活：“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使顺应自然，发达具足，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体会，以择所趋，固未为晚，若入学之初，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⁴

周作人以儿童文学可供儿童教育应用，故特予留意；但并不忽略其文学特性，而且将此视为根本：“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撻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本义。”⁵自一九一一年归国后起，就积极从事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说：“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⁶所作《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等，皆属此例。他更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⁷结果只征集到一首儿歌，他自己则陆续记了二百来则。手稿留存至今，题为《童谣研究》，包括所辑录的古今有关论说，古代童谣和今代童谣，后者或据范寅

1 《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九号）。

2 《儿童研究导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三号）。

3 《人的文学》。

4 《童话研究》（一九一三年八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收《儿童文学小论》）。

5 同上。

6 《古童话释义》（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七号，收《儿童文学小论》）。

7 《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

《越谚》转抄，或为周氏亲自搜集。稿本注明“二年癸丑一月始业，拟编为《越中儿歌集》一卷”¹。以后他的兴趣由儿童教育转向民俗研究，拟据此写成《绍兴儿歌述略》，“笺注这一卷绍兴儿歌，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²，但仅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序言。

周作人依旧保持先前的文学抱负，虽然作品并不算多。他说：“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决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³可谓承袭当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云“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不过更深入了；由此进而提倡“人的文学”，只是一步之遥。而另一处所说：“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中之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⁴则又为标举“文学的贵族化”埋下伏笔。他提出的“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主要是针对当下通俗文学之迎合大众口味和肤浅干预现实而言，旨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这与他此前此后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语言形式时，仍持民报社听讲以来的“复古”立场，有待于文学革命兴起，再行订正。此时所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⁵，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与十年前的《孤儿记》相比，艺术手段大为提高，关注弱者的悲惨命运则一以贯之；虽然发表在《中华小说界》时被列为“社会小说”，却与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径庭。

1 鲍耀明收藏，已影印出版。

2 《〈绍兴儿歌述略〉序》（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歌谣》第二卷第三期，收《风雨谈》）。

3 “丙午至丙辰间所作”文章之一，无题，亦未完；后辑入《秋草园旧稿》。

4 《小说与社会》（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五号）。

5 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七期。

一九一三年春，绍兴成立学术团体“彘社”，参加者多系第五中学学生，周作人为名誉社员。在《彘社丛刊》上，他先后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新希腊小说三篇》和《拟曲五章》，有成于留日时期者，也有新的著译。偶尔也在绍兴以外的报刊露面，如《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和第十期登载的《艺文杂话》、《希腊拟曲二首》等。不过无论对该杂志抑或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这些作品都独出机杼，或者说不合潮流。周作人仍然保持着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时的那种超前姿态，其难被接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周作人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仍为“弱小民族文学”，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一脉相承；其一则是留日时期已有兴趣的古希腊文学。一九一一年归国后翻译丹麦安兑尔然（Hans Christian Andersen）¹的《皇帝之新衣》，一九一三年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显克微支的《酋长》，一九一四年翻译希腊蔼夫达利阿帝斯的《秘密之爱》和《同命》²，均在“弱小民族文学”之列。以后《域外小说集》出版增订本，这几篇都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四月，旧译《炭画》经鲁迅在北京设法，得以面世。同年五月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炭画》“印订颇劣，首有显氏雕像，表纸图案乃钱稻孙作者”。过了几年他才与钱氏相识，以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后来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法国须华勃（Marcel Schwob）³的《拟曲五章》⁴，则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须华勃所作本系模仿希腊拟曲（Mimos）⁵，周氏在介绍时，就追溯到海罗达思和谛阿克列多思。而早在留日时期，他已经译有《希腊拟曲》，或即后来《中华小说界》所载海罗达思的《塾师》、《媒媪》。周作人对于拟曲特别看重，誉为“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制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⁶。对于《塾

1 通译安徒生。

2 与《老泰诺思》辑为《新希腊小说三篇》，载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彘社丛刊》第二期。

3 通译施沃布。

4 一九一六年六月《彘社丛刊》第三期。

5 又译通俗短剧。

6 《〈拟曲〉序》（一九一二年二月《彘社丛刊》第一集）。

师》、《媒媪》，则评价说：“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¹当时尚是根据英语转译，十几年后他更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出版《希腊拟曲》一书，完成了将其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夙愿。——附带说一句，《希腊拟曲二首》发表一年后，还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农，也在《中华小说界》刊出《希腊拟曲》，赞美周译“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此乃二人最初的文字之交。

继前此在日本作《古希腊之小说》两篇，周作人一九一四年又写了《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分别介绍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而在汇录所译外国短诗的《艺文杂话》中，也有谛阿克列多思的两首《牧歌》。《希腊之牧歌》和两篇《古希腊之小说》曾寄往北京，鲁迅代为编成一辑，谋发表而未果。²一九一五年十月，周作人加进一篇《希腊女诗人》，仍用鲁迅当初给起的《异域文谈》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来稿酬十七元”³。这组文章和此前此后所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以及《一蕪轩杂录》中的《荷马史诗》、《波兰之小说》等，都可看作是为日后写《欧洲文学史》相关章节提前做的准备。《一蕪轩杂录》中有关日本的俳句、盆踊和浮世绘的各则，乃是他最早介绍日本文化的文字。

“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期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 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⁴《英国最古之诗歌》就是此番学习的一点成果。——查周氏日记，他读《倍阿乌耳夫》(Beowulf)⁵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

1 《希腊拟曲二首》(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十期)。

2 鲁迅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希腊牧歌》一篇，绎希腊小说二篇，二十二日发。”六月三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迄，约四千字。”六月四日日记：“寄许季市信并《异或文谈》稿子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

3 《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异域文谈》只是一组文章，并非一本书；《小说月报》付了周作人稿费，但未予发表。

4 《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5 通译《贝奥武甫》。

月六日据此作《英国最古之诗歌》，以为介绍。

虽然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天各一方，联系却很密切。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人通信各约四百封，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分别编号，可见重视程度。可惜这些信件均已遗失。周作人写了文章，有时仍交鲁迅修改润色¹。鲁迅所辑录的三国至陈、隋间乡邦文献《会稽郡故书杂集》，经周作人校对，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鲁迅写的序文署“会稽周作人记”，——周作人说：“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²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约仍不时在周作人的向往之中。及至“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遇先总是许季葑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子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³。蔡氏原籍山阴，周氏则属会稽，同在一城，两家又向有世谊。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有意约周作人帮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绍兴，周作人往听讲演，虽然“人多声嘈，殊不能闻”⁴，仍写了篇《听蔡先生演说记》。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

1 姑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仍不适，作《〈蜕龕印存〉序》，至午后了，三百七十余字，即交梓生。”六月七日日记：“下午寄北京函。”鲁迅同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龕印存〉序》一叶，七日发。”鲁迅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周作人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得北京廿一日函，改正《〈印存〉序》一首。”

2 《关于鲁迅》。关于“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记：“下午看三国《吴志》，摘晋侯《会稽典录》数则录之。”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架凉棚，就《嘉泰志》抄《会稽记》逸文，午了。”二十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四纸。”鲁迅同年六月三十日日记：“下午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记》、《云溪杂记》各一帖，二十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二叶。”鲁迅七月十日日记：“又得二弟信，……又附《会稽旧记》二叶，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十一日日记：“寄北京函。”鲁迅七月十五日日记：“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先贤传》一纸，十一日发。”

3 《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4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

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谈的大约即为邀请周作人前来任教之事。——对蔡氏来说，这应该算是“今”与“外”的一项内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鲁迅信，“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五日他与第五中学校长“说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鲁迅寄来的旅费；十八日县教育会另选会长；二十五日中学同事为他饯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启行往北京”。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又一次离家远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大哥的再次追随——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末一次了。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¹

1 《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二》。

第四章

一九一七——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周作人抵达北京，“下午八时下车，径自雇洋车到了绍兴县馆里来了”¹。他给大哥带来途经上海时买的几种书，二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²，——大概彼此都有一破寂寥之感罢。自此周氏兄弟就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南头的一间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³。直到两年半后，迁往他们所购的八道湾住宅。

周作人虽然应蔡元培之邀而来，及至四月五日二人见面，却是“功课殊无着”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的国文吧。”⁵——周

1 《知堂回想录·从上海到北京》。

2 鲁迅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日记。

3 《知堂回想录·补树书屋的生活》。

4 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日记。

5 《记蔡子民先生的事》（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中国文艺》第二卷第二期，收《药味集》）。

作人未来之前，蔡元培即通过鲁迅“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而周氏也已有“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¹的答复。不过他还是来了。大约蔡元培只是有心请他来校任教，教什么并无确切安排；周作人则以为事情已经落实。“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²——“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³。蔡元培终于将周作人挽留下来，后者的人生“大转折”遂得以实现。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沈尹默则在此任教，他们都成为周作人的世界里的角色。四月十六日，周作人开始在编纂处上班。共有两位编纂员：周作人负责英文；沈兼士负责日文，但当时在西山养病。——沈氏亦为章门弟子，以后对周作人的命运多少也有影响。

自此之后，即如周作人所说：“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学上班，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这图书馆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妆楼，广阔的几间楼房，涂饰得非常华丽，我的办公室乃是孤独对立的小房，样子似乎寺庙的钟鼓楼，不知道是什么用的，原来也很不错，如今被旧杂志堆放得没有隙地，实在有点儿气闷。但是我在那里却也过了些有趣的时光，在那旧杂志上面找到几篇论文，后来由我翻译了，登在《新青年》上面，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⁴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有半年时间，他都在沉默之中。——五六月间，生了一场病，以为是猩红热，却是麻疹，后来鲁迅据此写了小说《弟兄》；更重要的是，

1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鲁迅致蔡元培信。

2 《知堂回想录·北京大学》。

3 《记蔡子民先生的事》。

4 《知堂回想录·往来的路》。

周作人面临着一个重大转变。

这时“文学革命”已经发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鲁迅曾寄这杂志到绍兴，周作人的反应是“多可读”¹。不过载有胡、陈上述文章者，大约来北京后才见到。“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蕤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²胡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和“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陈独秀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则是：“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³周作人如果接受这一主张，意味着将放弃与鲁迅、许寿裳等自民报社听讲以来在语言方面一直坚持的复古立场。——如前所述，这一立场本有革命意味，现在情形却不同了。以后他说：“我们这样的复古，耗废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⁴然而周作人完成自己的“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这年六月，他翻译俄国梭罗古勃（Федор Кузмич Сологуб）⁵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仍然使用古文——这也是将来补充进《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最后内容，是他以文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收笔之作。九月，翻译英国 W. B. Trilse 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⁶，正文采用白话，所作附记仍为古文。着手起草的欧洲文学史讲义也是古文。到了十一月，他为此前译的《古诗今译》

1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2 《知堂回想录·蔡子民二》。

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收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4 《我的复古的经验》。

5 通译索洛古勃。

6 陀思妥也夫斯奇（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题记，才是“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题记经过鲁迅修改补充，说明鲁迅的立场也已转变；虽然他自己写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还要迟些。其实非但他们俩如此，《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以及继起响应的钱玄同的《致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都是文言。《新青年》至次年一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才宣布改用白话，采取新式标点符号。

周作人完成这一转变如此缓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看来，问题也许并不像胡、陈所说那么简单——他针对《新青年》下的“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的考语，就流露出这个意思。这年七月，发生张勋复辟，周氏兄弟避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新华旅馆，一周后才返寓。周作人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隅，‘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¹所受“刺激”和“影响”的结果就是：“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²于是也就不仅仅满足于“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了：“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该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³——尽管胡适说自己与陈独秀“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的改革”⁴，究嫌过于枝节，亦过于浮泛；周作人提出“思想革命”，则是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十年来他与鲁迅一直这样主张；现在时机到了，所考虑的也更深入，更透彻了。

周作人与鲁迅从接受“文学革命”到标举“思想革命”，尤其是诉诸《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回师大寄宿舍去。”⁵鲁迅曾记录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

1 《知堂回想录·复辟前后二》。

2 《知堂回想录·复辟前后一》。

3 《知堂回想录·蔡子民二》。

4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5 《知堂回想录·蔡子民二》。

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¹的话；钱氏自己则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²“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基之小说》。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基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³，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

1 鲁迅：《〈呐喊〉自序》。

2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世界日报》）。

3 最早在北京大学听周氏讲课的学生，未曾留下文字描述。冰心云：“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致陈子善信）又梁实秋一九二三年邀周氏往清华大学讲演，则云：“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看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忆岂明老人》）此前情形，大约相去不远。徐訏则云：“我在北大读书时，他是北大教授，但是我没有上过他课。我记得在布告牌上他是一个最多告假的教授，……周作人是很重要的教授，他不很会教书，但是学生都很愿意同他亲近。我有几个朋友，是国文系的学生，虽然对他很敬佩，但都说他不会教书。”（《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一九六八年三月《笔端》第五期）

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¹“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和“小说”两组。小说组成员还有胡适与刘半农。二位来北京

1 《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

2 原件藏国家图书馆，已整理出版。

大学任教比周作人稍晚，也都成为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刘半农曾谈到当时对周作人的印象：“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¹次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小说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此举虽非周作人所发起，他却堪称这方面的先驱。参与上述活动，使得周作人很快成为一个以革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群体中的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命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²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参加进德会，为乙种成员。——进德会发起于民国元年，此时为蔡元培所大力提倡，“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³。其基本戒为不赌，不嫖，不娶妾；选认戒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乙种成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选认戒者。“不嫖，不娶妾”，自符合周作人一向的妇女观；此后他涉及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待两个兄弟的婚姻的态度，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一九一八年旧历除夕，刘半农造访绍兴会馆。在所写的一首诗中，透露周氏兄弟“欲招缪撒，欲造‘蒲鞭’”，即有意在文学及批评方面一展身手。“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⁴继《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古诗今译》之后，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了所译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这是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完成于该年一月二十一日；接着又有所译俄国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面世⁵。周作人在《日本近三

1 刘半农：《记砚兄之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人间世》第一卷第十六期）。

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五、五十六期）。按鲁迅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

3 同上。

4 刘半农：《除夕》（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原注云：“（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5 不过周作人为这两篇译作所写附记仍为古文，这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反复了。

十年小说之发达》¹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小说所以毫无成绩，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现在他正是为了给中国作家提供可资模仿的榜样。继而揭载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²，乃是周作人“研究外国著作”的论文。此文更促使鲁迅以后将武者小路实笃这剧本译为中文。——所有这些，都在“欲招缪撒”之列。

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贞操论》（《貞操ハ道德以上ニ尊貴ナル》）³译为中文发表，是周作人首次在思想问题上向传统观念发难，也标志着他自张勋复辟以后的一番思考，开始有了结果。妇女问题素为周作人所关注，现在则说：“女子问题，终究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研究。”此文引起很大轰动，《新青年》接续刊出胡适《贞操问题》⁴、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⁵等文章，予以讨论。然而对周作人来说，其意义实际上超出妇女问题之外，乃是要对既有的全部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重新加以评衡，即如与谢野晶子所说：“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倘若人间为道德而生存，我们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隶，永久只能屈伏在旧权威的底下。这样就同我们力求自由生活的心，正相反对；所以我们须得脱去所有压制，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充实有意义。”周作人随后所写《祖先崇拜》、《思想革命》等，都是依循这一思路。《贞操论》使周作人一举成名。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与此篇是在《新青年》同一期上发表，兄弟二人遂一起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核心人物。

1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一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五十二号，又载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收《艺术与生活》。

2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3 同上。

4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5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而《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旨趣，正与周作人翻译《贞操论》的用意相通。

六月下旬，在收到北京大学的续聘书后，周作人回绍兴探亲。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已经从地方的中学教员变成全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翻译家和思想家了。赶上曾经任教的省立第五中学以及明道女校学生毕业典礼，周作人均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说。直到九月，才返回北京。其间翻译了多篇外国小说，如瑞典斯忒林培克（Johan August Strindberg）¹的《改革》、《不自然淘汰》，蔼夫达利阿谛斯的《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显克微支的《酋长》和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等，都交《新青年》陆续发表。他还抄录了一卷儿歌，共七十四首，寄给在北京的刘半农。

二

《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起开辟“随感录”栏目。周作人为这栏目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中译“英国安得森著”《十之九》的²，略有“欲造‘蒲鞭’”之意；第二篇则正面介绍了英国学者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³所著《爱的成年》（*Love's Coming-of-Age*）。文中引用凯氏的话：“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氏认为，这说法“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⁴。从最早写《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时起，妇女问题就一直在他考虑之中，此后也还写过许多文章，如《北沟沿通信》、《妇女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刘香女》、

1 通译斯特林堡。

2 《随感录二十四》（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收《谈龙集》时改题《安得森的〈十之九〉》。

3 通译卡彭特。

4 《随感录三十四》（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收《谈龙集》时改题《〈爱的成年〉》。《爱的成年》后由后安（郭须静）译为中文出版。

《〈双节堂庸训〉》等；实际上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正是凯本德的话。周作人的妇女观进而造就了他的社会观，以后更归结为：“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¹他之宣扬“新村主义”，乃至对中国一九四九年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同，都可在此找到答案。

“戏剧改良”是《新青年》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周作人和钱玄同也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²。钱玄同曾说：“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³较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不无发展，但仍嫌拘泥于形式问题；周作人则进一步深入到内容方面，指出旧戏的要害在于“野蛮”和“有害于‘人心世道’”，而这并不限于这一项，其实统可归为“非人的文学”。继此之后，周作人通过一系列文章来宣扬与之彻底对立的“人的文学”，亦即他这一时期的“中心观念”。而在他，实际上是张勋复辟之后——或者追溯得更远，是十几年来——思考的结果。

当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新青年》作为月刊，不能适应需要，所以另办周刊《每周评论》，仍由陈独秀主编，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周作人亦参与创办，月助刊资三元。但据他说：“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⁴自此除几乎每期都为《新青年》撰写或译介作品外，他又有了新的阵地⁵。十二月五日至二十日，周作人一连写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的文学》三篇文章，嗣后又作《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再论黑幕》等，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

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这批文章中，周作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人”的认识或关于“人”的理

1 《〈知堂文集〉序》（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作，收《知堂文集》、《苦雨斋序跋文》）。

2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3 钱玄同：《随感录十八》（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4 《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二》。“我们”包括鲁迅在内。这大约是订正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九三四年十月《青年界》第六卷第三期）关于参加《新青年》编辑会的说法。

5 一九一九年六月《每周评论》出至第二十五号，陈独秀被捕，以后各号改由胡适主编。周作人只在第二十八号和三十一号发表了所译须莱纳尔（Olive Schreiner，通译施赖纳）著《欢乐的花园》和《人生的礼物》。

想。“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进而是关于“社会”的理想。“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构成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最终则落实到关于“文学”的理想。“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¹在他看来，“人的文学”体现了上述关于人的理想，也有助于实现上述关于社会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²他将此称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以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相区别。一年后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时，把这一主张推到极致：“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

1 《人的文学》。

2 《平民的文学》（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每周评论》第五号，收《艺术与生活》）。

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¹周作人对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与当年他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译《域外小说集》时并无二致；只是现在更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文学》等既成就了思想家周作人，又成就了文学理论家周作人。

至于“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眼中则与实现“人的生活”背道而驰。基于此点，他对于中国的旧文学多所抨击，旨在一概推倒，建立“人的文学”。而当他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²就又归结到几年前所讲的“种业”了。周作人所针对的不是某一文学种类，而是整个社会意识。他特别强调其间的新旧之别：“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³

周作为“人的文学”提供的标本，便是此前此后他翻译的一批外国小说，多发表在《新青年》上。他说：“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有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⁴以后，当他将这些译作结集为《点滴》一书出版时，还应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请托，在序言里强调两点，即“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为翻译“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这显然承继了《域外小说集》的“逐译亦期弗失文情”，只不过译文由文言改为白话罢了。而现在强调此点，除求“信”外，也旨在帮助确立属于白话文的“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译作乃是“文

1 《新文学的要求》（一九二〇年一月八日《晨报》，收《艺术与生活》）。

2 《论黑幕》（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每周评论》第四号）。

3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每周评论》第七号）。

4 《人的文学》。

学革命”的重要成果，对于白话文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所以胡适称之为“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¹；后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体体现，卷末附有《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点更其凸显。《点滴》中俄罗斯、波兰、新希腊、匈牙利等国的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正与从前《域外小说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周作人说：“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与其说周作人通过翻译宣示一种意见，不如说介绍一批类型；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学”并不褊狭、浅薄，而是丰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不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²周作人的翻译，另一目的在于介绍小说体式，以资中国作家借鉴。譬如《晚间的来客》³附记所云：“我译这篇，除却介绍库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为要表示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淑拉（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些特别，却具有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八世纪的戏

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一九二三年二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

2 《〈点滴〉序言》（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作，收《点滴》、《苦雨斋序跋文》）。《点滴》中收录了托尔斯泰的《空大鼓》，梭罗古勃的《童子林的奇迹》、《铁圈》，库普林的《帝王的公园》、《圣处女的花园》、《晚间的来客》，斯忒林培克的《不自然淘汰》、《改革》。又，伊孛然（Henrik Ibsen）通译易卜生。

3 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淑拉，通译左拉。

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胡适在总结中国新文学运动时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¹后一方面，即因为《人的文学》而得以完成。“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因此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然而多年以后，周作人自己却有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的浪漫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²其实前述三个层面的想法本身并不错，“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尤其是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性的把握，所谓“浪漫思想”，乃是将“人”、“社会”与“文学”之间视同因果关系，即认为关于人的理想一定能在社会意义上得以实现，而“人的文学”真的对于此种实现有所促进。也就是说，是以“定能如此”取代了“应该如此”。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当时还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以后才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云云所质疑的，正在启蒙主义这一点上。

一九一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周作人写了两篇短文。晚年回顾平生，他自称这是“比较的至今还是记得清楚的”，“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³。其一是《思想革命》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当然应该纳入“思想革命”；但若说“思想革命”仅仅指“人的文学”，却未免把他的意思局限住了。这要联系到此前发表

1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 《知堂回想录·文学与宗教》。

3 《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上》。

4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每周评论》第十一号，收《谈虎集》。

的《祖先崇拜》¹，其中有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周氏对生物学知识早有兴趣，又受到英国博物学家怀德（Gilbert White）²、汤木孙（Sir John Arthur Thomson）³和法国昆虫学家法勃耳（Jean Henri Fabre）⁴等人很大影响；据此“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却是他自己的贡献。他说：“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⁵在周作人看来，所有旧观念旧道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均在重新审视之列，这才是他所谓“思想革命”；以后他的一系列非圣无法的思想与行为，根源即在于此。《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是周氏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足以概括他一生思想的作品。行文看似平和，其实具有非常激进的倾向。所质疑的是通常视为前提的东西。周作人说：“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的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⁶

不久，周作人有绍兴、日本之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遂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⁷此种反应，与从前辛亥革命时颇有差别。大概因为先已投身新文化运动，现在总爆发了，他遂认定这回真是“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随即亲身经历“六三”事件。他与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等作为北京大学教员代表，

1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每周评论》第十号，收《谈虎集》。

2 通译怀特。

3 通译汤姆森。

4 通译法布尔。

5 《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上》。

6 《过去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作，收《过去的工作》）。

7 《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下》。

前往第三院法科慰问被政府拘押的中小學生。當日作《偶成》¹一詩，將此次事件與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相比：“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里的舊帳簿上，／却可看到許多這樣的事，／用通紅的火一般的橫行字，／都在那舊帳簿的末頁上記着。”兩天後，周作人遇到軍警馬隊沖散聽學生講演的人群，歸而作《前門遇馬隊記》²。在他的散文中，該篇可謂新的創體，即如其所說“只是裝痴假呆的說些諷刺的話”³，以後稱作“別扭的寫法”⁴。據他講，此乃受了英國斯威夫（Jonathan Swift）⁵的啟示，儘管這時尚未讀到後者最見風格的《育嬰叢議》一文⁶。

三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里，我做了一首新詩，題云《小河》。同年七月我到日本去，順便一看日向地方的‘新村’，這兩件事情似乎很有連帶的關係。”⁷《小河》是周作人繼《兩個掃雪的人》之後寫的第二首新詩，但發表在前，且被《新青年》列為頭題，以後《兩個掃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見》等陸續面世，他因此成了當時最重要的詩人之一。《新青年》早在一年前即已登載新詩，是為“文學革命”最初的實績；比起胡適、沈尹默、劉半農和唐俟（即魯迅）等，周作人起手稍晚。然而《小河》被胡適稱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⁸，朱自清更說：“周作人隨劉復作散

1 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2 一九一八年六月八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收《谈虎集》、《知堂文集》。

3 《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下》。

4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

5 通译斯威夫特。

6 周氏为所译《育婴叢議》写的附记云：“十六七年前我翻阅泰纳的《英国文学史》，才知道斯威夫德的冷嘲的利害，虽然这‘英国狂生’的《海外轩渠录》（原名 *Gulliver's Travels*，译只二卷）早已译成汉文了。从那文学史及明多的《英国散文》上见到《乌议》（*A Modest Proposal*）的一部分，但说也惭愧它的全文终于未见，直到今年在上海买到一部斯威夫德选集的时候。”（一九二三年九月九日《晨报副刊》）

7 《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上》。《小河》载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

8 胡适：《谈新诗》（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专号”）。

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¹原因即如周作人自己所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²《小河》正在这一点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的形式“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³。周作人说，这诗与“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有如他所介绍的外国短篇小说绝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小河》作为诗——这一点最是重要——也对旧诗无所依赖，正如胡适所说：“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⁴所谓“新诗乃正式成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小河》与新村有甚关系，留待下面再说。

一九一九年三月初，周作人完成《日本的新村》⁵一文。此系据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生活》等抄译而成，其间缀有按语。有云：“一九一〇年，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年生）纠合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那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盛行，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一时无人理会；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画，便是这理想的一种实现；去年冬初，先发队十几个人，已在日向选定地方，立起新村（Atarashiki Mura），实行‘人的生活’。”此前他与日本新村已有接触⁶，所写《人的文学》等，受新村的影响很深。现在则是首

1 朱自清：《选诗杂记》（收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2 《〈扬鞭集〉序》（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语丝》第八十二期，收《谈龙集》）。

3 《苦茶庵打油诗》（一九四五年十月《杂志》第十四卷第一期，收《立春以前》）。波特莱尔，通译波德莱尔。

4 胡适：《谈新诗》。

5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收《艺术与生活》。

6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往日本邮局寄新テシキ村一円二十戈。……阅《新テシキ村ノ生活》第一部了。”十一月九日，收到新村本部寄来的说明和会则。以后周作人几次给新村汇款。至于与武者小路实笃的联系，则可追溯到一九一一年周氏回国后不久。武者小路实笃《周作人与我》（夏亨译文载一九四四年大连书店《文坛史料》）云：“大概是《白桦》杂志出版的第二年，因为《白桦》的临时增刊‘罗丹号’余书无多，在杂志上刊出购买从速的广告时，从中国方面，有一个人来预购‘罗丹号’了，这人就是周作人。”很长时间周氏都是《白桦》的读者。

次著文介绍。更早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谈到武者小路及白桦派，说是“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

四五月间周作人赴日，本拟访问新村，因匆匆回国而未能如愿。七月二日再赴日本，于六日抵达。七日到日向福岛町石河内村，第一次与武者小路见面。——武者小路夫人描述说：“周先生戴着金边眼镜，是绅士气十足的白脸书生（也许是因为其他人风吹日晒的脸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我才有了那样的感觉？），很温和，身材正和实笃一样高。年纪三十五（按西洋算法），落落大方，让人一见如故。”¹周氏在此亲身参加劳动，并成为新村的第一位中国会员。十一日离开后，又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几处新村支部。周氏特作《访日本新村记》²详述经过，有云：“不但实见一切情形，而且略得体验正当的人的生活幸福，实是我平生极大的喜悦。”八月十日，他返回北京。九月十六日，首次在通信中提到“建设本国的新村”³。十一月八日，又为天津学术讲演会讲《新村的精神》。此后一年多里，鼓吹新村尤为着力，发表了《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讨论》等文章，并在《新青年》登出《新村北京支部启示》：“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有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⁴当时他受武者小路实笃影响很大，在本年日记末尾特地抄录了“武者小路著作目录”，共计二十六种。

对周作人来说，从提倡“人的文学”到宣传新村，可谓顺理成章。他说：“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生活。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⁵与《人的文学》所讲完全一致。他有关人的理想，是预期要获得社

1 武者小路房子：《周先生》（原载一九一九年《新村》第八期，董炳月译文载一九九八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

2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新潮》第二卷第一号，收《艺术与生活》。

3 《答袁潜昌君》（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4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

5 《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晨报》，收《艺术与生活》）。

会实现的，新村被他视为最佳途径；换句话说，新村体现了他关于社会的理想。“安全的生活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的要求，人类也自然是一律的，算不得什么新理想，不过求这生活的方式与内容有点不同罢了。”他对内容方面固然关心，在文章中详加解说；方式方面亦多留意，一再提及。周作人信服凯本德所说，认定“社会的共产制度”不仅必须，而且必然；却担心诉诸暴力手段实现，所以倾力宣传新村。最早在《日本的新村》中已经讲到：“新村的运动，便在提倡实行这人的生活，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革命，省去一回无用的破坏损失。”实地考察之后，更说：“新村的人，要将从来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来，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们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国人生活的不正当，或者也只是同别国仿佛，未必更甚，但看社会情形与历史事迹，危险极大，暴力绝对不可利用，所以我对于新村运动，为中国的一部分人类计，更是全心赞成。”¹——这就要回过头去讲《小河》了。这首诗“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但是就中“稻草”针对“小河”所说：“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以及“桑树”所说：“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将我带倒在沙滩上，/拌着他卷来的水草，/我可怜我的好朋友，/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其实都有寓意，即如日后他自己所揭示的：“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鄙人是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²周作人希望通过新村来解决这一问题。

周作人还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起，支持此时兴起

1 《访日本新村记》。

2 《苔茶庵打油诗》。

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出面为之募款，“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¹。“工读互助团”与新村都标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颇有相通之处。周作人与李大钊在一九二〇年春天相识，后者也成了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二人皆积极参与“工读互助团”事；而当“半工”无法维持“半读”，运动遂告失败，李大钊提出：“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²正是转而认同新村。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此外别无办法了。”³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作《新村的讨论》⁴，是周作人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承认新村“不容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他将来的实现”。几年以后他说：“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⁵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慰安，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的诗的时代。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⁶不过新村之于周作人，并非过眼云烟。这是他第一次致力于社会问题之根本解决，此种信念以后始终不曾消除。通过理解新村，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更趋深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有云：“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类分子论，是一律的，以个人论，不妨各各差异，而且也是各各差异的好。……倘若藉口大同，迫

1 李大钊等：《工读互助团募款启示》（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2 李大钊：《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3 《“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工学》第一卷第五号）。

4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批评》第五号。

5 《《艺术与生活》自序》（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语丝》第九十三期，收《艺术与生活》、《苦雨高序跋文》）。

6 《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下》。

压特殊的文化与思想，那又是一种新式的专制，不应该有的。大同与统一截然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或者因此说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新村的人虽不曾说过他们是根据什么主义的，但依照我个人的意见，却可以代他们答应一个‘是’字。”如果说其间特别有所取舍的话，周作人正是由此奠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思想立场。以后他也说：“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¹基于此点，周作人反对一切群体的或个人的，政府的或民间的思想专制。

当初访问新村，周作人曾说自己“思想上因此稍稍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气”²；待到中国的“新村运动”烟消云散，他思想上的“阴暗的影”或许反倒重了。其实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已经讲过：“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实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长处，但同时也或可以说是他的短处，因为他信托人类，把人的有几种恶的倾向轻轻看过了。”由此而萌发的对于社会或者说对于人类根本不作指望，也成为他后来思想的主要基调。

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安定，成就卓著。访日归来后，他携家眷先在绍兴会馆间壁曹家外院暂住；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与鲁迅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宅——这是出售绍兴祖屋后，由鲁迅经手买下的。不久鲁迅迎接母亲北上，夫人朱安及周建人一家随行。将近年底，周氏家族在北京定居。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母亲住中院北房西侧一间，朱安住东侧一间，中间为吃饭间；鲁迅先住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搬到前院前罩房中间三间。周作人除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外，又在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每周两小时，教的仍是欧洲文学史。“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

1 《外行的按语》（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作，收《谈虎集》）。

2 《访日本新村记》。

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¹鲁迅在大学任教，乃自此始。

一九二〇年春，周作人接受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的邀请，加入该社。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江绍原、李小峰、孙伏园、叶绍钧等组成，其中不少人将在周作人以后的命运中或多或少起到作用。自《新潮》第二卷第五期起，周作人被推举为主任编辑，他也在这里发表了所译俄国弥里珍那作《老乳母》、日本千家元磨作《蔷薇花》等短篇小说。周作人的译著《点滴》于这年四月编就，八月列为“新潮丛书第三种”，分两册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扉页上印了尼采《察拉都斯德拉的序说》里的话：“我爱那一切，沉重的点滴似的，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滴滴下落者，他宣示说，闪电来哩，并且当作宣示者而到底里去。”注明“唐俟译本”。《点滴》无疑是新潮社所推举的新文学的典范。

《点滴》收录了周作人至此为止的白话文译作，以前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加上他以文言译的其他短篇小说，也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汇编一册，经陈独秀介绍，次年由印行《新青年》的上海群益书社出版²。鲁迅代周作人撰写的序言有云：“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较之从前几乎无人问津，显然今非昔比。译者宣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域外小说集》与《点滴》相继出版，完整地展现了周作人十几年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成绩。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等七人聚会北京东城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宅，商议成立文学研究会，他被推举起草宣言。其中提出，成立该会的理由有三：“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

1 《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

2 按群益版《域外小说集》无出版月日，鲁迅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日记：“寄邵次公以《域外小说集》一本。”可知印出当在此前。

的基础”，——虽然多年后周作人说：“可是事实正是相反，设立一个会便是安放一道门槛，结果反是对立的起头。”¹所指的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间的纠葛，不过这是后话了。以上三点，多少还有新村的余响。次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周作人与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同为发起人，但他因病未能与会。当时沈雁冰接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全面改革，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周作人以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参与其间，在这一期上，登载了他此前的讲演稿《〈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所译日本加藤武雄作短篇小说《乡愁》。以后《小说月报》与《新青年》一起成为周作人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²。

“在一九二〇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³他指的是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的《儿童的文学》⁴。其中有云：“第一，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第二，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因为这一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又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这篇文章正如其所说：“特色就在于用白话所写的，里面的意思差不多与文言所写的大旨相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大意只在说明儿童的特殊状况，不应当用了大人的标准去判断他。”⁵文章的反响自是不同昔日，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被纳入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之中。《人的文学》中说，欧洲先后有关于人、妇女

1 《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

2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记者附白”有云：“周作人先生本允做的两篇文章，现在因周先生病了，不及做来登在第二期了；我们很不幸，不能早读到周先生的文章，只得请大家等着一下了。”该期所载周氏的《翻译文学书的讨论》，第四号的《到网走去》（志贺直哉作）和第五号的《日本的诗歌》，均成于患病前。从第八号起，周氏才有新的著译刊出。

3 《知堂回想录·儿童文学与歌谣》。

4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5 《知堂回想录·儿童文学与歌谣》。

和小儿的真理的“发见”；“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儿童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同样是“从头做起”，将有关“发见”揭示出来。

这年十二月，周作人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并与沈兼士共任主任。他的贡献在于，两年后《歌谣周刊》创刊，坚持不将所谓“猥亵的歌谣”排斥在征集对象之外。所撰《发刊词》有云：“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足可见其明达之处。以后他与钱玄同、常惠一起以个人名义征集，“我们所搜集的不单是歌谣，凡是猥亵的故事笑话以及猥亵话都在收罗之列”¹。他还作《猥亵的歌谣》一文，专门论述此事。然而这项严肃的研究终未完成，搜集的资料亦已散失。

四

周作人患了一场大病——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云：“晚颇疲倦。”二十四日：“晚微热。”二十五日：“热三十八度三分，咳嗽。”二十九日：“上午往山本医院，云系肋膜炎。”次年一月一日始“卧病”。这对他的情绪、思想影响很大。在一首题为《梦想者的悲哀》²的诗中，说：“‘我的梦太多了。’ / 外面敲门的声音， / 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 / 你这冷酷的声音， / 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 / 阿，曙光在那里呢？ / 我的力量真太小了， / 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 / 穿入室内的寒风， / 不要吹动我

1 《一点回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民间文学》第六期）。

2 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晨报》；又与《过去的生命》等合为《病中的诗》，载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收《过去的生命》。

的火罢。/灯火吹熄了，/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只怕在风里发火，/要将我的心烧尽了。/阿，我心里的微焰，/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与先前在新村运动中那种兴奋坚定大为不同，似乎已从理想回归现实之中，仅存“心里的微焰”而已。三月初稍愈，译了千家元磨的短篇小说《蔷薇花》，所作论文《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才成半篇，即因病情又复恶化而辍笔。

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入住山本医院，五月三十一日出院。“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¹包括《过去的生命》、《中国人的悲哀》、《歧路》、《苍蝇》和两首《小孩》，都是鲁迅探望他时笔录下来。这些诗流露出更为浓重的迷惘彷徨之意，《歧路》²一首尤其明显：“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吾师乎，吾师乎！/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

六月二日周作人到西山碧云寺养病，九月二十一日返家，十月重回北京大学授课。养病时所写《山中杂信》³，揭示自己的心境说：“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

1 《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

2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又载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期，收《过去的生命》。

3 《山中杂信》共六节，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至九月六日陆续发表于《晨报》，收晨报社本《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

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餐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共产主义”、“耶佛孔老的教训”大抵与他曾经宣扬的新村同属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尼采的超人”、“善种学”和“科学的例证”则与此相对立。及至下山前不久，还说：“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此种思想上的两重性，对于周作人来说是新的气象，以后一直延续下去；要而言之，其一趋向“兼济天下”，其一趋向“独善其身”，分别与他身上的“流氓鬼”和“绅士鬼”相呼应。——《山中杂信》是写给《晨报》的编辑孙伏园的。他本名福源，是周作人在绍兴时的学生，一九二〇年进《晨报》编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该版扩展为《晨报副刊》。孙伏园所编《晨报》第七版和《晨报副刊》之于周作人的意义，犹如从前的《新青年》及《每周评论》。

西山养病期间，周作人读了多部佛经。“这回所看的都是些小乘经，随后是大乘律。”¹或为家人带来，或向佛经流通处函购。以后他说：“我读《梵冈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戒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尝举食肉戒中语，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加以说明云，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又盗戒下注疏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我曾屡致其赞叹之意。”²与十六年前那次阅读

1 《读戒律》（一九三六年九月《青年界》第十卷第二期，收《风雨谈》）。

2 《我的杂学》。

佛经相仿佛，这回对于周作人来说，又好比一场精神洗礼。“明智通达”、“博大深厚”的气象，以后也在他的笔下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世事亦在他的关注之中。“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¹他写了多篇抨击现实的杂文。其中《碰伤》²系针对新华门前军警殴伤索薪教员事件而作，又是用的“别扭的写法”。他说：“事情出在六月上旬，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教员自己‘碰伤’，这事颇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³

《美文》⁴也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之作。其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⁵作者提出：“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现代文学史上的随笔或小品文，即由此发端。而自觉地表达有关白话文的文体意识，这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其意义并不限于随笔写作。“文学革命”至此才从“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⁶的程度更上一层楼。周作人曾举自己的《祖先崇拜》为例说：“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余情。”⁷这也可以用来批评包括周氏在内的第一代白话文作者此前多数文

1 《山中杂信》。

2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晨报》，收《泽泻集》、《谈虎集》、《知堂文集》。

3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

4 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晨报》，收《谈虎集》。

5 这里所谓“论文”，即 essay，通译随笔。

6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7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收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章。胡适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¹正道着《美文》及周作人等随后将此种文体意识付诸实践的特殊贡献。前述《山中杂信》、《碰伤》，以及先用日文后用中文写的两篇《西山小品》，就是周氏最早一批美文之作。

周作人说，他在西山“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²。周氏开始自学世界语尚在此前，一九二〇年九月二日“阅Jones世界语教本了”，十月二十日致长岛丰太郎信中则云：“我正在学习世界语。书能稍稍读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语写作。”³九月二十三日“译世界语小说二篇”，即波兰普鲁斯作《世界的霉》⁴和亚美尼亚阿伽洛年作《一滴的牛乳》⁵，是他这方面最早的译作。周作人宣传新村时即已提倡世界语：“将来因时势的需要，可以在国语上更加一种人类通用的世界语，此外种种国语方言，都任其自然，才是正当办法；而且不仅言语如此，许多事情也应该如此的。”⁶现在学习这门语言，则有如当年学习俄文，旨在搜罗难得的材料，以便从事移译。他也就掌握了除英文外的第二种译介东欧等“弱小民族文学”的手段。以后他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事实上是不十分适用的，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联合，即如‘希望者’的世界语实在也只是欧印语的综合，取英语的文法之简易，而去其发音之庞杂，又

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 《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

3 同一信中还说：“我也想学习朝鲜语，但没有合适的教材，而且朝鲜语发音很难，所以没有什么进步。如果能懂一点朝鲜语，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去日本，顺便也想去朝鲜看一看。现在我对朝鲜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不知为什么对朝鲜怀着一种爱，想了解朝鲜人的精神世界。”学朝鲜语的计划后未实现。

4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时事新报·学灯》，又载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5 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6 《访日本新村记》。

多用拉丁语根，在欧人学起来固属便利，若在不曾学过欧语的人还是一种陌生的外国语，其难学原是一样的。”¹不过因为周氏精通英文，自无此种困难；养病期间，据世界语译出波兰戈木列支齐（Wiktor Gomulicki）²作《燕子与胡蝶》、普鲁斯（Boleslaw Prus）作《影》、显克微支作《二草原》、科诺布涅支加（Maria Konopnicka）³作《我的姑母》、推忒玛耶尔（Kazimierz Tetmajer）⁴作《故事》等。此外还译了十多篇英文和日文作品。《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也在这时完成。他虽在病中，著译仍颇为高产。

一年多前，鲁迅替周作人代写《域外小说集》新序，谈到“当初的计画”是“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现在他们又开始酝酿性质相近，然而规模更大的计划。这便是《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病愈后，两项译事陆续完成。与此前出版的《点滴》一样，《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仍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为宗旨，即如周作人在序言中所说：“而且我们生活的传奇时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国的革命思想的冲激；我们现在虽然几乎忘却了《民报》上的文章，但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我们当时希望波澜及东欧诸小国的复兴，实不下于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大约还很深，终于使我们有了一国传奇的异域趣味；因此历来所译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国度的作品。”《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收录的是《点滴》之后他这方面的十八篇译作；与《点滴》不同的是，还将鲁迅所译九篇和周建人所译三篇一并阑入，这就更有承袭《域外小说集》的意思了⁵。

1 《知堂回想录·爱罗先珂上》。

2 通译戈穆利茨基。

3 通译科诺普尼茨卡。

4 通译泰特马耶尔。

5 周氏兄弟所译当时极受欢迎，这从鲁迅八月二十五日致周作人的信中可见一斑：“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但他九月八日的信却检讨了二人的翻译风格：“我看你译小说，还可以随便流畅一点（我实在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前回的《炭画》生硬，其实不必接他，从新起头亦可也。”就周作人的译文而言，《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特别是《现代日本小说集》，较之《点滴》已不那么“生硬”了。

周作人翻译的第一篇日本小说是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发表于《新青年》。现在他与鲁迅打算专门编译一本集子，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经过反复讨论，周作人于八月拟出目录，以后又有修订¹。他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²《现代日本小说集》专门介绍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文学，与《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以及《点滴》之涉及多个国度、不同年代自有差别；就编法而论，《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均照录各篇在报刊发表时译者所撰附记，《现代日本小说集》则由周作人重新编理一份作者介绍，附于卷末，体例更其严谨。可以说此乃“选集”，彼为“汇编”。其一致之处则在于所推举的均非英法德美等外国“主流文学”。周作人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³所强调的正是此种独到的取舍倾向。他自己选译的日本现代小说，与《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所收篇章有一点相近，多为细腻委婉、悲哀寂寞之作。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和现代日本小说总的方向下，周作人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口味，大旨仍不背离当年《哀弦篇》中所说，而更趋质朴含蓄；“悲天悯人”四字，约略可以概括。《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编就；《现代日本小说集》则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完成，收录周作人译作十九篇，鲁迅译作十一篇。二书由胡适经手，分别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和一九二三年六月列入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出版。

1 鲁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日记：“得二弟信并稿一篇，说目一枚。”当日致周作人信：“《日本小说集》目如此已甚好，但似尚可推出数人数篇，如加能，又佐藤春夫似尚应添一篇别的也。”九月十七日致周作人信：“查武者小路的《或日ノ一休》系戏剧，于我辈之小说集不合，尚须别寻之。此次改定之日本小说目录，既然如此删汰，则我以为漱石只须一篇《一夜》，鸥外亦可减去其一，但《沉默之塔》太怪，当别译，而若嫌页数太少，则增加别人著作（如武者，有岛之类）可也。该书自然以今年出版为合，但不知来得及否耳。”

2 《〈现代日本小说集〉序》（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作，收《现代日本小说集》）。

3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序》（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一九二一年十月周作人通过英文转译了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妓女对话》中的三篇，即《大言》、《兵士》和《魔术》，十一月翻译台阿克利多思的牧歌《情歌》，十二月翻译朗戈思的小说《苦甜》¹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还有重新翻译的台阿克利多思的牧歌《割稻的人》和海罗达思的拟曲《媒婆》，均在《晨报副刊》“古文艺”一栏发表。此前他在病中写过一篇短文《胜业》²，有云：“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他打算“行贩”的显然不止是《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之类，还扩展到古典作品。这与不到一年前他的意见颇有不同，那时说：“陈胡诸君主张翻译古典主义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过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在中国此刻，大可不必。那些东西大约只在要寻讨文学源流的人，才有趣味；其次便是不大喜欢现代的思想的人们。”³现在他恰恰是从中发现了“现代的思想”，就像关于路吉阿诺斯的对话所说：“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所以译他出来。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而得倖存。”⁴此种眼光，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之译介希腊拟曲。但是这回意味着他的思想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道主义思潮为依靠，逐步转向以古希腊文明为根据；而在他看来，“希腊是古代诸文明的总汇，又是现代诸文明的来源”⁵。“人情”一词，也可形容周作人对包括狂言等古代作品在内的整个日本文化的把握；而他对狂言的欣赏还在于趣味相投——这与古希腊和他的关系相比，要更具体一些。就像他所说的：“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学之一种，用了当时的口语，描写社会的乖谬与愚钝，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纯朴而且淡白，所以没有那些俗恶的回味。”⁶这是周作人翻译路吉阿诺斯和日本狂言的起头，以后两方面都卓有成就：前者晚年有

1 系《达夫尼斯和赫洛亚》(*Ta Kata Daphnin kai Khloen*)的一节，周氏此后所译《希腊小说断片》，亦选自这部田园小说。

2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晨报》，收《谈虎集》、《知堂文集》。

3 《翻译文学书的讨论》（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

4 《大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晨报副刊》，收《陀螺》）。

5 《在希腊诸岛》（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收《永日集》）

6 《骨皮》（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晨报副刊》，收《狂言十番》）。

直接译自古希腊文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后者先出版了《狂言十番》，又增补为《日本狂言选》。

五

周作人说：“一九二二年春天起，我开始我的所谓文学店，在《晨报副刊》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一栏。”¹从作为开场白的《自己的园地》起，到最后的《情诗》，共十九篇。开宗明义就讲“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其中或申说文学观念，或具体评鹭作品，以后被阿英誉为“确立了新中国文艺批评的基石”²。后来他即以这年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分界：此后“写批评文章”，此前“多翻译外国作品”³——《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后，有关“弱小民族文学”和现代日本文学的翻译较之先前明显减少。

周作人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来有关言论，都可统摄在这一观念之中，只是前后侧重略有不同罢了。从前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说：“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此时则说：“现在却以个人为个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

1 《郁达夫的书简》（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香港《新晚报》）。对于周氏此举，钱玄同说：“自园主人努力种‘自己的园地’，我极以为然。我以为比做几条‘杂感’‘短评’较有意味——而且讲起功利主义来，也实在较为有用得多。”（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日致周作人）

2 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周作人小品〉序》。

3 《〈书房一角〉原序》（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作，收《书房一角》）。

4 《自己的园地》（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¹其间不无差异，但并非对立；区别在于现在他虽不排斥文学的功用，却也不再那么强调。对此他在先于专栏写的一篇《文艺的讨论》²中讲得最清楚：“我以为文艺是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因其情思之纯真与表现之精工，引起他人之感激与欣赏，乃是当然的结果而非第一的目的。”至于他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这个人的文艺也即真正的人类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文艺。”与《新文学的要求》所云“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也是一致的。“自己的园地”一辑是周作人自一九二一年初开始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产物，这一转变此时尚未彻底完成。有一点订正值得注意，即针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重加界定说：“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与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的标准，也觉得不很妥当。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而真挚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论思想与形式的如何。……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³不仅对相关问题重新有所厘清，更意味着他从此不再站在社会立场去理解文学。当进而说：“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旧剧就是他的一个影子。”已经为他日后不能认同“无产阶级文学”打下底子了。

“自己的园地”最有意义之处，与其说是申明了作者的文学观，不如说是树立了他的批评观。“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

1 《自己的园地》（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2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

3 《贵族的与平民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叔本好耳（Arthur Schopenhauer），通译叔本华。

这样艺术作品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¹这一观念贯穿整组文章始终，尤其体现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和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评论中，当时二书颇受攻击，周氏特为辩解，并分别厘清了“不道德的文学”与“情诗”的问题。——以后阿英说：“《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²周作人把人道主义作为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加以坚持；这条线上的一切，皆应在宽容之列。他拿这个宽容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态度也与当初写《人的文学》时有所变化。周氏说：“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³因为不是义务，“所以没有服从传统的必要”；因为有此权利，所以不应盲目拒绝传统，何况其中多有值得新文学借鉴之处。这就为他以后对于包括“本国的古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新甄别评估奠定了基础。

周作人对于宽容的强调始自新村运动，现在已成为其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并不限于文学批评一隅：“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⁴在周作人看来，“权威的迫压”不仅来自于守旧的或少数的一方——这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间所着力反抗的——还可能来自与之对立的一方，所以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⁵

周作人如此说法，似乎不无隐忧；没过多久，所担忧者就成了事实。这年三月，上海、北京先后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面世，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三月二十四日，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信说：“观其通电（今日

1 《文艺上的宽容》（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2 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周作人小品〉序》。

3 《古文学》（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4 《文艺上的宽容》。

5 《诗的效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晨报》),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绝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钱氏以其特别的敏感,再一次起到催化作用:二十九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报应》一文,首次对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做出反应,称从中“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三十一日,《晨报》又刊出他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联署的《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四月七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的信》予以驳难:“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陈之间遂有一场短暂的论战:四月十一日,周作人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此前此后他还写了《古今中外派》、《拥护宗教的嫌疑》、《思想压迫的黎明》等文章;四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又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周作人不复回应¹。——这里补说一句,一九二〇年九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旧同人多有不再合作者;周作人却在继乎其后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上发表多篇译著,对陈独秀表示支持²。现在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了。

周作人对基督教精神颇有体会,所作《人的文学》与宣传新村,都不无这方面的背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燕京大学文学会讲演《〈圣书〉与

1 顺便可以提到,梁启超当年四月十六日在题为《评非宗教同盟》的讲演(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晨报副刊》)中,尽管指出:“我觉得这回各处非宗教同盟团体发出来的电报,那态度有点不对。为的是客气太盛,把恳切严正的精神倒反掩没了。我们看过去,不知不觉便和两个月前看那‘洛阳才子’之‘驱鳄文’‘讨武檄’式的电报起一种联想。我以为许多‘灭此朝食’‘划除恶魔’一类话,无益于事实,徒暴露国民虚懦的弱点,失天下人的同情。至于对那些主张信教自由的人加以严酷的责备,越发可以不必了。”但仍认为非宗教运动“是一种好气象”。

2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第九卷第五号所载《病中的诗》、《山居杂诗》和翻译的西班牙伊巴涅支(Vicente Blasco Ibáñez, 通译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著《颠狗病》,是周作人最后一次在《新青年》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更指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一九二一年西山养病时，还提到“自己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¹然而此时如其所说，“我们宣言的动因，已在北京报上申明，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所关心的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是思想自由——包括独立思考和自由发表言论——是否仍然可能，亦即正在连载的“自己的园地”中一以贯之的宽容问题。在周作人看来，思想自由以个人为出发点，亦以个人为归结处，——其为陈独秀所不能理解者，即在于此。周作人视思想自由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之为文明的标志。他说：“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要用政府之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要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²而后一重也许更其迫近：“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中国的政府连自己存在的力量还未充足，一时没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将来还是人民自己凭藉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³

周作人后来编文集时，上述论战之作一概未收，似乎是要淡化它们的意义，然而对于其思想历程来讲，这意义着实不小。如果说此前他主要面对的是“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从现在起要顾到另外一面，即“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了。在并未放弃前一种反抗的情况下，他显然认为自己更重要的任务是从事后一种反抗；而这将意味着某种抉择——他不会不知道，在非宗教大同盟背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发挥作用。几年前的“小河”之忧，似乎更具体、更切近地体现为“人民自己凭藉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了⁴。在周作人看来，上述两种“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其实是一回事，他的反抗也出于同一立场，即无论写《人

1 《山中杂信》。

2 《复陈仲甫先生信》（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晨报》）。

3 《思想压迫的黎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晨报》）。

4 钱玄同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ウチカアセ万|万|（布尔什维克），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桑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所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的了。”

的文学》还是宣传新村时一直强调的个人主义立场：“即使我的思想侥幸不在这回被除灭之列，但是尽够使我不安了，因为我们失了思想自由的保障了。我所最怕的，实在还是在关于自己的这一点。”¹这里所谓“自己”，始于“某一个人”，止于“每一个人”——谁都无可躲避“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假如不反抗它的话。而在他看来，陈独秀对待持有异议的自己，与非宗教大同盟对待信教者，态度如出一辙。

周作人并不以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为孤立事件；将此置诸“思想界的倾向”的背景下，他说：“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²这与钱玄同所说“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即义和团运动正相一致；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所高扬的“民主”、“科学”终将化为泡影。以后周作人说：“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转向理知方面发展，致力于所谓新文化的提倡，截至民国十年止，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时期，然而自此以后感情又大占优势，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³即系针对“非宗教运动”而言。——当时胡适对此不予认同，著文批评周氏“未免太悲观了”⁴。周作人未作辩解，但不久后在《晨报副刊》发表《真的疯人日记》和《夏夜梦》两组短篇小说，多数篇章讲的仍是关于“统一思想，定于一尊”的“杞忧”。其中《统一局》⁵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司其事；大家没有姓名，只是号码；“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此点尤其深刻：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而当周作人认准“思想界的倾向”，他也就为自己确立了毕生的抗争方向；以后他写文章，总是竭力攻击这个笼罩中国的“统一局”，抵御思想专制或思想统一。在继续写的“自己的园地”专栏中，他再一次针对文艺问题

1 《古今中外派》（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晨报副刊》）。

2 《思想界的倾向》（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

3 《五四运动之功过》（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京报副刊》）。

4 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周作人编《雨天的书》时，将此文附于《思想界的倾向》之后。

5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晨报副刊》，收晨报本《自己的园地》、《谈虎集》、《知堂文集》。

重申立场：“据我的意见，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一切主张倘若与这相背，无论凭了什么神圣的名字，其结果便是破坏文艺的生命，造成呆板虚假的作品，即为本主张颓废的始基。”¹

这段时间，对周作人来说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是爱罗先珂的来华。前者系由胡适发动，一年多前即已酝酿，因周氏生病而搁置。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胡适安排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周作人见面，议定此事。三月六日签合同，自七月起发生效力。“内容是说担任国文系内的现代国文的一部分，原来的一部分则称为古典国文，旧有两位教员，与这边没有关系，但是现代国文这半个系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也是不行，学校里派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我便规定国语文学四小时，我和许君各任一半，另外我又设立了三门功课，自己担任，仿佛是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类，每星期里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我原来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职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上课至多十二小时，这在我是不可能，连许地山的一总只是凑成十小时，至于地位薪资那就没有计较之必要。”²据胡适讲：“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³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的是外国文学，这一年他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安排是“欧洲文学史三小时，日本文学史二小时，用英文课本，其余是外国文学书之选读，计英文与日本文学小说各二小时”⁴，此前著译也以这方面的介绍为主；对本国文学加以研究，尤其是有关五四新文学的寻流讨源，乃是由此起头。他这方面观念的形成，也与在燕京大学的授课有关。以后他介绍说：“我不知道这应当怎样教法，要单讲现时白话文，随后拉过去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相连接，虽是容易，却没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

1 《文艺的统一》（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2 《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

3 胡适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日记。

4 《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谈到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说：“这门功课在几年之后也停止了。”具体时间不详。他在北京大学讲授日本文学史的始末亦待考。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八号所载《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列有“《日本文学史》——周作人编”一项，不过该书并未出版。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其时冰心女士还在这班里上课，废名则刚进北大预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现，这些人的文章后来也都曾选过，不过那是在民国十七八年的时候。这之后加进一点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¹燕京大学这门课程，直到一九三一年周作人专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辞去各校兼职时才结束。

爱罗先珂(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Ерошенко)是俄国盲诗人，一九二一年五月被日本政府驱逐。那时鲁迅就注意到他，将其作品译为中文。一九二二年春初，蔡元培聘请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世界语，并托周氏兄弟照顾。他从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起住在周家，七月三日前往芬兰参加第十四回万国世界语学会年会，十一月四日返京，次年四月十六日回国。周作人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²爱罗先珂的到来，对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颇有促进作用。“以后各处的讲演，照例是用世界语，于是轮到我去跟着做翻译兼向导，侥幸是西山那个月的学习，所以还勉强办得来。但是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讲演大抵安排得很好，翻译却也就不容易，总须预先录稿

1 《关于〈近代散文〉》（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

2 《怀爱罗先珂君》（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晨报副刊》，收晨报本《自己的园地》，收《泽泻集》时，与《送爱罗先珂君》、《再送爱罗先珂君》合并为《爱罗先珂君》）。

译文，方才可以，预备时间比口说要多过几倍，其中最费气力的是介绍俄国文学的演说，和一篇《春天与其力量》，那简直是散文诗的样子。”¹周译爱罗先珂的讲演稿，有《春天与其力量》、《公用语之必要》、《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女子与其使命》四篇存世。爱罗先珂在华期间的诗作《与支那少年》、《人类一分子》和《摇篮歌》，亦由周氏译为中文发表。爱罗先珂第一次离京后，周作人写文章说：“他毕竟还是诗人，他的工作只是唤起人们胸中的人类的爱与社会的悲，并不是指挥人去行暴动或别的政治运动；他的世界是童话似的梦的奇境，并不是共产或无政府的社会。他承认现代流行的几种主义未必能充分的实现，阶级争斗难以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认现社会制度，他以过大的对于现在的不平，造成他过大的对于未来的希望，——这个爱的世界正与别的主义各各的世界一样的不能实现，因为更超过了他们了。想到太阳里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丝雀，想到地面上来的土拨鼠，都是向往于诗的乌托邦的代表者。诗人的空想与一种社会改革的实行宣传不同，当然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正当的说来，这种思想很有道德的价值，于现今道德颠倒的社会尤极有用，即使艺术上不能与托尔斯泰比美，也可以说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罢。”²周作人似乎是以一个前理想主义者的心情去理解爱罗先珂的，他在爱罗先珂身上也许多少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诗人的空想”云云亦可用来形容曾经热中的新村运动，其实同为“诗的乌托邦”而已。

一九二二年十月，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梁实秋登门拜访周作人。多年以后，梁氏回忆说：“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³

1 《知堂回想录·爱罗先珂上》。

2 《送爱罗先珂君》（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晨报副刊》，收晨报本《自己的园地》、《泽泻集》）。所云“雕”、“金丝雀”、“土拨鼠”，见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

3 梁实秋：《忆启明老人》（一九六七年九月《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三期）。

六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周作人发表《妇女运动与常识》¹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人的文学》中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从前他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已有“反求诸己”之意；现在或以“讲人道，爱人类”未免虚幻，而“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实在得多，所以就切实解答这一问题：“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Gnōthi seauton），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知道你自己”乃是“回到根本”；强调此点，正是周作人的独到之处。他所列举的“常识”包括：“第一组的知识以个人本身为主，分身心两部；生理又应注重性的知识”，“第二组是关于生物及人类全体的知识”，“第三组是关于天然现象的知识，第四组是科学的基本知识。”以上四组，“他们的用处是在于使我们了解本身及与本身有关的一切自然界的现象，人类过来的思想行为的形迹，随后凭了独立的判断去造成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常识所能够在理智上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好处了”，“第五组特别成为一部，是艺术一类，他们的坏处完全是感情上的”。这里所说，既是周作人有关“人”的理解，又是他对自己的总结。他的全部思想，即以上述“正当的人生的常识”为基础。

不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开辟一个新的专栏，题为“绿洲”，皆为读书之作。较之此前的“自己的园地”，这组文章更接近后来所谓“周作人小品”——或者说，真正的周作人风格，是从这个专栏开始酝酿的。其中《猥亵论》²介绍道：“蔼理斯（Havelock Ellis）是现代英国的有名的善种学及性的心理学者，又是文明批评家。”自此周作人便与这个

1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妇女杂志》第九卷第一号，收《谈虎集》。达勒思，通译泰勒思。

2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名字联系在一起，以至有“中国葛理斯”之称。周作人对葛理斯的评价：“他的好处，在能贯通艺术与科学两者而融和之，所以理解一切，没有偏倚之弊。”使人联想到《妇女运动与常识》中对于艺术科学两类常识的强调；他从这时开始把葛理斯引为知己，似非偶然。两氏最大的相同之处，正在总是基于常识发表意见。几个月后周氏又在《文艺与道德》¹中讲到葛理斯，他自己也将成为这样的人：“他毫无那些专门‘批评家’的成见与气焰，不专在琐屑的地方吹求，——却纯从大处着眼，用了广大的心与致密的脑估量一切，其结果便能说出一番公平话来，与‘批评家’之群所说的迥不相同，这不仅因为他能同时理解科学与艺术，实在是由于精神宽博的缘故。”周作人最看重的还是葛理斯关于性心理的意见，上述两篇文章均涉及这一问题。以后他说：“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里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²葛理斯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让周作人深感契合，求之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这里又要讲到两件事情。爱罗先珂末次来华期间，发生了“剧评事件”。先是爱罗先珂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剧有所批评，由鲁迅译出，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在《晨报副刊》刊出；不久魏建功发表《不敢盲从》，文中“看”字又特加引号，对于失明的爱罗先珂显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袭用爱罗先珂的话回击道：“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³周作人也在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发表了《见了〈不敢盲从〉的感想》、《爱罗先珂君的失明》，态度不似鲁迅激烈，意见则完全一致。“事情是这样下去了，但是第二年的正月里，他往上海旅行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说他因为剧评

1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

2 《我的杂学》。福勒耳 (Auguste-Henri Forel)，通译福雷尔。勃洛赫 (Iwan Bloch)，通译布洛赫。鲍耶尔 (B.A.Bauer)，通译鲍尔。凡特威耳特 (Van de Velde)，通译范德费尔德。

3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

事件，被北大学生撵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国去了，什么原因别人没有知道，总之是他觉得中国与他无缘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撵走了，也未始不可。”¹四月十七日，即爱氏离京次日，周作人作《再送爱罗先珂君》，多有感慨：“他的去留，在现在的青年或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²嗣后又以《出京后的爱罗先珂》为题发表友人来信，显见未能忘怀。然而去者自此再无消息。——直到一九六四年，周作人才由日文杂志得知，爱罗先珂“于五二年十二月在故乡死去，现在俄文全集已出云”³。

有阮真者，撰文声言决意与妻子离婚，并自称是此一关系中的牺牲，引发一些议论。周作人三月二十九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谁是牺牲的问题》，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离婚与结婚》，而阮真也写了《答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回答说：“我并不非难（而且可以说是赞成）他们的离婚，但也决不能赞许他凭倚旧道德的那种态度。”“在“绿洲”的一篇《〈结婚的爱〉》⁴中，又说：“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坏一切而自己不知负责，加害与人的，所谓自由恋爱家的男子。”此文系介绍斯妥布思（Marie Stopes）⁵的同名著作，所述斯氏“两性关系应该是女子本位”的主张，最能代表周作人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是非标准，尤其体现在以后他对两个兄弟婚姻问题的态度上。《晨报副刊》继而又有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的“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以周作人说：“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⁷

1 《知堂回想录·爱罗先珂上》。

2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收晨报本《自己的园地》、《泽泻集》。

3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八日日记。

4 为阮真《答周作人先生》所作附记，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六日《晨报副刊》。

5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当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李小峰译《结婚的爱》一书在《晨报副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

6 通译斯托普斯。

7 《卑劣的男子》（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

周作人所作《“重来”》¹一文，可以视为有关“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至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这与前一年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一样，在周作人的思想进程中都是不容忽略的环节；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所说可能是一回事。周作人有如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未必寄予希望，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失望。而他在对现实做出判断的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方向；此后他所反抗的对象，相对来说就以“青年的‘重来’”为主了。而当他说道：“人间最大的诅咒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在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不仅重申了《祖先崇拜》的立场，而且深化了相关认识：“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应该也只能从本质上去理解，“重来”正是本质使然。

周作人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日记说：“起首作‘土之盘筵’。”这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开的一个新的专栏，包括翻译的童话、知识小品和儿童剧。小引有云：“我随时抄录一点诗文，献给小朋友们，当作建筑坛基的一片石屑，聊尽对于他们的义务之百分一。”²似乎比“绿洲”更

1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这与爱罗先珂此前在北京写的《时光老人》（鲁迅译文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晨报四周年纪念增刊》）所说颇为接近：“……但看见青年的人们学着老年，许多回重复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错处和罪恶，还说道我们也是人，昂然的阔步着，我对于人类的正在进步的事，就疑心起来了。不但这一件，还有一看见无论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间，在社会上，在政治上，重复着老人的错处和罪恶的青年，我就很忧虑，怕这幸福的人类接连的为难了几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周作人可能多少受到他的影响。《重来》，通译《群鬼》。

2 《〈土之盘筵〉小引》（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

接近于他曾经讲过的“胜业”。然而才发表到第二篇，就在附记中说：“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¹——这番话写在七月二十日，其实并未“生病”，所指的是两天前发生的一件大事：一向志同道合的周氏兄弟失和了。

有关这一事件直接的文字记载，只有鲁迅与周作人当时的日记，以及周作人写给鲁迅的一封信。合而观之，可知大致经过。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同日周作人日记不见异常迹象，似乎与之无关，他亦无所察觉。十七日周作人日记“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当是涉及此事；但多年后他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用剪刀剪去了”²。次日他作书一通：“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³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得斐然函，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同日鲁迅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二十六日鲁迅日记：“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二十九日鲁迅日记：“终日收拾书册入箱，夜毕。”三十日鲁迅日记：“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八月一日鲁迅日记：“午后收拾行李。”二日鲁迅日记：“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同日周作人

1 《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收入《儿童剧》时，该篇附记有所删节，这里引用的话均未保留。

2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3 一九六一年许广平出版《鲁迅回忆录》，披露说：“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信，是什么样子呢？在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在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周作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云：“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此信全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八〇年《鲁迅研究资料》第四期，后又收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一书。

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¹

关于周作人信中所云“昨日才知道”的“过去的事”，亦即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世间议论纷纷²，均无确实证据。鲁迅只隐晦地起过“宴之敖者”的笔名³，此外没有只字发表；周作人则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⁴所以只能说是“不知究竟”。

此前此后周作人所作文字，也许多少反映他的想法。七月十七日——即“才知道”的当天——他为前一日译完的武者小路实笃作《某夫妇》⁵写了“译后附记”，有云：“《约翰福音》里说，文人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的妇人来问难耶稣，应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头打死，耶稣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篇的精神很与他相近，唯不专说理而以人情为主，所以这边的人物只是平常的，多有缺点而很可同情可爱的人，仿佛把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痛刻的解剖与陀斯妥也夫斯奇（Dostoievski）的深厚并合在一起的样子。像莎士比亚的阿赛罗（Othello）那样猛烈的妒忌，固然也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但是这篇里所写的平凡人的妒忌，在我们平凡人或者觉得更有意义了。”似乎不无借题发挥之意。七月二十日他着手翻译日本长与善郎作《西行法师》⁶，于次日

1 值得留意的是，母亲鲁瑞与两个儿子合住，却对此事无所干预。许寿裳似曾居间调解，见所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忤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毫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遭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所云“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与鲁迅日记不合。许氏称：“鲁迅……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亦不确。又，许羨芬《回忆鲁迅先生》云：“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先生由砖塔胡同迁居到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老太太也由八道湾十一号和他来同住。”然而鲁迅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日记尚云：“晨母亲来。”关于母亲移居西三条事，周氏兄弟日记均无记载。估记起初仍如在砖塔胡同那样，时常来往，终于定居下来。而周作人夫妇移住八道湾十一号中院北屋，则在此后。

2 直到鲁迅死后，才有人公开谈及周氏兄弟失和之事，如郁达夫《回忆鲁迅》、荆有麟《鲁迅回忆片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收《欣慰的纪念》）等。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周作人是公开表示和鲁迅绝交过的。”不确。周氏只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致江绍原的私人通信中说：“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

3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敖，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最早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署名“宴之敖者”，此文写在一九二四年冲突之后，有云：“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子身道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此后所作小说《铸剑》里的复仇者，亦化名“宴之敖者”。此外又有“宴敖”、“敖”和“敖者”等笔名。

4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5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一号，收《两条血痕》。“阿赛罗”，通译“奥瑟罗”。

6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十三号，收《两条血痕》。

完成。倘若对比“土之盘筵”之“现在不及说了”、“没有精神再写了”，选译这篇好像也有特别意思。小说中说：“那是可怜的人们呀。一生都为了别人的事情烦恼过日。这叫做对人之心，佛法上称做众恼。火宅的人们，一生为此对人之心所驱使鞭打，没有自己娱乐的安闲时间。为什么不再愉快的有趣的度世的呢？我真想把自己的宽闲的性情分赠他们一点哩。”仿佛对于《某夫妇》中“在我们平凡人或者觉得更有意义”的“平凡人的妒忌”，乃是一番自我调剂。

七月二十五日，周作人为自己编辑中的集子作序，有云：“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¹这里袭用了致鲁迅信中的“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却不愿陷入“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仍然希望有所“寻求”。这个意思也说在五天后写的一篇散文诗中：“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²八月三日——亦即鲁迅迁居的次日——“土之盘筵”专栏又在《晨报副刊》恢复登载。其实先前在《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的附记中即已说过：“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负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孩子们讲笑话。”这里又袭用了致鲁迅信中的“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同样期望有所振作。虽然，“土之盘筵”最终仍未完成预定计划，就截止了。

如果说上述文字显示周作人曾经深受打击，那么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真正打击他的并非兄弟失和，而是造成失和的那个原因——至少对周作人来说，从未怀疑其真实性。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周作人与十多日后第一次回到八道湾的鲁迅发生冲突，可见怨恨仍未消除。该日周作

1 《〈自己的园地〉自序》（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晨报副刊》，收晨报本《自己的园地》、《苦雨斋序跋文》）。

2 《寻路的人——赠徐玉诺》（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过去的生命》）。

人日记：“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里提到的三个“知情人”，同样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¹。至于周作人随后写的《破脚骨》²一文，与其说攻击鲁迅，倒更像自况之作，所云“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使人联想到日后他形容自己“流氓鬼”的一面为“精神上的‘破脚骨’”³。

至此兄弟二人关系彻底断绝；虽然他们以后可能在公开场合见过几面⁴，彼此的文章亦偶有呼应之处⁵。有关这一事件的后果，还要从头说起。一九二三年八月，鲁迅所著小说集《呐喊》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三”出版，该丛书署“周作人编”，乃是兄弟失和前最后一次合作。此前已经初见成果的合作翻译计划，也都一律终止，是以《现代小说译丛》只出

1 郁达夫曾经转述张凤举、徐耀辰私下所说：“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回忆鲁迅》）

2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3 《两个鬼》（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语丝》第九十一期，收《谈虎集》）。

4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周作人日记：“五时又至女师大，赴学生会。”同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女师校学生会。”八月十日周作人日记：“下午二时半往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五时散。”同日鲁迅日记：“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九月十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宗帽胡同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午返。”同日鲁迅日记：“上午往校务维持会。”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孔德告假，赴女师大。”同日鲁迅日记：“午后往女师大评议会。”所参加的是同一会议，规模很小，碰面在所难免。另有几回活动，场面稍大，打个照面亦不无可能。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观女师大开学，午返。”同日鲁迅日记：“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女师大赴刘、杨追悼会，下午返。”同日鲁迅日记：“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八月二十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纪念会。”同日鲁迅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演说。”四日后鲁迅离京南下；假若周作人那天见着鲁迅，该是最后一面。

5 如周作人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京报副刊》发表译作《伤逝》：“我走尽迢迢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奉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与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冥，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附记有云：“这是罗马诗人喀路路死的第百一首诗，现经某君参照几种译本说给我听，由我自主地笔述下来的。‘琵琶词侣’画有一幅插图，今转载于后，一个人举起右手，上题‘哀哀哀该乏勒’三字，大约即系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据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越九日而鲁迅作小说《伤逝》。以后周作人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下》。喀路路死（Gaius Valerius Catullus），通译卡图卢斯。琵琶词侣（Aubrey Beardsley），通译比亚兹莱。

版了第一集¹，而《现代日本小说集》亦为未竟之作²。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编定于失和之后，当初《晨报副刊》的专栏里本有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评论³，此番即予删汰，——该文称：“阿Q这人是中国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这使人联想到周作人自己曾经谈到的“种业”，兄弟二人的确一贯彼此理解，相互启发。几年后周作人所译《点滴》改订为《空大鼓》重新出版，删去鲁迅所译题词，新序有云：“又尼采的文句与题目一并撤去，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意思。”⁴周作人可能还不知道，与鲁迅失和，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在当时，他显然决意“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直到晚年，才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⁵

这年九月，周作人所著《自己的园地》列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由北京晨报社出版，收入“自己的园地”、“绿洲”两组专栏文章，以及杂文二十篇。《自己的园地》呈现了周作人此前主要的文学成就，就像面世不久的《呐喊》呈现了鲁迅此前主要的文学成就一样。然而现在已经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⁶了。

1 有趣的是，鲁迅去世前一年翻译罗马尼亚索陀威奴（Mihail Sadoveanu，通译萨多维亚努）的《恋歌》和保加利亚伐佐夫的《村姑》，似乎又回到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路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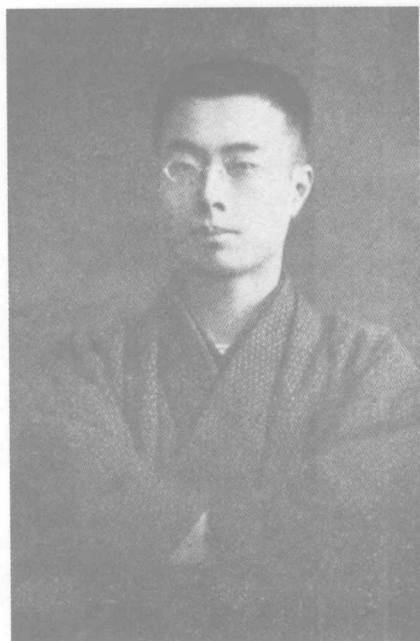
2 《〈现代日本小说集〉序》有云：“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如岛崎藤村，里见弹，谷崎润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诸人，本来也想选入，只因时间与能力的关系，这回竟来不及了，这是我们非常惋惜的事。”《女子与读书》（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作，收《苦口甘口》）又云：“在二十年前我们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

3 《〈阿Q正传〉》（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原列《自己的园地》之八）。此文收《鲁迅的青年时代》，但是添写的“引言”中说：“我的那篇文章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不确。

4 《察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在用作《点滴》题词的“我爱那一切……”之后有云：“喂，我是闪电的宣示者，是云里来的沉重的一滴，但这闪电便名超人。”周氏所谓“我不喜欢那个意思”，当指“超人”而言。

5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下》。

6 《诗经·小雅·大东》。按鲁迅一岁拜长庆寺和尚为师，取法名“长庚”；周作人字“启明”则如前所述，乃因章太炎在信中写错了“起孟”二字。



一九一〇年，东京



一九一一年，东京
(左羽太信子，右羽太重久)



一九二二年秋，绍兴（前排左一羽太芳子，左二鲁瑞，左三羽太信子，
后排左一周建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前排右三鲁迅，右四爱罗先珂，
后排左三江绍原）



一九二〇年代后期，北平（左一刘半农，左二沈尹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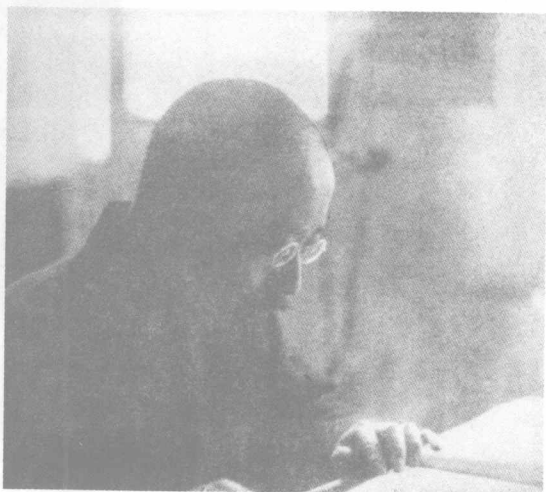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北平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北平（前排左一张凤举，左二俞平伯，左三马豫，左四马季明，左五钱玄同；中排左一沈尹默，左二徐祖正，右一湛亚达，右二沈兼士，右三黎子鹤，右四马裕藻，右五沈士远；后排刘半农）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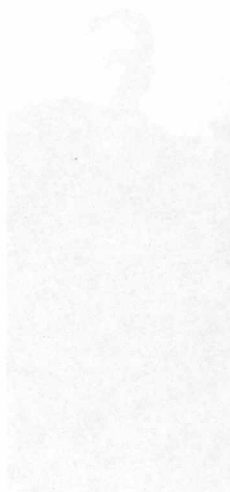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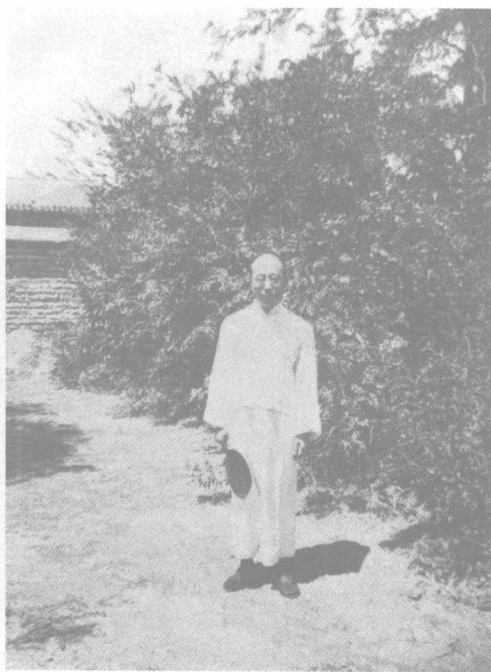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北平（左羽太信子，右一周丰一，右二周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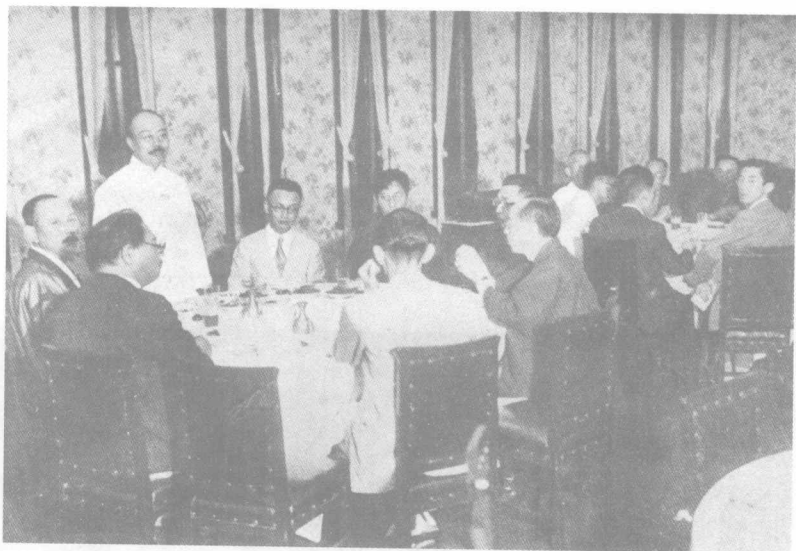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北平（右羽太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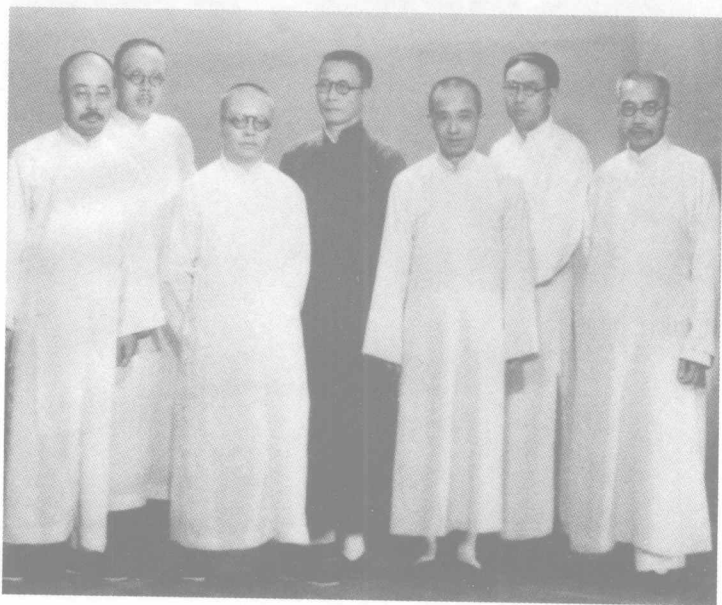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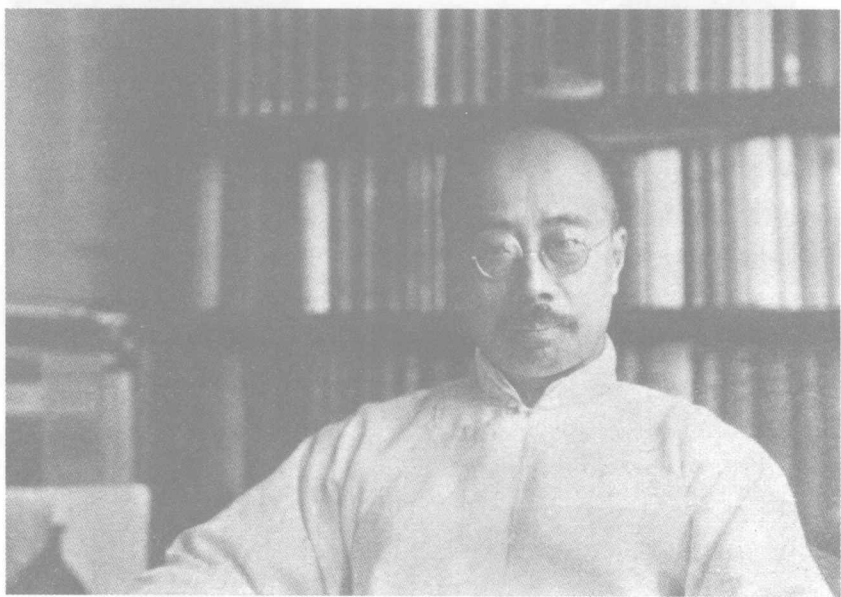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东京（左四徐祖正）



一九三六年九月，北平（右一许寿裳，右二沈兼士，右三朱邈先，右四沈士远，右五钱玄同，右六马裕藻）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北平

第五章 一九二三——

—

周作人与鲁迅绝交时所说“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三个月后面世的《不讨好的思想革命》¹中。文章有云：“我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激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大有好处，即失败了，至少在同派总还是回护感谢。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人五人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民党的人可以得孙中山的信用，津派的人可以蒙曹仲三的赏识，虽然在敌派是反对他们；至于思想改革家则两面都不讨好，曹仲三要打他，孙中山未必不要骂他，甚至旧思想的牺牲的老百姓们也要说他是离经叛道而要求重办。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

¹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

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当初他提出“思想革命”，是预期要实现的；现在看来，这也属于“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不过所质疑者仅此而已，并不包括“思想革命”本身；换句话说，他并未质疑始终“赞成思想革命”的自己。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所指尚且限于“此时此地”；待到写《教训之无用》¹一文，援引了蔼理斯和斯宾塞的话，前者说：“一个人如听人家说他做了一本‘道德的’书，他既不必无端的高兴，或者被说他的书是‘不道德的’，也无须无端的颓丧。这两个形容词的意义都是很有限制的。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后者说：“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据此，周氏将“思想革命”之“不讨好”视为一条历史规律，求诸古今中外，无有例外：“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中国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地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今当不知怎么的更是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艺术趣味的人的欣赏，那就尽够好了。至于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难怪要被骂了。”

话说至此，显然希望彻底放弃此前曾经坚持，然而已经动摇的启蒙主义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文堪称周作人思想进程上的一座界碑。如其所说：“我自己承认是范缜的神灭论者，相信人只有形体，没有精神可以离形体而独存，至于上帝与神更是不在话下了。可是尽管如此相信，却有时也要表现出教徒那种热心，或者以为宗教虽是虚妄，但在某种时地也是有用，有时也还要这样的想，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²然而“教训之无用”

1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知堂文集》。

2 《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下》。

毕竟只是周作人此后思想的一端——虽然可能是最主要的一端；他仍不时以教训者的面目出现，而且期待着这些教训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周作人自相矛盾之处；他自己不但不掩盖，甚至有意彰显这一点——显然他更愿意做个丰富的人，复杂的人。

周作人提出“教训之无用”，并不单单因为对于受众失望，也与他愈发崇尚宽容精神有关，——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就以宽容为核心融为一体。此前不久写的《中国戏剧的三条路》¹有云：“我们平常不承认什么正宗或统一，但是无形中总不免还有这样思想。……将来无论社会怎样变更，现出最理想的世界，其时一切均可以平等而各人的趣味决不会平等，一切均可以自由而各人的性情决不能自由；有这个不幸（或者是幸）的事实在那里，艺术的统一终于不可期，到底只好跳出乌托邦的梦境，回到现实来做自己的一部分的工作。”也就是说，“教训之无用”，于被动的一方是拒绝接受，于主动的一方则是无意强求，——否则岂不成了以自己“性情”的“自由”去获取他人“趣味”的“平等”了么。不仅拒绝别人统一自己的思想，也不应该以自己的思想去统一别人。然而周作人既不否认思想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于思想本身，而无所谓是否付诸实施——也不排除它仍有可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才说：“对于世间‘不道德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也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²这里说的是自己之于别人，他当然也希望别人这样对待自己。此即《〈自己的园地〉自序》所说：“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总而言之，无论作为“言者”还是“听者”，周作人都有意从群众之中脱身出来。

“教训之无用”可以说是负面的意见；对于周作人这位“教训者”来说，还需要有正面的说法以为倚靠。他发表了《蔼理斯的话》³，从蔼氏所著《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中抄录两节话：“有些人将以为我的意

1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号（二十周年纪念号），收《艺术与生活》。

2 《教训之无用》。

3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赫拉克来多思，通译赫拉克利特。路克勒丢思，通译卢克莱修。

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 (Herakleitos) 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 (Lucretius) 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周作人说：“这两节话我最喜欢，以为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前一节是讲自己的立场，后一节是讲自己的职守，均以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为背景，而限于“当下”。这一进程是不断延续，永无止境的；他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传承的角色，不具终极意义，无须固步自封。此种传承且与“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无关，故无所谓“教训之无用”。此前无论标举“人的文学”还是宣扬新村，均是当作“最终解决”的方案提出，现在他将这一前提视为虚妄，予以废弃。

从上述立场出发，周作人在一九二四年初宣称：“这一年里我的唯一的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¹ 主要针对此前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而言，因为他的文学观已经随着人生观的改变而改变了。后来他说，此时所作《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国语文学谈》及所译蔼理斯《论左拉》“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他总结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

1 《一年的长进》（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三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知堂文集》）。

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¹一九二五年伊始，他干脆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白明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²周作人“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的文学批评生涯，自《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起始，至《人的文学》达到高潮，又以“自己的园地”一组殿后，如今乃告一段落。将来他未必不复谈论此类问题，不过宗旨不一样了。

“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在周作人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将这层意思发挥到了极致。譬如《北京的茶食》³中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喝茶》⁴中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所体现的都是他因蔼理斯的启发而建立的新人生观。——虽然他在这方面所受影响，并不止于蔼氏一家。举个例子，从前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中介绍过夏目漱石的“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⁵就与现在所说颇有相通之处。这个新人生观，周作人概括

1 《《艺术与生活》自序》。

2 《元旦试笔》（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语丝》第九期，收《雨天的书》）。

3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泽泻集》、《知堂文集》。

4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语丝》第七期，收《雨天的书》；又收《泽泻集》、《知堂文集》，改题《吃茶》。

5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一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五十二号，收《艺术与生活》）。

为“生活之艺术”。他说：“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单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他（按指蔼理斯）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¹前引文将“无用的游戏与享乐”与“日用必需的东西”，“偶然的片刻优游”与“胜业”并举，不使偏废一端，正是“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蔼理斯所说“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本已蕴涵此意。而当周作人指出：“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则俨然是以文明传承者的姿态出现。——他之所谓“我想订正我的思想”，也就归结于此。

周作人上述《北京的茶食》、《喝茶》，以及同期所作《故乡的野菜》、《济南道中》、《济南道中之二》、《济南道中之三》、《苍蝇》、《苦雨》、《沉默》、《死之默想》等文，意义当然不仅限于宣传一己的观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开辟题为“雨天的书”的专栏。序中有云：“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这里“空想”乃至“随便写一两行”，亦当归在“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片刻优游”之列；或者反过来说，“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偶然的片刻优游”应该理解为“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的手段，而所谓“雨天”显然象征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实。“雨天的书”这专栏“在半年里只写

¹ 《生活之艺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语丝》第一期，收《雨天的书》）。

了六篇，随即中止了”¹，周作人却藉此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散文美学；换句话说，他曾经提倡的“美文”，似乎更是落实于此。总括来说，就是：“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无论述生活，忆往事，还是谈思想，记读书，要皆如此。文章写出来有此境地，关键还在写时所持态度——当周作人意识到“教训之无用”，明确了“生活之艺术”，也就尽可“平淡自然”地写他的文章。他比以往更充分地表现自己。谈到“雨天的书”一类文章时说：“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不久他更宣布，“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²，而不再写长篇论文。联系前面提到的“文学小店”关门，可以说文学批评家周作人从此就让位于散文家周作人了。尽管他强调说：“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³但《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苍蝇》等篇，显然更侧重于“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偶然的片刻优游”，在他的创作中，别启“闲适小品”一路。单以文章而论，此前此后所作，除路数相近者如《乌篷船》、《谈酒》外，似乎都不及这批作品名声来得更大。

二

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云：“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先是周作人记录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⁴，继而鲁迅的《我的失恋》又被抽下，孙伏园遂愤而辞职。这对周作人影响自然不小，因为此前他写文章多交《晨报副刊》发表，——情形与此相仿的还有鲁迅。“伏园既然离开了

1 《〈雨天的书〉序》（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语丝》第五十五期，收《雨天的书》改题《自序二》，又收《苦雨斋序跋文》）。

2 《〈艺术与生活〉自序》。

3 《〈雨天的书〉序》。

4 《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五十四期）。《徐文长的故事》载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和十日《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便提自己来办一个出板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于是由他自联络筹办，结果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李小峰章川岛，作为经营出板的人，做文章的则另外约了些人，经过一次会商，这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了。”¹即如周作人十一月二日日记所述：“下午……又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颀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晚八时散。”杂志如期面世，大获成功。不久孙伏园被请去办《京报副刊》，于十二月五日出刊；《语丝》则由周作人实际主编。自此《语丝》及《京报副刊》成了他发表意见的主要阵地。

周作人所撰《〈语丝〉发刊辞》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这番讲《语丝》的话，也可以用来说《京报副刊》，或多或少还可以说此前的《晨报副刊》，更恰切的则是表白周作人自己这一时期文章总的倾向。

四个月前，周作人著文解释他写作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生上的——双重态度：“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那么尽可简单地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

¹ 《知堂回想录·〈语丝〉的成立》。

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¹后一方面上承《〈自己的园地〉自序》之“我已明知道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前一方面则接续“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他又说：“我是喜翻筋斗的人，……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意表之内的事，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基于“教训之无用”，对于自己的一种新的定位。

此后周作人一再强调这一点。他针对日本厨川白村“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的两本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当时鲁迅的译文正在报刊掲載——和《往十字街头》，造了一个“十字街头的塔”，作为自己现在立场的象征：“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这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姿态；而在周作人看来，如果不首先或不始终是个人主义者，也就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文章中还说：“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他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所以我这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不过这个名称是由我替他所取的罢了。”²“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即《沉默》所云第二种方法，“出

1 《沉默》（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知堂文集》）。

2 《十字街头的塔》（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在街头说道工作”即第一种方法，仿佛判然有别，实则同为一人——在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在他看来，远有蔼理斯等，近有《语丝》各位同仁，无不取这一立场。

上述文章讲到“沉默”、“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主要是从“教训之无用”出发；周作人并非没有另外一重考虑。《语丝》上与《十字街头的塔》同期发表了她的《净观》¹一文。——“净观”实为“生活之艺术”的核心，而这又特别针对有关两性关系的看法而言；即如周氏所说：“平常对于秽褻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种为依据，）自己洁净地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他所以推崇蔼理斯即是这一原由；《净观》谈的则是日本学者废姓外骨，表示“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谓秽褻趣味，即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其实还是同样道理。——周作人说：“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本是法国拉勃来(François Rabelais)²的主张。拉勃来“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异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闹着，披着猥褻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实在是他的本领”，周氏引为对待日趋严重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禁锢——当时《自己的园地》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都被北洋政府查禁——的态度。虽然他强调说：“他又说将固执他的主张，直到将要被人茶毗为止：这一点很使我们佩服，与我们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余次一样。”

来自拉勃来的这一影响，构成了周作人的人生观的重要成分。他说：“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耶稣，孔丘，释迦，梭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

1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2 通译拉伯雷。

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觉得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我并非绝对不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而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那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拼命。”¹“如我屡次所说，我是同拉勃来（Rabelais）师父一样的，我只主张到需要被烤了为止。我对于这个地球并没有了不得的情愫。我觉得为了这班到底不大会聪明起来的仁兄们而被烤是不很值得的事。”²“教训之无用”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无效”，即无人理会；一是“无用”，即无所建树，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此一前提下，周作人将其个人主义立场发挥到了极致。作为思想者他要求绝对自由，无论申说与否；作为人则还以活着要紧。而正因为作为思想者而活着，活着也就不仅仅是活着。以后他在关键时刻所做抉择，与此或许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相对于“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周作人更多选择的是“出在街头说道工作”——既未“被火烤了”，也就不必“为止”。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交替之际，他宣布：“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这是现实刺激，也是自我反思的结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³周作人“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眼光来看”⁴，上述“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甚可警惕，是以不遗余力加以抨击。尤其针对日本人在北京所办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先后写了《清朝的玉玺》、《日本与

1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语丝》第二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2 《答张崧年先生书》（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

3 《元旦试笔》。

4 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九日给胡适信中的话。十一月五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胡适视为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之举，公开表示抗议。周作人则称“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私下与胡适有所争论。

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几篇文章。

周作人晚年回顾说：“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可是人们都不当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国人所办的新闻造谣是常有的，算不得什么，不值得费笔墨来同它斗争，这种理由有一半是正确的，但是一半也在读者，要能够知道它是在造谣才好，可是在中国这怎么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鞞毂之下’，数百年来习惯于专制之淫威，对于任何奇怪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会主张，简直是与《顺天时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是重大。”¹这被他称作“由我匹马单枪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涉及北伐、清党等一系列事件。“我对于外国的某一类文化还是很有趣味很想研究的，但我觉得这两不相妨：赏鉴研究某一国的某种文化同时反对其荒谬的言论与行为。”²可以代表周作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他常常是以“日本通”的身份去戳穿日本的假“中国通”所造的谣言。

周作人批驳《顺天时报》等，看似强调“中外之分”，其实却是“新旧之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他驳斥外国人的谬论，同时也拒绝本国人的类似谬论。他之所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只是关注点稍有差别，根本则是一致的。周作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文明反抗野蛮，以自由抵制专制，以理性驱散迷狂。他在一篇介绍俄国亚力舍托尔斯泰——也就是十几年前译就而未能出版的《劲草》的作者——的文章中说：“我们相信立在文化最高处的精神上之贵族主义者其主张不外对于一切压制专断的憎恶与反抗。”实乃他的自况；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³就此所发的议论，未必不能纳入“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的范畴。这

1 《知堂回想录·顺天时报》。

2 《外国人与民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京报副刊》）。

3 《托尔斯泰的事情》（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语丝》第十四期，收《雨天的书》）。

在致穆木天的《论国民文学的信》¹中讲得非常明确：“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命运。我们第一要自承是亚洲人（‘Asiatics’！）中之汉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类中汉族所应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却在于此：“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当初宣传新村，同样提倡的是个人主义；此亦证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正是殊途同归。五卅运动发生，周作人这一立场更其彰显，他说：“中国现在应该根据正当的民族主义，办教育，练兵。然而如没有自觉没有改悔，这也是空想梦话，——什么都是空想梦话。”²——至于“国民文学”，在他最终归结为一场全面的国民性批判：“我们在反对别人之先或同时，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则只是拳匪思想的复活。”“在积极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还有这几件工作：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愤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³

三个月后，《论国民文学的信》重新在《语丝》——那一期几乎是“国民文学”专号——发表，周作人补充说：“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成国民文学的提唱之理由。但是，有时又觉得这些梦想也是轻飘飘的，不大靠得住；如吕滂（Gustave Le Bon）所说，人世的事都是死鬼

1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京报副刊》。

2 《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京报副刊》）。“五卅”运动中，周作人还写了《讲演传习所》、《文明与野蛮》、《吃烈士》等文章。

3 《论国民文学的信》。末尾几句，所针对的是穆木天的诗：“我们要歌颂盘古的开天，我们要歌颂轩辕的治世，我们要歌颂乌江夜里的项羽，我们要歌颂努力实现的仲尼。”

作主，结果几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睨国王手中的账簿，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这又使我对于一切提唱不免有点冷淡了。我的微小的愿望，现在只在能够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这倒是还无妨无妨。”¹说法较前稍有调整，更接近于“教训之无用”。然而“教训之无用”毕竟只是周作人思想的一极，他从启蒙者向着纯粹思想家的转变始终是不彻底的。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女师大风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周作人担任筹备主任，共同任教的有张凤举、徐祖正，三人以后结为“骆驼社”。周作人又应沈尹默之邀，在孔德学校教中学十年级国文课。他的译作集《陀螺》²和随笔集《雨天的书》，分别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与十，于九月和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们展现了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之后不同既往的面貌。《陀螺》收录的是希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诗歌小品，除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和日文者外，均据英文、日文和世界语转译³。虽然只有一小部分是在《点滴》和《现代小说译丛》之后译出，相比之下，却颇能看出“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译者的态度——不是对待翻译，他所取的仍为“直译”之法；而是对待文学的态度——多有变化，即如其所说：“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周作人的翻译

1 《答木天》（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语丝》第三十四期，收《雨天的书》改题《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吕滂，通译勘度。

2 《呐喊》书末“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所列“（四）《我的华鬘》”，注明“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系此书原拟题目。又周氏为所译《形影问答》写的附记亦云，“译诗及小品集《我的华鬘》”“今年春间想付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晨报副刊》）。

3 《《陀螺》序》（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语丝》第三十二期，收《陀螺》、《苦雨斋序跋文》）云：“集中日本的全部，希腊的二十九篇，均从原文译出，其余八十七篇则依据英文及世界语本。”所说“希腊的二十九篇”，应指除《拟曲二篇》、《对话三篇》之外者。这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所译朗戈思《苦甜》为最早，但之后的《媒婆》仍系“根据英译本重译”，《苦甜》是否从古希腊原文译出，尚难确定。《牧歌三篇》之《私语》曾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语丝》第二十四期，题曰《希腊牧歌之一》，小引有云：“今据勒伯古典丛书译其全文。”又云：“这原是《希腊牧歌抄》中三篇之一，去年春间译出，想登在一个杂志上的。”“去年”即一九二四年。当时所作《沙漠之梦》（一九二六年七月《骆驼》第一期）一文云：“这三篇里《情歌》与《私语》系此次新译，《农夫》一篇数年前曾从 Andrew Lang 英译本重译过，今据原文校改收入。这几篇的译法都是根据原文，用几种英译作参照。”如此，最迟一九二四年周氏已据原文翻译古希腊作品。

历程，《域外小说集》前后各是一段落，《陀螺》起又是一段落，多少回到最初那种“觉得很有趣味”的路数去了。

《雨天的书》所收，主要是“自己的园地”、“绿洲”两个专栏之后的随笔作品。作者的趣味、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序言有云：“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涵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如前所述，他强调的不过是自己的某一方面罢了。

三

《〈语丝〉发刊辞》所云“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要到几个月后，才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与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人陈源成为靶子；而且在周作人眼中，恰恰分别代表“专制”和“卑劣”。不过他说：“‘那只大虫’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时候，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评论，但觉得这班东西太无人气，在《语丝》上不曾提到他们，……”¹虽然通称“语丝派”，至少周作人相当一段时间内选择《京报副刊》为直接“反抗”的阵地，发表在《语丝》上的文章则更侧重于文化批评。此外他还和张凤举、徐祖正合办一份纯文艺的刊物《骆驼》，于一九二六年七月面世，但仅出版一期，未见赓续。

一九二二年九月，周作人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一九二四年五月，教育部将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

1 《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

动”，肇始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作人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云：“下午女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是他首次牵涉其中：“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¹五月初周作人写《论章教长之举措》²，还只是说：“秋桐先生大约不至于想取缔思想。倘若想取缔，那可以说是乖谬，倘若更想取缔文章，那么这真是乖谬至于滑稽了。”待到杨荫榆倚仗章士钊支持，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名干部学籍，周作人便于五月二十一日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校务维持讨论会，并明确表示：“我个人的意思是希望杨先生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责辞职。”³五月二十七日，又与同为女师大教员的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指出：“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这被陈源攻击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挑剔风潮”⁴。——此前周作人还“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⁵。遂在六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反驳：“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实在可怜极了，但佢不知道也正因为更引起人家的反感，有些像我们这样的‘狂筒小子’，向来不愿多嘴的人反而说起话来。”同期刊出鲁迅的《并非闲话》，态度正相一致。周氏兄弟着力谴责章士钊等的倒行逆施，以后又与为之张目的陈源展开论战，其间多所配合，且因共同参与维持女师大校务之事难免见面，但这并未

1 《知堂回想录·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2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

3 《女师大的学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京报副刊》）。

4 西滢：《闲话》（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5 《知堂回想录·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东吉祥派”即陈源等《现代评论》的作者。

使他们的私人关系得以恢复。

周作人之介入女师大风潮，虽是顺应时势，却非随波逐流。他曾在《与友人论章杨书》¹中表白：“老实说，我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并不是代表籍系的公意，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我知道自己也是一个书生，（要感谢或诅咒历代士流的传统！）正如章君在报蔡先生书中所自述，‘惯为大言，好预事故’，这正是我的坏脾气，所以在一年里总要白花好些时间作无谓的文章，讲那些不值一讲的事情和人物。我希望能够改过，但是此刻似乎还难做到。……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以后又补充说：“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气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特别以蔼理斯与阿那多耳法兰西的影响为多，我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之反抗即从我的这种意见发生，我的反对章士钊——及其甲寅运动亦即是这种反抗之一种表现。”²“我意思是说，‘我自己虽没有兴致踢球，但为保障踢球的人的缘故而被骂或打，我是愿意的。’我自信现在的反对‘大虫运动’实在也就是这种表现之一。”³可见仍是其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使然。周作人曾说：“然而宽容绝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⁴现在所取即后一层意思，反对章、杨，正是“不忍受”的表现。在一篇不满于胡适面对此种形势“终于未见动静”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此义：“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且更直截了当地说：“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欤？”⁵其实这并未超出周作人所谓“宽容”的范畴；反倒应该说，不如此则其宽容观不能得到完整体现。而在周作人，还不止是写文章而已。“我还有一次以学生家长的资格，出席于当时教育

1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京报副刊》。

2 《答张崧年先生书》（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阿那多耳法兰西（Anatole France），通译阿纳托尔·法朗士。

3 《再答张崧年先生书》（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报副刊》）。

4 《文艺上的宽容》。

5 《忠厚的胡博士》（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部所召开的家长会，——我其实并无女儿在女师大念书，只因有人介绍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叫我做保证人，这只需盖一个图章，本是‘不费之惠’，不过有起事情来，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证人是要代家长负责的，这是寻常不会有的事情，但是我却是适逢其会的碰着了。……那一天的日记只简单的记着：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这会议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阁议已经通过教育部解散女师大，改办女子大学的决议，这里招集家长前来，无非是叫约束学生，服从命令的意思。当时到场二十余人，大都没有表示，我便站起来略述反对之意，随有两三个人发言反对，在主人地位的部长章士钊看见这个形势，便匆匆离席而去，这便是那天无结果的详情。”¹周作人虽对此种反抗的结果无所期待，却不认为反抗本身没有意义——哪怕它仅仅是种表示，仅仅是一己人格的证明：“我们此刻的反抗只能限于言语文字，如没有效验，实在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倘若有实力，我想也可以用，——不过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么？在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人如不是把‘人气’减少以至于无，就不会得到什么实力或高位，即使是关于教育文化的事情。我只是就理论上说，不妨用强力反抗。唉，我终于变为托尔斯泰的叛徒了。”²

周作人的论战之作，大多承袭他五四时期平白显豁的文风，然而亦有近乎《前门遇马队记》、《碰伤》一路“别扭的写法”或“愉快的文章”。他曾说五卅之后所作《吃烈士》是“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³，批判章士钊和陈源时，所写文章也常常反语迭现，举重若轻。“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启示”，而在此之前，周作人已经将斯氏的《育婴刍议》⁴和《〈婢仆须知〉抄》⁵译为中文发表。关于前者他说：“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周氏自己所作《让我吃主义》、《失

1 《知堂回想录·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2 《不宽容问题》（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十二期）。

3 《知堂回想录·五卅》。

4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至九日《晨报副刊》及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民国日报·觉悟》，收《冥土旅行》。

5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语丝》第十期，收《冥土旅行》。

题》、《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怨府卫》、《怨陈源》、《“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等，多少亦可当得此语。

周作人的宽容观本有“因时制宜”之意，一旦情形变化，自然此消彼长。他曾说“我希望能够改过，但是此刻似乎还难做到”；“还难做到”渐至不成问题，“希望改过”随即抬头了。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在《我最》¹一文中说：“我所顶看不入眼而顶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第一种人满脑子都是‘两性衔接之机械缔构’（原语系疑古玄同所造，今用无卯总长呈执政文中语代之，较为雅洁而意义恰合），又复和以巫医的野蛮思想，提了神秘的风化这二字咒语，行种种的罪恶，固然可憎极了，第二种人表面都是绅士，但是他们的行为是——说诳，反复，卑劣……尤其是没有人气，因为他是野蛮之更堕落的了。在最近的女师大事件里，我们居然得见许多这样的人物，这个恰好投吾所好，有了说话的资料，不免写了几篇文章，——但是正经事却也误了不少。”当下宣布“我不再来反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而这工作是：“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其中“文明的野蛮”与“假道学、伪君子”不无关系，但在他还是有进与退的区别。谈及“语丝的文体”时，周作人又提出：“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²此时章士钊及其所倚靠的临时执政府总执政段祺瑞“下野之兆已见”，周作人遂表示：“‘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日树倒胡猕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猕，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分。”³其中多有反语，不能十分当真，但总归是不同既往的姿态。不过他很快发觉判断有误，特作《大虫不死》⁴予以订正：“自

1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语丝》第四十七期。

2 《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

3 《失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第五十六期）。

4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从章士钊忽然不见之后，有些有绅士气的乱党忽然挂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所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老虎何尝死呢”，“章士钊决不是孤生独立的，他是中国恶劣旧势力的代表，他的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坏人挨挤着，推着，他一个人偶然倒了，他背后的那些‘卵部’，多数的无名之老虎是不会倒的，所以他这个大虫是一个不死的，至少也是死而不僵的虫。”——此文尚且写在鲁迅因林语堂追随周作人宣扬“费厄泼赖”而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前¹。

周作人将自己此种表现，归结为“在我们的心头住着 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²他说：“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鬼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街头衙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e keh niarmgsaeh, fiauletoüg tsern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r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对周作人来说，这是迄今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剖析。“绅士鬼”与“流氓鬼”，以后他又说成“隐士”与“叛徒”³，归根结底，区别在于接受既有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与否；而终周作人一生，统可归结为这样两种倾向或双重人格之相互消长。前述反抗与宽容，乃至启蒙主义与反启蒙主义，分别根植于这“两个鬼”。二者不时发表不同意见，显示的是周作人

1 鲁迅此文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第一期。

2 《两个鬼》。

3 《〈泽泻集〉序》（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一百四十五期，收《泽泻集》、《苦雨斋序跋文》）。

真实而复杂的自我——前面已经提到，他并无意掩饰这一点。“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¹不妨将此视为一种“复调”，一种自我争辩或自我启发。其中任何一个声音都是真实的，但都不足以代表他的全部。

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六年交替之际，周作人以“不打死老虎”结束了这场论战中自己的前一阶段，马上又以“大虫不死”开始了自己的下一阶段——徐志摩时已接编《晨报副刊》，对陈源多所恭维；周作人遂于一月二十日在该报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由此重起与陈源之间的交锋。颇多笔墨纠缠于“叫局事件”：“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²周氏晚年提及此事，犹言“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及至三月十八日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屠杀民众的惨案发生——那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他作《恕府卫》、《恕陈源》二文，视向民众开枪的执政府卫兵与收受官方贿赂、诬陷死难烈士的陈源为同样“无知识”和“奉令”，——因为“知识似乎不单是指能看几本外国杂志的力量”³。随后更归纳说：“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⁴“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⁵周作人将陈源之流此等举止，视为中国知识界发生分化，从而丧失整体上的独立性与反抗性的象征：“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

1 《两个鬼》。

2 《知堂回想录·〈语丝〉的成立》。关于周氏兄弟与陈源之间的论战，胡适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给三人写信，有云：“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3 《恕陈源》（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京报副刊》）。

4 《论并非文人相轻》（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5 《论并非睚眦之仇》（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语丝》第七十五期）。

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¹

三一八惨案后，周作人作《可哀与可怕》、《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等文，言辞质朴，寄意沉痛。他谴责屠杀者，哀悼牺牲者，赞美“新中国的女子”之“大胆与从容”²，但因素不主张请愿游行，故有“白死白死”³之慨。他还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作独幕剧《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有云：“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后，我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抑郁，想起这篇东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⁴三一八百日纪念时，他说：“据我想来，这决不是普通的事件，实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的纪念的。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迫压反动的开始。我并不是自诩先知，预备到市场去挂牌卖卜，这三四年来我天天在怕将有复古运动之发生，现在他真来了，三月十八日是他上任的日期。”⁵以后更说：“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⁶直到去世前一年，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亦已寥若晨星矣。”

1 《怒府卫》（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

2 《新中国的女子》（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语丝》第七十三期，收《泽泻集》）。

3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第七十二期，收《泽泻集》）。

4 《〈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附记》（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第七十七期，收《两条血痕》）。

5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世界日报副刊》）。

6 《红楼内外之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子曰》第五辑，收《知堂乙酉文编》时，与《红楼内外》合并为《红楼内外》）。

四

周作人虽然将三一八与五四相提并论，其实在他看来，“迫压反动的开始”确切无疑，“解放运动的起头”则要打些折扣。将近一年前，他就在《五四运动之功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的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而有关的“妄幻的教训”在于：“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¹此话说在女师大学潮高涨，五卅运动席卷全国之际。周作人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两场群众运动，但是如前所述，特别强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并且公开表示：“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²显然不愿裹挟其中，丧失自己固守的个人主义立场。而这一立场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五四运动另一“极大的流弊”即在于此：“‘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³他未免陷于两难境地：既反抗不宽容地打压群众运动

1 《五四运动之功过》。

2 《代快邮》（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语丝》第三十九期，收《谈虎集》）。

3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六日《晨报副刊》）。周氏有关“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话，显然受到钱玄同的启发。后者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日致周作人信云：“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譬如一条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扫了他的门前雪，则此一条街便已无雪矣。要是雪已扫完，则管管他家的瓦上霜尚可。若放着自己的门前雪，不去扫它，而忙忙于拿梯子去扒上他家的屋上去刮霜，无论他家讨厌不讨厌你，总有些无谓：因为自己的门前雪尚未扫也。而况梯子又未必确是梯子，所扒的又未必确是他家的屋上，所刮的又未必确是霜乎！”

的章士钊等，又不愿意加入反抗此种打压的不宽容的群众运动；结果还是一番“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那么五四运动“其功又如何”，周作人明言：“我将如‘大鸦’的回答道，‘没有啦！没有啦！’”——“思想言论之自由已由政府民众及外国人三方面协同迫压，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¹这里再次提到“重来”，实与“教训之无用”互为因果；过去仅以“重来”表示对青年的失望，现在则用来概括整个民族无法摆脱的命运。如其所说：“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谍谱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 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豫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所以在他看来，中国非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变革不可：“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更坏。革命是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换朝代；赤化也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抗

1 《五四运动之功过》。

乱杀掠。”¹——周作人之介入女师大学潮，其不无期待如此；其无所期待，反而深自警惕亦如此。

不久之后，周作人的立场却发生了微妙变化，——话说至此，该接着讲三一八了。“迫压反动的开始”，直接落在他的身上：当时流传一份段祺瑞政府拟予通缉的名单，周作人亦列名其中；及至直奉联军入京，《京报》遭查封，一时只剩下《语丝》可以发表言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使得他对广东革命军的北伐寄予厚望。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所作《南北》²，最能反映他的想法：“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周作人身居北方，却与南方同气相求。他这一时期的言论，譬如反对蔡元培“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一说，指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³以及对“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的章太炎公开宣布“谢本师”，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⁴都是基于这一新的立场。他还一再著文抨击北方军阀的屠杀暴行⁵，并对《顺天时报》散布有关南方的谣言予以驳斥⁶。

在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中，这是一段短暂然而不应忽略的插曲。从前他在《碰伤》中说：“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

1 《代快邮》。

2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语丝》第一百零四期，收《谈虎集》。

3 《外行的按语》。

4 《“谢本师”》（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第九十四期）。《知堂回想录·章太炎的北游》云：“但在那文章中，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

5 《养猪》（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语丝》第一百零一期，收《谈虎集》）、《卧薪尝胆》（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语丝》第一百一十七期，收《谈虎集》）。

6 《裸体游行考订》（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一百二十八期，收《谈虎集》）、《擦背与贞操》（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语丝》第一百三十五期）。

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譬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三一八惨案后，他说“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¹，言外之意还是如此。将“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与曾经概括的五四两大流弊“有公理无强权”和“群众运动可以成事”相对照，可知周作人之抵制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办法是错的”。而在他眼中，北伐革命大概属于“对的办法”。也就是说，当不再“有公理无强权”，他就以为“可以成事”，从而忽视了归根到底这仍是一场“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周作人所谓“自己的责任”之所以独立于群众运动，因为这才称得上“思想的战争”的一方，群众则与此无关，抑或只能居于反动地位；现在以“思想的战争”形容一场实际上的群众运动，说明并未排除“自己的责任”可能借助特定的群众运动得以实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换个说法正是“文艺复兴”、“觉醒”；这样一来，“革命是不会有”、“赤化也不会有”之类预言，好像也推翻了。周作人彻底认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尚须时日，或者说，要等到有人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之后。

这一天很快到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所作《命运》²，标志他的希望开始破灭：“几年前我有过一句不很乐观的话，便是说历史的用处并非如巴枯宁所说，叫我们以前事为鉴戒，不要再这样；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见报上载国民党内讧的新闻，令我更确信以前所说的话是不错了。我们不必说明对于所谓左右派是什么意见，但总之觉得‘太平天国’的影戏似乎在演起头了。无论怎样懂得唯物史观，却不懂得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七十年史，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易卜生在他的剧中高呼曰，‘鬼！鬼！’这是何等可怕。嗟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虽然科学家硬叫他曰遗传。”好比把从前所说“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重述一遍。继而如周氏日记所载：

1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第七十二期，收《泽泻集》）。

2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语丝》第一百二十五期。

“四月六日，植树节，驼群同人至海淀旅行，在土远处午餐，下午回城。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八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周作人著文颂扬李大钊“以身殉主义”¹；并偕同友人保护烈士遗孤：“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²六年以后，又参与筹划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以及联系出版全集。而在当时，更大的打击继而降临：南方开始大肆清党。对此周作人说：“普通只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这惊异也将消灭，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³他所企望的“思想的战争”或“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被残酷的现实所一笔勾销了。

然而周作人并未就此沉默。他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国民性——所说“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答案就在于此，这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其实是一回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⁴“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

1 《偶感》（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语丝》第一百三十一期，收《谈虎集》）。在《语丝》同期发表的《日本人的好意》（亦收《谈虎集》）中，作者驳斥了《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蔑。

2 《知堂回想录·坚冰至》。

3 《偶感之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语丝》第一百四十四期，收《谈虎集》）。

4 《怎么说才好》（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第一百五十一期，收《谈虎集》）。

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自己却愿承认，我不愿帝国主义者说支那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¹清党期间“智识阶级”的堕落，尤其使周作人愤怒，先后作《猫脚爪》、《人力车与斩决》、《吴公何如》、《偶感之四》、《功臣》等文，对主谋其事的吴稚晖、参与发议的蔡元培以及置若罔闻的胡适予以谴责。

周作人的国民性批判的对象，“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实际上一总就是他素所质疑的“群众”。如今他不认为其间有任何区别。他的相关思想，也就由“群众观”发展为“阶级观”——讲得更确切一点，是以“思想观”取代了“阶级观”。这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正是他宣布“我不再来反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后——所作《让我吃主义》²。该文称：“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在被吃的地位时，安分地让你吃；在可以吃人的时候，便又乐观地让我去吃了。”先前《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所说“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其实也是此意。对于构成群众运动之主旨的阶级论的否定，更早还可追溯到“自己的园地”中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不过今昔立意已有不同，现在他一概归结为“重来”。周作人此番思考，完成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所写《文学谈》³一文——虽然仍从文学着眼，所论却已不限于此：“现今弥漫于上下的，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以私产制度为根基的道德与风俗，例如偏重女性贞操，纳妾蓄婢，宿娼等之公认及讴歌，都是明证，同时也有极少数人起来反对，在文艺上可以看出这种‘反有产阶级思想’之痕迹，——我不称他为无产阶级思想，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阶级的问题，虽然这多少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先后发生，但这些人未必以阶级意识为主动，实在只是其思想态度与因袭的资产阶级思想相反，故出于反抗的举动。在

1 《诅咒》（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第一百五十二期，收《谈虎集》）。

2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五十四期。

3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语丝》第一百三十八期，收《谈龙集》。

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而抱着资产阶级思想！？是的，我相信这是实情。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其间的关系只是目前的地位，有如微时的汉高祖楚霸王之于秦始皇。中国资产阶级弄许多婢妾，表面上加上一点圣贤之话做修饰，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无产阶级的妇女观大要相去不远，或者不过说得还要老实显露一点而已。现在如以阶级本位来谈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与有产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语句口气略有差异，大约如白话的一篇《书经》，仍旧是鬼话连篇。正如一个亭长出身的刘邦补了秦王的缺不能就算社会革命，把那些古老思想从民众口中（或凭了民众之神圣的名）重说出来，也不见得就可以算是文学革命了。”

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这时他写《北沟沿通信》¹，提到重读吕滂《群众心理》一书，觉得“可以发人深省”——这话似乎也针对不久前的自己而言：“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不过周作人的思想仍然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北沟沿通信》系讨论妇女问题之作，他始终坚信凯本德所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因而主张社会有一根本变革；这不能不诉诸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绝不可能实现此点。如其所说：“妇女问题的解决似乎现在还不能不归在大的别问题里，而且这又不能脱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有点茫然了，妇女之经济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办法呢？方子是开了，药是怎么配呢？”

¹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世界日报》“萧薇周年纪念周刊”，收《谈虎集》。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改办京师大学堂，周作人“当然去职”¹，一年多后北平大学成立，才重在那里任教。十月，北京北新书局被查封，《语丝》停刊，周作人与刘半农离家避难，——后者有记载云：“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人家。小间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²《语丝》改在上海继续出版，由鲁迅主编，周作人仍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此前此后两年多里，周作人共有十一种著译面世：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重新出版所译显克微支著《炭画》。一九二六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狂言十番》。一九二七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园地》修订本，删去全部“杂文”，补入“茶话”一辑，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的专栏文章，与《雨天的书》风格相仿。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北新书局分别出版《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统属一套“苦雨斋小书”——“苦雨斋”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的名字³；两书其一汇集所译古希腊、英、法和古代日本的作品，其二则为俄国科罗连珂（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⁴一八八

1 一九二七年日记。

2 刘半农：《记砚兄之称》。周作人在《苦茶随笔·半农纪念》中补充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后任某少佐也。”

3 苦雨斋是八道湾十一号中院西屋。即如《苦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泽泻集》、《周作人书信》）所云：“前天夜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经上了台阶，浸到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

4 通译科罗连科。

五年作中篇小说《Сон Макара》¹。周作人在《〈苦雨斋小书〉序》中说：“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喜欢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阅《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同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政治犯，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²这有如周作人的自况之作，几位作者——路吉阿诺斯、法布尔、斯威夫特、兼好法师以及科罗连珂——的影子重叠在他的身上，分别对“流氓鬼”和“绅士鬼”予以支持。一九二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旧译《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随笔集《泽泻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此书前半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后半则为《雨天的书》之后所作。序言有云：“戈尔特堡（Isaac Golaberg）批评葛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葛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条血痕》，乃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的补遗和续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谈龙集》；一九二八年一月和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谈虎集》上下册。两书收录周作人过去九年间所作杂文，前者“略略关涉文艺”；后者则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虽然并不完全：“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

1 通译《马卡尔的梦》。周氏据英文本转译，曾载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2 Sophistes，通译诡辩派或智者派，指古希腊以诡辩出名的一些演说家、作家和教师。

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¹ 前述批判章士钊、杨荫榆和陈源的文章，均在此列。以后他说，这“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²。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由旧译《点滴》改订的《空大鼓》，篇目略有增减，最重要的是删去了原来作为附录的《人的文学》等三片文章。新撰序言云：“《空大鼓》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所以为最好的，我只觉得它写得还不错，至于内含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可以服膺的了。单纯的信仰（‘Simple Faith’）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较之五四时期自是今非昔比。周作人此后对待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即是“明净的观照”：虽然不介入，却也不回避。而类似说法先已见于《〈艺术与生活〉自序》中，不过这部一九二六年即已编定的论文集交到上海群益书社，却拖了整整五年才得以出版。

上述诸书中，以《谈虎集》最直接也最充分地反映周作人自倡导思想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它的编辑出版，给了作者一个反思既往、自我剖析的机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为此书所作后记有云：“在这些文章上表现出来的我的意见，前后九年，似乎很有些变了，实在又不曾大变，不过年纪究竟略大了，浪漫气至少要减少了些罢。我对于学艺方面，完全是一个‘三脚猫’，随便捏捏放放，脱不了时代的浪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有许多事实我不能不看见而且承认，所以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在近来愈益显著。我常同朋友们笑说，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根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那一部书。我不是这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没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随意谈谈，对于百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贬，只是凭着个人所有的一点浅近的常识，这也是从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普通知识中得来，并不是怎么静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怀旧的青年曾评我的

1 《〈谈龙〉〈谈虎集〉序》（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文学周报》第五卷第十四期，收《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苦雨斋序跋文》）。《炭画》书末所附“译者译著一览”列有“《真谈虎集》（北新）——印刷中”，大约即“曾经广告过”者也。

2 《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意见为过激，我却自己惭愧，觉得有时很有点像‘乡愿’，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与灵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仪式经典我都颇感兴趣，对于有些无理的攻击有时还要加以反对；又如各派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群众的，与共产党无政府党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这是我所以主张宽容的理由。还有一层，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琵琶诗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没有那样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弗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自此周作人完全自成面貌，与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先前并肩作战的鲁迅和近来颇显生分的胡适在内——判然有别。在他乃是性格、爱好、思想、学问所致，亦是当下时势使然：“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眯眯地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然而我还缺少相当的旷达，致时有‘来了’的豫感，惊扰人家的好梦。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棒喝主义现在正弥漫中国，我八九年前便怕的是这个，至今一直没有变，只是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罢。”¹

对于周作人来说，不仅仅是“心思”有所变化，他继而宣布：“从今年起（或者不如从龙儿年起更为合式），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不问国

1 《谈虎集》后记》（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北新》第二卷第六号，收《谈虎集》）。

旗，恐怕不能写什么文章，……”¹不过一时未能实行，《语丝》仍不断刊出他的愤世嫉俗之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北新》半月刊开辟“夜读抄”专栏，但仅登载两次即告中止。介绍旧译《黄蔷薇》时，他说：“不知道在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人很攻击过革命文学，对于阅读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这一件事也大加非难。到了现在，大家都大谈其革命文学了。我虽然对于革命文学仍然不很热心，但觉得阅读弱小民族的文学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英法德义，但莎哥噐，本来值得也应该有人去弄，但弱小民族也有他们的灵魂，表现在文学上面，我们当一样的尊重，而且在此刻的地位中国人更应对于他们感到亲近，古诗人说：‘贼能知道贼的足迹’，现在可以改说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²——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周作人亦被牵连在内，因为语丝派仍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³有云：“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何大白《文坛的五月》⁴则说：“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倾向，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过是以下几种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当的不平，些须的人道精神。他们有的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有的在帝国主义武装保护的北京城中，翻译着古代希腊的恋歌，日本武家专政时代的俳句，一面却高撑着由武者小路的新村借来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只这两个代表的先生（不是老生！）已经够叫我们看出他们的矛盾和无聊赖了。”此前编订《艺术与生活》一书，周作人重视的是自己今昔的变化；现在受到攻讦，他却强调不变的一面。他之所以重新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乃是自觉比“革命文学家”更能理解中国的现实——这也可以形容

1 《新年通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语丝》第四卷第八期）。

2 《〈黄蔷薇〉附言》（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北新》第二卷第九期）。

3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4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为“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译独幕剧《婴儿杀害》亦可看作这类作品，虽然作者山本有三并不属于“弱小民族”。革命文学甚嚣尘上之际，周作人藉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本篇声明系‘社会剧’，究竟他的文艺的价值如何，社会的意义如何，在我外行是说不上来。但我相信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总是应该‘打倒’的，而文学却也非是宣传，——他不是别种东西的手段，他自己就是目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沁到人心里去燃烧起来再发出为言语文字，这样可以成为好的文学，是动人的艺术而非符咒或号令。”¹他既已根本否定“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也就将自恃萌生于此的革命文学看作无稽之谈——无非是与“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同一性质的“别种东西的手段”罢了：“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浑账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²自此他就站在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的对立面，将其视同“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予以反抗。

面对“反动运动之到来”，周作人所作《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等文，虽由不同话题而起，却都归结到一点上：“第一重要的事，青年必须打破什么东方文明的观念。……这种幼稚的夸大也有天真烂漫之处，本可以一笑了之，唯其影响所及，不独拒绝外来文化，成为思想上的闭关，而且结果变成复古与守旧，使已经动摇之旧制度旧礼教得了这个护符，又能支持下去了。”³而这不过是他早已指斥的“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而已。周作人说：“我所最怕的是复古的反动。现在的中国却正在这种反动潮流之中，中西医的争论即是新势力对于旧势力迫压之反抗的一种表现，所以它的成败是很可注意的。新势力的反抗当然发现于种种方面，唯关于政治经济道德各方面的几乎统以‘赤化’之名而被压倒，只有医学以系统正科

1 《《婴儿杀害》引言（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八期，收《两条血痕》增订本）。

2 《爆竹》（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语丝》第四卷第九期，收《永日集》）。

3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觉》第三期，收《永日集》）。

学之故，虽其主张不与‘国粹医’相合，尚未蒙‘准共党’之徽号，可以自由说话。倘若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时反动便已大告成功，实现了右倾派的理想世界，有力者与下民‘相安一时’，虽袁吴段张之盛世也要相形见绌了罢。”¹因此他对宣传“新医学”的丙寅医学社²及“医学周刊”特予支持。周作人藉此阐明了他的文明观：“世间常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东方文明高于西方文明，我总不能了解，我想文明总只是一个，因为人性只是一个，不过因为嗜好有偏至，所以现出好些大同小异的文化，结果还总是表示人性的同一趋向。……我想世界也只有一个学问，一个艺术，但也因闻道有后先之故，生出种种形相，实在是等级程度之不齐，并不是什么‘质’上面的分别。”³他之孜孜不倦介绍古希腊以降的世界文明，动因即在于此。

北伐成功后，周作人对于现实更感绝望：“北京现在已经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据不佞的观察，自然是后者为近——本来这革命也就只是招牌，拿到北京来之后必然要更加上一层油漆了。”⁴“此刻现在，风向转了，北方刚脱了复古的鞭笞，革命发源的南方却渐渐起头来了，这风是自北而南呢，还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统一南北的呢，我们惊弓之鸟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实在不禁急杀恐慌杀。”⁵面对现实，无疑是这般感想，反观历史，却未免觉得似曾相识——不过是彻底印证了他一年多前说的“历史的用处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而已。于是乃作《历史》⁶一文：“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人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僵尸！僵尸！’

1 《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作，收《永日集》）。

2 一九二六年成立，以协和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要成员，在《世界日报》举办“医学周刊”。周作人曾为《医学周刊集》一书作序，收《永日集》。

3 《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

4 《北京通信》（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语丝》第四卷第二十八期）。

5 《国庆日颂》（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四十一期，收《永日集》）。

6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八期，收《永日集》。

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重来”不仅是周作人的现实观，更成了他的历史观，——假如以此为前提，那么迄今为止针对现实所发种种议论，即便不算隔靴搔痒，至少也是舍本求末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停止了《语丝》上“随感录”之类的杂文写作¹，同时作《闭户读书论》²，重申了自己“暗黑的新宿命观”：“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何，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进而宣布自己将要从事一项新的事业：“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这当然有迫于现实的考虑——此番真如拉勃来之“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了；用周氏自己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实乃“追根溯源”之举。此即《〈空大鼓〉序》所说“明净的观照”。周作人所要考察的“史”不仅是书本，还包括中国整个文化传统和一切固有观念在内，其主要工作遂由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未必一定脱离

1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四卷第四十六期上的《欧洲整顿风化》、《神州天子国》，是周作人最后在此发表的杂文，距离鲁迅交卸该刊编务已为时不久，柔石接编后，周作人只在第五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和第十三期（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发表所译犹太作家唆隆亚来叶（Sholom-Aleichem，通译肖洛姆-阿莱赫姆）作《慈悲》和《村里的逾越节》。

2 写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收《永日集》、《知堂文集》。

社会实际。《闭户读书论》标志着他自《〈谈虎集〉后记》起的思想转折和人生转折业已完成，他的一生就此进入新的阶段。

半年后，周作人据《旧约·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云云而作《伟大的捕风》¹，可以看作对“可以得道”的进一步强调。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为虚空的虚空也欤？”然而又说：“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还只有虚空之追迹，而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结论则是：“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重来”；另一方面则是“伟大的捕风”——从“教训之无用”到“闭户读书论”，他的思想一总凝聚到这样一个意象之中。

¹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作，收《看云集》、《知堂文集》。

第六章

一九二八——

—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北平大学成立。周作人任文学院国文系教授、日本文学系主任；十二月，又在文理分院（前女子大学）任教，并代理国文系主任。此时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还在继续，在他为友人著作所写序跋中仍有涉及：“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¹他自揭示“教训之无用”以来的一应想法，都可涵盖在“反抗”这

¹ 《〈燕知草〉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收《永日集》、《苦雨斋序跋文》）。

个概念之内；尤为要者，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是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这构成了他今后思想与文章的基调。标举“反抗”时，周作人认定现代散文——亦即从前倡导的“美文”——可以承担，而且自有渊源。此前即已指出：“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¹如今讲的就更明确：“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在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²

话说至此，周作人下一阶段的主要意见昭然若揭。然而他却并没有接着说下去，甚至什么都不说了。他的创作陷入低潮，“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³。只编成两种著作，一是《永日集》⁴，主要收录《泽泻集》之后的文章；一是《过去的生命》，汇集所作新诗，分别列为“苦雨斋小书”之四与五，由北新书局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出版。《〈永日集〉序》有云：“我在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关于文学我的意见恐怕如不是老朽也是外行的，……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他还写信给因宣扬人权而为国民党政府查处的胡适，建议“以后别说闲话”⁵。不过宣布不谈时事后所作《在女子学院被囚记》⁶，还是一篇“时文”，记述一九二

1 《〈陶庵梦忆〉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语丝》第一百一十期，收《泽泻集》、《苦雨斋序跋文》）。

2 《〈杂拌儿〉跋》（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作，收《永日集》、《苦雨斋序跋文》）。

3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致胡适。

4 《炭画》书末“译者译著一览”所列北新书局“印刷中”的“凤凰砖斋随笔”，或系此书原拟题目。

5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致胡适。

6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华北日报》副刊，收《永日集》。

九年四月十九日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校址被法学院学生强行接收，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教员遭到拘禁之事。周作人为此深受触动，自谓“以后当努力廓清我心中种种虚伪的妄想，纠正对于教育与法律的迷信，清楚地认识中国人这东西的真相”。此文亦属“愉快的文章”，几乎成为他写作上的转机——“近一两年头脑迟钝，做不出文章，这回因了这个激刺，忽有想写之意，希望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写去”，然而此前此后，只得《媚女礼赞》、《哑吧礼赞》等少数篇章，仍系以“别扭的手法”写的批判现实之作。六月，周作人结束了在孔德学校的兼课；但又应刘半农之邀在辅仁大学教书，每周二小时。十月，辞去女子学院国文系主任职务。

十一月，周作人家中又出了一件大事：“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于二十日死去，年十四岁。这对做父亲的是巨大打击：“我自己是早已过了不惑的人，我的妻是世奉禅宗之教者，也当可减少甚深的迷妄，但是睹物思人，人情所难免，况临终时神志清明，一切言动，历在心头，偶一念及，如触肿疡，有时深觉不可思议，如此景情，不堪回首，诚不知当时之何以能担负过去也。”¹继而作《麻醉礼赞》²，虽亦列为“三礼赞”之一，笔意却至为沉痛，实与女儿的夭亡相关。所说：“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茹苦忍辱，斯乃得度。画廊派哲人（Stoicoi）之勇于自杀，自成宗派，若彼得洛纽斯（Petronius）听歌饮酒，切脉以死，虽稍贵族的，故自可喜。达拉思布耳巴（Taras Bulba）长子为敌所获，毒刑致死，临死曰，父亲，你都看见么？达拉思匿观众中大呼曰，‘儿子，我都看见！’此则哥萨克之勇士，北方之强也。此等人对于人生细细尝味，如啜苦酒，一点都不含糊，其坚苦卓绝盖不可及，但是我们凡人也就无从追踪了。话又说了回来，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而又不能麻醉，还是清醒

1 《若子的死》（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华北日报》副刊，作为插页加入此前出版的《雨天的书》）。

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益世报》副刊，又与《媚女礼赞》、《哑吧礼赞》合为“三礼赞”，载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北新》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收《看云集》、《知堂文集》。彼得洛纽斯，通译佩特罗尼乌斯。“达拉思布耳巴”，通译“塔拉斯·布尔巴”。

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实为无可如何者耳。”可以代表他新的人生体验。较之既往，自是一重进境——不是说“生活之艺术”为“凡人之悲哀”所取代，只是更其深化而已；前者无论“取”“舍”都有主动之意，后者则是把不能不接受的现实接受下来。其间相互映照，彼此渗透，最终融为一体。以后提出“忍过事堪喜”、“苦住”等，皆从“凡人之悲哀”来；对于普通民众的人生境遇和生存愿望更多理解——尤其是讨论鬼神或邪教之类问题时——亦与此密切相关。若子死后，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刊出《就山本医院误诊杀人致北平市卫生局呈文》，“要求取消该山本忠孝医师开业许可”。此亦如其所云：“我不喜欢仇友反复，为世人所窃笑，唯如山本大夫所为，觉得无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为快耳。”¹日记中屡见“夜想起一月前若子尚在人间及临终事，不禁泫然”²、“终日无事，怅怅无所之”³等语，苦雨斋元旦照例的友朋聚会也取消了。

次年三月，周作人翻译路吉阿诺斯的《论居丧》⁴一文，该篇“无慈悲地把家族感情上的幕都撕碎了”，或许有助于周氏调整心境。同时所作《中年》⁵中说：“我决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惑，虽然岁月是过了不惑之年好久了，但是我总想努力不至于不不惑，不要人情物理都不了解。”认为“中年是理智的年代”，“以后便可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这成为周作人此后思想的主调。他也就此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不过此文与其说讲中年应该如何，不如说讲不该如何，其间隐约有个反面例证，似乎就是在上海已与许广平同居的鲁迅；文中“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和“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云云，仿佛特有所指。以后他写文章，一再针对这一问题影射攻击鲁迅。其看法

1 《若子之死》一文的“再记”，插入《雨天的书》时删去。林语堂曾议论此事云：“问问岂明，若子死，岂明不能免俗大闹一番，是何道理？岂明答辞，便是他整个性格之剖析。吾于此一事，甚见得岂明之‘渐近自然’处，‘吾从众’处，及其内情之冲动处。其热闹乃其恸哭。”（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人间世》第二十六期所载废名《关于派别》之“语堂跋”）

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

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

4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未名》第二卷第九、十、十一、十二期合刊，收《看云集》、《知堂文集》。

5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益世报》副刊，收《看云集》。

有如从前在《情诗》一文中所说：“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乃是其一贯的妇女观使然¹。兄弟失和将近七年之后，周作人在心里又与鲁迅决裂一次。对周作人来说，现在有如前回，同样是“我想订正我的思想”。而鲁迅此时翻译出版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转向“革命文学”并成为其中坚，与周作人正是渐行渐远。几年后周作人接受记者采访，回答“关于鲁迅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您意见如何”，有云：“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创作方面基本上没有拿出什么东西。”²

周作人又写了《金鱼》³，其中说：“几个月没有写文章，天下的形势似乎已经大变了，有志要做新文学的人，非多讲某一套话不容易出色。……文学上永久有两种潮流，言志与载道。二者之中，则载道易而言志难。”乃是接上一年多前“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的话头，重新申明自家立场。“言志”承袭“反抗”；“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及“反革命”在内。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均以倡导“言志”，抵抗“载道”为己任。

“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写作。此时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除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等外，还有日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四大弟子”前三位曾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与俞、江交谊已在十年以上，废名亦近十年。俞平伯著《杂拌儿》、《燕知草》，江绍原著《发须爪》，废名著《竹林的故事》、《桃园》，周作人均作有序或跋，以为揄扬。沈启无相识稍晚，其乃燕京大学出身，尚未崭露头角。周作人“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

1 一九二五年起，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对此周作人持同样意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去信云：“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工人工人辩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

2 [日]井上红梅：《采访周作人》（原载一九三四年九月《文艺》第二卷第九号，董炳月译文载一九九九年《鲁迅研究月刊》第八期）。

3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益世报》副刊，收《看云集》。

意味的一种”¹，废名写的虽是小说，他却说“我所喜欢的第一是这里面的文章”²；当他再次确立自己的“美文观”时，正是以俞平伯及废名的作品作为榜样：“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³以后他更将二人视为现代散文“文体的变迁”的代表，犹如明末继公安派而有竟陵派：“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⁴

现在他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阵地。——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周作人日记云：“作文（《水里的东西》），晚九时了，共二千字，拟予废名、君培所办之《骆驼草》。”五月十日云：“废名来，交来《骆驼草》第一期一份。”周刊就此面世。“君培”即冯至。发刊词是废名手笔，所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取名《骆驼草》，或许有意继承从前的《骆驼》，不过“骆驼”之一张凤举已到欧洲去了；另外一位“骆驼”徐祖正则与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冯至等一并成为新刊物的主要作者。

《骆驼草》曾得到周作人的资助⁵；他在此发表著译颇多，一时似乎恢复了《语丝》时代的写作状态。最早的《水里的东西》和《论八股文》，开启了他此后文章的重要一路。其一云：“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

1 《〈燕知草〉跋》。

2 《〈桃园〉跋》（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作，收《永日集》、《苦雨斋序跋文》）。

3 《〈燕知草〉跋》。这里“论文”仍指 essay（随笔）。

4 《〈枣〉和〈桥〉的序》（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作，收《看云集》、《苦雨斋序跋文》）。

5 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日记：“下午慧修、废名、耀辰、君培、翔雀先后来，讨论维持周刊事，定每月出洋五元，因先付十五元交君培。十时顷去。”十一月九日日记：“废名来，旋去。《骆驼草》拟出至二六期止，即停刊，付洋十五元。”

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¹其二云：“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我的第二个提议即是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²相比之下，两个“提议”中周作人更留心后者，所用方法则与前者相当，而这又与“谈河水鬼”异曲同工，都是关于某一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或批判，最终归结到“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正如其所说：“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近于真相。”³所谓“闭户读书”，也就落实于此。

周作人继而所作两文，分别涉及他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观。——前一方面可谓已具雏形，后一方面则较之先前又有发展。一篇是《〈冰雪小品选〉序》⁴。他以明清“小品文”这名目称呼古往今来类似文章，视之为对抗一种倾向的另外一种倾向：“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太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期，皇

1 《水里的东西》（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骆驼草》第一期，收《看云集》）。

2 《论八股文》（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日《骆驼草》第二期，收《看云集》，又列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附录一”）。

3 《拥护〈达生编〉等》（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骆驼草》第六期，收《看云集》）。

4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骆驼草》第二十一期，收《看云集》，收《苦雨斋序跋文》改题《〈近代散文抄〉序》。《冰雪小品选》系沈启无所编明清小品集，当时未能出版。

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结论是：“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周作人过去所倡导的“美文”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此外更强调它的渊源性和反抗性。另一篇是《〈草木虫鱼〉小引》¹——《金鱼》、《水里的东西》等，均属“草木虫鱼”之列。如果说《〈冰雪小品选〉序》是纵向考察，这里便是横向比较：“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总之有两位，即是禅宗与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两个名称。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文学呢，它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它不能那么解脱，用了独一无二的表现法直截地发出来，却也不会这么刚勇，凭空抓了一个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过气来，结果是东说西说，写成了四万八千卷的书册，只供闲人的翻阅罢了。”结论则是：“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老实说，禅的文学做不出，咒的文学不想做，普通的文学克复不下文字的纠缠的可做可不做，总结起来与‘无一可言’这句话岂不是很有同意么？话虽如此，文章还是可以写，想写，关键只在这一点，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至少在理论上已完全排除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而他所谓“文学”，其实只是“小品文”——“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这一论断，在这里被绝对化了；或者说，他所强调的是各种文学形式中的“小品文”性质，即反映或造成“王纲解纽”的那个东西。周作人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诗

¹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三日《骆驼草》第二十三期，收《看云集》、《苦雨斋序跋文》。

言志”，以与一切“文以载道派”——所谓“密宗”或“咒的文学”即指各种“载道”之作——相抗衡。在此种抗衡背后，还有更深一层意思：他们或是藉此反抗一个时代，或是创造一个时代。

具体到自己，周作人有云：“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在为终于有望出版的《艺术与生活》新写的序中也说：“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不过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¹不过《骆驼草》出满半年即告终刊，此后他写作重又减少，上述话要过些时才得以充分体现。——关于《骆驼草》，还有一点应该提到：“暑假中照例要预定下好些工作，……回过头来还只能又想到译，于是便想到译那古希腊的拟曲(Mimiamboi)。这是亚历山大时代海罗达思(Herodas)所作，现存七篇，每篇平均二千多字，其中有两篇又已根据英译本重译过，收在《陀螺》里，现在只须再照原文校读一下，加以订正就好。”²《妒妇》、《塾师》、《乐户》和《上庙》诸篇，陆续在此刊载。

一九三〇年八月起，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休假一年。次年一月，梦中得诗一首：“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可以代表此时心境。他在《北大的支路》³中说：“我平常觉得中国的学人对于几方面的文化应该相当地注意，自然更应该有人去特别地研究。这是希腊，印度，亚刺伯与日本。”自己显然希望身体力行，不久在回答一家杂志的提问时说：“我志愿的学术：希腊神话学；我今年拟着手的著译：希腊神话（译）；我最爱好的著作：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著作；我常看的中外

1 《《艺术与生活》序二》（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作，收《艺术与生活》、《苦雨斋序跋文》）。《艺术与生活》一九三一年二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2 《古希腊拟曲》（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骆驼草》第十九期，收《看云集》）。

3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作，收《苦竹杂记》。

文杂志：不一定；我的著译时间：不一定，大抵在课余；我的起卧时间：大抵十时睡六时起。”¹

二

一九三一年八月，周作人“辞去各校兼职，专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²。——有人曾谈到对他的印象：“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卦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似乎没有那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他一生差不多始终做着教师，讲书时喜欢一手摸着前额，一手持讲义遮着脸，一句一句地念下去，高兴时，头与身躯也许不由得就会摇一摇，下面的学生可以任意地写情书打盹，与讲者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给学生的分数倒很宽的。”³

这时已是九一八的前夕。关于此次事变，他在回答杂志提问时说：“咒骂别国的欺侮，盼望别国的帮助，都靠不住，还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兴学，征兵；十年之后可以一战，但是大家阿Q式的脾气如不能改，则这些老生常谈也无所用，只好永远咒骂盼望而已。”⁴可以代表周作人此后数年对待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态度，即一方面戒“虚”，一方面务“实”；虽然不无同道——如胡适⁵等，但也就与民众与知识界的主流意识相左。以后周作人的抉择，亦未必不肇始于此二端。十月在北京大学讲演，也说：“这回辽宁事件之发生，大家知道错在日本，但在中国方面没有错么？我想是有的。列位或者要问，土地被占，人民被杀，一点都

1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新学生》第一卷第三期。

2 《知堂年谱大要》。

3 美子：《作家素描——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出版消息》第五、六期合刊）。

4 《老生常谈》（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九日《文艺新闻》第三十二号）。

5 胡适一九三四年所作《“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整整三年了！》，与周作人的看法尤为接近。

没有反抗，怎么还有错呢？我想即此便是错。近来中国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了一种谬误思想，迷信‘公理战胜’，与原有的怯弱，取巧等等劣根性相结合，这是一个大错。”¹与他对于五四以来历次运动“有公理无强权”、“群众运动可以成事”的反思正相一致。此后更在通信中说：“中国如亡，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一则断然为此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可无疑也。”²——周氏虽曾明言“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公开私下却都不免破例，正如他所说的：“……有老朋友曰，病在还要看，若能作闭目集便更好。我谢未能。”³盖此仍为“两个鬼”在作怪也。

这年年底，周作人起念在《东方杂志》开辟专栏，以赅续搁笔已久的“夜读抄”：“光阴荏苒，四年的时光差不多过去了，‘夜读抄’还只写了一节，检出来看，殊不胜其感慨。……写‘夜读抄’之类的意思却还是有，实在这几年来时时想到，只有总没有动笔的兴致，所以终于搁下，这回因友人们的策励，决心再来续写。”⁴无论“反抗”还是“言志”，理论问题业经解决，现在只须付诸实践。名为“苦茶随笔”的专栏于次年一月面世。创作生涯的中期，也就自此开始：“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⁵不过仅登出《黄蔷薇》、《远野物语》两篇，《东方杂志》即因一二八事变发生、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而停刊，周作人未及发表的《习俗与神话》等文亦付之一炬。其后一段时间，他重归旧日状态：“近来老是写不出文章，也并不想写，而其原因则都在于没有什么意思要说。”⁶“读书录”或“看书偶记”之大量面世，还要推后一年。

一九三二年二月至四月，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做系列讲演。“现在所定的讲题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想在这题目之下，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源流，经过，和它的意义，据自己所知道所见到的，加以说明。”⁷共计八次，学生邓恭三（即邓广铭）所整理的笔记厘为五讲。

1 《关于征兵》，收《看云集》。

2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致曹聚仁。

3 《〈莫须有先生传〉序》（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鞭策》第一卷第三期，收《苦雨斋序跋文》）。

4 《〈苦茶随笔〉小引》（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一期，收《苦雨斋序跋文》）。所云“因友人们的策励”，主要指时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副主编的胡愈之。

5 《〈书房一角〉原序》（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作，收《书房一角》）。

6 《〈看云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作，收《看云集》、《苦雨斋序跋文》）。

7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 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经本人校订，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九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周作人说：“……我对于新文学的散文之考察，陆续发表在序跋中间，所以只是断片，但是意思大抵还是一贯，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变更。二十一年夏间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即是以这些意见为根据，简单地联贯了一下。”¹除直接沿袭《〈陶庵梦忆〉序》、《〈杂拌儿〉跋》、《〈燕知草〉跋》、《〈杂拌儿之二〉序》、《〈冰雪小品选〉序》、《〈草木虫鱼〉小引》、《〈枣〉和〈桥〉的序》等外，亦可追溯到“自己的园地”专栏中的某些论述，《〈圣书〉与中国文学》，乃至《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较之前此诸文，讲演录补充内容并不很多；然而有关思想得以系统总结，故被视为毕生重要著作之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仍以主要篇幅讨论明末公安派与民国以来文学革命运动的相似之处。这话题作者此前已经一讲再讲。本书新的贡献是将其纳入文学史的框架；或者说，将二者间存在着的对应关系推广至整个文学发展历程，从而形成一种明确的文学史观。所说：“我以为文学史的研究在现今那样办法，即是孤立的，隔离的研究，多少有些不合适：既然文学史所研究的为各时代的文学情况，那便和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思想史等同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这课程便应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²即为主旨所在。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惟彼此性质有别，所以分化出来：宗教仪式都有目的，而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³。以上不同倾向，此后仍体现于文学中，遂有“载道派”与“言志派”之分；而“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⁴。从晚周到民国，其间几经反复。——需要强调的是，所云“感情”与“目的”，分别是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的。他使用“言志”和“载道”两个概念，虽脱胎于“诗言志”、“文以载道”，却无关乎“诗”与“文”的区别，就连“志”与“道”也只是“个人感情”与“社会目的”的代称而已。三年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为避免缠夹更追加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

1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2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 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3 同上。

4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 中国文学的变迁》。

己的道亦是言志。”¹以这里所揭示的文学史规律反观文学革命运动与公安派的关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才得以成立。用周氏后来的话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缘，一是内应。外缘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²亦即过去所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的新。”³而文学史规律还体现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⁴据此不仅能说明公安派与文学革命运动的发生，亦可解释继乎其后的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的反动和当下载道派——无拘左翼还是右翼——的勃兴。

周作人探讨公安派与文学革命运动的关系，主要是从“言志—载道”着眼；进一步考察言志派文学本身的演变，就涉及竟陵派起以补救公安派之流弊，乃至与此仿佛的现代散文前后两种路数了，——这分别以胡适、冰心、徐志摩和俞平伯、废名为代表，前者“很像公安派”，而后者“和竟陵派相似”⁵。这意思他过去讲过，现在也纳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范畴。可以说，周氏的文学史观有着“以性质论”和“以文体论”两个层次，最终则落实于作者有关“文章之美”的理想。周作人说：“我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⁶由此完成了对于文学革命运动的重新定义：它所体现的仍是“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

1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2 同上。

3 《(杂拌儿)跋》。

4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 中国文学的变迁》。

5 同上。

6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

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与此相冲突的，无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还是“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根本不能算是文学。此前的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此后对于文学革命运动的反动，概莫如此。而将“言志派文学”置诸文学史的背景下，就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等少数人所为，而属于一个悠久的传统，或一个强大的阵营。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对于公安派特别重视。然而正如他后来所强调的：“……公安派的文学大约只做到这里，现在的要算是进一程了。为什么呢？这便因为现在所受的外来影响是唯物的科学思想，他能够使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切实的淘炼一番。”¹并未忽略文学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特别意义和特别作用。至于由此引发“晚明小品热”，一时选编、翻印成风，只是指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余绪而已，但却有反客为主之势。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即《冰雪小品选》）继周著后面世，即被视为与之“配套”的明清小品文读本²；沈氏得以跻身“苦雨斋四大弟子”，与此颇有关系。

周作人的《看云集》——前引友人“病在还要看”的话，即针对此书而言——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编就，十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主要收录《永日集》之后的文章。晚年自我评价说：“觉所为杂文虽尚有做作，却亦颇佳。”³序中抄录所作《知堂说》云：“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⁴这涉及“知”与“言”两个层面；而孔子之“是知也”与荀子之“知也”、“亦知也”，均可理解为“智”——周氏以此自勉，既关乎治学态度、写作态度，亦关乎人生态度。嗣后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

1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2 《近代散文抄》篇目先曾列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附录二”，编者尤炳圻（平白）说：“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以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又周作人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许寿裳信云：“有沈君启无系燕京大学旧生，专治明清文，现在北大代弟担任国文系‘近代散文’功课，编有《散文抄》一书。”

3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记。

4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作。

取而不想给。”¹实乃同一意思。而他在一篇“自述”中介绍得更为详细：“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如不懂弗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全无处，全是徒劳。”²可以说，“知堂”是周作人自提出“教训之无用”与“生活之艺术”以来，有意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此“号”遂与本名并行于世。

此外还有几种选本付梓。一九三二年三月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儿童文学小论》，收录的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所作这类文章。上海天马书店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知堂文集》；一九三四年三月，又出版《苦雨斋序跋文》。一九三二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周作人散文钞》，名为“章锡琛编”，实亦出自作者自己之手³。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周作人书信》，其中“书”的部分亦具选本性质。周作人通过选编《知堂文集》等，对于此前作品有所存舍，此亦从创作生涯前期向着中期嬗变的重要步骤之一。所保存者，包括《猥亵的歌谣》、《荣光之手》等文化批判之作，《苍蝇》、《乌篷船》等“趣味之文”，《前门遇马队记》、《碰伤》等“别扭的写法”；所舍弃者，则有文学评论，社会批评，以及带着“梦想家”与“传道者”色彩的作品等。这标志着不同写作路数在下一阶段的兴废。置身于这一创作时期的“交界之处”，他总结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

1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与侵君”，《〈夜读抄〉后记》引。

2 《周作人自述》（一九三〇年作，一九三四年未补充后收《周作人论》），弗洛伊特（Sigmund Freud），通译弗洛伊德。

3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日记：“下午编文钞录目，寄给章锡琛君。”书中注释则为废名所作，见周氏五月十九日日记：“下午废名来，寄开明文钞注释及序。”

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¹

《周作人书信》“信”的部分则展现了他人生的别种内容。这是写给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的，涉及写字，搜书，集邮，说梦，聚餐，喝酒，赏月，看花，刻印，制笺诸事，可见日常生活与个人爱好之一斑。相比之下，他与前两位弟子思想多所契合，与末一位趣味更其相投。周作人说：“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²如果说前引“总努力说实话”云云体现了他“进”——尽管其间多有困惑苦恼——的一面，这里所反映的主要是“退”的一面；二者仍分别由“流氓鬼”与“绅士鬼”执政。整个三十年代，周作人均在此种进退之间。他显然自有退处，可与二三同好一起享受：“苦雨斋”、“煨药庐”、“苦茶庵”或“苦竹斋”³，就是这样小而完整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从前他在《北京的茶食》中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如今可谓落到实处。虽然所崇尚者，在质朴而非奢华，在陶冶而非沉溺，一言以蔽之，“玩物”未必“丧志”，形诸笔墨，毕竟与时代气氛不相协调。周氏因此为一部分人所羡慕，亦为另一部分人所不满。

1 《知堂文集》序。

2 《书与尺牋——致小峰》（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青年界》第三卷第四期，收《周作人书信》改题《序信》，收《苦雨斋序跋文》改题《书信序》）。这段话亦有针对鲁迅之意，此前同一出版社印行了鲁迅、景宋（许广平）合著《两地书》。周作人还说：“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3 这都是他为自己书房取的名字，与“苦雨斋”同为一处。“煨药庐”首见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作《〈冰雪小品选〉序》；“苦茶庵”首见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作《笑话论》，以后又有《苦茶庵小文》（收《夜读抄》）；“苦竹斋”则仅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作《〈苦茶随笔〉序》中一见。

一九三三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的《苦茶庵笑话选》，选自明冯梦龙《笑府》，清陈皋谟《笑倒》和石成金《笑得好》。对周作人来说，多少也是趣味的产物。尽管他说：“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钱店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为戏仿佛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对比所说：“与歌谣故事谚语相同，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¹所关心者仍在“人民所感”，而不为民俗学的兴趣与研究所限。

他还完成了两种译作。一九二四年的“土之盘宴”里有三个儿童剧，现在他又补译三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儿童书局出版《儿童剧》一书。为儿童提供文学读物，在他是历时二十年之久的愿望。——儿童书局为原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学生张一渠创办，编集此书与《儿童文学小论》，均系周氏“帮忙”之举。《希腊拟曲》前曾在《骆驼草》揭载数则，“如是又有两年，总是‘捏捏放放’，一直没有成就，这回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的鼓励，才算勉强写完”²，时为一九三二年六月。除海罗达思所著外，又加入谛阿克列多思的作品。一九三四年一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周作人的第一本古希腊文译著。“可惜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³所得稿费四百元，在西郊板井村购坟地一块，安葬了女儿若子。后来侄子丰三、母亲和妻子也都葬在那里。

《希腊拟曲》署“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一九三三年五月，周作人又起手为胡适所主持的这个机构翻译《书库》(Bibliothékē)，此书托名阿波罗陀洛斯(Apollodorus)⁴著，实为公元一世纪的作品。周氏早有译介古希腊神话的设想，现在便择定了此种。“这神话集的好处，叙述平易而颇详明，固然是其一。是希腊人自编，在现存

1 《笑话论》(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青年界》第四卷第二号，收《苦茶庵笑话选》改题《序》，又收《苦雨斋序跋文》)。

2 《〈希腊拟曲〉序》(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作，收《希腊拟曲》)。

3 《我的杂学》。

4 通译阿波罗多罗斯。

书类中年代又算是较早的，这一点也颇重要，是其二。”¹将近一年后，还提到：“我找到阿坡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来翻译，自己觉得很是愉快也是有意义的事，目下所感到的困难乃是人神的名字太多，译音容易混乱，但别无妙法，还只得一个个的用汉字校了又译译了又校耳。”²

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日记云：“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应沈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七时回家。”“沈君”即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起担任即将创刊的副刊主编。三天后，周氏成《〈猪鹿狸〉》一篇，发表于第一期。前后五载，他先在《北新》，继在《东方杂志》作文，均告半途而废；现在终于藉《大公报·文艺副刊》实现“中年变法”，创作也再次进入高潮，而且持续相当长久。这个副刊对他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不亚于《新青年》、《晨报副刊》、《语丝》、《骆驼草》等；作为编辑的沈从文亦可与先前的陈独秀、孙伏园等相提并论。他还常常参加沈从文、朱光潜等邀集的文人聚会。正是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此类活动，文坛产生一个“京派”，成员包括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俞平伯、废名、李健吾、杨振声、朱自清、萧乾等，周作人成为精神领袖，时有“北方文坛盟主”之称³。

三

周作人说：“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⁴又将以书为题的文章称为“本文”，将其他题目的文章称为“杂文”，而后者亦多为读书之作。当初写“夜读抄”时，他说：“看了如还有工夫，便随手写下一点来，也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不愿意使自己的感想轻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点痕迹，所以写下几句。”⁵写“苦茶随笔”时则说：“在这小文章里

1 《〈希腊神话〉引言》（一九四四年十月《文艺杂志》第二卷第十期，收《立春以前》）。

2 《希腊神话二》（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界》第五卷第五期，收《夜读抄》）。

3 沈从文：《论冯文炳》（收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海大东书局《沫沫集》）。

4 《〈夜读抄〉后记》（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作，收《夜读抄》）。

5 《〈夜读抄〉小引》（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北新》第二卷第五号，收《夜读抄》）。

所说的大抵是关于书或人，向来读了很受影响或是觉得喜欢的，并不是什么新著的批评介绍，实在乃是一种回忆罢了。这里所谈差不多都是外国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无可谈，其原因很简单，从小读中国书惯了，就不以为奇，所受影响自己也不大觉得，所以有点茫然，即使想说也有无从说起之概。”¹现在路数又有所变化：不仅仅是“回忆”，也包括当下读书“感想”；所涉及者除欧洲、日本等“外国的东西”外，还有“中国书”，——《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继《〈猪鹿狸〉》后，就有《〈蠕范〉》、《〈颜氏学记〉》二文刊出。谈中国书所占比例，以后更逐渐增多。这些文章反映了作者的读书生活，与“绿洲”、“茶话”等一脉相承。不过过去主要强调一己趣味：“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意目，仿佛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Oasis）一般，疲倦的生命又恢复了一点活气。”²如今意义多少有所不同。

周氏此路文章，具体写法是大段摘抄原著，中缀少量按语。——对此他曾有所说明：“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但也正如其所说：“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³世间遂有“文抄公”之讥。时隔多年，他仍强调“没有意见怎么抄法”，指出自家文章“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⁴。先前有云：“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⁵现在则选择以“不愿意直说”即尽可能采用间接表述的方式达到目的。文章这一新的创体，自此沿袭多年。郁达夫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言，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

1 《〈苦茶随笔〉小引》。

2 《〈绿洲〉小引》（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收《自己的园地》、《苦雨斋序跋文》）。

3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答上海有君”，《〈苦竹杂记〉后记》引。

4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周氏此种写法，曾得到钱玄同的鼓励，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即钱氏辞世前三天，致周作人信有云：“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

5 《〈雨天的书〉自序二》。

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¹正道着周氏前、中两期文章的风格变化。

周作人被誉为“小品散文之王”²，鲁迅在回答“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时，也把周作人列为第一³。钟敬文更说：“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偶呢。”⁴周氏自己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趣味”：“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普通有低级趣味这一句话，虽然看样子是从日本输入的，据我想也稍有语病，但是现在不妨借来作为解说，似乎说没趣味更容易懂些。没趣味并不就是无趣味，除非这人真是救死唯恐不赡，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犹如人各异面，只要保存其本来面目，不问妍媸如何，总都自有其生气也。最不行的是似是而失的没趣味，或曰假趣味，恶趣味，低级趣味均可，假如照大智若愚的这说法，这可以说是大俗若雅罢。”⁵一是“简单”：“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钝吟杂录》卷八有云：‘平常说话，其中亦有文字。欧阳公云，见人题壁，可以知人文字，则知文字好处正不在华绮，儒者不晓得，是一病。’其实平常说话原也不容易，盖因其中即有文字，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⁶“趣味”与“本色”在他实为一事。“简单”即不渲染，不夸张，不做作，正是为了葆有此种品质或状态，不致因

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收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

2 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青年界》第六卷第五期）。

3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翻译整理，载一九八七年三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

4 钟敬文：《试谈小品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文学周报》第三百四十九期）。

5 《笠翁与随园》（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大公报·文艺》，收《苦竹杂记》）。

6 《本色》（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晨报》，收《风雨谈》）。

诉诸写作而遭受破坏；而对于随笔来说，文体旨在传达，本身并非制造。周作人自提出“美文观”，至此终于在理论与实践上臻于完善。“文抄公”之作代表他的散文的最高成就。周作人写文章的态度，与其人生态度、生活态度是一致的。中庸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美学。过去曾说：“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股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¹他写文章，也一再强调“不曾想有什么力量及于别人”²；“文抄公”的写法，同样符合这一原则。

周作人谈到自己这一时期的写作，一方面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子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所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³另一方面又说：“我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⁴“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这一年过去了没有能够消极一点，这是我所觉得很可悲的。我何时才真能专谈风月讲趣味，如许多热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⁵“绅士鬼”似已占据主位，“流氓鬼”却又常来捣乱，仍然不能拘于一端。然而对周作人来说，无论“销沉”还是“积极”，都关乎对于现实问题的直接反应；自从他提出“闭户读书论”，用心其实已经不在于此，尽管偶尔仍有所涉及。关键在于，即便“销沉”或尽管“积极”，是否还有别的要说，或不妨碍说些别的。——当初他讲：“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

1 《金鱼》（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益世报》副刊，收《看云集》）。

2 《情书与文章》（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华北日报·每日文艺》，收《苦竹杂记》改题《情书写法》）。

3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俞平伯，收《周作人书信》。

4 《〈苦茶随笔〉后记》（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作，收《苦茶随笔》）。

5 《〈苦竹杂记〉题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收《苦竹杂记》改题《后记》）。

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¹现在则要把读书所得公布于世。

此前周作人为俞平伯《杂拌儿之二》作序，有云：“这里边兼有思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万不能及的，……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²用来形容周氏自己或许更为合适。这里又要提到给予他极大影响的蔼理斯。在《〈性的心理〉》³一文中，周氏再次抄录了自己顶喜欢的那两节话，“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二十年后再来写这一册的《性的心理》，蔼理斯已是七十四岁了，他的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还是仍旧，但是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常识”与“情理”，恐怕是周作人这一时期笔下出现最频繁的两个词了。他以此为尺度，估量人生，评衡世界：“所谓常识乃只是根据现代科学证明的普通知识，在初中的几种学科里原已略具，只须稍稍活用就是了。”⁴“我觉得中国有顶好的事情，便是讲情理，其极坏的地方是不讲情理。随处皆是物理人情，只要人去细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渐进为贤人，不知者终为愚人，恶人。”⁵自己所要做的，便是指斥各种“不讲情理”的“极坏的地方”，褒扬所有“讲情理”的“顶好的事情”。所谓“读书录”或“看书偶记”，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切入方式，即以阅读为契机，依靠知识的绵延和思想的碰撞，扩大深入到人类、历史、社会、自然、文化、文明等各个领域。书是陆续读来，并无规划；“吾道”却一以贯之：“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⁶

1 《闭户读书论》。

2 《〈杂拌儿之二〉序》（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作，收《苦雨斋序跋文》）。

3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现代》第四卷第一期，收《夜读抄》。

4 《常识》（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实报·星期偶感》，收《苦竹杂记》）。

5 《情理》（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实报·星期偶感》，收《苦茶随笔》、《苦竹杂记》）。

6 《〈书房一角〉原序》。

周作人说：“这些文章从表面看来或者与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我仍旧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是民国八年我在《每周评论》上说过的话，至今我还是这样的想。”¹较之前引“销沉”或“积极”的话，涉及更深的层面。他继续质疑启蒙主义，故云“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自审销沉”即是此意；但同时又“惭愧积极”，因为依旧未能彻底放弃这一立场。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或“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其中最重要者，即是以生物学“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就像他所说的：“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²编《雨天的书》时，他曾以“道德家”自居，现在也还是“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同时建立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不过作为“参考”的“标准”更其明确罢了。以后他将这一方向归纳为“伦理之自然化”。

周作人说：“老实说，我自己也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教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³这与其说是向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不如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上述“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可以看作是对《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新的诠释：“因为我是儒家思想的，所以我平素很主张人禽之辨，而文过饰非乃是禽

1 《〈夜读抄〉后记》。

2 《〈百廿虫吟〉》（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作，收《夜读抄》）。

3 《〈逸语〉与〈论语〉并说到孔子的益友》（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五期，收《风雨谈》改题《〈逸语〉与〈论语〉》）。

以下的勾当。古人说通天地人为儒，这个我实在不敢自承，但是如有一点生物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常识，平常也勉强足以应用了。我读英国捺布菲修所著《自然之世界》与汉译汤姆生的《动物生活史》，觉得生物的情状约略可以知道，是即所谓禽也。人是一种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实在与禽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他于生活上略加上一点调节，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变动，对于禽却显出明了的不同来了，于是他便自称为人，说他有动物所无的文化。据我想，人之异于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于是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假如人类有什么动物所无的文化，我想这个该是的，至于汽车飞机枪炮之流无论怎么精巧便利，实在还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长发达，拿去夸示于动物但能表出量的进展而非是质的差异。……但是人的文化也并不都是向上的，人会善用他的理智去干禽兽所不为的事，如暗杀，买淫，文字思想狱，为文明或王道的侵略，这末了一件正该当孔子所深恶痛疾的，文过饰非自然并不限于对外的暴举，不过这是最重大的一项罢了。”¹其所重行审视、重定取舍的对象，就从人生态度，扩大到社会道德，又扩大到整个人类文明。而“物理人情”，就是此种有别于“物的文化”的“人的文化”的基本状态与形式²。

周作人曾记述他与俞平伯之间的一次谈话：“（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往新南院去访平伯，讲到现在中国情形之危险，前日读‘墨海金壶’本的《大金吊伐录》，一边总是敷衍或取巧，一边便申斥无诚意，要取断然的处置，八百年前事，却有昨今之感，可为寒心。近日北方又有什么问题如报上所载，我们不知道中国如何应付，看地方官厅的举动却还是那么样，只管女人的事，头发，袖子，袜子，衣衩等，或男女不准同校，或男女准同游泳，这些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我真不懂。我只知道，关于教育文化诸问题信任官僚而轻视学人，此事起始于中小学之举行会考，而统一思想运动之成功则左派朋友的该项理论实为建筑其基础。《梵网经》有云：

1 《《逸语》与《论语》并说到孔子的益友》。

2 在《日本管窥之三》（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一期）中，也谈到“物的文化”与“人的文化”的区别。

‘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坏。’我想这话说得不错。平伯听了微笑对我说，他觉得我对于中国有些事情似乎比他还要热心，虽然年纪比他大，这个理由他想大约是因为我对于有些派从前有点认识，有过期待。”接下来周氏有番自省：“他这话说得很好，仔细想想也说得很好。自辛丑以来在外游荡，我所见所知的人上下左右总计起来，大约也颇不少。因知道而期待，而责备，这是一条路线。但是，也可因知道而不期待，而不责备，这是别一条路线。我走的却一直是那第一路，不肯消极，不肯逃避现实，不肯心死，说这马死了，——这真是‘何尝非大错而特错’。不错的是第二路。这条路我应该能够走，因为我对于有许多人与物与事都有所知。见囊驼固不怪他驼背，见马也不期望他有一天背会肿，以驼呼驼，以马称马，此动物学的科学方法也。自然主义派昔曾用之于小说矣，今何妨再来借用，自然主义的文学虽已过时而动物学则固健在，以此为人生的基本不亦可乎。”¹周作人以“儒家”自居，所心仪的对象却是《论语》里的长沮、桀溺；如果说孔子走的是“第一路”，他们走的正是“第二路”：“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间为儒家盖无疑也。”²“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最能说出自家的态度。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最能说出孔子的态度。说到底，二者还是一个源流，因为都知道不可，不过一个还要为，一个不想为罢了。”³周作人提倡“闭户读书”，以“爱智者”自许，所希冀的正是从“第一路”转向“第二路”，从孔子变作长沮、桀溺。至于是否真能做到，则是另一问题。

周作人的文章，当时常被视为“闲适”，他自己则说：“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这可以分作两种。其一是小闲适，……如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不必卧且

1 《苦茶随笔》后记。

2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与侵君”，《夜读抄·后记》引。

3 《论语》小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四期，收《苦茶随笔》）。

醉也。其二可以说是大闲适罢。……夫好生恶死人之常情也，他们亦何必那么视死如甘寝，实在是‘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总之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冒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¹他的确写了些“小闲适”的文章，却又有“大闲适”做底子，时而不免“焦躁”、“积极”；这样三种状态，混杂在其笔下，较之同时代人，或许正是丰富复杂之处。

在以“常识”和“情理”为标准重估一切价值的过程中，周作人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中国古人言论方面。起手写“苦茶随笔”专栏时曾说：“中国思想大约可以分为儒道释三家，释道二氏之说有时觉得极透彻可喜，但自己仔细思量，似乎我们的思想仍以儒家为大宗，我想这也无可讳言，不过尚不至于与后世的儒教徒合流，差堪自慰耳。”²现在他致力于以是否合乎“物理人理”，重新划定一个真正的儒家传统。此种甄别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他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有关文章的看法，也一并体现其中。“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³他特别把矛头指向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⁴从根本上说，周作人散文正是对唐宋八大家至清代桐城派这一路正统散文的反动。而他所首肯的，几乎都是思想史与文学

1 《自己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十月《青年界》第十卷第三期，收《瓜豆集》）。

2 《《苦茶随笔》小引》。

3 《《苦竹杂记》后记》。

4 《谈韩退之与桐城派》（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人间世》第二十一期，收《苦茶随笔》时改题《厂甸之二》）。

史上的异端人物，如颜之推，李贽，王思任，傅山，颜元，刘玉书，俞理初，王侃，李元复，等等。关于王侃《江州笔谈》有云：“所觉得有意思者还在他对于一般事物的常识与特识。”¹关于刘玉书《常谈》则云：“在《乡闹纪异》这类题目的故事或单行本盛行的时候，能够有如此明通的议论，虽然不过是常识，却也正是卓识了。”²约略可以代表他的态度。

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周作人虚岁五十。生日前夕作“牛山体”七律二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前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羨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笔意闲适，却颇具苦味；作者所关心、从事、坚持者，于此可见一斑。“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³之前林语堂编《论语》，周作人极少投稿，对于所鼓吹的“幽默”亦不甚认同；直到《人间世》出，提倡小品文，二人才引为同调。然而发刊词所说“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虽系周氏一贯主张，周氏自己作文，却不为此所囿。《人间世》及林语堂随后所办《宇宙风》，都是他的重要阵地。

《人间世》创刊号刊载“五秩自寿诗”时，一并发表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唱和之作；以后两期，又有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的和诗，对

1 《江州笔谈》（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夜谈抄》。

2 《刘青园〈常谈〉》（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竹杂记》。

3 《知堂回想录·打油诗》。前一首以《五十诞辰自咏诗稿》为题先刊于一九三四年二月《现代》第四卷第四期，诗末附言云：“三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寿诗，仿牛山志明和尚体。”可知所说“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不确。

周作人颇表契合。抨击声随之而起。先是荃容作《人间何世？》¹，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作《过去的幽灵》²，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³，看法如出一辙。对此鲁迅在私人通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⁴不过公布于世，已在逝世以后。周作人自己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说：“……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林语堂遂作《周作人诗读法》⁵一文，称周诗“寄沉痛于幽闲”。周氏自己亦略有分辩，如关于“街头”一联有云：“若一一如字直说，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十字街头听《聊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临《十七贴》，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⁶——其实即便“谈鬼”，亦如其所说：“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

1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荃容即廖沫沙。

2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爱罗先珂在华时有《过去的幽灵》讲演，耿飏之译，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过去的幽灵及其他》（朱枕新、李小峰编，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四年出版）。胡风称该篇系周作人所译，不确。

3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

4 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这大概是对后者所作《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的反应。曹文有云：“周先生自新文学运动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谈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想必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鲁迅在同年五月六日致杨霁云的信中，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五月二十二日给杨写信更有申说：“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前几月的《汗血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大骂明末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加以亡国之罪，则手段之相像，他们自己也觉得的。”而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中所云：“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如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有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恰与鲁迅的说法暗合。

5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6 《谈鬼论》（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论语》第九十一期，收《瓜豆集》）。

之投影则当不谬也。”¹所关心者仍为“人情”。周作人与批评者所关注的本非一事；立足现实层面考虑，他的言论确有“不合时宜”之嫌，或如其自己所云“思想销沉”；尽管他所标举的“物理人情”，未必不涵盖现实问题，甚至根本即由现实问题引发。然而在批评者看来，只要不直接针对现实，便是脱离现实²。当然也有相反意见，如苏雪林说：“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³她总结周氏思想的核心为“对国民劣根性的拮据”，“驱逐死鬼的精神”和“健全性道德的提倡”。

周作人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他后来说：“当年那两首诗发表之后，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闹嚷嚷的一阵，不久也就过去了，似乎没甚妨害，但是拨草寻蛇，自取烦恼，本已多事，况且众口烁金，无实的毁谤看似无关重要，世间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发生，不是可以轻看的事情。”⁴这的确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进一步分化的重要标志。周作人与左翼作家相违已历年所，但被公开推到对立面尚属首次；他也就站在这个位置，对自己的对立面施以攻击，——尽管他赏识“忍过事堪喜”的境界⁵。不久胡风提出“葛里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⁶，仍系接续“过去的幽灵”的话题；周作人则作《葛理斯的时代》⁷，再次抄引葛氏那两节话，并说：“这些话在热心的朋友们看去或者要觉得太冷静了也未可知，虽然他原是说得很切实的。现在所有的是教徒的热诚，天天看着日出于东而没于西，却总期望明天是北极的一个长昼，不，便是那么把太阳当作水月灯挂在头上的无穷尽的白天。大家都喜欢谈‘前夜’，正如基督降诞夜似的，或者又以古雅语称之曰子夜。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夜，但是这在

1 《鬼的生长》（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夜谈抄》）。

2 巴金所作短篇小说《沉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的主人公“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据作者说：“《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

3 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

4 《苦茶庵打油诗》。

5 《《苦茶随笔》序》（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改题《小引》，收《苦竹杂记》改题《杜牧之句》）。

6 胡风：《林语堂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一号）。

7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

少信的人也是不容易领解的。葛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周作人以此界定与左翼作家的不同之处，他自恃仍然坚持一贯的个人而非集体，独立而非附庸的立场。——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确与无产阶级思想难以相容。而在后一方面看来，周作人已经成了前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一再强调：“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¹

其实此种思想立场上的分歧对立，早由鲁迅在一系列文章中揭示出来；——此时的周氏兄弟，无疑已处于对立的两方面了。鲁迅说：“‘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²虽未提及周作人的名字，却可理解是对其十余年来思想与作品发展变化的总体评价，而前述胡风等所论实乃脱胎于此。周作人的回应则是：“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一种自慰。……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

1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答南京阳君”，《〈苦竹杂记〉后记》引。

2 《小品文的危机》（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第三卷第六期）。鲁迅相关文章，还有《“京派”与“海派”》（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小品文的生机》（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隐士》（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京派”和“海派”》（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杂谈小品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等。

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总有愤慨，做文章说话知道不是画符念咒，会有一个霹雳打死妖怪的结果，不过说说也好，聊以出口闷气。”¹进而更有“老人的胡闹”的说法，通常被认为是攻讦鲁迅：“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²周氏兄弟如今站在各自的立场，分别指责对方背离了曾经共同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周作人说：“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³以此表明自己与左右两翼之不能相得，——在他看来，二者本是一回事：“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与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⁴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周作人为授课收集材料，利用暑假携妇前往东京，住在本乡菊坂町，九月二日返回北京。其时徐祖正也在日本，周作人出席各种活动，多由徐氏陪同。周氏会见了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还曾参加新村支部集会。又与郭沫若见面，——后者日记有云：“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周作人的确已非前次访日时可比，不仅是中国的文坛重镇，在日本也是知名人士了。此后他的作品出现了一些日译本，如《北京の菓子》（松枝茂夫译，山本书店一九三六年出版）、《周作人随笔集》（松枝茂夫译，改造社一九三八年出版）、《中国新文学之源流》（松枝茂夫译，文求堂

1 《关于写文章》（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

2 《老人的胡闹》（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九十六期，收《瓜豆集》）。

3 《蛙的教训》（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北日报·每日文艺》，收《苦茶随笔》）。

4 《关于命运》（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

一九三九年出版)、《周作人文芸随笔抄》(松枝茂夫译,富山房一九四〇年出版)、《瓜豆集》(松枝茂夫译,创元社一九四〇年出版)、《苦茶随笔》(一户务译,名取书店一九四〇年出版)、《结缘豆》(松枝茂夫译,一九四四年出版)等,以及田中庆太郎编的中文本《周作人随笔抄》(文求堂书店一九三九年出版)。在日期间,刘半农死讯传来,周氏“为之怆然”¹。所作《半农纪念》²有云:“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仍强调保持一贯的思想传统,他与刘半农等正因此而声气相求。

一九三四年九月,周作人著《夜读抄》由北新书局出版,所收多系《看云集》以后所作,包括未完成的“夜读抄”、“苦茶随笔”专栏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文章。这是周作人创作中期的第一本书,自许“最所敝帚自珍”³,——假如要在他一生著作中推举一种为代表作,大概就是《夜读抄》了。此后的作品,又陆续编成几个集子:《苦茶随笔》,北新书局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版;《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版;《风雨谈》,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版。

说来周作人并非“不知外事”⁴,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致俞平伯的信中,已对当下形势忧心忡忡:“鼙鼓动地来,……寄寓燕山,大有釜底游魂之慨,但天下何处非釜乎。”然而其着眼点以及对于知识界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的考虑,却与众不同。他作《〈颜氏学记〉》⁵一文,引用颜元的话:“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惶惶久之。”并说:“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

1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记。刘半农于该年七月十四日逝世。

2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十八期,收《苦茶随笔》。

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致鲍耀明。

4 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中文语。

5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夜读抄》。

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这本系承袭此前戒“虚”务“实”的主张，以后所宣扬的“道义之事功化”即发端于此；而否定“偏激的气节说”，又与《祖先崇拜》中即已萌芽的非圣无法的倾向相一致，正是“流氓鬼”的一种表现。

一年多后，周作人发出与九一八事变时几乎相同的质疑：“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无庸讳言，盖这四十年来的政治实以不同外国打仗为基础而进行着的，到了今日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变吧？在别人——不，就是自己以前也如此，只好讲和的状态之下，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¹正是基于此种判断，他打算“一说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又觉得大可不必，故复中止。”²但文章中所引述的某友人的话，可以代表他的意思：“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是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³而在他看来，此所以为“难”，某种程度上仍牵扯到前述“偏激的气节说”一类民众意识：“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⁴

在此背景之下，周作人愈加强调“事功”：“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

1 《弃文就武》（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独立评论》第一百三十四期，收《苦茶随笔》）。

2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致梁实秋。

3 《再谈油炸鬼》（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论语》第九十五期，收《瓜豆集》）。

4 《关于英雄崇拜》（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

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張弘范或吳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¹——周作人几年后的举动，于此似乎可以找到一点思想渊源；然而若断定此时所提到的“我们”包括自己，所倡导的“事功”仅指“主和”，却未必也。

对于周作人来说，上述言论不仅仅是“书生论政”，仍应纳入他这一时期整个思想范畴之内。当提出文天祥等不应作为“英雄”来“崇拜”时，他另有自己心仪的“事功与道德具备”的对象：“从前读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后来又读丹麦勃兰特思的论文，对于加里波的将军很是佩服，假如中国古时有这样一位英雄，我是愿意崇拜的。就是不成功而身死的人，如斯巴达守温泉峡（Thermopylae）的三百人与其首领勒阿尼达思，我也是非常喜欢，他们抵抗波斯大军而死，‘依照他们的规矩躺在此地’，如墓铭所说，这是何等中正的精神，毫无东方那些君恩臣节其他作用等等的浑浊空气。”末尾所说才是真正落脚处；而前引有关秦桧等的说法，用意同样深刻得多：“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这统一化有时由于一时政治的作用，或由于民间习惯的流传，二者之中以后者为慢性的，难以治疗，最为可怕。那时候有人来扎他一针，如李贽邱濬赵翼俞正燮汪士铎吕思勉之徒的言论，虽然未必就能救命，也总可放出一点毒气，不为无益。关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稍为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虽然太平天国一案我还不预备参加去翻。”²周作人虽然对普通生活乃至民间信仰颇感兴趣，在思想上却坚决抵制来自民众意识的影响；其从事文化批判，梳理儒学传统，始终贯彻这一精神。即如此后所说：“下级社会与中上级游离，固然是不好的事，但是中国的现象，又显得中上级社会的见识渐与下级接近，其重大性也极值得考虑。”³归根结

1 《关于英雄崇拜》（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

2 《再谈油炸鬼》。勒阿尼达思（Leonidas），通译莱奥尼达斯。勃兰特思，即布兰代斯。

3 《论小说教育》（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天地》第五期，收《苦口甘口》）。

底，他所标举的“物理人情”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五

一九三五年五月，周作人发表《日本管窥》，以后一再续写，自认为是“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¹，此外又作《谈日本文化书》、《谈日本文化书（其二）》等，此即其所谓“日本研究小店”是也。十年前周氏在批判《顺天时报》时，已提出“中国在他的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²；其后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三十二周年撰文，亦将日本文化列为“应该有人去特别地研究”的项目之一³。现在则说：“从甲午至甲戌四十年中事情也不少了，似乎却总还不能引起知己知彼的决心，有的大约是刺激太小吧，没有效力，有的又是太大了，引起的反应超过了常度。九一八总是大事件了，然而它的影响在学校则不及，在社会则过。”⁴他试图在非“社会”的层面从事一点“知彼”的工作，实际上仍是一种现实关注。“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的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⁵

此项研究仍从文化入手，如其所说：“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

1 《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日本管窥》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八期，收《苦茶随笔》；《日本管窥之二》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收《苦竹杂记》时改题《日本的衣食住》；《日本管窥之三》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一期，收《风雨谈》；《日本管窥之四》载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五期，收《知堂乙酉文编》。

2 《日本与中国》（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京报副刊》，收《谈虎集》）。

3 《北大的支路》。

4 《关于日本语》（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文》第二卷第一期，收《苦竹杂记》）。

5 《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

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然而一番考察之后，终于发现：“文化是民族的最高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¹一言以蔽之，“人的文化”无从解释“物的文化”，而后者对现实所起作用，为前者所不能比拟。是以前三篇《管窥》揭载之后，搁浅许久，第四篇才面世，其时已是七七事变前夕。文章有云：“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以后他总结说：“我们谈日本文化，多从文学艺术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结论，这固然也是对的，可是他的应用范围也有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缺点。文化研究的结论有如一把钥匙，比得不好一点正如夜行人所用的万应钥，能够开一切的锁，这才有用，假如这结论应用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释同一国民的别的行动便不适合，那么这里显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这可以代表贤哲，而不曾包括英雄与无赖在里边，总之是不能解释全部国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这些深刻的反证，我自不能完全抛弃以前关于日本文化的意见，声明无所知，此即是《管窥之四》的要点。一面我提出推测的意见，以为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与宗教无缘，所以结果只好干脆断念，

¹ 《谈日本文化书》（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自由评论》第三十二期，收《瓜豆集》）。

我的徒劳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¹实际上他对于日本现实的认识，已经涵盖于这一结论之中。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消息传到北平，周作人在北大上六朝散文课，课程每次为两小时，上完一小时之后，他面露悲痛之色，对学生说，鲁迅去世，下一节课暂时告缺了。”²周作人以“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³，对外掩饰兄弟间十多年不相往来的真相。他先后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和《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还曾参与编撰鲁迅年谱⁴。不过回答记者提问及作《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所持态度却与鲁迅当年写《忆刘半农君》相仿。鲁迅有云：“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周作人谈论鲁迅，也是“这里所说限于有个人独到之见独创之才的少数事业，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毁或誉者概置不论”⁵，暗寓取舍之意，尤其针对最后十年。当有人表示“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年青人去做，若稿已告成，自可束之高阁，不必发表”时，周作人以“如或单纯是封条主义，则不佞素不喜各色封条，幸恕不能承教耳”⁶作答。此亦与鲁迅所云“……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有几分相似。周作人与鲁迅一样，都试图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打捞死者留下的遗产。兄弟二人失和已久，其后更以笔墨相讪，然而鲁迅的死使得周作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所说：“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⁷实是引亡兄为平生难得的知己。他将鲁迅从前以自己名义发表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怀旧》和《〈域外小说集〉序》“物归原主”。自此周氏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

1 《过去的工作》。

2 唐弢：《关于周作人》（一九八七年五月《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

3 《鲁迅先生噩耗到平，周作人谈鲁迅》（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大晚报》）。

4 《鲁迅全集》附录之年谱，先由周作人、许寿裳合编，后因二人于写法详略意见分歧，改由许氏独自完成。

5 《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九期，收《瓜豆集》）。

6 《〈关于鲁迅〉书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作，收《瓜豆集》）。

7 《关于鲁迅》。

以后所作《关于范爱农》、《关于阿Q》等皆属此类，晚年更有成本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行世。而上来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若是神则所需要者自然别有神话与其神学在也。”¹成为他回忆鲁迅恪守始终的原则。

“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如何，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²从十月到十二月，仅周作人就为《世界日报·明珠》写了十九篇³，简明扼要，表达思想颇为显豁。所谓“新的启蒙运动”，乃以周氏称道废名的“意思极正确，是经过好多经验思索而得的，里边有其颠扑不破的地方”为旨。这是他与俞平伯、废名继《骆驼草》之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最末一次合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周作人宣布：“近来我很想看点前人笔记。中国笔记本本来多得很，从前也杂乱的看得不少，可是现在的意思稍有不同。我所想看的目下暂以近三百年为准，换句话说差不多就是清代的，本来再上溯一点上去亦无不可，不过晚明这一类的著作太多，没有资力收罗，至于现代也不包括在里边，其理由却又因为是太少，新式的杂感随笔只好算是别一项目了。”⁴他所列举的较好作品，如傅山、刘献廷、刘玉书、郝懿行、马时芳、李元复、王侃、赵翼、俞正燮等人所著，此前差不多都专门有过评论；现在则打算更系统全面地检阅一番。一如既往，他仍拟将读书所得著之为文；然而所要采用的形式，却与过去有所不同。这预示着自《夜读抄》以降的文章风格，行将发生某种变化。——所作《自己所能做的》⁵一文有云：“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

1 《关于鲁迅之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收《瓜豆集》）。

2 《怀废名》（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古今》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收《药堂杂文》）。

3 《世界日报·明珠》发表了其中十六篇；另有一篇《妇人之笑》收入《秉烛谈》，也保存下来。

4 《谈笔记》（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作，收《秉烛谈》）。

5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宇宙风》第四十二期，收《秉烛后谈》。

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为得失。余下来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酝酿写的是关于笔记的笔记，虽然一年后方才起手，目的仍在甄别中国的固有思想，但说法较此前更为明确：“中国民族的思想传统本来并不算坏，他没有宗教的狂信与权威，道儒法三家只是爱智者之分派，他们的意思我们也都了解。……不过后来出了流弊，儒家成了士大夫，专想升官发财，逢君虐民，道家合于方士，去弄烧丹拜斗等勾当，再一转变而道士与和尚均以法事为业，儒生亦信奉《太上感应篇》矣。这样一来，几乎成了一篇糊涂账，后世的许多罪恶差不多都由此支持下来，除了抽鸦片这件事在外。这些杂糅的东西一小部分纪录在书本子上，大部分都保留在各人的脑袋瓜儿里以及社会百般事物上面，我们对不能有什么有效的处置，至少也总当想法侦察他一番，分别加以批判。希腊古哲有言曰，要知道你自己。我们凡人虽于爱智之道无能为力，但既幸得生而为人，于此一事总不可不勉耳。”

“自己所能做的”，对周作人来说，乃是一种自我定位：“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不懂哲学玄学，但知道思想的健全与否。我谈文章，系根据自己写及读国文所得的经验，以文情并茂为贵。谈思想，系根据生物学文学人类学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识，考察儒道释法各家的意思，参酌而定，以情理并合为上。我的理想只是中庸，这似乎是平凡的东西，然而并不一定容易遇见，所以总觉得可称扬的太少，一面固似抱残守缺，一面又像偏喜诃佛骂祖，诚不得已也。”此种定位其实肇始于提出“闭户读书论”时，不过当初侧重于“读”，如今更强调“谈”。——久经摸索，周作人终于在现实中择定一项适合自己的“事功”，就是做个纯粹的思想者，以从事文化批判为己任：“一个人生下到世间来不知道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生下来以后那总是必然的了。凡是中国人不管先天后天上有何差别，反正在这民族的大范围内没法跳出来，固然不必怨艾，也并无可骄夸，还须得清醒切实的做下去。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是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利，盖我们生在此地此时实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自有其特殊的便宜，

虽然自然也就有其损失，我们不可不善自利用，庶不至虚负此生，亦并对得起祖宗与子孙也。”这或许与“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不无关系，然而并非退回认定“教训之无用”之前；反倒是以此为起始点，得有一重新的进境。相比之下，似乎态度多少转趋积极。当初他说：“……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是寂寞。”如今则审慎甄别，去伪存真，以重申他们的“教训”，作为自己的贡献。蔼理斯所云“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也就落到实处，——用周作人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生在现代中国的人，当然不能像蔼理斯那么安静，可是意思总是对的。不知道那里有晨光，手里也并没有什么炬火可拿，不过跑总还得跑。”¹

周作人提到的上述清代作者中，俞正燮尤为他所推崇。此前已一再表彰，特别重视其关于妇女的意见：“俞理初的确可以说是嘉道时豪杰之士，其《癸巳存稿》《类稿》都值得阅读，关于宗教的好些研究固可佩服，见识思想之宽博尤可礼赞。”²又说：“俞君颇好为妇女出脱，此即是他的不可及处，试问近一二百年中还有谁能如此说，……再找上去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即是鼎鼎大名的李卓吾。”³——大概就在此时，周氏厘清中国思想传统的工作，取得了最重要的成果，虽然公表出来是在两年以后：他从中发现一条隐没不彰、却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泾渭分明的思想线索。“我最爱重汉王仲任明李卓吾清俞理初这三位，尝称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曾以语亡友玄同，颇表赞可，……王仲任提示宗旨曰疾虚妄，李卓吾与俞理初亦是一路，其特征是有常识，唯理而复有情，其实即是儒家的精髓，惜一般多已枯竭，遂以偶有为奇怪耳。王君自昔不为正人君子所齿，李君乃至以笔舌之祸杀身，俞君幸而隐没不彰，至今始为人表而出之。”⁴周作人则以他们的传人自居：“我们生于衰世，却喜尚友古人，往往乱谈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我们的友朋，想起来未免可笑，其实以思想倾向论，不无多少因缘，自然不妨托熟一点。”⁵而构成

1 《关于自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五期）。

2 《画蛇闲话》（一九三三年十月作，收《夜读抄》）。

3 《妇人之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作，收《秉烛谈》）。

4 《记蔡子民先生的事》。

5 《读〈初潭集〉》（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五号，收《药堂杂文》）。

周作人思想核心的“疾虚妄”、“爱真实”、“常识”、“情理”等，均可以此为源泉。随后又作《关于自己》一文，谈所受西方思想家的影响，文艺批评方面举出克鲁巴金和勃兰兑思，文化批评方面举出英国弗来则（James George Frazer）¹和蔼理斯。他自己的思想流脉，已经梳理得清清楚楚了。

这年春天，周作人写了《赋得猫》与《谈文字狱》两篇文章。——却说他有一路作品，后来自己称作“古怪题目”²，系从某一特殊文化现象入手，深入及于所属文化系统的本质，此前所作《荣光之手》、《穷袴》、《关于活埋》等均是，《赋得猫》亦在此列。周作人说：“人类原是一个，我们也有文字狱思想狱，这与巫术案本是同一类也。欧洲的巫术案，中国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常还想（虽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³现在所谈就是这两件事情，在他的文化批判之作占有特殊地位。从前在《〈谈虎集〉后记》中已经说过：“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倘以生物学“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该算“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之尤了。这涉及思想自由及其所对应的思想专制，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人道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来说，既是事情的前提，又是问题的核心；他也因此得以从根本上阐述自己的相关思想：“普通以文字杀人的文字狱其罪名大都是诽谤，虽然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加上好些好听的名称，却总盖不过事实，这只是暴君因被骂或疑心如此而发怒耳，明眼人终自知道，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为犯匹夫之怒者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虽或后来有二三好事者欲为平反，而他们也正为大众所疾视，不独无力且亦甚危事也。其一是政治的杀人，理非易见，其一是宗教的杀人，某种教旨如占势力则此钦案决不能动，千百年如一日，信仰之力亦大矣哉。因为这个理由，在文字狱中我特别看重这一类，西洋的巫蛊与神圣裁判之引起我的兴味亦正为此，其通常诽谤的文字狱固是暴君草菅人命的好例，但其影响之

1 通译弗雷泽。

2 《知堂回想录·后记》。

3 《赋得猫》（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八期，收《秉烛谈》）。

重大则尚未能相比耳。”他又特别指出，“一般读书人对于此事的感想”，往往与“暴民”或“大众”无异。思想专制的实质，就在于整个社会普遍丧失思想和判断能力，自觉趋同于专制本身。在此情形之下，个别“以思想问题受迫害的人”，不仅是思想自由的体现者，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他岂真有惑世诬民的目的，只是自有所得，不忍独秘，思以利他，终乃至于虽损己而无怨。”周作人以下面的话为此番文化考察与文化批判作结：“此种境地吾辈凡夫何能企及，但为己之极急于为人，觉得不可不勉，不佞近数年来写文章总不敢违反此意也。”¹

六

然而就在这时，周作人又一次面临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了。——日本全面侵华在即，几年前他所预料的：“……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²不幸即将成为现实。对周作人来说，“何去何从”也就成了问题。一九三七年春夏之际，他编了两本书，其一汇集《瓜豆集》以后的文章，取名《秉烛谈》，寄给北新书局，因逢上海兵火，直到一九四〇年二月才出版；其一选录所作有关故乡的文章，计三十篇，取名《桑下谈》，未能付梓。——现在编集此类作品，如其所说：“故乡犹故国然，爱而莫能助，责望之意转为咏叹，则等于谏词矣，此意甚可哀也。”他拟将“室名”改作“苦住庵”：“这苦住的意思我很喜欢，曾经想借作庵名，虽然这与苦茶同是一庵，而且本来实在也并没有这么一个庵。不过这些都无关系，我觉得苦住这句话总是很好的。所谓苦者不一定要‘三界无安犹如火宅’那么样，就只如平常说的辛苦那种程度的意义，似乎也可以了。不佞乃是少信者，既无耶和華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签发到手

1 《谈文字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一期，收《秉烛后谈》）。

2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致俞平伯，收《周作人书信》。

的乃是这南瞻部洲的摩诃至那一块地方，那么只好住了下来，别无乐行的大志愿，反正在中国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盖亦不得已，诗人岂真有此奇嗜哉。”¹是乃当友人纷纷南下避难之际，他已打算留下。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日军进入北平，均未使他改变想法。

在给朋友的信中，周作人反复申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回北留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²“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³“其实愚夫妇及小儿本来共只三人，而舍弟在沪，妻儿四人不能不由此间代管，日用已经加倍，若迁移亦非同行不可，则有七人矣。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并非上海的那位）亦在，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上述七人有法子可以南行此事亦有问题也。小女已出嫁，现其婿往西安北平大学教书，亦寄寓舍间。鄙人一人即使可以走出，而徒耗旅费，无法筹家用，反不如不动稍可省钱。”⁴所述大概是他不走的主要原因，——其一贯的妇女观与家庭观使然，是以无法抛妻弃子，独自逃生；而与左翼的长期对立，可能更使他视南行为畏途⁵。从《弃文就武》到《〈桑下谈〉序》所体现的对国家前途的判断，与他做出这一决定也颇有关系。据郑振铎介绍，周氏曾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⁶九一八以来中国的现实令他极度悲观，与当时很多人一样，他不相信中国有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可能。以后他的出任伪职，也是以这一终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为前提。

1 《〈桑下谈〉序》（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作，收《秉烛后谈》）。

2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致陶亢德。

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致陶亢德。

4 《复某君函促南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戏言》第一期）。宋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晚致许广平信云：“今日见太师母商量南下，恐不堪长途火车劳顿，不敢贸然就道，且火车时有阻碍，购卧票亦属不易，拟暂不离平，如果形势紧急，再行设法趋避，其意见如此。”次日晨附言：“今晨太师母来说，太师母已决定不南下。”鲁瑞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云：“信上说，可以教老二送我到上海去，但是因为我不吃不起长途劳顿，只好作罢。”

5 郑振铎《惜周作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周报》第十九期）有云：“‘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地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

6 郑振铎：《惜周作人》。

友人们仍一再劝他离开，郭沫若也著文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换掉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¹对此周作人表示“且感且愧，但亦不敢不勉耳”²，然而无所行动。不过他强调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³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蛰居家中，“看点前人笔记”的计划得以落实：“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⁴时为九月初；自秋徂冬，他都用心于此：“丁丑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比常识似稍适切亦未可知。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⁵该份“记录”已经亡佚；这番功夫，却颇有助于他日后写自己的笔记，即收入《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的篇章。

周作人曾说：“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或反而走往闲适一路，）于今颇觉得旧诗人作中少见乱离之迹亦是难怪也。”⁶也许正应了这句话，如今所写《谈混堂》、《谈劝酒》、《野草的俗名》、《谈搔痒》等文，“文字意趣似甚闲适”⁷。作品完成，难以发表。不少杂志均告停刊，包括创办

1 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宇宙风·逸经·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第一期）。

2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致陶亢德（明信片）。

3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致陶亢德。

4 《俞理初的谈谱》（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中国文艺》创刊号，收《秉烛后谈》）。

5 《〈一蕪轩笔记〉序》（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华东作家月报》第六期）。

6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致俞平伯，收《周作人书信》。

7 《〈风雨后谈〉序》（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作，收《立春以前》）。

不久、旨在重振“京派”而周作人也担任编委的《文学杂志》，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青年界》、《论语》、《逸经》等；仍存在者如《宇宙风》，亦因邮寄阻隔而无法投稿。一两年内面世的文章，多半都是此时“存货”。到了十月，几乎完全停笔。持续四年的创作高潮，终于告一段落。——以后他说：“最初我是主张沉默的，因为有如徐君所说在沦陷区的人都是俘虏，苦难正是应该，不用说什么废话。”¹对周作人来说，这是一个纯粹个人化的立场。入冬所作绝句二首，以不忘故国的遗民自居：“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²

这时，周作人与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被已经南迁的北京大学承认为“留平教授”，委托照管校产。——后来蒋梦麟说：“抗战的时候，他（按指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³而周作人等确曾勉力而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同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⁴

北京大学每月寄来津贴五十元⁵；维系一家人生活，周作人尚须另外设法。“学校搬走了，个人留了下来，第一须得找得一个立足之处，最初

1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

2 《苦茶庵打油诗》。

3 蒋梦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收一九六一年五月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编《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4 《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五》。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来信中则说这是一九三七年底的事，或为阳历与阴历的算法不同所致。

5 直到一九三九年，周作人仍然收到这一津贴。该年一月三十一日日记：“遣丰二往金城取来三百元，盖是昆明沈肃文所寄也。”六月二十八日日记：“至银行收……又三百元，盖是昆明来者也。”

想到的即是译书。这个须得去找文化基金的编译委员会，是由胡适之所主持，我们以前已找过他好几回了。……我便去找编译委员会商量，其时胡适之当然已经不在北京了，会里的事由秘书关琪桐代理，关君原是北大出身，从前也有点认识，因此事情说妥了，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元，翻译的书由我自己酌量，我便决定了希腊人著的《希腊神话》。”¹此即《书库》。该项译事始于四年前，大概中断已久，现在重新拣起。至年底已将本文译完，并着手翻译弗来则所著《希腊神话比较研究》，拟据此作神话注释²。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周作人日记云：“武田熙来访，约九日午在北京饭店会谈，应之。”二月九日云：“上午十一时至北京饭店，应大每之招，来者中日共十余人，有汤尔和、张燕卿、何克之、钱稻孙、森岛、成田、泷川、武田等，下午三时散。”——《大阪每日新闻》的相关报道称：“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具有促成的作用的，因之，它早已为在华日人有志之士所慎重考虑了。还有，他方面，即在日本国内，也希望这个问题能早日得到妥善的措置。日前广田外相于议会的答辩中，曾言及这一问题的具体方策，并将我政府对两国的文化合作的准备及热诚加以公开，然则此时中国的新首脑对这一问题究有若何的准备与抱负呢？又于通过现地的文化的握手中而负着种种任务的日本各方面果有如何的方策呢？究要将它循着怎样的轨道推进呢？本社北京支局，特于九日正午在北京饭店招请下列，开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于觥筹交错的欢笑声中，许多极有意义的话源源而出。”与席者，中方汤尔和为伪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张燕卿为伪新民会副会长，何其巩为前华北大学校长、现中国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北平代表，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教授，钱稻孙为清华大学教授，可谓“各方面人士”都有；日方森岛守人为大使馆参事官，泷川政次郎为新民学院教授，成田贡、武

1 《知堂回想录·北大的南迁》。

2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日记云：“阅论童话诸书，其中《小说之童年》一书最佳，Rose在《希腊之原始文化》中亦称之，将来拟译出，与《希腊神话考证》可互作参考也。”此计划未实现。《希腊神话考证》即《希腊神话比较研究》。

田熙为陆军特务部人员。所载周氏的发言如下：“余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而其实，可说当初就在尽可能地使中国的学生通晓日本文学。又为了研究日本，于是特别设立了日本文学讲座。但……到如今，从一年的经验上，真是不胜惭愧，盖其中了无良好成绩，总觉得不到日本去是毫无用处的。于这里，只好大概地教授关于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这问题，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最好的。”¹较之他人所说，似乎有意“避重就轻”²。

该报道译为中文公布后，周作人顿成众矢之的。五月五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至各汉奸通敌叛国之罪责，俟诸政府明正典刑可也。”这是周作人的名字第一次与“汉奸”联系在一起。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作家《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称：“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问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³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国协会也向全国发出讨周通电。

1 《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高桥特派员自北京发，余士华译文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文摘》第十九期）。译者云：“这个座谈会的召集，名义上虽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头，但我想任何人也不敢断言它并非受日本法西斯军阀授意的。”山本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筑摩书店一九七八年出版）则说：“在抗战地区一片哗然之中所传由‘敌人’或‘敌寇’召集的座谈会，其实不过是某一个新闻社支局的企划而已。虽说如此，实际的情况还稍有些复杂麻烦，还在临时政府刚组建的时候，要请对有关去留问题须要慎重的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新闻社支局是没有这样的面子和威力的。在此，实际上出面邀请的是日本方面的出席者之一军特务部人员武田熙（据笔者向本人直接询问）。”而“该人原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留学生”，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受《大阪每日》支局长委托，武田熙所‘动员’的中国方面的出席者几乎都不情愿，特别是周作人，称如果让日本人感到我和哥哥鲁迅的立场是一样的，这样好吗？……结果被武田熙的‘仅就文化建设请您讲讲话决不会添任何麻烦的’客套话说服了。”
2 可以对比后来为“北方救国会”负责人之一的何其况所说：“我素不后人，常常一个人就那么想：通过两国的文化而紧紧地携手，实在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固有时间、空间的种种限制，真挚的考虑检讨，也是被要求的。本来就具有融合的文化，故两国之融合其文化，坚固提携，实在是极为当然的事。”
3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期。对此郑振铎说：“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惜周作人》）

关于“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上述公开信中提到：“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随后据说“周氏已有信寄此间友人，声明摄影系受骗，座谈会记录则完全为日本记者所捏造”¹，然而终无此类“声明”揭载。周作人在另一封信中说：“《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以前津报曾说鄙人将做大学校长，或者亦此类乎？此事真伪自有事实可征，但世上有捕风捉影者及幸灾乐祸者，只可供他们去当材料，受其祸者无可奈何，造谣与报怨各各满足之后或自消沉耳。”²同在北平的常风著文称：“周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过要他牺牲他的人格恐怕要更困难，……愿国人且网开一面，留待来日看个究竟。”³李健吾则针对参加座谈会事说：“目前求周先生自白，绝不可能：他的环境和心性都不允许。日人威逼利诱是事实，他的虚与委蛇也是事实。”⁴——周作人的确曾经参与该项活动；然而《大阪每日新闻》有关报道是否完全属实，尤其是所标榜的名义及所宣扬的宗旨，周氏事先及当时是否了解，不得而知。论者每每视为其后来一系列附逆行动的前奏，但亦不能排除当时仍属一次偶然失误。

座谈会之后十一日，周作人作《读〈东山谈苑〉》一则笔记，引余怀书中之语：“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且云：“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之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⁵似乎是在重申他自北平沦陷以来所据的立场。继而作《谈卖糖》⁶一文，引日本原公道《先哲丛谈》的话：“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并说：“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唯不佞可解。”仍以不忘故国自许。而当武者小路实笃提出“我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什么”时，周氏答复：“现今中日两民族正在战斗中，既然别无道路，至于取最后的

1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五期编后记。

2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周黎庵。

3 胡马（常风）：《北平的来信》（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文汇报》）。

4 前引文之“收信者按”。

5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收《书房一角》。

6 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宇宙风》第七十四期，收《药味集》改题《卖糖》。

手段，如再讲什么别的话，非但无用，亦实太鄙陋矣。”¹更补充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他再次抄录《东山谈苑》那一节话，解释说：“所谓俗即鄙陋也。”继而谢绝了日伪方面的一系列聘任、宴请和约稿，包括伪满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教职和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之职，并辞不入伪东亚文化协会和留日同学会。不过自三月起，为伪教育部编审委员会审阅教材，每月领车马费一百元。据周氏日记，所看者有初中国文第一、三、五册等。四月一日日记云：“上午又看教科书，其实各种皆低能无可取也。”四月十二日，在河北高中讲演《中学的国文》。以后又作《国文谈》²，有云：“看初中国文一册里大抵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国文材料，此外多是垃圾，学生在一学期中只读得这一点儿国文，无论他怎样用功，真心想学写作，怎么能行呢。”其关注点大率在此。

周作人说：“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里只写些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³“写笔记”的计划，就此得以落实。五至八月，以“药草堂题跋”、“药草堂笔记”为总题目，陆续在北平《晨报·副刊》登载三十余则，——周氏自称“聊可自娱”⁴，类似“个人写作”，是也以归在“不说话”之列，与撰写长篇文字有所区别。虽然如此，笔记之作仍然延续了文化批判精神，而牵涉方面更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使得此种批判更系统化了。正如其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⁵此后四五年间，这是他所采用的主要写作方式之一：“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⁶至于译注《希腊神话》之事，二月《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译竣，三月开始写注释，至四月完

1 《友情的通信》（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七十五期）。

2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华光》第一卷第六期。

3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

4 《寄甘山》（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

5 《〈书房一角〉原序》。

6 《〈药味集〉序》（一九四二年七月《古今》第五期，收《药味集》）。

成第一章。按照计划，“注释总字数恐怕比本文更多，至少会有二十万字吧。”¹五月又翻译英国哈利孙（Jane Harrison）²著《希腊神话论》，拟作为附录，于六月完稿。显然他有意将《希腊神话》做成一部“毕生巨著”。上半年里，共向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交稿六次。“目下聊可敷衍过去，殊不能有远大计画耳。”³按照他的想法，此项翻译“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⁴不过六月七日最后一次交稿后，编译委员会迁往香港，合作遂告中止，《希腊神话》译注工作就此停顿⁵。已交稿件后遭遗失，包括《希腊神话论》在内。

“大概这编译会迁移的事情决定的颇早，是在民国廿七年的上半年，所以我就赶紧作第二步的打算，因为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想在里边谋一个位置，那时燕大与辅仁大学因为是教会大学的关系，日本人不加干涉，中国方面也认为在里边任职是与国立和学校没有什么不同。我把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君，承他于五月二十日来访，送来燕大的聘书，名义是‘客座教授’，功课四至六小时，待遇按讲师论，但赠送二十元，以示优异。其后因为决定每星期只去一天，便规定两种功课各二小时，月薪一百元。”⁶他自称“聊以避俗”⁷，“我便藉此抵挡了别处的劝诱，第一是师范大学的中文主任，算是成功了”⁸。九月十五日，周作人开始重在燕京大学授课。——据他说：“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⁹他还曾三次拜访时任辅仁大学文教

1 《〈希腊神话〉引言》。

2 通译哈里森。

3 《复某君函促南行》。

4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周黎庵。赫洛陀多斯（Herodotus），通译希罗多德。

5 据李霁野《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文艺报》）说：“不料到一九三八年春代我领稿酬寄津的朋友来信说，基金委员会决定撤消北平办事处，移到香港，原约定译稿的五六个人，要将手头的译稿结束，以后不再续约译稿了。这样一来，势必影响他们的生计，所以他们几个人结伴去向主管会务的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请愿，不要把办事处移走，或只留一个办事员，每月收稿发稿酬，并定约翻译新稿，在请愿的人中有周作人，大家原以为看在他的面上，这点合理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不意遭到了拒绝，只好想法将手头译稿结束，在沦陷区面临失业的威胁了。”

6 《知堂回想录·元旦的刺客》。

7 《与某君书》（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宇宙风》第七十二期胡马《关于周作人》引）。

8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珩。

9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周黎庵。

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为沦陷区的北平文化人找工作”——主持人的沈兼士，但未说明来意，后者觉得“莫名其妙”；虽经李霁野指出：“这是托钵僧站街化缘嘛！”辅仁大学终未接受周氏前来任教¹。

这年八月四日，胡适自伦敦寄出一诗，仍劝周作人南下：“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²周作人于九月二十日收到，次日以一首《苦住庵吟》作答，其中有云：“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然而他表示“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强调自己并未“落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氏日记云：“再开始作神话注释，已有半年搁置矣，本拟于年内了之，今于年内动手作，希望能于明年春末完成，亦了却多年心愿也。”至年底已写完第二章注释。

1 李霁野：《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

2 胡适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致郑天挺信云：“台君见访，知兄与知老、莘、建诸公皆决心居留，此为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不及一年，胡适对周作人另有建言，或与“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件不无关系。



耀公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 景漢に
 就かれた三日目の為、眞父の
 綿入の稍左によつた所に
 ピストルのたまのうたれた穴
 が見られる、記念のため

八六、二二五

豊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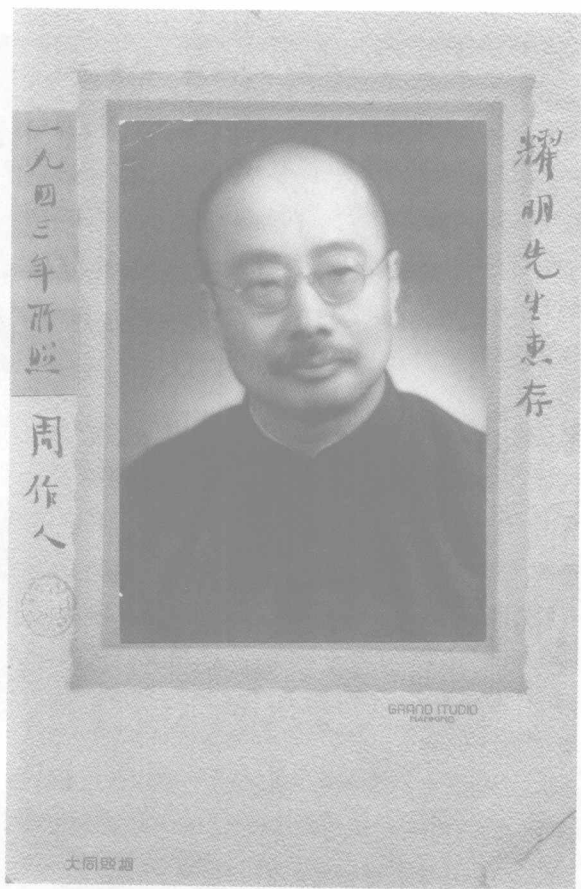
周丰一在照片背面为鲍耀明所写说明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北平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平
(右柳雨生)



一九四三年，北平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北平（右武者小路实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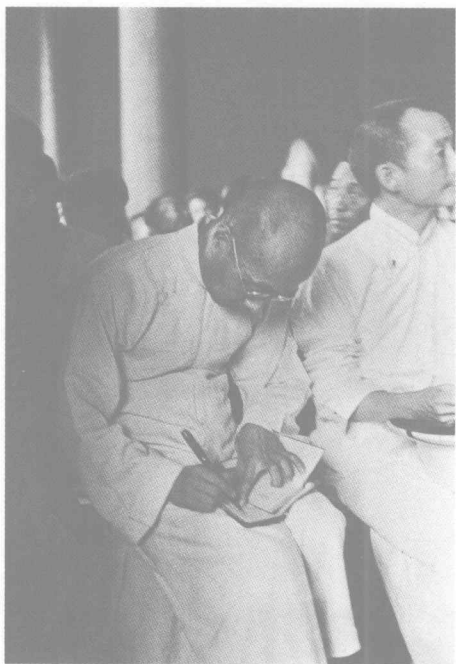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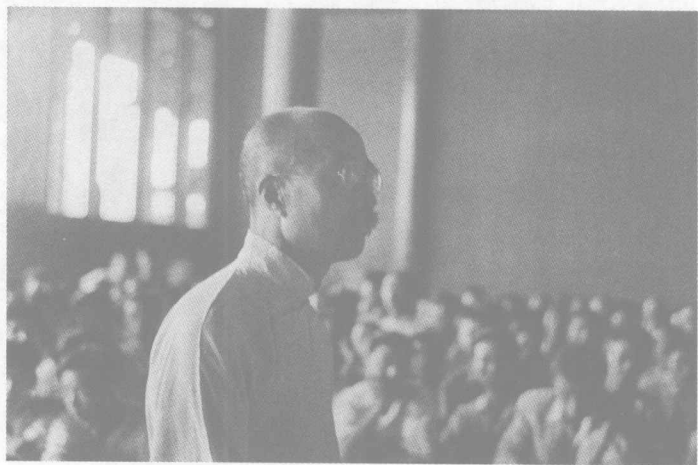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南京

南京，日式十百廿四六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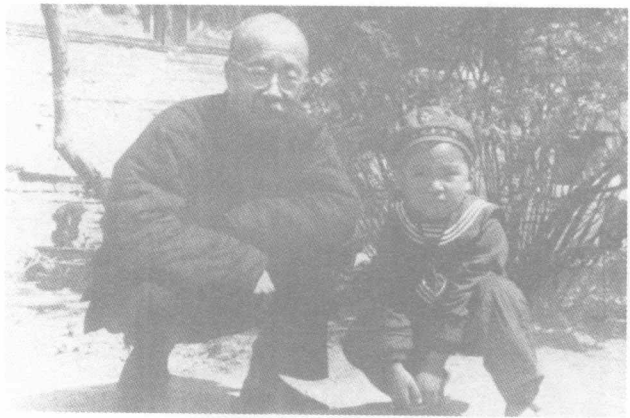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南京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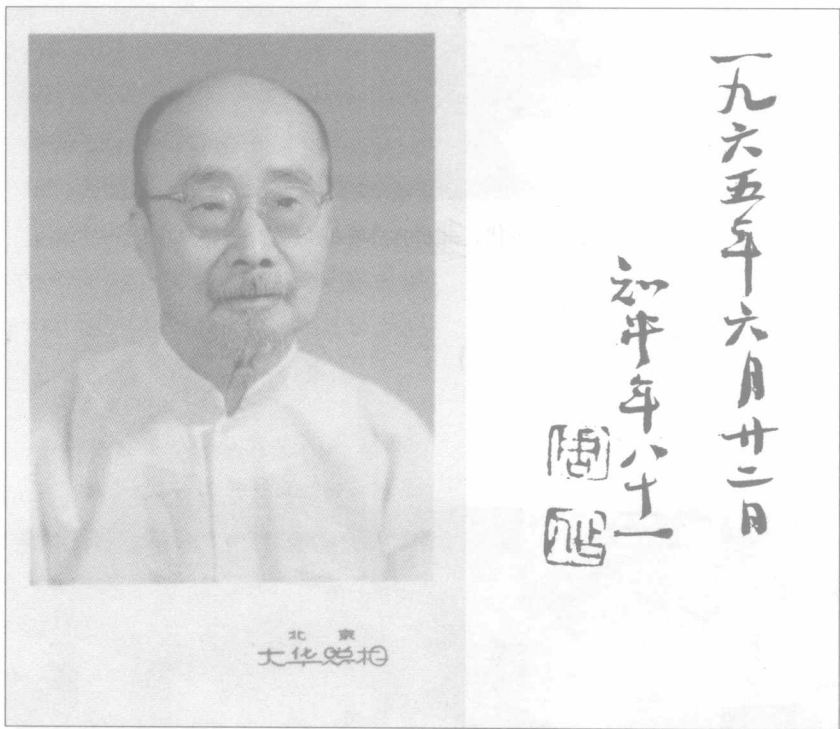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四周年



一九五〇年代，北京（右周吉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右钱稻孙）



一九六五年六月廿二日

初平年八十一

周作人

北京
大华照相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北京

照片背面之周作人手迹

第七章

一九三九——

一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周作人在家中忽遇刺客袭击。据他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时跟在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还有一个助手，看他

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¹ 射击周氏的子弹为毛衣骨钮所阻，仅擦破腹部皮面；沈启无则在医院疗养了一个半月。

周作人的一生，因这一事件而分为前后两截，——用他自己的话说：“寒斋有一块寿山石印章，朱文九字云‘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边款云庚辰禹民，系民国二十九年托金彝斋君所刻。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² 至于暗杀究系何方所为，迄无定论。先后不止一人出面承认，说法均不能令人信服。此即如周氏所言：“外国警察找到犯人自白罪状，也还要现场表演，才能证实，乃今居然有冒充暗杀凶手，而所说又与事实大异，真真是奇事，恐怕连西洋也未必有也。”³ 他自己则归咎于日本军警方面：“我到燕大去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⁴ 事实或许未必如此，这一判断却可能影响了他随后做出的抉择。——周作人自称“不

1 《知堂回想录·元旦的刺客》。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北平特电三日发）报道了周氏对记者所说：“没有参与过政治运动只专心于文学方面的著述的我，何以要受到狙击真是搞不明白。因我而成为牺牲的学生、车夫以及家人等很可怜的。但是，我想这或许成为我今后事业工作上的一个好的转机吧。”（赵京华译）

2 《苦茶庵打油诗》。晚年作《八十心情——放翁自适诗》（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香港《新晚报》）一文也说：“我确有一方石章说：‘五十五以后所作’，但那是刺客事件的特别纪念。”

3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致鲍耀明。此系针对 Loo Pin-fei（倒译为“卢品飞”或“卢彬斐”）著 *In Is Dark Underground* (New York: NY G.P. Putnam's Sons, 1946) 而言，不过所云“说出事原因在做督办，可谓时代错误之甚。……当时抓凶手的有徐田，其人尚在西直门菜市场做事，他只看见凶手有二人，乃今忽化身为三人，恨不一问徐田，为何眼花乃看不见一个人乎？可发一笑”，亦可用来说道年后范旭《风萧萧兮易水寒》（收《燕京大学三八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刊》，又载《上海文史》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一文。Loo Pin-fei 与范旭所述经过多有相似之处，如都说刺客共三人（前者云系自己及高、王二姓，后者云系自己及李如鹏、赵尔仁），行刺乃因周氏“将出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而据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北平特电三日发）的报道，凶手为“两名”；鲁瑞事后给周建人的信中也说：“老二家于元旦晨十时忽来暴客二人。”至于“督办”，当时还是“教育部总长”；将近两年后汤尔和病死，这一职位才出缺。

4 《知堂回想录·元旦的刺客》。周氏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松枝茂夫信云：“鄙人于‘沦陷’时出任‘伪官’，其动机大概未易知道，但有一事可以奉告者，即一九三九年元旦之暗杀事件乃出自日本军部（？）方面也。当时鄙人在燕京大学任职，在重庆方面是认为正当的。（事件后在北京潜伏之重庆教育专员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均致慰问，且说明并非出自重庆。）”

曾在日军刺客光临苦雨斋的那时成为烈士”¹，实际上他一向主张“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如果说此前尚且敷衍周旋，虚与委蛇，现在他不肯也不敢这样做了。

“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²遇刺次日，钱稻孙来访，代汤尔和劝他就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五天后周作人回访，表示接受。一月十二日日记有云：“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函复之。”维持了将近一年半的“苦住”，终以失败告终。多年后他复述其间经过，归结道：“……以上这些‘说明’实在没有什么说服的力量，当作辩解，结果无非证明我意思[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³这个意思，多少已体现在遇刺后所作诗中：“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未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⁴过去他以“忍过事堪喜”形容对待批评的态度，现在则用来描述自己的处境。然而所付出的代价太大：附逆使他名声扫地，不仅以后所说大家拒绝相信，此前讲的一切好像也丧失了意义。几年来外界的种种指责，也都因此得到“证实”。——从前周作人针对丁文江出任淞沪督办所说的话：“丁文江一个人堕落不足责，科学的人生观本身也没有罪，但因丁文江而使我们的中国讲科学的人生观的人开始怀疑，则丁文江之罪大矣。”⁵现在也许要用之于他自己了。至于《希腊神话》的译注工作，也因遇刺事件而再次中断。

三月，周作人受聘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八月，文学院成立，出任院长。他似乎仍然试图把一切限制在“忍”的范围之内。“我还是终日住在家里，领着干薪，图书馆的事由北大秘书长代我办理，后来文学院则

1 《知堂回想录·后序》。

2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

3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汧。

4 《苦茶庵打油诗》。

5 《丁文江的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第一百零六期）。

由学院秘书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罢了。”¹尽管不时仍要参加宴会之类应酬。所说“北大秘书长”为钱稻孙，“学院秘书”为尤炳圻。北京大学教授月薪四百，文学院院长兼职而不兼薪。与此同时，只在北平《实报》陆续刊出简短的笔记之作，此外别无作品。如其所说：“……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是很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²再次引用这个典故，所强调的是“不辩解”，已与将近一年前意味不同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钱玄同病逝。就与周作人相互理解之深，彼此共鸣之多而言，大概只有失和以前的鲁迅可以与之相比。“玄同和我所谈的范围极广，除政治外几于无不在可谈之列。……关于思想的议论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乐观的而已。”³二十多年来周作人所表达的思想，有不少诞生于此种交谈之间。他曾记述钱氏去世前一周来访时，二人关于周氏近五六年所作读书随笔的一番谈话：“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谈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⁴钱氏死后百日，周作人著文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损失。……老朋友中间

1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活到说话》。据陶希圣说：“我从河内到香港时，即派武仙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况，特别访问周作人（岂明）。武仙卿由北平回香港，到九龙山道林报告他到北平考察和访问的经过。他到九道湾访问那个苦茶斋主人时，岂明对他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仙卿带给我的口信，是‘干不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对此，周作人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致鲍耀明信云：“陶君虽同在北大，却未识荆，所说武氏见访一节已殊不能记忆矣。当时有周化人氏曾来访问，我告以日军人素不讲信用，恐难合作，便嘱为转告于汪君，请其慎重，但不久而‘国府还都’，于事实毫无补益也。”

2 《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3 《读〈初潭集〉》（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五号，收《药堂杂文》）。

4 《读书的经验》（一九四〇年五月《新光》第二期，收《药堂杂文》）。

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¹——钱氏辞世在他乍任伪职之际，联系到此后事情的发展，不禁令人扼腕。文章又云：“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据他说：“我自此决意来说话，虽对于文字的力量仍旧抱着怀疑，但是放手写去，自民国廿八年至三十四年这七年里，收集起来的共有一百三十篇，其散佚者在外，可以说是不算少了吧。”²其实此后将近半年，还是未见“说话”之举，仍只发表自视属于“不说话”的笔记，意见与先前并无二致。

这年九月十二日，周作人写《偶作用六松堂韵》一诗：“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煦沫剧堪怜。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将身托愿船。漫策断株追日没，孰持煎饼补天穿。高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六松堂”即汤尔和，华北沦陷后，参与组建伪临时政府，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是浙江杭州人，说起来与我算是同乡，但是他生长在外面，说话也是江北的口音。他是以前北京‘八校’时代的医学校校长，是教育界的元老。不过我同他没有什么交情，我和他往来还是在他发行一种周刊叫做《舆论》，叫我作文章的时候。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春天，北平沦陷后我受旧北大保管员的嘱托，常有事跑去接洽，从而相见次数比较多。以前虽说是同乡，可是接触很少，只知道他是个很世故，善诙谐，且颇有点权谋之术的人。”³周作人诗中对汤尔和沦陷以后的行为很感理解，视作临危救难之举，似乎预示着自己某种新的思想动向。在此之前，他所作《禹迹寺》⁴一文说：“中国圣贤喜言尧舜，而所说多玄妙，还不如

1 《最后的十七日》。

2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活到说话》。

3 《“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一九九九年《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百三十五辑）。

4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中和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收《药味集》。

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正道出就中含意。而前一年末的绝句：“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¹则显示自己于此早有契合之处。该诗曾寄上海沈尹默，沈氏和诗云：“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²对此周作人说：“匏瓜厂指点得很不错。但如致废名信中说过，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恣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更明言前引《偶作用六松堂韵》末二句“亦只是此意”。而沈尹默所批评者“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³。话说到此，就重又回到几年前对于“事功”的提倡，而不复是“忍过事堪喜”了。对于周作人来说，这是立场的重要变化，尽管他早已“落水”。此种想法与已经发生之事无关，但对即将发生之事有所影响。

十月以后，周作人偶尔在北平的《华光》、《覆瓿》、《中和》、《中国文艺》等杂志发表文章。一九四〇年一月起，又在天津《庸报》连载笔记。三月成《释子与儒生》⁴，乃是接续《偶作用六松堂韵》、《禹迹寺》思路之作。其谈释儒两家，归结为同一种精神：“释子学佛，与墨者学禹相同，都不是容易事，非是有血性人不能到，若杨子为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谛，至多可获阿罗汉果，终是自了汉，不可同日而语也。……据我们平凡人想，儒家本是讲实际的，并不是不重功利，那么其理想当然是禹稷，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其理由也无非是忧民，所以如其是急，等到没法下手去干，这才来坐在树下找几个学生讲讲，所讲的恐怕还是入世的问题要紧，性命之理也总在罕言之列罢。”这使人联想起几年前他有关孔子与长沮、桀溺的比较，似乎其间重有一番人生作为的取舍；虽然仅限于价值观方面，尚且未将自己牵连在内。

接下来所作《汉文学的传统》⁵一文，应该算是周作人正式“说话”。

1 《苦茶庵打油诗》。

2 沈尹默：《和知堂五首》（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鲁迅风》第十四期）。沈诗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序云：“知堂近有诗见寄，读罢快然，若有所触，不得不答，辄依韵和之，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惟览者自得之耳。”

3 《禹迹寺》。

4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改写前年所撰小文”，收《药堂杂文》。

5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中国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收《药堂杂文》。

距离宣布“破了不说话的戒”已近一年，大概是考虑许久的结果。——他将自己的转变概括为“从不说话到说话”，前者纯为个人立场，犹如其已经不满的“杨子为我”；后者则是“绅士鬼”再次让位给“流氓鬼”了。其间态度也就有消极与积极，被动与主动的不同。他似乎觉得，自己在此情形之下，境遇之中，能够有所作为。此文上来标举一个“汉文学”的概念：“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这个意思，实际上将近四年前他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已有揭示。当时周氏认为，“现在有强化中国民族意识之必要”，而这就“要利用国语与汉字”：“我们拿笔管的人也不必费什么大气力，也无须一定转变何种宗旨，只要各自尽心，把诚实的自己的意思写成普通的中国文，让他可以流传自西南至东北，自西北至东南，使得中国语系统的人民可以阅读，使得中国民族的思想感情可以联络一点，未始不是好事。”¹《汉文学的传统》所论更其深入具体。这包括思想文章两项。就前一方面而言，“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具体内容与此前所说似无大异，着眼点却颇为不同，第一次赋予儒家思想以“民族精神”的意义：“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暂时枯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他由此文而起始的一番思考，亦即自称“以中国人立场说话”²的基本前提，这里揭示了一半：所关心的是“中国人”是否以及如何能“站得住”，能“生存于世界上”。另一半没有说出：现实是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也正因为后者，前者才成为一个问题。

《汉文学的传统》虽然大半谈论思想问题，却落实于“写文章”，——

1 《国语与汉字》（一九三六年元月二十八日《独立评论》第二百零七号）。

2 《过去的工作》。

此前他只是对汤尔和辈表示认同，现在则涉及自己了。作者后来说：“题目称汉文学却颇有点特别，因为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将这来代表中国文学。”¹在他看来，只要“汉文学”存在，其中的“传统”也就存在，而民族之维系实有赖于此。其自我规划的“事功”，即是试图发挥“汉文的政治作用”，亦即通过从事“汉文学”的写作来保存其中的思想传统。周作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指出此点，以及写为文章而已。这影响到他这一时期文章的风格：“……正经文章在那时候是特别的多。当然里边也不少闲适的小文，有如收在《药味集》里的《卖糖》、《炒栗子》与《蚊虫药》，以及后来的《石板路》，都可以说是这一路，但是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²随后他在一本妇女杂志《新光》连续发表的《读〈列女传〉》、《读书的经验》、《新文字蒙求》、《观世音与周姥》、《女学一席谈》、《道德漫谈》、《蔡文姬〈悲愤诗〉》、《启蒙思想》、《女人轶事》、《流寇女祸》等，大约就是“事功”的具体体现。文章“题材多与妇女有关”，如其所说：“关于妇女问题，并不如友人在电话里笑说，你还可以来得几句，实在因为以前曾经留心过，觉得值得考虑，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藉此发表一点意见。”³《观世音与周姥》⁴一篇有云：“男子讲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但如得到评语说好为妇人出脱，或以周姥比拟，那么这便是确证，原论即使不深厚，也总有可取，盖男子立言而能近于周姥，是即能理解女子的立场。”最早在《女子世界》写文章时，其实即是如此；周氏谈论妇女问题，始终不离这一立场。

十月所作《启蒙思想》⁵一文，重申《汉文学的传统》的旨意，更加强调写作之“事功”意义：“大乘菩萨舍身利众之行为，岂易企及，平常读书人当如此存心，事实上执笔写文章所能做的，也只是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这个愿心，一字一行虽是细微，亦费心血，所冀有半麻半麦之益，功不唐捐耳。古人作文希望有功于人心世道，其实亦本是此意，问题乃

1 《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

2 同上。

3 《读〈列女传〉》（一九四〇年四月《新光》第一期，收《药堂杂文》）。

4 一九四〇年八月《新光》第五期，收《药堂杂文》。

5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新光》第九期，收《药堂杂文》。

在于所依据的标准，往往把这个弄颠倒了，药剂吃错，病反增进，认真为明，妄加指示，则导人入于暗路，致诸祸害，正是极常见事也。据我想这问题也还简单，大小只须讲一个理，关于思想的但凭情理，但于人无损有益，非专为一等级设想者，皆善也。关于事物者但凭事理，凡与已知的事实不相违背，或可以常识推知其然者，皆可谓真，由是进行，庶几近光而远冥矣。”这就又接续上自己三十年代以来总的思路。落地地讲是合情合理，升高来看是维护传统，“讲情理”与“重事功”也就成为一致的了。——周作人“从不说话到说话”的思想历程，大致如此。然而“事功”与“民族大义”，社会公论另有取舍；周氏与之背道而驰，也就因此越走越远。

周作人后来说：“近几年来可以找出两个段落，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与思想的轨道。”¹其一是由《汉文学的传统》起头；其一则是这年底写的《日本之再认识》²。后者乃“正式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以后对于不懂得的外国事情不敢多开口，实行儒家的不知为不知的教训”³。“这是一九四〇年值日本所谓建国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文化振兴会于募集纪念文之外，又特别指名征求，赠送艺术品为报酬，我于不受酬的条件之下，答应了这要求。那是很可笑的一篇东西，因为实在乃是抄袭《日本管窥》而成的，将其二的上半接品了其四的下半，结论仍旧是日本国民性不可解，归结到宗教上去，换句话说即是感情超过理性，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⁴此文新意无多，但若与《汉文学的传统》对比来看，可谓“不知为不知，知之为之”，正可看出周作人作为自己划定的作为“事功”的写文章的范围。

1 《〈立春以前〉后记》（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作，收《立春以前》）。

2 日译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文艺》第九卷第十二期（译者不详），又载一九四二年七月《国际文化》第二十号（松枝茂夫译）。中文载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和月刊》第三卷第一期，收《药味集》、《知堂乙酉文编》。一九四一年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印有单行本。

3 《〈立春以前〉后记》。

4 《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二》。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汤尔和病死。周作人所作挽联，称其“一生多立经国事功”、“此出只为救民苦难”。一年多后，还说：“我对于汤先生觉得特别有所感服。”¹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汤尔和是极少数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使之追随其后的人之一。汤氏之死，更使周作人再次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头：所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职，有待他人接任。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周作人十二月二十日日记：“知报载南京已议决任教育督办事。”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日记：“收政委会交来国民政府委任状。”一月四日，伪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这与他原本担任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等性质不同，至此已跻身华北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之列。

多年以后，周作人解释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了。”²此事背景相当复杂：汤尔和有让周作人继任的遗愿，伪新民会副会长缪斌垂涎该位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则属意周作人，一再劝进；各种政治势力亦有所介入，以争取于己相对有利的结果。其间，在北平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许宝骙³曾经起过相当作用。据他讲，

1 《〈汤尔和先生〉序》，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作。《〈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一九四二年六月《古今》第四期）以“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名声”云云形容汪氏，与此约略相近。

2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鲍耀明。据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北平沦陷后曾采访过周作人的山本实彦，早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即说过：“有人甚至想以这个人为中心让他出面做北方的文化工作，而本人推说自己不能胜任，没有出马。”（“走访旗舰出云长谷川清支那方面舰队兼某某舰队司令长官”的对谈，原载一九三八年《改造》第二号）

3 许宝骙即周作人日记中的“许介君”，系俞平伯之妻舅。

当时在王定南、许宝骅和张东荪秘密举行的“三人碰头会”上，有过一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分析，其后许即对周作人进行游说：“我对周作人说：‘尔叟（指汤尔和）去世，督办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缪斌呼声颇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齿（周听至此，插话问了一两句，我便告诉他，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现为新民会会匪），若任其得逞，则毒化教育，奴化青年，为害不堪设想（周听至此，似乎动容）。为文化教育计，为青年学子计，先生（指周）若以文学院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周听至此，表情倾注，似乎微微颌首）。我更接着说：如果出仕，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我方对此可以尽可能保持消极——这是积极中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的积极作用——这又是消极中积极（周听至此，又频频颌首，似乎有所理会）。……周作人当时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当局诸公都不熟识，也恐落落难合（这也只是大意）。我便对他说，在这方面，我当居间给他介绍几个朋友，如殷桐声（名同，当时任伪建设总署督办）、汪翊唐（名时璟，当时任伪财政总署督办，是殷同的妹夫），都还算爽朗通达之流，可以相接纳，通声气。”¹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定南则说：“北方救国会日常工作由我和张东荪、何其巩三人负责。关于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我回忆有一次我在何其巩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我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我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²周作人另一番话，与此多少对得上号：“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³——游说的许宝骅等，或即在“大家”之列。不过周作人一再讲“经过考虑答应了”、“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可知在他个人虽非主动，但也不尽被动，至少不像两年前之“事实上不

1 许宝骅：《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团结报》）。

2 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山西政协报》）。

3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来。以《周作人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能不当”那么被动；而他对待该项职务，态度的确积极得多。以后在法庭上也说：“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治虽伪，教育不可使伪。本人半生在华北教育界服务，平时人才众多，尚可偷懒。迨及国家存亡绝续之秋，青年教育关系重大，不可使中绝，尤不可使恶化，必须有人肯冒犯不韪，共为维持，努力抵抗敌方奴化政策，稍为国家及青年保存元气。”¹至于所云“考虑”，具体问题或即如上所述，泛泛而言则此前所作《汉文学的传统》、《启蒙思想》等尽可纳入其中，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²，较之先前只想到写文章，现在所为或许更符合其对“事功”的强调。

当时有人谈及对周作人的印象，说是：“风采似较前略胜，因为面貌虽稍形丰腴，而举止益见雅度，并不因他一行作吏，便不足观。”³周氏在伪教育督办任内的一系列职务行为——包括出席或召开会议，参加招宴，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赴日，前往外地视察，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访问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举办培训班，参加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并任副总监等——责任均应由职务人承担；尽管他自称是“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⁴，而讲演等则系“说应酬话”，“与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文章不相同”⁵。督办“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进一级加四百元，至二千元为止”⁶。同僚如王揖唐，伪治安督办齐燮元，伪实业督办王荫泰等，皆为北洋余孽。此外周氏还有一系列兼职，如伪剿共委员，伪安清道义总会顾问，伪教育部学制委员会委员，伪华北文艺协会顾问，伪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会长，伪新民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伪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学术文化审议会会长，伪

1 《周作人辩诉状》（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

2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来。

3 柳雨生：《北平三日》（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杂志》第十一卷第二期）。

4 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文汇报》）。

5 《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6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鲍耀明。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常委之类。凡此种种，至今仍为人们深予谴责。另一方面，周氏为战后法庭所“认为真实”的“在抗战期内不但保存文学机关之产业及书籍，而且向人劝募或以伪组织公款与自己之财力设法增加，以及营救中央地下工作人员”¹；或如他自己所说“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倒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与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最伤脑筋的事”²，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其所拥有的身份有关。

周作人担任督办期间，写作极少；倒是此前所作，现在编为两种集子问世。一九四一年五月，《药堂语录》由天津庸报社出版，所谓“语录”亦即笔记，多为曾在《庸报》连载者。一九四二年三月，《药味集》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³。经此精选，相当整齐，周氏自谓：“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的小文。”⁴所作序言强调：“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周作人作《中国的思想问题》⁵一文。所说：“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他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乃是有着特定背景：“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本来这种驴鸣犬吠的运动，时至自会消灭，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当时听了觉得很讨厌，所以决意来加以打击。”⁶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此文所论又有超越

1 《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〇四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2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来。

3 《〈药味集〉序》。

4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致鲍耀明。

5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和》第四卷第一期，收《药堂杂文》。日译载一九四三年四月《改造》第二十五卷第四期（松枝茂夫译）。

6 《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二》。

具体环境，涵盖历来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意义。这包括“正面”与“反面”或“乐观”与“悲观”两层意思：“我相信中国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这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类的道德，所以是很坚固也很健全的。别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为君，有的是为神，中国则小人为一己以及宗族，君子为民，其实还是一物。这不是一部分一阶级所独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广狭程度不同，这不是圣贤所发起，逐渐教化及于众人，乃是倒了过来，由众人而及于圣贤，更益提高推广的。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思想并无什么问题，只须设法培养他，使他正当长发便好。但是又因为中国思想以国民生存为本，假如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也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此非理论主义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语言所能防遏。”¹

这里前一方面是对《汉文学的传统》的进一步发挥，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尤为透彻；而在论述这一思想时所说：“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则是重新阐释自己从前在《人的文学》中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定义的人道主义，其深刻程度前所未有的。周作人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思想，至此已告完成。

相对而言，后一方面也许才是文章的重点所在。周作人说：“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²文中所“悲观”者，即根植于此。在他这一情结郁积已久：“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

1 《中国的思想问题》有段话颇为论者所垢病：“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实际上作者是对“共存共荣”做了为我所用的歪曲性的解说，谁都知道，“共存共荣”的真正涵义并非如此。

2 《〈立春以前〉后记》。

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自《小河》起，中间经过好些文诗，以至《中国的思想问题》，前后二十余年，就只是这两句话。”¹写《中国的思想问题》之前不久所作打油诗：“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有注云：“夏中南方赤云弥漫，主有水患，称曰大水云。”²作者自称“情调最是与《小河》相近”，“只是说瓜豆尚未成熟，大水即是洪水的预兆就来了，种园的人只表示他的忧虑而已”³。然而当他说：“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以及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却显示出自己不同既往的立场。以后他说，此文“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⁴，虽然基本前提与先前的《汉文学的传统》并无二致，但由“生民根本之计”进而留意“国家治乱之源”，并视“国家治乱之源”的解决为“生民根本之计”之所系，却是现在才有的考虑。所说“离开文学的范围”，乃是立足点有所变化：他是从“为政者”而不再是“为文者”的角度去关注这一切的。然而所谓“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是指“政治”应该适应“中国思想”，而非相反。所担忧的“乱”，归根到底还是人民的生存问题。也就是说，提出解决“国家治乱之源”，旨在实现“生民根本之计”。一年多后，为甲申三百年祭所作文章说：“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话未免太阴沉一点了吧，我愿意改过来附和巴古宁的旧话，说历史的用处是在警告我

1 《苦茶庵打油诗》。

2 同上。

3 《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中》。

4 《〈立春以前〉后记》。

们不要再如此。明朝甲申之变至少也该给我们一个大的教训。民不聊生，为盗为乱，又受外诱，全体崩溃，是其一。士人堕落，唯知做官，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是其二。这两件事断送了明朝，至今已是一百年，引起现在人的追悼，继以嗟叹，末了却须得让我们来希望，如巴古宁所说，以后再没有这些毛病了。”¹以“民不聊生”始，以“民不聊生”终，亦可证明此点。

回到《中国的思想问题》，若以“我尝叹息说，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天，这实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转仔细一想，现在何尝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后面会来，却不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俾得大家有生路，岂非天下之至愚乎”，对照“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可知“正面”与“乐观”者纯属理想，而“反面”与“悲观”者才是现实。故所说虽然深切，却根本无法实行。——作者后来有云：“此文所说实是老生常谈，但为统治阶级所不愿闻者，故无怪到处碰壁也。”²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由汪、日方面授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全体委员共署辞呈。二月八日，伪国民政府飭令批准。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教署事已辞却，可又消闲矣。”此系华北伪政权内部权力倾轧，据周氏二月十日日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后他之所以不再被聘用，乃是因为“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叔鲁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朱深即接替王揖唐任委员长者；而周氏去职亦非本人情愿，未及半载朱深病死，他尚云：“小人做坏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段事日后思之，亦甚可笑也。”³无论如何，周作人的“其责盖在政治”的

1 《甲申怀古》（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古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收《苦口甘口》改题《阳九述略》）。巴古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кунин），通译巴枯宁。

2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致鲍耀明。

3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在当年二月六日日记上所做补记。

“事功”至此乃告结束。继而被迫任为伪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无非得以保持其督办任内的经济待遇；以后出任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亦为闲差¹。此外还有伪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伪《华北新报》理事兼报导协会理事，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伪留日同学会理事等，均系挂名。周作人又从“为政者”回归“为文者”了，随后两年多著述颇丰，可谓又一高潮。刊物往往将他的文章排在头条，或标题字号加大，且将手写署名制为铅版，以示位置重要。一九四三年七月，由艺文社编辑的《艺文杂志》问世，周作人任社长，几乎每期均有作品发表，成为他的主要阵地。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前往南京就任伪国府委员并讲学，其间还到苏州一游，——有人描述印象，说是“丰仪如旧，唯短髭或较去年更苍白耳”²。十七日回到北京。正因有此行，周氏才与南方文坛恢复联系，此后《古今》、《风雨谈》、《杂志》、《天地》等刊物上多有他的文章刊出。回京后五日，母亲鲁瑞逝世，享年八十六岁。周作人追忆说：“先母性弘毅，有定识，待人宽厚，见有急难，恒不惜自损以济人，以是为戚邻所称。平时唯以读书自遣，古今说部，无所不读。又喜阅报章，定大小新闻数种读之，见所记多单调虚假，辄致愤慨。关心时事安危，时与儿辈谈论，深以不能再见太平为恨。”³母亲抚育了周氏兄弟，于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功莫大焉。

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讲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以及三个月后所作《汉文学的前途》，被他列为与《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同样“较为重要的”“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⁴。不过现在他又重新回到“文学的范围”了。《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⁵提出：“据我的意见来说，关于政治道德中国本来有两种绝不同的思想，甲种早起，乙种后来占了势力，可是甲的根本深远，还时常出现，于是

1 周氏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松枝茂夫信云：“北京大学亦已得脱身，现在唯任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在一周中去二天，但如木炭车不来相接，则亦可以不去，殊为闲散。”

2 纪果庵：《知堂老人南游记事诗》（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五月六日《古今》第二十三、二十四期）。

3 《先母事略》（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三号）。

4 《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

5 一九四三年七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收《药堂杂文》。

成了冲突。简单的用假定的名称来说，这可以说甲是一切都为人民，乙是一切都为君主的主张。”而以“一切都为人民”为“中国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基调”；至于“一切为君主的思想本是后起的，因了时代的关系一时间大占势力，在文化表面上很是蔓延，但是终于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属于这一路的”。其间区别，在于对《中国的思想问题》里所说“中国思想”是否有所体会，予以认同。

及至写《汉文学的前途》¹，则与三年多前的《汉文学的传统》“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有云：“从前我偶讲中国文学的变迁，说这里有言志载道两派，互为消长，后来觉得志与道的区分不易明显划定，遂加以说明云，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的以诚与不诚分别，更为明了。本来文章中原只是思想感情两种分子，混合而成，个人所特别真切感到的事，愈是真切也就愈见得是人生共同的，到了这里志与道便无可分了，所可分别的只有诚与不诚一点，即是一个真切的感到，一个是学舌而已。如若有诚，载道与言志同物，又以中国思想偏重入世，无论言志载道皆希望于世有用，此种主张似亦相当的有理。”过去宣扬文学无用，现在却说“希望于世有用”；然而对后一方面的解释是：“盖中国人如本其真诚为文，结果自然多是忧生悯乱之情，即使貌若闲适，词近靡丽，而其宗旨则一，是即是有益于世，谓之明道殆无可矣。”是以与他一向的看法并无根本区别，只是相对而言，人道主义的成分稍增，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成分稍减而已。其实他所谓“于世有用”，重点还在“汉文学”这一形式：“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

¹ 一九四三年九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三期，收《药堂杂文》。

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¹话说至此，显出与《中国的思想问题》之不同，即如其在他处所说：“中国士流向来看重政治，从事文化工作者往往心不专一，觉得弄政治更为有效，逐渐的转移过去了。其实文化工作者不必看轻政治，却也无须太看重，只应把自己的事业看作与政治一样重要，或者如有必要即认为也是一种政治的工作亦可，专精持久的做去，效果自会发生出来。”²从《汉文学的传统》到《汉文学的前途》，所论从“文学”到“政治”再到“文学”，恰与作者的身份变化相当；不过立足点虽然不同，着眼点却是一个。

这年秋天，周作人做了两件事：一是編集“说话”以来的文章为《药堂杂文》，于次年一月由新民印书馆印行；一是起手翻译文泉子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写生文”《如梦记》，陆续刊出³。《药堂杂文》最初拟名《一蕢轩笔记》，作者自谓：“我在《雨天的书》自序里承认自己是道德家，虽反对人家跟班传话似的载道，自己却仍是随时随地的传道，因为所传是出于私见的道理，故一时亦曾以为即是言志。……《一蕢轩笔记》写得较晚，则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调或更较浓厚而已。”⁴主要针对《汉文学的传统》等四篇“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而言；对于周作人来说，此书思想意义上的重要性，或许只有从前的《艺术与生活》可以相比。至于《如梦记》，周氏有云：“在日本有过明治维新，虽已是过去的事，但中日两国民如或有相互理解之可能，我想终须以此维新精神为基础。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

1 文中有云：“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证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力，必先能树立了国民文学的根基，乃可以大东亚文学之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与《中国的思想问题》类似，也是利用“大东亚文学”的现成说法，而替代以自己的意思。显而易见，果然如其所说，则根本不可能“以大东亚文学之一员而参加活动”了。

2 《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文学》创刊号）。

3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九月连载于《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至第二卷第九期。

4 《〈一蕢轩笔记〉序》。

总想译述出来，虽然自己深知这是很不易的事。……全书共计九章，希望每月能译出一章来，那么到了明年夏天，全部译完了，可以出一小册单行本子。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成，这已写了一部分三万字，下余的大约也还有十万字之谱吧。”¹这里谈到“文学上”的“野心”，在他确是新的动向：于继续从事“也是一种政治的工作”的“汉文学”之外，不啻别开一路。

年底，周作人在《论小说教育》²一文中说：“总而言之，中国现今本来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那是当然的事。要打破这个浑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宜，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谊之事功化。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老鸦皆明礼教，其意虽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今宜通物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道，自更坚定足据，平实可行。次则儒者常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固亦甚佳，但个人可以用作修身之准则，若对于家国人民，必须将道谊见诸事功，始能及物，乃为不负，否则空言无补，等于清谈也。”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伦理之自然化”与“道谊之事功化”³，前者旨在认识世界，后者关乎确立自己，周氏三十年代以来的基本思想，大致可以涵盖在这两句话中。

三

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周作人作《遇狼的故事》⁴一文，有云：“前几

1 《〈如梦记〉第一章附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2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天地》第五期，收《苦口甘口》。

3 在不久后所作《梦想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求是》第一卷第一号，收《苦口甘口》）中，作者改说“道义之事功化”。

4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古今》第四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天同日本的客谈起，我比喻说，这里有一堵矮墙，有人想瞧瞧墙外的景致，对我说，劳驾你肩上让我站一下，我谅解他的欲望，假如脱下皮鞋的话，让他一站也无什么不可以的。但是，若连鞋要踏到头顶上去，那可是受不了，只得蒙御免了。”似乎意有所指。果然不到十天，即有“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之“破门声明”，投诸各处。再过五天，周氏又致信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谓：“……唯因此而想起一事，则去年九月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氏扫荡中国老作家之演说是也。该演说是否由于某乙之示意，又所谓老作家是否即是鄙人，此二点无论如何希望予以说明，为此特请费心转告片冈氏明了回答。”¹并明言：“如若所谓反动的老作家确是鄙人，则鄙人自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等，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案犹云谢绝）。鄙意见发言者虽为片冈氏，唯其责任则应由贵会负之也。如至四月中旬未得任何回复，即认为已经默认。”就此掀起一场风波。

沈启无向与周作人关系密切，七七事变后，亦滞留北平。一九三九年八月，周作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启无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周作人任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沈启无任评议员。他并曾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据周作人说，沈启无“在我指导之下任事已有多多年，就是前一次出席文学者大会，算是一名代表，也是我派他出去的。”²但沈氏似乎心有未甘，二人之间由此生隙³。一九四三年春，日本文学报国会小说部参事林房雄作为“文化使节”来华，周作人以其系“转向文人”——原系左翼，转而投靠政府——颇予冷落，沈启无却竭诚招待，引为倚靠。不久为编辑《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事，沈启无与出版方新民印书馆发生矛盾，希望周作人与之同进退以相要挟，为周氏所拒绝。夏，在沈启无召集的文学茶话会上，

1 《一封信》（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日报》）。

2 《文坛之分化》（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中华日报》）。

3 这与周作人与俞平伯的关系适成对照。许宝骥《俞平伯先生〈重圆花烛歌〉跋》（一九九〇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云：“此期间，兄（指俞）淡泊明志，清操自持。周知堂翁时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后且曾出任伪教育督办，与平兄师友至交，而始终未以一言相挽，盖知之至深，其风义亦有足述者。”同为“四大弟子”，其一热中，其一淡泊，周氏亦以不同态度待之。

林房雄对“中国老作家”有所攻击。此外，沈启无将一九三九年周作人遇刺殃及自己，说成为救老师受伤，亦招致周氏不满。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科讨论会上，日本代表片冈铁兵宣称：“基于渝方政权分立下之中国特殊情形，而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此应予“扫荡”者，“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毫不考虑今天之中国呼吸于如何历史之中，被置于如何世界情势之下，唯弄其独自随意的魅力丰富的表现，暗嗤诸君，而于新中国之创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为诸君与吾人前进之障碍，积极的妨害者，彼为在全东亚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彼不过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而已。”¹这一题为《中国文学之确立》的发言虽经发表，周作人当时并未寓目。冬天，才由胡兰成《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得知，片冈所针对的乃是自己。

周作人对此的反应，如其所说：“我所写的不知是大品小品，都是有意义的东西，凡对于中国与中国人之运命有关的人应无不能了知此意，若意见相合与否自然是别一问题，至于不读或不懂，或外国人，或奉外国主义的分子，加以不理或反对，那又是当然的事，无须奇怪的了。这样说来，片冈铁兵之提议也是可以原谅，我所觉得有点奇怪的，只是这个意见他是从那里得来的。片冈铁兵似乎未曾遍读老作家的作品，何从知道应该打倒，那么这种主张必是另有来源的了。这来源是怎样的呢？推想起来或当如此，即片冈铁兵得之于某甲，而某甲得之于中国人某乙，是也。”²“某甲”即林房雄，“某乙”——在致文学报国会的信中也提到——即沈启无。一九四四年二月北京出版的《文笔》第一期上，有署名“童陀”实为沈启无的《杂志新编》一文，所说“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等，坐实了周氏上述推论。“这里边攻击老作家，与某甲以及片冈的攻击正是一条战线，而又特别集中攻

1 陶晶孙译文载一九四四年五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二期。

2 《关于老作家》（一九四四年四月十日《中华日报》）。

击《艺文杂志》的老作家，其目标非常显著，已无异于指名而骂矣。”¹

周作人先后写了《关于老作家》、《一封信》、《文坛之分化》、《一封信的后文》等，公布沈氏“言动不逊肆行攻击”的详情，并声明：“凡有沈杨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鄙人一律敬谢不敏。”²虽有伪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柳龙光以及胡兰成等个别人声援³，沈启无终于被北方文坛扫地出门⁴。——多年后，周作人提起沈氏，犹自耿耿于怀：“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⁵至于日本文学报国会方面，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致电周作人，请稍待片冈答复。二十五日，周作人以时限已过为由，表示“只能到此截止了，认为不答复。……使我对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一切交际可以免除，这也就是大可感谢的了”⁶。并说：“我这人平常是很麻糊的，对于有许多事都不很计较，所以有人误会以为我是极端主张忍耐的人，其实并不尽然，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有区别的。这回为了什么演说与文章，忽然计较起来，似乎有点儿小题大做，但题目似小，意义则大，我的声明与质问便是着重在这两点，请大家注意。其

1 《文坛之分化》。沈启无在《另一封信》（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民国日报》）中，否认自己与片冈的发言有关。对此周作人说：“沈某攻击鄙人最确实的证据为其所写文章，假如无人能证明该文作者童陀并非沈某，则虽有林房雄片冈铁兵等人之后援，代为声辩，此案总无可翻也。”（《一封信的后文》，载一九四四年五月二日《中华日报》）沈启无《你也须要安静》（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五期）一诗所云：“你说我改变了，是的/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是的，我是改变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似可视作对周氏“破门”的回应。

2 《文坛之分化》。

3 如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五期载陈鲁风《铲除“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云：“铲除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即是扫荡‘反动作家’。”“可是反动分子也许反对积极的前进的，也许老大家会仗着他老大家的势力来阻挡这热烈的国民文学的前进的。也许要以其卑鄙的反动行动来损毁青年们的向新建设前进上的热情。可是要知道潮流所趋，是无可阻挡的。”同期柳龙光所撰“编后记”则云：“自周先生的‘破门声明’发表以来，‘为了个人的爱恶或派别的私见而排除异己的事’，逐次发生。”

4 沈启无“文革”期间所写交待材料说：“一九四四年四月间，周作人公开发出破门声明，并在各报上登载这个声明，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在报上攻击我。我并未还手，只想把事实摆清楚，写了《另一封信》送到北京、上海各报。他们都不刊登，当时只有南京胡兰成等人，还支持我，《另一封信》才在南京报刊上发表出来。周作人不过经过北大评议会，挟其权力，就勒令文学院对我立即停职停薪，旧同事谁也不敢和我接近。由于周作人的封锁，使我一切生路断绝，《文学集刊》新民印书馆也宣布停刊。我从五月到十月，靠变卖书物来维持生活。……北京现待不下去，我就到南京去谋生，胡兰成约我帮他编《苦竹》杂志。”（《沈启无自述》，黄开发整理，二〇〇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

5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鲍耀明。

6 《一封信的后文》。

一，徒弟勿可吃师父。其二，文化交流也要有国际礼仪。”《新中国报》、《大陆新报》（日文）以及陶晶孙等均表示同情周氏，谴责片冈。以后，日本文学报国会剧文学部部长武者小路实笃、理事长与善郎更受托致函周氏，以相安抚。在这一事件中，固然可见周作人在沦陷区文坛难以动摇的地位；自始至终，他的“绍兴师爷”的性格也表露无遗，即如多年前就有人说过的：“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¹——在其一生中，大概是最后一次如此充分地彰显这一面了。

四月下旬，片冈铁兵终于给周作人来信，勉强道歉之余，仍坚持说：“请你想起在改造社《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大作《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圣人那样的损己以利人云云。这样说起，讲到乱的那一节话，当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发表那篇演说时，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者所戟刺矣。读了《中国的思想问题》全文，熟读上述之一节，假如不曾感到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角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组会议席上，作那样的演说。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之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意思，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不赌个人的生存之战争可能有乎？不牺牲个人之欲望而愿赢得战争既不可能，然则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或至少亦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

¹ 温源宁：Chou Tso-jen，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评论周刊》第七卷第十三期。倪受民译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逸经》第十七期，题《周作人——铁与温雅》。这里引用的是南星《一知半解》（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中的译文。

而使之正当化耳。文章之批评不可为文章之表面所眩惑，虽是平稳的言词，而在其底下流动之物，必可感知其出于平稳之上，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

片冈或许“过度诠释”了周作人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周氏当时却颇引“扫荡反动老作家”以自重：“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我的力量极是薄弱，所能做的也只是稍有议论而已，却有外国文士见了说这是反动，我听了觉得很有意义，因此觉得恐怕我的路是走得不错的，因为冷暖只有自家知，有些人家的非难往往在己适成为奖励也。”¹

“破门”与“反动老作家”事件期间，周作人在为自己的《秉烛后谈》写的序言中说：“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见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²此书收录《秉烛谈》之后作品，多写在一九三七年春秋之际，这年九月由新民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本书《书房一角》，则在五月由同一出版社印行，五六年来所作笔记，除《药堂语录》所收者外，基本上汇编于此。二书均属艺文社编辑的“艺文丛书”。

周氏自称“思想则可云已定”，接下来所作《我的杂学》³一文，最接近于他的“思想自传”。作者说：“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点懂得的事物，简单的记录了下来。”⁴所述计有古文，小说与读书，古典文学，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与安特路朗，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的心理，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与妖术史，乡土研究与民艺，江户风物与浮世绘，川柳落语与滑稽本，俗曲与

1 《〈立春以前〉后记》。

2 《〈秉烛后谈〉序》（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作，收《立春以前》）。

3 前十二节连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新报·文学》，全文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古今》第四十八期、七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古今》第五十至五十二期、九月十六日《古今》第五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4 《知堂回想录·拾遗卷》。

玩具，外国语和佛经等项，其一生学问范围以及思想根基，大略如此。而总结为：“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种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斟酌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曰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得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近来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此即是我的杂学之归结点，以前种种说话，无论怎么的直说曲说，正说反说，归根结底的意见还只在此。”

自从揭示“伦理之自然化”与“道义之事功化”后，周作人就进入到一个“总结时期”，提纲挈领者当然是这篇《我的杂学》，下接老虎桥监狱中所作组诗《往昔》等，至一九四九年寓居上海时给周恩来写信乃告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关于《我的杂学》所说：“……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¹固可视为“反动老作家”事件之遗响，但也确系将近二十年前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以后，作者又一次新的自我定位。他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作家”²、“站在文坛之外”。这年年底，更说：“据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我有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相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虽然自己标榜是儒家，实在这种态度乃是道家的，不过不能澈底的退让，仍是不能免于发生冲突。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许可不做喽啰，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³概括了自己从三十年代遭受左翼批判到四十年代几为片冈扫荡的际遇，而“二不主义”则将其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立场具

1 《〈苦口甘口〉自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风雨谈》第十六期，收《苦口甘口》）。

2 《关于老作家》。

3 《文坛之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作，收《立春以前》）。

体化了。正是基于此一立场，作者明言：“我写文章的态度，第一，完全不算文学家，第二，写文章是有所为的。这样，便与当初写《自己的园地》时的意见很有不同了，因为那时说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又说，弄文艺如种蔷薇地丁，花固然美，亦未尝于人无益。现在的希望却是在有益于人，而花未尝不美。”与“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正是相辅相成。

对于周作人来说，标举“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与当年提出“教训之无用”，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虽然其间不无矛盾之处，尤其是“道义之事功化”，——“教训”既然“无用”，“道义”何以“事功化”，又何须“事功化”呢。或者说，“教训之无用”是从被动一方面考虑，而“道义之事功化”是从主动一方面考虑，也就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仍“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九四四年八月，周作人作《灯下读书论》¹，延伸自己多年前《闭户读书论》之意，当初提倡“读史”，现在讲的便是所得结论：“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此乃回顾既往；瞻望未来，则如另一处所说：“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²这也还是“教训之无用”，不过讲得更透彻、更痛切罢了。即如作者所说：“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古今中外无不如此。”³以此来看“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亦只能归为“一点儿都未实现过”的“好思想”，无从改变“在人间全已做了”的“坏事情”。——后来他自己也说，“道义之事功化”“此与‘伦理之自然化’相并，是我多年来的主张。说句老实话，也只是一种空论罢了”⁴。而他一度在“教训之无用”与“道义之事功化”之间犹疑反复，实是导致一九三九年以后放弃“无为”、选择“有为”的思想原因之一。《灯下读书论》等，说得上是对此的一番反思。虽然周氏此后继续提倡“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这只是根据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所提出

1 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2 《凡人的信仰》（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作，收《过去的工作》）。

3 《灯下读书论》。

4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订。

的“中国现今紧要的事”；至于自家思想，终仍统摄于“教训之无用”也。作者所说，其实亦是此意：“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证候与结果，我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不要犯这种的病，再好一点或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也说不定。我自己还说不出读史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有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但是正面说来只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就容易归入圣贤的说话一类里去，永远是空言而已。”¹

周氏所做“自我总结”，包括写文章在内，如其所说：“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想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了，在努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有如圆光似的，所不同者我并不要念咒画符，只须揭开书本子来就成了。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²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冲淡平和，丰腴蕴藉，疏散从容，朴讷苦涩；所以如此，关键即在于“不作态”。这可以上溯于“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古来散文作品亦有此路写法，如《论语》、《颜氏家训》以及其他周氏素所推崇者，尤其是小品、笔记、题跋、尺牍之类，然而至周作人才真正树立这一散文美学观念，同时充分付诸创作实践。徐汭说：“他这种老老实实谈他读书与见解，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或者敢做过。”³放在白话散文史和整个中国散文史上看，这都是周作人的最大贡献。

一九四四年七月，周作人说：“去年九月以后我动手翻译日本坂本文泉子的《如梦记》，每月译一章，现在已经完毕，这是近来的一件快意的事。我还有《希腊神话》的注释未曾写了，这个工作也是极重大的，这五

1 《灯下读书论》。

2 《谈文章》（一九四五年六月作，收《知堂乙酉文编》）。

3 徐汭：《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

六年来时时想到，赶做注释，难道不比乱写无用无味的文章更有价值么？”¹进而更说：“或者翻译家可与文坛稍远，如真不能免为白丁，则愿折笔改业为译人，亦彼善于此。”²尽管《希腊神话》的注释刊载了一小部分，即告中止³，所说却预告了自己晚年的主要工作。至于《如梦记》，虽已登出将由新民印书馆印行的广告，然而并未面世。

周作人在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两年，所写文章其实很多，虽然他一度宣布：“（一九四五年）立春以后还未写过一篇文章，或者就此暂时中止，未始非佳，待将来学问有进步时再来试作吧。”⁴周氏还“忽然想到，草木虫鱼的题目很有意思，抛弃了有点可惜，想来续写”⁵，但“续草木虫鱼”只完成了《蚯蚓》、《萤火》和《关于红姑娘》区区几篇。一九四四年末至抗战胜利，与他有些关系的杂志如《古今》、《中和》、《求是》、《天地》、《逸文》、《留日同学会季刊》、《读书》、《同声》、《文史》、《风雨谈》、《杂志》等，陆续停办。自家主编的《艺文杂志》，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终刊。周氏不少文章，写成未能发表。一九四五年七月《杂志》第十五卷第四期所载《无生老母的消息》⁶几乎是最后面世者，该文“谈论民间信仰”，对于“农民苦痛的呼号”“寄以同情”⁷，与先前的《鬼的生长》、《关于活埋》、《赋得猫》等，同为文化批判之代表作。周作人的随笔集《苦口甘口》、《立春以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五年八月由陶亢德、柳雨生主持的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一九四五年春夏之际，周作人还写过一些笔记⁸，又

1 《苦口甘口》自序。

2 《希腊神话》引言。

3 《希腊神话》连载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艺文杂志》第二卷第十至十二期，作者所作附记有云：“本译文发表到第二次，杂志的第二卷也已结束了，原文第一章却只抄了一半，假如照预定计划做去，登完一二两章，恐怕还要半年的光阴吧，我想或者这样也够了，找得着适宜的材料，且来改译点别的东西也好。”然而其译事却到此告一段落。

4 《立春以前》后记。一九四五年五月《小天地》第五期“文坛影坛”栏据此云：“此后周氏或将稍息其文字生涯。”实则他只在该年二三月间暂告歇手，四月十五日作《焦里堂的笔记》后，重又写作较多。

5 《蚯蚓》（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作，收《立春以前》）。

6 收《知堂乙西文编》。

7 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日致曹聚仁。

8 周氏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记中，多有写作笔记的记载，六月四日日记：“下午写笔记，成一卷，共约三万三千字。”八月三日日记：“收亢德寄还笔记稿廿页，即寄读书出版社。”又周黎庵说，一九七九年他曾见过周氏一部手稿，题为《秋灯琐记》，“大概百余页，内容杂乱无章，各种体裁的文章都有，主要的则是日记。”（《周作人与〈秋灯琐记〉》，收一九九六年七月浙江文艺出版社《闲话周作人》）现亦下落不明。

编了《北京竹枝词集》、《近代散文》二书¹，均未出版，已经遗失。《关于〈近代散文〉》一文所云：“说得简单一点，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这也就是现代精神。”可谓是对自家思想的高度概括。《艺文杂志》第三卷第三期预告周氏编辑《杂学汇编》，甲集第一册为明赵南星《笑赞》、《芳茹园乐府》，第二册为嘉应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初稿》，第三册为藁城秦书田《曝背余谈》，第四册为海宁邹存淦《修川小志》，乙集第一册为山阴张岱《梦忆》，第二册为会稽章学诚《丙辰山中草》、会稽范家相《范衡洲文钞》、会稽周兆蓝《镜湖竹枝词》，第三册为会稽李慈铭《萝庵游赏小志》、山阴平蝶园《酒话》，均未面世²。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周作人的反应颇为平静，当日日记有云：“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一个半月前所作《谈胡俗》³，却表达了对半壁河山长期沦陷之行将终结的感想。该文由查考“胡俗”入手，结论是：“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仍着眼于中国民族的自我维系能力，认为：“又一部分则或者是民众的特殊性格，即是所谓一盘散沙性吧。……中国人缺少固执的粘性，所以不分裂与不团结是利弊并存的。有权力的或想割据，讲学问的也要立门户，一个个小团便形成一块块的小分裂，民众并无此兴趣，但也无力反抗，只得等他们日久坍塌，那时还是整个的民众。”此虽不出前此所说“思想文字语言礼俗”的范围，但《汉文学的前途》、《十堂笔谈》等文强调其中自己有所作为的一部分，现在则留意无须作为的一部分，固是深感“中国民情之可信托”，却也显得自家“道义之事功化”的作为未免多此一举了。

八月二十日，周作人复函北京大学文学院，同意担任国文系主任，——此前，他已在一九四四年十月辞去文学院院长，“但教授职务没有辞”⁴。有

1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记：“下午编《北京竹枝词集》了。”七月二十七日日记：“编《近代散文》全了。”周氏《北京的风俗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关于竹枝词》（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作，收《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显与《北京竹枝词集》有关；《关于〈近代散文〉》（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则系《近代散文》（《立春以前》）书末“太平书局印行”书目列有“现代散文随笔——周作人著”，或即此书）之序或后记。

2 周氏所作《〈笑赞〉》（一九四五年三月《杂志》第十四卷第六期，收《立春以前》），或与该丛书甲集第一册有关。

3 一九四九年二月《好文章》第四集，收《过去的工作》。

4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收《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记载云：“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周作人想还自己当初身份面目，不但担任起主任职务，而且还上讲堂讲课了。原计划开‘佛教学’和‘国文研究法’两门课，后来只开了一年级的国文研究法，在每星期四上午十至十二时上课，九月末开学上课，周上了不到三次课，因为‘肃奸’开始，周才不到校了。”¹他的教授生涯，自此结束。常风来访时，周氏曾表示：“（沈）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常风写道：“他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我听了不由得很惊讶，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²周氏还有意前往解放区，不过未能成行。据于浩成说：“大约在十月或十一月，有一天我父亲告诉我，赵荫棠受周作人的委托已来张家口找到我父亲，说周作人想来解放区，希望通过董鲁安问一问共产党能否接纳他。我父亲还说他已经请示成仿吾议长，成议长当即一口拒绝。”³

与此同时，周作人继续写作，虽已无从刊布。后来编进《乙酉文编》中的抗战胜利后的文章，即有八篇。就中《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道义之事功化》、《两个鬼的文章》等，都是承袭《我的杂学》而更加深刻的自我总结之作。他似乎要利用这段时间，说出自己此前未说或未说清楚的话⁴。所作《关于遗令》⁵，不无自况之意。回顾平生，周作人说：“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⁶他将两路文章分别归之于自己身上的“绅士鬼”与“流氓鬼”。“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这种态度当然不能为旧社会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只可自承是流氓的。”“伦理之自然化”与“道义之事功化”，均可纳入此一范畴，与一贯的非圣无法的思想

1 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一九八二年《文化史料》第三期）。

2 常风：《关于周作人》（收《闲话周作人》）。

3 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鲁迅研究动态》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所云“我父亲”即董鲁安，又名于力，时任晋查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4 周氏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过去的工作》一篇又说明杂文小店的关门，盖此后真是焚弃笔砚，于此类小品文乃属过去的玩意儿矣。”

5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作，收《过去的工作》。

6 《两个鬼的文章》（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作，收《过去的工作》）。

倾向一脉相承。为“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所统摄的周作人思想，是对包括儒、道、法在内的全部中国传统思想的扬弃；离开这一关系，很难理解周作人思想的真正价值。

周作人在确知已经身败名裂之际，犹自谆谆其言：“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他谈“伦理之自然化”，题曰“梦想之一”；谈“道义之事功化”，又称为“梦想之二”：“现在须得有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从中国本身出发，清算封建思想，同时与世界趋势相应，建起民主思想来的那么一种运动。上边所说道义之事功化本是小问题，但根底还是在那里，必须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首先勾消君臣主奴的伦理观念，改立民主的国家人民的关系，再将礼教名分等旧意义加以修正，这才可以通行。”¹这些话与提出“道义之事功化”本身，均不无自我辩解之意；然而“必须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的确是自《祖先崇拜》、《思想革命》起头的“反礼教思想”的核心所在。周氏此说首先是针对中国知识界的，这方面他久有批评，现在讲得尤其激烈：“我不承认是文士，因为既不能写纯文学的文章，又最厌恶土流，即所谓清流名流者是也。中国的士大夫的遗传性是言行不一致，所作的事是做八股，吸鸦片，玩小脚，争权夺利，却是满口的礼教气节，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振古如斯，于今为烈。人生到此，吾辈真以摆脱土籍，降于堕贫为荣幸矣。”²

十二月二日所作《石板路》³，是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最后一篇文章。附记云“时正闻驴鸣”，乃系针对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所说“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而发，此前周氏曾对这位旧日学生寄予期望，一度打算写信给他。——当日周氏日记云：“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 《道义之事功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

2 《两个鬼的文章》。

3 收《过去的工作》。

第八章 一九四五——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周作人在家中被捕。“当军警用枪械对着周命令周就逮时，周还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¹十几天前，国民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就在这日，又颁布《惩治汉奸条例》。周氏以后对记者说：“我始终等待就捕。”²晚年则云：“凡是在敌伪时期做过事的人当然要受到处分，不过虽有这个觉悟，而难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处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在于‘劫收’，并不是为别的事情。我这里没有其它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 (Movado) 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皇砖和永明砖砚总算留下了。”³同日被捕的，还有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等多人。

他们都被送到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据周作人讲：“在北平的炮局是

1 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

2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申报》）。

3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

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¹入狱之初，周氏“偶作打油诗，得二十四章”，当时“迄未写出”；及至南京，“荏苒半载，大半遗忘，勉强补缀，存其半数”，此即《炮局杂诗》²，共十三首。描写狱中生活，同监轶事，笔意多近乎“谑”。此情此景，甚至使他回想起“四十年前南京学堂生活”：“布衾米饭粗温饱，木屋安眠亦快然。多谢公家费钱谷，铁窗风味似当年。”显然尚不觉得前景特可担忧。虽亦偶有例外，当他以胡适“学者应出研究室入监狱，出监狱入研究室”之语对照自家目下处境时，不免慨然：“生平未入研究室，先进监房卧地铺。夜起有时面壁坐，一丝烦恼未消除。”³

周作人入狱后，亲友多方营救。俞平伯向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尚未归国就职的胡适建言，“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希望胡适“建议政府，或致书友好之当道者，或诉诸舆论”，“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信中道着周氏的真实处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縲继，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文人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⁴然而身为“左翼”的郑振铎公开发表的意见，却与俞平伯不无相近之处：“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⁵在“国人皆曰可杀”⁶声中，堪称“杂音”。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王荫泰、江亢虎、齐燮元、殷汝耕、汪时

1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

2 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记于南京，收《老虎桥杂诗》。

3 作者自注：“胡适之云，学者应出研究室入监狱，出监狱入研究室。”

4 俞平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胡适（收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

5 郑振铎：《惜周作人》。

6 《自称淡泊复世故 周作人明受审》（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中央日报》）。

璟、周作人等十四人，两位铐为一对，以飞机解送南京。就中“周作人光头衣着最陈旧”，“瘦多了，态度仍很‘冷淡’”，“携其自著之《谈龙集》”。“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五十二公斤。”¹此前汪伪政府要角如缪斌（四月八日）、陈公博（四月十二日）、褚民谊（四月二十二日）、梅思平（五月九日）等均被判处死刑，缪斌且已执行（五月二十一日）；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四月二十二日）。周氏亦不无赴死之念，所作《渡江》二首，仿佛“遗书”：“驷提未足擅施薄，日暮途遥剧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贫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邪。”

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首都监狱²的“忠舍”。“忠舍为看守所的一部，在西北的一角里，东西相对各有五间房子，每房要住五个人，北面有一个小院子，关起门来倒也自成一个院落。住在里面的人，安定下来就开始募款，记不清那数目了，大约是每月三四十万吧，给他们做酬劳，——这叫做什么好呢？凡是在忠舍当差的人，自看守以至副所长都有所得，据说只有所长没有分润，这是我听说如此，详细也不知道。我们没有钱的也可以不出，反正忠舍的住民里不缺少富翁，他们就负担下来了，……因为如此，忠舍的管理比较缓和，往来出入可以自由，烟酒什么违禁物品也可输入，所里照例每月也有检查，但是都是预先知道，由担任‘外役’的先期收集了，隐藏在板屋的顶上，检查完毕再一一归还原主。当外役的都是那些短期拘禁的犯窃盗小罪的人。”³周氏《忠舍杂诗》中《瓜洲》、《灌口》诸作，即写赠“外役”者。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和十三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王文俊对周作人连续讯问。六月十七日，提出起诉书，有云：“被告周作人……迨北平沦陷、伪临时政府组织成立，遂受汤逆尔和之怂恿，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秉承敌伪意旨，聘用日人为教授。三十年一月，经升任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推行伪府政令。同年十月，兼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促进两国文化交

1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

2 该处于二〇〇〇年七月四日拆除。

3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

流。三十二年六月，兼任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三十三年五月，任伪《华北新报》理事及报导协会理事，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同年十二月，又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实施沟通中日文化。……核其所为，实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之罪。”¹该款为“图谋反抗本国者”，罪列“通谋敌国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为汉奸，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之首。

前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等十四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授徐祖正等五十四人，先后呈文高等法院，“具呈证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请求察核”²，“联名保证周作人并未通谋敌国，且曾作有利于青年教育之行为，恳请略迹原心，从宽发落”³。又有前教育部北平市战区教育督导主任、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刘书琴，北平私立孔德学校，私立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顾随，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杨永芳，前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之江大学国文系教授郭绍虞，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及北京大学等出具证明，或为周氏任伪职期间保存增添文化机关产业书籍事，或为掩护营救中央地下人员事。——多年后蒋梦麟病逝，周氏尚云：“蒋君尚重信用，亦有可取，如留校教授之命，如在别人早不承认矣，乃不反讦，故云尔。”⁴

周作人则于七月十五日作辩诉状，随即又追加辩诉，称：“被告在华北参加伪组织，其动机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其结果则华北教育不曾奴化，学生不伪，有朱教育部长发表训话可证。”⁵“被告曾在伪组织服务，诚有不合，唯别无反抗本国之图谋。至于并无通谋敌国情事，亦可由敌国认定被告为其敌人此一事实上确实证明。”⁶所举事实，即片冈铁兵之提议“扫荡反动的中国老作家”也。

七月十九日，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庭对公诉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第一次公开审判。八月九日、九月十九日和十一月九日，又有第二、三、四次公

1 《首都高等法院检查官起诉书》（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2 《沈兼士等为周案出具证明致首都高等法庭呈》（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3 《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庭呈》（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4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记。

5 《周作人辩诉状》。

6 《周作人之追加辩诉状》（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审¹。周作人的辩护人先是法庭指定的吴万生律师，后改为自已选任的王龙律师。据周氏说：“今年夏来南京受讯，在法院邂逅王天瑞先生，立谈数语，慨然允任义务辩护，侠情高谊，不知所报。”²王氏为周作人辩护书称：“周作人为保全北大校产而留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临难不敢苟免，既无寸铁，又无三军，虚与委蛇，降志辱身。今幸北大校产无恙，遇难同志得救，敌伪政令及奴化教育因多方阻止而未能实行，华北青年子弟之教育幸未因久战而停顿。沦陷时被日本人认为‘文学敌人’，胜利后又被人指为文化巨奸，天地虽大，进退两难，不知何时，重见天日？”³有人描述第二、三次公审之间囚徒周作人的形象：“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痍痕，寸许的短髭灰白杂间，金丝边眼镜。”⁴

十一月十六日，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庭审判长推事葛之覃作出判决：“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称：“被告在日寇羽翼之下伪组织所属之学校机关担任首长或重要职务，则其与伪组织内一般主脑人物沆瀣一气已可断言。况据该被告供明：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内亦有日人教授，而伪教育总署、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等等无一不有日人参与其间，而且每每居于监视之地位，是分工合作之势已成，即最低限度，其随声附和在所不免。该被告推行伪令、实施奴化教育等罪行实无推诿之余地。其所持维持教育、抵抗奴化等抗辩理由，殊无足采。……该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即在战时所著《中国的思想问题》一书以忠恕为我国固有中心思想，亦颇有见地），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

1 第二次公审后，黄裳采访了周作人，“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不能不答辩云。”（《老虎桥边看“知堂”》）

2 《偶作寄呈王龙律师》（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作，载同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文汇报》）。又，王龙辩护书《知堂之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云：“余百战归来，三经荒废，复律师之故业，代社会鸣不平，因念同学之谊，出为义务辩护，嫌恶不辞。”

3 王龙：《知堂之狱》。

4 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

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颀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惟对被告提出“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人民行为之各种反证”有所确认，“衡情酌理，应予减轻其刑”¹。

周作人不服判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声请复判，自称“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²。十二月十七日又补具复判理由，分“教育不奴化之证据”与“不同谋敌国之证据”两项，并说：“根据上述理由，是作人并无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图谋已极明显，法院仅照职守推测，以想当然之事作为定案，岂得为平？”³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审判长推事高熙针对周作人的声请复判，判决如下：“原判决撤消。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周作人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该案至此定讞。判决书称：“查声请人在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时所聘用敌人为教授，及在伪教育总署督办任内改编我国教科书，悉以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军事合作之近卫三原则为题材，成立青少年团，参照伪新民会之计划，实施并组织学生勤劳队在跑马场附近修筑马路，以供敌伪运输之用，均经声请人供明在卷。而声请人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设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又称‘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等语，可见声请人推行奴化教育业已充分表现。核阅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华北日报》登载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北平市中小学校校长教职员欢迎会上所发表之演词，内有‘今天证明敌人的奴化教育整个失败，其功当归诸于各位教职员先生身上’一节，经三十五年九月二日教育部公函叙明朱部长在北平市教职员欢迎会上发表训词系对出席欢迎会之忠贞分子加以勉励，但并非对汉奸而言，足见声请人所称不曾奴化教育无非徒托空言，无可采信。次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固有之中心

1 《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〇四号）》（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2 《周作人声请复判状》（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3 《周作人补具复判理由状》（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惟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仍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合由本院以职权撤销改判，以昭公允。”¹

上述检察官与两审法官种种判断，代表有关周作人一案的社会主流意识，自此遂成定论；论者谈及此事，大多出于同一思路。周氏自己则说：“对于那篇《中国的思想问题》，可以看作‘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或是‘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这种武断罗织的话是本国人的公正法官所应该说的么？或者说此乃是向来法官的口气也未可知，那么我只好以‘作揖主义’对付之，说大人们这样说一定是不错的吧。”²当时唯一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是废名，不止一次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³“因为国家的命运不好，他寂寞地忠于自己的见地，故与群众相反，这是信。敌寇当前，他还想救人，还想替国家有所保存，这是仁。这个人现在在狱中，他是如何的‘忍辱’（这是他生平所喜欢的菩萨六度之一），他向着国家的法律说话是如何的有礼。”⁴周作人在南京狱中，得到因类似案情关在苏州的龙榆生之子女龙顺宜、龙真材照顾：送进食品、稿纸、书籍等，并代为拆洗棉衣棉被。友人废名、叶公超、川岛等曾来探望⁵，废名更托龙顺宜转赠百元。

周作人说：“在忠舍大约有一年的样子，起居虽然挤得很，却还能做一点工作，我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小桌子，翻译

1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特复字第四三八一号）》（载《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2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天的事情》（一九四八年四月《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

4 废名：《我怎样读论语》（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民国日报·文艺》）。

5 据冯健男《废名在战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一九九〇年第一期），废名说：“我去看了周先生，他很镇定。”据常风《关于周作人》，叶公超告诉作者，“周作人在监狱里生活很好，相当自由。”

了一部英国劳斯(W.H.D.Rouse)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给了正中书局，没有出板，解放后经我重新译了，由文化生活社刊行，书名省作《希腊的神与英雄》了。此外又开始做些旧诗，就是我向来称它做打油诗的，不过这时不再作那七言律诗了，都是些七言绝句和五言古诗，那是道地的外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是疲赖一点罢了。计共有《忠舍杂诗》二十首，《往昔》五续三十首，《丙戌岁暮杂诗》十一首，这里除《忠舍杂诗》外都是五言古诗。”¹这些诗作或感慨际遇，或追怀往事。《忠舍杂诗》中《偶作》一首，最可见作者心境：“入狱二百日，即事多所欣。同居恒乞食，高谈不避人。忧患互相恤，盗贼渐可亲。昨日岂为非，前路认已真。拘幽增自力，悲悯即雄心。学道未有成，立愿在今晨。”而《纪梦诗》之“吹箫乞食寻常事，记取吴师入楚时”和集外的《为友人题画梅》²之“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同样反映了他的自我认知。当吟咏“此意无人领”的“狂人”³和“俗世不相容”的“天才”⁴时，无疑也有所寄托。《感逝诗》一组，分写梅思平、林柏生、傅式说和丁默村死事。凡此种种，与其在法庭所言正相一致。《往昔》“多说史地杂事，稍附意见”⁵，涉及人物、书籍、地理、风物、玩具等，概括一己的精神世界，可与此前所作《我的杂学》相提并论。劳斯的著作译于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化了两个月工夫”⁶。“其时浙江五中旧学生蒋志澄在正中书局当主任，由他的好意接受了，但是后来正中书局消灭，这部稿子也就不可问了。”⁷这是周作人首次试图重新发表作品，却未能成功。只留下一篇《关于希腊神话》，写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的散文创作的晚期自此开始，虽然大量写作还在出狱以后。

七月下旬，周作人被移至“东独间”。此前一度在“义舍”关押。东

1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所提到的几组诗，均收入《老虎桥杂诗》。其中最先写完的是《往昔》。《丙戌岁暮杂诗》继其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写后记时完成。《忠舍杂诗》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写起，末一首《感逝诗》之四作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

2 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引。

3 《丙戌岁暮杂诗·狂人》。

4 《丙戌岁暮杂诗·天才》。

5 《〈往昔〉后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作，收《老虎桥杂诗》）。

6 《〈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后附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作，收《希腊的神与英雄》）。

7 《知堂回想录·北大的南迁》。《〈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后附记》则云稿子“被火烧毁”。

独间“是一人一小间”，“稍得闲静，又得商人黄焕之出狱时送我的摺叠炕桌，似乎条件够用功了，可是成绩不够好，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荦友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其次则是写诗，《丁亥暑中杂诗》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和集外的应酬诗和题画诗共约一百首”¹。《丁亥暑中杂诗》与此前的《丙戌岁暮杂诗》相仿，大致介乎《忠舍杂诗》与《往昔》之间，部分可视为对后者的补充，其余则关乎处境，发为感慨。《修褻》一首，可作代表：“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载。深巷闻狗吠，中心常惴惴。恨非天师徒，未曾习符偈。不然作禹步，撒水修褻事。”周氏自称“三十年来不少旧学生，有三数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跟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²，此诗特别针对傅斯年而作，与《忠舍杂诗》之开篇《骑驴》一脉相承。《鸡肋编》“人腊”的典故，此前已用于《道义之事功化》中，如今一再说，仍旨在揭露中国知识界已堕落为“封建思想与制度的余孽”。至于《儿童杂事诗》，据周氏讲：“最初因读英国利亚（Edward Lear）的诙谐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略师其意，写儿戏趁韵诗数章，迄不能就，唯留存三数首，衍为儿童生活及故事诗各二十四首，后又广为三编，得七十二章焉。”³虽然自称“实在乃只是一篇关于儿童的论文的变相”⁴，却写得生意盎然，有如天籁，较之《往昔》等的古朴浑厚，别是一番笔墨。

1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丁亥暑中杂诗》、《儿童杂事诗》和《题画绝句》（五十九首）均收入《老虎桥杂诗》。其中《儿童杂事诗》甲、乙两编共“写了十日”，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乙编后记时已经完成。《丁亥暑中杂诗》“计自大暑（七月二十四日）至处暑（八月二十四日），一个月中，共得三十二首”。《儿童杂事诗》丙编写于一九四八年惊蛰（三月五日）之后，三月二十日作附记时已经完成。《题画绝句》前五十四首，写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之间。《知堂回想录》云“三十七年一年中不曾作诗”，不确。

2 《偶作寄皇王龙律师》。

3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利亚，通译利尔。

4 《〈儿童杂事诗〉序》（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作，收《老虎桥杂诗》）。

周氏谈到《修楔》之“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有云：“这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次，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字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台议》中得来亦未可知。”¹周氏多写旧诗，是在身陷牢狱、无法作文的特殊情况下；然而有如他所说，“杂诗”在其整个创作中自具特殊地位，反思生平，表白心境，深切程度或为其他散文作品所不及。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周作人作《杂诗题记》，《老虎桥杂诗》时已“录为一编”。以后又增补《儿童杂事诗》丙编等，共二百三十七首。《杂诗题记》中延续了“必须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的话题：“直截的说，凡是以三纲为基本的思想在现今中国都须清算，……中国古来帝王之专制原以家长的权威为其基本，（家长在亚利安语义云主父，盖合君父而为一者也。）民为子女，臣则妾妇，不特倭幸之侍其君为妾妇之道，即殉节之义亦出于女人的单面道德。时至民国，此等思想本早应改革矣。但事实上则国犹是也，民亦犹是也，与四十年前固无以异，即并世贤达，能脱去三纲或男子中心思想者又有几人。今世竟言民主，但如道德观念不改变，则如沙上建屋，徒劳无功，而当世倾向，乃正是背道而驰，漆黑之感，如何可言。虽然求光明乃是生物之本性，谓光明终竟无望，则亦不敢信也。鄙人本为神灭论者，又尝自附于唯理主义，生平无宗教信仰之可言，唯深信根据生物学的证据，可以求得正当的人生观及生活的轨则，三十年来此意未有变更。《暑中杂诗》之《刘继庄》一首中有四句云：生活即天理，今古无乖违。投身众流中，生命乃无涯。此种近于虚玄的话，在我大概还是初次所说，但其实这也还是根据生物的原则来的，并不是新想到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看重殉道或殉情的人，却反对所谓殉节以及相关的一切思想，这也即是我的心中所常在的一种忧惧，其常出现于文诗上正是自然也是当然

1 《〈老虎桥杂诗〉题记》。

的事。”这还是“流氓鬼”使然，仍可溯源于《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亦即“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然而终于只得感慨“平生弄笔墨，妄想作法施。立言终空幻，半偈只自怡”¹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子曰》丛刊第三辑，有署名“王寿遐”的《〈呐喊〉索隐》一文，系周作人三年来首次发表作品。不过文中有意隐晦作者身份：“我的亲戚里边有一位方女士，她是鲁氏老太太的一个内侄女，又是义女，常在老太太那里居住，她知书识字，和老太太很谈得来，所以知道的事情很不少。有一回我们偶然谈到《呐喊》，她把里边有事实作背景的有些事情告诉我听，后来又说到《彷徨》里的故事，我都摘要记录在日记里，这些大概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此文有云：“欠了《子曰》一笔文债，无法偿还，心里老是惦记着。”可知乃系编者黄萍荪约稿。以后该刊又发表“王寿遐”的《红楼内外》、《红楼内外之二》、《北平的事情》²，此外《好文章》也登出“丁鹤生”的《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十鹤”的《希腊运粮记》（希腊妥玛格拉罗斯作）、“孟开舟”的《孔融的故事》，均系周氏狱中著译。涉及作者仍取“庾词”，如《红楼内外》³云：“我于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我出了课堂，却又进了办公室，当一名职员，与学生教员一直保持着接触，所以这以后的许多事情，如五四六三事件，八校教员索薪，以至三一八事件，我都在旁看着听着，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虽然大半有点忘记了，但约略记得的也还不少。”《北平的事情》⁴云：“我曾于北大滥竽充数，当学生与职员都有相当的年数。”这些文章通俗浅近，不再采用过去的“文抄公”写法，作者晚期风格，已见一斑。

周氏谈及已成围城的北平，有云：“北平的人心安定，总是好的。特别是各大学各学校决定不迁移，以学术机关立场论，都是很好很对的，虽

1 《丁亥暑中杂诗·乞食》。

2 三文“王寿遐”署名均手写制版，熟悉笔迹者自可看出作者何人。《红楼内外》发表前，在该刊预告作“从卯字号说起（又一北大掌故）”，《北平的事情》预告作“北平之思想山水人物”，或是先从狱中传出拟写内容，再著之笔墨。

3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子曰》丛刊第四辑，收《知堂乙酉文编》时，与《红楼内外之二》合并为《红楼内外》。

4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子曰》丛刊第六辑。

然自己觉得不大安全的要想逃走也是人情，也是可以原谅的事。教员学生都不是有钱的，而且弄学问的人原不该怕苦，也不见得生活更坏，那么茫茫如丧家之狗似的乱跑也正是可以不必的事吧。”似乎预示了以后他留下不走及北归回家；虽然此时仍在狱中，尚未面临该种选择。他又说：“实在中国知识阶级的传统太不行了，我曾见有人写过这个题目的文章，登在一个不大有人看见的非卖品的刊物上，简单的来分析过一回。他说历史上的士大夫本来都是皇帝的帮闲，或是帮凶，加上宋以来的道学，明以来的八股，做他技术与思想上的训练，这样就合成了他的性格，是中国特有的，至今虽然改名为知识阶级，实质上原是不曾有多少变化。在新文化运动的新潮里能打一个滚，出来还是一个穿西服的士大夫，为有钱有势的作帮闲。他们很捧过易卜生，不知在他的戏剧中有阿尔文夫人高叫‘群鬼’却正是自己的徽号，可谓滑稽之至。文中有一节云：这种传统微妙难灭正如微生物一样，它会隐伏着再出现的，如五四运动的角色，到了成为社会贤达的时候，一样的会把青年当猪崽卖，这是显著的事实。”¹所云“曾见有人写过这个题目的文章”不知属实与否，类似意思却正是他自己一贯所说。

周氏在为同监的胡逸民所著文稿写序跋时，再次谈到“三纲”思想与“殉节”问题，所论更其深刻：“三纲主义自汉朝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寿命，向来为家天下政策的基本原理，而其根柢则是从男子中心思想出来的，因为女人是男人的所有，所生子女也自然归他所有，这是第二步，至于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所以算是第三步了。中国早已改为民国，君这一纲已经消灭，论理三纲只存其二，应该垮台了，事实却并不然，这便因为它的主纲存在，势力还是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看孔孟书中并无臣子为君死节之言，汉朝虽重气节，却是侠义这一路，自是男子汉的立场，与后来的妾妇之道全不相同。大概由唐经过两宋这种思想乃见确立，根深蒂固，以至今日，一般男子平居畜婢妾，狎娼妓，视为故常，一旦有变故，自己无力庇护，唯期望诸妇女一齐自裁，免致昔所宝玩之物更落人手，以为旧主人羞，一面更可以博得旌表，以光耀门闾，此种心理无问今

1 《北平的事情》。

昔普遍存在，殆无可疑。君主对于臣民，责以守节死难，即系依据同一道理，社会上未必悉是尊王的人，唯以自己的男子中心思想为主，推己及人，自有同感，故对于未能恰合上述标准的臣民，也如看见不守妇道的女人一样，心里感到憎恨，说到底这与大义名分无关，实际上是有性的症结在作祟，所以往往无理性可讲的。”¹虽与彼此际遇密切相关，但他的“反礼教思想”聚焦到这一点上，是乃多年思考业已完成。

周作人说：“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近末期，独居里边虽然报纸可以潜入，但是没有人要留心这些。最受欢迎的乃是《观察》周刊，它的战争通信真是犀利透彻，令人佩服。这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²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监狱奉令疏散犯人，判除有期徒刑者准予交保释放。据龙顺宜说：“听说当年在南京的李振邦先生，在上海的尤炳圻先生，都为保释老人出了不少力，也花了不少钱。”³周作人遂于一月二十六日出狱。他的人生也再次出现“一个大转折”，在这一过程——包括随后客居上海及返回北京——中，外间视为他的“门生”又曾在伪北京大学和《艺文杂志》为其担任助手的尤炳圻帮助最大。出狱当日，周作人“口占了一首，题目是《拟题壁》，可是实在却没有题，只是记在心里，到了二月八日才把它记了下来”⁴，诗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自注：“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以后作者说：“这是赋而比也的打油诗，缺乏温柔敦厚之致，那是没有法子的。”⁵

1 《我与江先生》后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作，载胡逸民《虎牢吟啸》，香港上海书局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

2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

3 《知堂老人在南京》（一九八三年三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〇七期）。另据袁愈俭《汪伪政府垮台前琐记》云：“当时曾风传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要被释放，但始终没有执行。到了旧历年的前几天，仍不见动静，汉奸家属们着急了，由我的家属出面借了一辆卡车，载了一二百人到司法部请愿，但此时司法部已无人负责。后来打听到司法部长仍在南京，这批人又赶到司法部长家请愿。这次总算成功了。司法部长下令释放全部在狱中的犯人。家属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后，便纷纷跑到老虎桥监狱，这天正好是一九四九年初的阴历除夕，我同周作人、李圣五、陈君慧等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载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

4 《知堂回想录·狱中生活》。

5 同上。

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

—

周作人出狱当晚，借宿在马骥良家。次日下午由尤炳圻父子接往下关，同乘火车赴上海，历二十四小时才抵达。在《知堂回想录》里，他详细描述了此番“逃难的经验”。到上海后，即去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尤家，其时正是戊子年的除夕。“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¹关于这段生活，周氏说：“我住的地方是在横浜桥东首南岸，离桥只有一箭之路，桥上的电车声听得很清楚，这是一间朝北的小楼，窗外便是河水。这有两样好处，其一是和对面的人家隔得很远，凭窗眺望，看看水都可以，不至于有窥探闺房的嫌疑，朋友们谈天也无妨随便一点。其二是窗下潮水天天上落，我不常出去散步，看了也可以消遣。我自己不出去便只等客来，孺牛齐甘雪窗克安等人是常来的客人，反正来的

¹ 《知堂回想录·在上海迎接解放》。

多是黄河以南的人，也用不着硬说国语，谈的更是畅快。”¹所提到的“孺牛”即陶亢德，“齐甘”即徐淦；王古鲁、方纪生、康嗣群、金性尧、施蛰存、谢刚主等，亦与周氏来往较多。其中康嗣群、陶亢德两位，于周作人“复出”——尽管未能采用本名——出力尤多。有人描述对周氏的印象：“他的形象竟是如此渺小，不像想象中那么高大。刊登在《人间世》第一期的《五十自寿》‘京兆布衣’照相，的确有些太史公想象中的留侯模样。而时隔十四五年出现面前的竟是一个‘小老头子’。”²何炳贤、朱肇洛等均有馈赠，周氏亦常赴友人招饮聚餐。他还买了一副竹背骨牌，“后来就常用这骨牌，于那小楼上在四周暴风雨中，玩那古来传下来的‘打五关’的游戏”³，以消磨时日。当时有报道称：“知堂曾作久居上海之筹备，会谢刚主家有余屋，以友谊可减低项费，但至少需金三两。此数尚不难筹，合购置家具及迎春南来诸费用，计非一大条不办，则不易张罗，遂罢。”⁴或非虚构。又，周氏有云：“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皇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⁵

三月十九日周作人为唐令渊女士画作题诗五首，附于《老虎桥杂诗》之末，旧体诗写作遂告一段落。三四月间，经徐淦介绍，为张慧剑所编《自由论坛晚报》“未晚”副刊作文，署“鹤生”、“长年”，共发表九篇。不久报纸以他故停刊改组，周氏不复撰稿。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他于次日托尤炳圻致电北平家人，报告平安。自此乃有北归之念，然而须得做些准备。六月二十七日周氏“起手写文章”，七月四日抄毕，“寄废名信，附文八纸”，此即致周恩来的信，乃请废名设法托人转呈。这大概是周作人平生最后一次系统地介绍自己的思想。与此前文章中所说大同小异，却虚拟了一个不同既往的新的“语境”：“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

1 《横滨桥边》（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亦报》）。

2 周黎庵：《周作人与〈秋灯琐记〉》。

3 《知堂回想录·在上海迎接解放》。

4 迟红：《周作人决定北归》（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亦报》）。

5 《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七》。胡适去国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当系此前之事。

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前一方面——他自嘲为“拍马屁”——谈到自己与未来的社会制度及未来的执政者之间，思想上可能存在着的两处契合；而他之所以接受这一制度，即基于此。一是：“有一个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归结到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变更。我由妇女问题一角入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这见诸他早先所作《〈爱的成年〉》、《〈知堂文集〉序》等文章中，此后就《婚姻法》和妇女问题所发的一系列议论亦是同样考虑。二是：“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合一，打破过去统治界的传统空气，建立农民的质朴的作风，来推行政治，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大，的确不容易估计，至少与打倒封建独裁的武力相比不在其下，而且更为难能，因为这是开创的。”则是以自己所倡导的“道义之事功化”来加以理解，从而寄予期望。凡此种种，虽与中国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趋向一致，却不无作者个人的独特认识；尽管其所认识者，或与事实并不相符。后一方面——他自嘲为“丑表功”——针对“人家批判我，在抗战前说是有闲消极，在战后则是附逆与敌合作”，他说，“我的反礼教思想”上承王充、李贽、俞正燮之“疾虚妄”与“非圣无法”，而自己“后来行事有些与此相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戡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他在沦陷期一应言论，法庭上种种辩解，均可归结于此。至于所说：“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实已不限于一己之事。

此信发出，下文如何不得而知。而据胡乔木说，“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¹。周作人后来不止一次抄录此信，

1 胡乔木：《致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收《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五月出版）。

其中之一即冯雪峰所见者。王士菁曾说：“有一天，雪峰同志来到武进路三〇九弄十二号鲁迅著作编刊社，坐在我的对面，打开他的台灯，看一份材料，越看越生气地对我说：‘你看，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雪峰同志说：最近领导上转给他一份材料，是周作人为自己辩护的。”¹

七月十九日，“亢德以英文书一册见借”，此即英国韦格耳（Arthur Edward Pearse Brome Weigall）²一九三二年所著《莱斯沃斯的萨福，她的生活及其时代》（*Sappho of Lesbos: Her Life and Times*）。周作人于次日起手移译其中部分章节，八月四日编成《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萨波，此前他曾译作萨复、萨福或萨普福。韦格耳原著“把萨波遗诗之稍成片段的差不多都安插在里面，可以说是传记中兼附有诗集”³；周氏又将“萨波的原诗译文，一一校对海恩斯本的原文，用了学究的态度抄录出来”，列为附录。这位古希腊女诗人所作只剩断编残简，周氏此书之最大价值，或许正在于分别根据古希腊原文和英文提供了两种较为完全的译本。他说，“介绍希腊女诗人萨波到中国来的心愿，我是怀的很久了”，如今终于实现，“我对于此书觉得很满意”⁴。“书编成后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所云“公司的老板”即刘哲民。当初周氏系狱，郑振铎对其“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念兹在兹，如今乃有此举，周氏日后感慨：“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希腊女诗人萨波》署“周遐寿编译”，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出版。“遐寿”与“作人”同出“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希腊女诗人萨波》完成次日，周作人“与平白说定同行往北平”。——

1 王士菁：《关于周作人》（《南开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周作人的信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编者按云：“这是周作人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是林辰同志于一九五一年向冯雪峰同志借阅时抄下的，现在我们从林辰同志处抄得一份，发表于此。”应即是王士菁所言者。又，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收有周作人该信手稿照片，共八页。

2 通译韦戈尔。

3 《《希腊女诗人萨波》序言》（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作，收《希腊女诗人萨波》）。

4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

《亦报》文章有云：“……缘居停尤生且北去，殊未便独留其宅，乃同行。”¹从回平后的情形看，致周恩来来信此时或未得到明确答复。友人杨南克、王心笛、李小峰、龙榆生等赠送路费。八月十二日成行，十四日夜抵平，暂住太仆寺街尤宅，此亦早在计划之中，前引《亦报》文章即说：“尤某在平有住宅，知堂此去，仍寓居停尤生家中。”抵达次日，家人前来看望。旧日朋友、学生中，废名在生活上提供帮助最多。陈法正则为周氏作户籍铺保。据说，“这期间由孙伏园为之奔走探听消息。孙与沈衡山（钧儒）联系，告之周作人已回北京，问人民政府对周持何态度。沈衡山是建国后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早在民国初年在浙江省教育司时，即与周作人共过事。可是现在沈也不能做主。那么，当然就要由沈老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说，他（指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这样，周作人就回到了八道湾”²。十月十八日周氏返回家中，距离当初被抓走，已是三年十个月零十二天。八道湾十一号“日本投降后部分成了没收的敌产。前院正中三大间住着解放军的一个排，每天清早在院子里吹号升旗”³。周作人夫妇住后院西侧三间北房；周丰一一家先住中院西房（即“苦雨斋”），后来迁到后院中间三间北房。“唯书物悉荡然无存，有些归了图书馆，有些则不可问矣。”⁴

这里插说一段后话。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周氏“起草信稿”，次日“起草信稿了”。二月十八日寄致周扬信，有云：“现在关于半公半私的事，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已经直接送去，抄了一份信稿，附上请你一看。”所云“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即前此“起草”之“信稿”也。周作人说：“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成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全是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见了救

1 迟红：《周作人决定北归》。

2 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收《闲话周作人》）。按这里所述毛泽东语未必确实，“他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似是后来胡乔木向毛泽东的建议。又周作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记云：“上午遣丰一送致沈衡山信。”

3 徐淦：《忘年交琐记》（收《闲话周作人》）。按所说“前院”，实为中院。

4 《知堂回想录·后记》。

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这是人间的弱点，尚乞鉴原是幸。”过了六天，胡乔木报告毛泽东：“周作人写了一封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周作人致毛泽东信迄未披露。胡氏报告复云：“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示：“照办。”¹四月四日周作人得周扬信，次日往访周扬。十五日“起首拟文稿”，至十九日写完，“计二千七百字”。二十二日寄给在上海的周扬。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又“开始写文”，二十四日“誊清”，次日寄给周扬。两次所写或即为“悔过”，然而均未获通过。据楼适夷说，周氏“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领导上以为这样的自白是无法向群众交代的，没有公开发表”。不过楼氏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还要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²。

周作人说：“既然平安的到了北京，安静的住了下来，于是我要来认真的考虑我能做的工作了。我过去虽然是教书的，不过那乃是我的职业，换句话说乃是拿钱吃饭的方便，其实教书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那么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工作呢？想来想去，勉强说还是翻译吧，不过这里也有限度，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³以当时情形，其实惟此一途，不过倒应着自己五年前所说“愿折笔改业为译人”的话了。从此周作人就把“翻译的工作当作职业”，散文家的身份遂退居其次，甚至隐没不彰；若以翻译家而论，一生之中又数这最后十六七年成绩最大。虽然后来“给公家译书”，选目却基本不出他的兴趣范围，不少更是从前曾有译介或一再

1 胡乔木：《致毛泽东》。

2 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收《闲话周作人》）。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

谈论者。周氏曾说，“我的杂学”“有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¹。晚年多所翻译不妨视为一项“还债”之举，所译诸作亦已成为其整个文化构成或思想构成的有机成分。

卜居太仆寺街时，周作人已开始重新翻译英国劳斯(William Henry Denham Rouse)的《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Gods, Heroes and Men of ancient Greece*)，完成则在回到八道湾后。“全书约可十五万字，译稿自九月十三日起手，至十月廿七日译成，凡四十五日，其中还有十天休息，可以算是很快了。译好后仍旧寄给康君，由他转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承李蒂甘君赏识，亲予校勘，这是很可感谢的。”²巴金与康嗣群分别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总经理。这部题为《希腊的神与英雄》的译作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出版，乃是署名周遐寿的第一本书，——上距《希腊拟曲》面世，周氏已有十六年未出版译著了。劳斯原作问世于一九三四年，周氏次年即著文介绍，有云：“我喜欢这册书，因为如说明所云，著者始终不忘记他是一个学人，也不让我们忘记他是一个机智家与滑稽家。所以这书可以娱乐各时代的儿童，从十岁至八十岁。”³现在则云：“在英美人所做的希腊神话故事书中，这一册实是最好的。”⁴晚年更说：“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种感情。”⁵

不久，经陶亢德介绍，周氏开始为上海唐大郎编《亦报》撰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复亢德信，附小文六页”，二十二日首次刊出。据作者记录，前后寄稿近一千篇，发表九百零八篇，分别署名“申寿”、“鹤生”、“十山”、“持光”、“木寿”、“祝由”、“木仙”、“十仙”、“龙山”和“仲密”。其中某些篇章，用过“饭后随笔”的专栏题目。另有《儿童杂

1 《我的杂学》。

2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3 《〈希腊的神、英雄、人〉》(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苦茶随笔》改题《〈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

4 《〈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后附记》。

5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事诗》七十二首连载，署名“东郭生”，由丰子恺配画¹。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至三月二十七日，他还上海陈蝶衣编《大报》刊登文章四十四篇，署名“荣纪”。周氏经济负担甚重，预支翻译版税不敷度日。据说，他“全家差不多顿顿都是豆腐青菜”，自己“甚至教一个女学生补习英文挣点钱贴补家用”²。是以为小报写些短文，以增收入。——顺便提一下，周作人对报纸请丰子恺为《儿童杂事诗》配画并不满意，以后私下里说：“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里边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大概百分比要较好一点罢了。”³

周作人为《亦报》撰稿，多半是在翻译之余；此乃“为稻粱谋”之举，尽管仍具博学多闻，趣味盎然，平易朴实，简捷明快诸般特色，在其一生创作中，质量不仅不及前、中二期，而且逊于此后作品。内容或追忆往昔，或议论时事，或品鹭人物，或介绍风土，几乎无所不谈。此即如其所说：“若是平常小文章，如笔记随笔之流，本与小说不同，不列在文艺之内，而且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⁴至于写法则说：“我很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缩到五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随意抓住一个题目，开门见山的说出来，上下四旁有该说的说上几句，表明主意，随即收科，这是理想的写法。”⁵虽属笔记一类，却与此前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不同，很少抄引书籍，笔意颇近通俗。

总的来看，作者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过去的话尚且没有说完，现在的话还拿不准如何说好。他说：“我在《亦报》上写文章，本来自己定有

1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九日《亦报》。

2 徐淦：《忘年交琐记》。当时他在周家借住。

3 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致鲍耀明。

4 《关于身边琐事》（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亦报》）。

5 《文章的包袱》（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亦报》）。

两个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¹虽然“两个标准”力求不违当下尺度，但无论“有意思”还是“有意义”，因此而放弃“自己”并不算多，坚持“自己”亦不算少。当涉及“时髦话题”或使用“官方语汇”时，看似有意趋同，往往仍在宣扬一己之见。周氏身上那个“流氓鬼”似乎并未完全隐退。譬如对于“近年来盛行扔包袱这一句话”，他即颇表赞同，认为“思想的抽屉里的废物”“并无可以利用的地方”；接着所言“例如说乌鸦反哺、鸱鸢食母、百鸟朝凰、红裙捕蚺蛇等故事，一看只是非科学的，实在都从封建思想生根，可以通到三纲主义上去，虽然觉不出压在背上，却是潜伏的霉菌，恐怕有更大的害处”²，归结为自己向来主张的“伦理之自然化”。而他讲“圣人为什么可尊贵，这便因为他有道义，有功德，换句话说即是理论与实践合一，孔孟推尊禹稷，正为他们为人民服务，不许一个饿死淹死，并不是为的能谈性与气，孔孟自己也主张黎民不饥不寒，这是中国人的根本思想。后来走了岔道，出了一种官派的圣人，即士大夫，以圣道猎官，自汉迄今二千余年；又一种和尚派的圣人，即道家，谈玄说理，自宋迄今一千余年，终于归并，主宰政治与学术，为封建制度作支持，于是圣人之名扫地矣。于今要缀缉圣人遗编，便已一无是处，重要的是在整理批判，还他一个本色真相出来，这就是一种功德，是现今知识阶级中人所应当做的”³，又归结为“道义之事功化”。

周作人曾表示自己“最厌恶士流”，这又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搭上界了，然而所讲的还是自家的道理：“我们知道要为人民服务，但是为什么呢？这就少去研究它，岂不是因为自己回到人民里面去了的缘故么，所以为人民服务，也即是为自己服务。从前的文人是专给人家服务的，好像是吹鼓手，谁家有好事，他就去应了婚丧吉凶仪注的规定，分别奏乐，取得工资，因此有帮闲之名，也不是冤枉。现在大家都翻了身，文人也自然与前不同了，他所会的只是吹奏，那么当然还是吹鼓手，不过他不再雇给人家；甚至也不雇给人民，他乃是人民中之能吹奏的，他感受到人民的

1 《拿手戏》（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亦报》）。

2 《整理抽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亦报》）。

3 《经学史的教训》（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二日《大报》）。

喜怒哀乐，那么的吹奏起来，他一面是自己要吹，一面也正是人民所要他吹的。换句话说，即是文人翻身了，他不再是帮闲，已经回复了人民的地位，再从这里出发去发挥他的本领，为人民服务与尽自己的责任，便成为一元的了。”¹如果说前引关于“中国人的根本思想”的话可以溯源于《中国的思想问题》，这里所说则与《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相一致。此时他的某些说法，譬如“赞成大团圆”，或与早年见解不无矛盾，却是由四十年代初那几篇“较为重要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发展而来：“中国人看重现世，要改善实生活，把人与人相处的关系弄好，反对残害破坏，信赖公理正义，这与新民主时代很相适合，所以大团圆思想虽是幼稚，却是比近代怀疑的个人主义思想要好得多。”²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使得“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的周作人颇受鼓舞。他说：“婚姻法的发布是中国本年的一件大事，这奠定男女平等的基础，过去封建社会中的两性间的片面道德将由此而逐渐打破了。”³希望以此为契机“把封建道德根本的推倒”：“封建道德简单的说即是三纲主义。君为臣纲的一项在辛亥革命后名义上是倒了，但变相的仍是存在，直到法西斯的蒋帮和地主都解决了，这才算是消灭。父为子纲比较的不成问题，自然逐渐变化，又有夫为妻纲的势力最为深厚，很不容易拔除，至今还在作怪。为什么呢？因为男尊女卑的思想于男性为有利，一般的男人往往抵抗不住它的诱惑，无意识地跟着它走，虽然别的思想方面相当明白。”⁴这又回到他曾经“梦想”过的“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了。与周作人此时一再“上书”相一致，他写这批文章，也是以为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真的存在着相通之处，共鸣之点。这与其说是曲解，不如说是误解。涉及现实问题，也就难免盲目乐观。以“时文”观之，自然不切合实际；其意义还在于一以贯之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思想。

1 《文人与吹鼓手》（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亦报》）。

2 《赞成大团圆》（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亦报》）。

3 《重婚与离婚》（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亦报》）。

4 《婚姻法与女干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亦报》）。

周作人这批文章中最具价值的，当数《鲁迅在东京》¹、《百草园》²、《补树书屋旧事》³、《〈呐喊〉衍义》⁴等几组有关鲁迅之作，以及与鲁迅稍有牵连的《学堂生活》⁵。这都是比较完整的回忆录，不仅提供了鲁迅早期生活的宝贵资料——按周氏自己从前的说法就是“我所知道已为海内孤本”⁶；还涉及鲁迅周围的人，所处的环境，以及更远的背景。就中显然最为着力的《百草园》，背景本身似乎更重要，有如作者所说：“园属于一个人家，家里有人，在时代与社会中间，有些行动，这些都是好资料，就只可惜我们不去记它，或者是不会记。……说得小一点，那么一个园，一个家族，那么些小事情，都是鸡零狗碎的，但在这空气中那时鲁迅就生活着，当作远的背景看，也可以算作一种间接的材料吧。说得大一点呢，是败落大人家的相片。”⁷这其实是为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写的一本“家传”。至于强调所写“内容以事实为主，不杂议论”⁸，则是秉承过去所说“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事实，并不是普通《宦乡要闻》里的那些祝文祭文”，较之当年更显得不同凡响了。

周作人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日记云：“得高唐六日笺，云《亦报》四月起与《大报》合并，又将有所改变，殆可以不写矣。”“高唐”即唐大郎。自此遂不再投稿。果然十天之后，“得高唐信云《演义》已停止刊登了，可知少有人读《呐喊》也。”周氏在《亦报》发表文章，截止于该年三月十五日之《〈呐喊〉衍义》第二十九节《九斤老太》。《〈呐喊〉衍义》“虽然只发表了极小一部分，但仍是继续着写”⁹，于三月二十四日完成。三十日起手写关于《彷徨》和《朝华夕拾》部分，四月九日完成，统名《〈彷徨〉衍义》。作者说：“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纪事实，本来与写《百草园》

1 共三十五节，连载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亦报》。

2 共九十四节，第一至五十九节和第六十一至六十二节连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日《亦报》。

3 共十五节，连载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二月二日《亦报》。

4 共九十一节，前二十九节连载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亦报》。

5 共三十四节，第一至二十节和第二十四至二十七节连载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十月二十六日《亦报》，未发表的十节今已不存。

6 《关于鲁迅》。

7 《关于百草园》（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8 《〈故家〉后记》（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日作，一九五五年八月《鲁迅的故家》印行第二版时加入）。

9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总序》（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作，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是一样的，不过所凭藉的东西不同，一个是写园及其周围，一个是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时地。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些物事特别是属于乡土的，土物方言，外方人不容易了解，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了的，也就所知略加说明。”以上两路，可以说是“就实说实”和“就虚说实”，分别承继十几年前写的《关于范爱农》和《关于阿Q》；而南京狱中所作《〈呐喊〉索隐》，实为两种“衍义”之雏形。

周氏有关鲁迅之作，发表时即有困难，谋出版复告“搁浅”。不意另外遇着一个“解人”。据刘哲民说：“建国初期，研究鲁迅之风很盛，但除了一部《鲁迅全集》和上海出版公司影印的《鲁迅日记》之外，有关资料很是缺乏，冯雪峰同志认为唯一能够提供鲁迅原始资料的人是周作人，就要求上海出版公司做这一工作。我和唐弢同志都先后到了北京，因此就去访问周作人。告诉他雪峰提出的要求，并希望他不用旧的笔名。他当时的写作找不到出版机构，我们要求他写并为他出版，他当然很高兴，同意我们提出的意见。”¹一九五三年三月与一九五四年四月，《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别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列为“鲁迅研究资料”之一、二，均署名周遐寿。前者包括《百草园》、《园的内外》、《鲁迅在东京》和《补树书屋旧事》，后者包括《〈呐喊〉衍义》、《〈彷徨〉衍义》、《旧日记里的鲁迅》和《学堂生活》。两本书问世后颇受欢迎。一九五五年，《鲁迅的故家》更有了日译本（松枝茂夫、今村与志雄合译，筑摩山房出版）。一九五六年四月，《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五月，周作人根据英国倍因的《哥萨克童话与民间故事》（*Cossack Fairy Tales and Folk-Tales*）和《俄罗斯童话》（*Russian Fairy Tales*）选译了《乌克兰民间故事》和《俄罗斯民间故事》。两部原著分别出版于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二年。周氏说：“介绍民间故事是用不着多说话的。民间文艺即是原始的文艺，歌谣是最古的诗，故事是最

¹ 刘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收《闲话周作人》）。

古的小说，尽管有人加以轻视，它的地位却总是确定实在的。这本是民众集体创作，不经过刻板纪录，纯是口耳相传，所以生动流畅，有它活泼的生命，内容与形式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这一句名言用在这里可以说正是恰好。”¹这一题目为其关注已久，属于“我的杂学”范畴。适经柳存仁（即柳雨生）介绍，徐少眉主持的香港大公书局有意印行周译，遂以二书与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三年一月，《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乌克兰民间故事》分别由该书局出版，署名知堂。徐氏“对这两册民间故事电汇给先生三千元港币的稿费，这在当时算是较大数目”²。

二

时间倒退回去，“一九五〇年一月承蒙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君和秘书金灿然君的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来是来叫我翻译书，没有说定什么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过了几天郑西谛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本，我便根据了这个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这本商伯利（Chambry）本的《伊索寓言》共计三百五十八则，自三月十三日起至五月八日止，共计两个月弱，译的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六十四条，可以说是还可满意的”³。译稿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周氏说：“现在

1 《〈俄罗斯民间故事〉序言》（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作，收《俄罗斯民间故事》）。

2 柳存仁：《知堂纪念》（收《闲话周作人》）。胡适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到致杨联陞信云：“我近来收集周作人一生的书，已近八九册，他的最近两部书是《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及《乌克兰的民间故事》，已够可怜的了。（但序例里尚无肉麻的话，也没有引证马、列诸大神）你信上说的周遐寿的两书，我还没有见到，当托香港朋友代为访求。”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又，叶圣陶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记：“饭后两时，偕乔峰、灿然访周启明于八道湾。启明于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拘系于南京，后不知以何因缘由国民党政府释出，居于上海，去年冬初返居北京，闻已得当局谅解。渠与乔峰以家庭事故不睦，来京后乔峰迄未往访，今以灿然之提议，勉一往。晤见时觉其风采依然，较乔峰为健壮。室中似颇萧条，想见境况非佳。询其有无译书计划，无确定答复，唯言希腊神话希腊悲剧或可从事，但手头参考书不备，亦难遽为。盖其藏书于拘系时没收，存于北平图书馆也。谈四十分钟而辞出。”

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乃是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之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些古来的动物故事，像一切民间文艺一样，经了时代的淘汰而留存下来，又在所含的教训上可以想见那时苦辛的人生的影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贵重的资料。”¹虽云“给公家译书”，出版总署自己不办出版，译稿被安排给开明书店，直到一九五五年二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〇年七月，周作人开始重新翻译《书库》。本文十年前曾经译就，只差注释未及写完；现在从头译起，原稿或已遗失。历时十一个月完成，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云：“此书再译作注竟成，亦可喜也。信子为买白酒来饮之。”距离最初动手，已有十八年了。计本文、注释各十万字，仍题为《希腊神话》²。周氏说：“我们希望有一册希腊人自己编的神话书，这部《书库》可以算是够得上理想的了，有那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给小孩们看的，如今有了劳斯的书，也可以充数了。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³后来又有申说：“关于希腊神话，我曾经有这样一个计划，即甲 译希腊古人所作的，乙 译英、美人的新作，丙 则他们写了给儿童们看的，到现在只成功了甲、丙二项。”⁴

《希腊神话》刚刚完成，“得开明回信属译希罗多德《史记》”⁵，遂于七月动手移译。此即《历史》(Herodotus's *Historiae*)，十几年前周氏所云“赫洛陀多斯怕太多”者。然而“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开明通知因为改变营业方针，将专门出青年用书，所以希罗多德的翻译用不着了，计译至第二卷九十八节遂中止了”⁶。周氏与出版总署及开明书店合作将近两载，虽然支领报酬，译作却无一面世，《史记》更半途而废，已完成部分约十万字，现已亡佚。

另一方面，周作人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日记云：“罗念生来访，邀参加为天下图书公司翻译悲剧工作，约以明年。”十月十八日云：“罗念生来，携来欧利披台斯书三册，约定翻译从下月起。”十月廿二日云：“下午至天

1 《关于伊索寓言》(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作，收《伊索寓言》)。

2 保存下来的一份译者自撰目录中，题为《原本希腊神话集》。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

4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致鲍耀明。

5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九日日记。

6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

下图书公司，与公司葛一虹、郁文哉及罗念生、缪灵珠共谈译事。”约定缪灵珠译埃斯库罗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周作人译欧里庇得斯。此虽系出版方约稿，并预付版税，但翻译希腊悲剧，确为周氏愿做之事；三大悲剧家中，他又对欧里庇得斯最为重视。从前著《欧洲文学史》，即强调欧氏“思想卓绝，不能为世俗所赏”，“于神人行事，多所置疑”；还曾节译《忒罗亚的妇女》(Trôades)¹片断，强调作者“虽然生于二千三百年前，但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使得我们读他如对当代的大师，发生亲密之感”²。从事此项翻译，在他还有另一目的：“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与利益的。”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开始译悲剧”，因为罗念生早已译出欧里庇得斯四种剧本，周氏的计划是翻译其余十四种。起手译的是《赫卡柏》(Hekabê)，于次年七月完成。七至八月完成《圆目巨人》(Kyklop̄s)。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四月完成《在奥里斯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 en Aulidi)。周氏对于羊人剧《圆目巨人》尤感兴趣，有云：“悲剧是从宗教剧分化出来的艺术，而在分化中表示出关联的痕迹的乃是这宗羊人剧了，在这一点上这唯一保存下来的剧种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离开了这些问题，单当它一个笑剧来看，也是足够有趣的了。”⁴

周作人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一日日记云：“晚冯君培来访，谈译书事，大抵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悲剧译事。”八月二十九日云：“得人民文学社通知云，伊索及神话稿已由开明移交，此事甚可喜，总之已脱出了私商的土牢矣。”给朋友写信也说：“弟之译书正是家庭手工业，但间接亦于国家有用。以前两年全与私商(书估)打交道，但现今那些货物(译稿大小五部)悉已由人民文学社收购，为此不但将来有出板之望，且亦足见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价值，总算不为白费，私心窃以为喜也。”⁵周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选目系出版社与之商议决定，至少是他可以接受的，更多则是他希望翻译的。

1 通译《特洛伊妇女》。

2 《忒罗亚的妇女》(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八号，收《永日集》)。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4 同上。

5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龙榆生。

周氏说：“自此以后我的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是帮助翻译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这是极重要也是极艰巨的工作，却由我来分担一部份，可以说是光荣，但也是一种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¹一九五二年六至九月，完成欧里庇得斯著《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继以白话文再次据J. Curtin英译本翻译显克微支著《炭画》，于十月完成，收入与施蛰存合译的《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选》，一九五五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完成欧里庇得斯著《伊翁》(Ion)。三至七月完成《海伦》(Helenē)。七至十一月完成《希波吕托斯》(Hippolytos)。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得法院传票，明午十一时问话。”八日，“十时后乘电车往法院，等候几五十分钟，至十二时半问毕，仍以电车回。”二十二日，“得十九日法院判夺政治权利。”周氏对此的反应，仍然相当平静。——此前两年，他在自己将满六十八虚岁时已经写道：“不知今日为可祝耶，为可诅也。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先君歿于三十七岁时，祖父卒年六十八，但也在诞日前半年余，今乃过之，幸乎，不幸乎。庄子述尧对封人之言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是很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日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虽然在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极好的事，不过其利益只在个人而已。”²类似意思，其实将近十年前他已说过：“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向于为人的，为儿孙作牛马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他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³

周作人自此成了管制对象，住地派出所不时传问、令写材料；然而上述判决却未影响他翻译、写作和出版作品。得知判决当日，他开始翻译欧

1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2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记。

3 《记社逢辰君的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求是》第一卷第七期，收《立春以前》）。

里庇得斯著《厄勒克特拉》(Elektra)。不久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阿里斯托芬¹著《财神》(Ploutos)，“嘱先翻译，盖因明年世界名人纪念中有此作者，将出板也。”²周氏看来，“那是一篇很愉快的喜剧，希腊人相信财神是瞎眼的，所以财富向来分配得不公平，这回却一下子医好了眼睛，世上的事情全部翻了过来，读了很是快意。”³于次年一月起手，自称“近日别无奢望，但愿此本喜剧得完成耳”⁴，至三月译竣。合作翻译阿里斯托芬的罗念生和杨宪益均提了校阅意见。在周作人看来，“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⁵，而罗氏“所提意见多庸俗粗糙，只可选择采用之”⁶。——罗念生认为人地译名当依英美读法，周作人则主张“名从主人”；此外则如罗氏所说：“周译注解很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⁷当时安排周、罗二人相互校订译稿，上述分歧几乎贯穿翻译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始终，周氏称之为“令人厌恶的苦差事”⁸。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财神》收入罗念生等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周作人“给公家译书”后作品首次面世，该篇署“周启明译”，在他实际上是“以字行”，应该说是最接近于本名的了。以后出书，除《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沿用“周遐寿”外，均署这个名字。

校订罗译之外，此前此后周氏还为他人校阅多部日文或英文译稿，包括周丰一译小岛进等著《反抗着暴风雨》⁹、黑井力等著《明天》¹⁰、江马修等著《血的九月》¹¹、大田洋子等著《广岛的一家》¹²、德永直著《妻呵，安息吧》¹³、太宰治著《惜别》¹⁴，康嗣群译阿慈塔洛斯著《风往这

1 周氏认为“正译应作阿里斯托法涅斯”(《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2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4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日记。

5 一九五四年六月六日日记。

6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日记。

7 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悲剧》(收《闲话周作人》)。

8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

9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

10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出版。

11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五月出版。

12 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

13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出版。

14 未出版。

边吹》¹、米克沙特著《圣彼得的伞》²，傅仲涛译小林多喜二著《不在地主》³，萧萧译高苍辉著《箱根风云录》⁴、德永直著《静静的群山》⁵等，有些是亲友帮忙，有些则系出版社委派。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洁若说：“一次，萧萧笑嘻嘻地告诉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对人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一不屑的意味。”⁶一九五四年四月，周作人起手翻译日本狂言，最初只是“聊以消遣而已”⁷，大约是对“令人厌恶的苦差事”的一种调剂；以后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接受。狂言为周氏素所喜爱，现在所说：“狂言的特质是滑稽，但是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显得俗恶，特别很少色情的成分。正当的民间文学是壮健的，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⁸与早年看法正是一贯。该项译事于七月完成，除对旧译十篇略作修订外，新增补计十四篇。周氏称：“关于日本狂言的翻译，也是一件高兴的事。”⁹次年四月，《日本狂言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周作人完成欧里庇得斯著《厄勒克特拉》。十一月至次年八月完成《俄瑞斯忒斯》(Orestes)。一九五五年一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更改稿费结算办法，每月预支二百万元(旧币制)，自此周氏始有固定收入，不似此前计件获酬。《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的编辑出版已经列入日程，遂又花费许多工夫，重新校订自己前此所译各剧以及罗念生的译作，更须遵命删减所写注释，乃至“甚不快”¹⁰。幸而又得有一桩“比较觉得自己满意”又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¹¹的译事，以为调剂：五月十三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接洽《浮世風呂》等译稿也”。周氏于月底动手翻译，十月完成，译本名《浮世澡堂》。他曾说式亭三马所著《浮世澡

1 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

2 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出版。

3 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震先译《不在地主》，或即此书。

4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

5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出版。

6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一九九〇年《读书》第六期)。

7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日记。

8 《〈日本狂言选〉引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作，收《日本狂言选》)。

9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

10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

11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

堂》及《浮世理发馆》“是日本有名的滑稽小说，也是我所爱读的书”¹，特别强调：“这‘滑稽本’起于文化大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²并将其归在“我的杂学”之列。《浮世澡堂》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只译出了初二两编四卷，因为分别叙述女澡堂和男澡堂两部分的事，以为足够代表了，还有三四编共五卷，译注太是麻烦，所以不曾翻译，想起来很觉得可惜”³。周氏以后尚说：“阅旧日译书《浮世澡堂》，亦觉不恶，对于昔日工作觉得满意，可见退步，但亦是实情，无鸟村之蝙蝠，亦是可悲。”⁴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周作人完成欧里庇得斯的《赫刺克勒斯的儿女》（*Hērakleidai*）。一九五六年一至二月完成《请愿的妇女》（*Hiketides*）。四至六月完成《疯狂的赫刺克勒斯》（*Herakles*）。六至八月译出《腓尼基妇女》（*Phoinissai*）本文，十二月刚起手写注释，“就生了病，由于血压过高，脑血管发生了痉挛，所以还有一篇未曾译，结果《酒神的伴侣》仍由罗念生君译出了”，《腓尼基妇女》的注释亦成于罗氏之手。周作人久患高血压病，自此休息将近两年。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月和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三卷，其中有十三种系周氏人所译。“这十三部悲剧的本事有五种是根据特洛亚战争，两种是讲阿伽曼农王的儿子报仇，就是这战事的后日谈，可以说是特别多了，两篇是关于赫刺克勒斯的，两篇是关于‘七雄攻忒拜’的，这些都是普通的童话。”⁵此乃其特别兴趣所在，所作注释篇幅几与原作相埒，亦可视为有关希腊神话的一项研究。然而苦于与罗念生及出版社的分歧，全稿校毕，遂云“俗事算了矣”⁶。

自从《亦报》“腰斩”《〈呐喊〉衍义》，周作人久已不发表作品了。

1 《〈浮世風呂〉》（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作，收《秉烛谈》）。

2 《谈日本文化书》。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

4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日记。

5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6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日记。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间，他曾为《大公报》写过一批稿件，包括二十八页的《龙是什么》和二十页的《十山笔谈》。寄给该报北京办事处潘际垌，无一发表。潘氏退还讨论汉字的《十山笔谈》时曾云“太难”¹。周氏还向《人民日报》投寄关于《内经》的杂文，也遭退稿。又曾徇张次溪之请作文，自忖“未知能写得好歹”²，亦无结果。这些作品，除《尤是什么》和《十山笔谈》外，均已亡佚。《财神》译出后，本来安排先在《剧本》发表，周氏特地为此撰写一份“简注”，然而“不知为什么却终于没有实行”。在他看来，“其实这篇《财神》是够通俗可喜的，其不被采用大约是别有看法的吧”；晚年述及此事，犹自“不禁又提起旧时的一种不快的感觉来”³。

一九五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的命运似乎忽然有了转机，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不无关系。七月四月，周氏应邀参加北京市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不久中国文联又安排他与身份相当的钱稻孙、王古鲁一起出外旅行，于九月二十三日前往西安，历十九日始归。回京后受到中国文联宴请，并于十月十九日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后还被安排去官厅水库参观。据中国文联工作人员佟韦说：“我负责周作人的工作，是受周扬、阳翰笙、阿英三同志委派进行的。周扬同志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他是这一工作的决策者，没有他的指示文联不会与周作人接触。这个工作开始于一九五六年秋，结束于文联整风的一九六四年，大约七年之久。”⁴其间中国文联在生活上对周作人亦有所帮助。

一九五六年七月，《旅行家》杂志刊出周作人署名“周长年”的《关于花生》一文。此后两年间，他共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遐寿”、“启明”、“十堂”、“长年”，均系所用笔名。“长年”或即“遐寿”，或为绍兴话“长期雇工”，亦即其一再讲的“为人与为工作”之意是也。时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读书月报》、《文汇报》、《陕西日

1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日记。

2 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日记。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4 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收《闲话周作人》）。

报》、《工人日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均约他撰写纪念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一九五七年三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自我评价说：“这比起我以前所写的或者有地方还较为得要领些，不是那么的散漫，有地方供给了些新的事实，虽然这分量不多。”¹周氏曾说“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²，此书“较为得要领些”和“供给了些新的事实”之处，恰在于此。作者又将从前所写《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略作删改，收入书中，重申“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人去看，不是当做‘超人’”。他再次强调自己“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一律以报告事实为主”³，在直接收入书中的《〈阿Q正传〉里的萝卜》中更明言“八股与事实总是有点不同的”。而私人通信里的某些议论，譬如：“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⁴实际上是出自同一立场。

《新民报晚刊》（后改名《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以及《人民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读书月报》等处，均曾刊登周作人的作品。他写作较多，自与因病休养、停止翻译有关，也有赖于政治环境一时宽松。前此虽有文章面世，但多登在消闲小报，谈不上重返文坛，现在倒是几乎“呼之欲出”了。——胡乔木曾指示“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⁵，此事如今已经提上日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见访，嘱准备编选杂文，拟于下年度为刊行自选集数册，政府之好意甚可感，唯因无自信，自选殊感困难，幸时日尚宽，可以慢慢打算耳。”⁶一九五七年七月，《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发表了署名“启明”的《梅兰竹菊》等三篇文章，在散文一栏排在沈从文之后，老舍、凤子、端木蕻良

1 《〈鲁迅的青年时代〉序言》（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作，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2 《关于鲁迅》。

3 《〈鲁迅的青年时代〉序言》。

4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致曹聚仁。

5 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

6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致松枝茂夫。

等之前，编后记有云：“多年来一直没动笔或很少发表作品的老作家，在这期上出现得比较多，特别是诗歌和散文部分，这个特点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老作家们写作热情的高涨，当然是文坛的喜讯，相信他们在‘鸣’、‘放’方针的鼓舞下，会更加积极的写作，把他们的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而我们这些编刊物的，除了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以外，也愿意用我们所能尽到的力量，支持各方面老作家的创作。”周氏显然在所说“老作家”之列。然而反右运动随即发生，“有可能”也就变成不可能了，旧著重印亦成泡影；尽管一时并未妨碍他继续发表作品。

相对于先前“《亦报》随笔”之驳杂参差，周作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显得相当纯粹。他曾与“闲适”结下不解之缘，批评者“其一是说我所写的都是谈吃茶喝酒的小品文，是不革命的，要不得。其二又说可惜少写谈吃茶喝酒的文章，却爱讲那些顾亭林所谓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与文学离得太远”，他自己辩白说：“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¹现在则几乎只写闲适文章了，尤以“讲到名物与民俗”²者为多；周氏晚期散文较之早、中二期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此。他似乎对于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定位”。此外放弃了“文抄公”写法，而且通体采用白话，基本消除了原来分量较重的文言成分。当然所有这些，在他与其说主动如此，不如说被动使然。比起早期的平和冲淡和中期的苦涩丰腴，晚期散文似乎更加朴实，平易，随意，更趋通俗化，往往呈现出一种明朗宁静、宽容平和的老人心境。至于“我的思想和意见”，只是偶尔流露而已。譬如讲到“古人观察事物，常有粗枝大叶的地方，往往留下错误，这样地方后人当纠察补正，不宜随和敷衍，继承下去”³，仍归结到对“自然物之伦理化”的批判。其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与“百花齐放”多有合拍：“我深深感觉到，以前从人民的智慧创造出那许多喜剧出来，足够我们后人的学习。我虽是不爱看京剧，只就我从地方戏看来的结果，已经使我相信，例如《时迁偷鸡》，《活捉张三》，这些戏编得很好，明朗而多趣。我们万

1 《两个鬼的文章》。

2 《《知堂乙酉文编》题记》（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

3 《乌鸦与鸚鵡》（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新民报晚刊》）。

不可以一知半解去动手，损坏了本来的好处。我们第一要放下手里捏着的鞭子，信赖人民和艺员，不可以改造者自居。文化部这回将禁戏完全开禁，这可以算是贤明的举措，我希望大部分都能够谢去清规戒律，恢复本来的面目吧。”¹鼓励“鸣放”之际，周氏更在《谈毒草》²中说：“思想有种种区别，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发表出来给大家批评一下子，看出是非，至于辨别是非的责任，那主要是在批评家身上了。现在如提倡‘百花齐放’，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好像预先有自己承认是毒草，便不开放似的，天下有这种事么？既然齐放，也总得让它放了出来，随后你再研究它一下子，下判语道这有问题，随即展开讨论，如果大家以为这花开得不好，那就算是不好。——开是开了，结果开得好不好是别一件事，这样才与‘百花齐放’的原则不相违背。”这在他大概算得上是一篇“正经文章”了。

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两年，周作人有多种译著出版或重新出版。前面提到的之外，所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一九五七年八月和九月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三月，该出版社又出版了他校订的《明清笑话四种》³。此系《苦茶庵笑话选》之修订本，补充了赵南星的《笑赞》，《〈笑府〉选》和《〈笑倒〉选》两部分则略有删节，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完成。新作引言有云：“这集子里所收笑话的著述者，有赵梦白那么的贤哲，也有石天基那么的庸俗人，他的自称《传家宝》全集的格言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但统观全部笑话，却都说的不差：我们只看那《笑赞》第五一的‘打差别’，与《〈笑得好〉选》第八的‘割股’，对于强有力的封建道德，特别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项，敢于举起指头来，实在是很难不容易的事，即此可以看出中国笑话里的明朗性与健康性来了。”重视思想意义虽属“时代要求”，其中隐约流露的却是“我的思想和意见”。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月和一九五八年一月，所译《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希腊神话故事》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末一种即《希腊的神与英雄》。惟独所编注的《绍兴儿歌集》运气不济。绍兴童谣稿本搁置已久，原拟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

1 《时迁偷鸡》（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新民报晚刊》）。

2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3 原名《明清笑话集》，《明清笑话四种》系出版社所改。

时编好印出；“但是我去年病后，精神不继，不能照原定计划来记述，现在只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¹，于一九五八年八月起手，九月完成。不想时过境迁，“可是现今因为兴起‘新民歌’运动，这是旧时代的儿歌，它的出板不能不稍要等待了。”²——周氏之“不合时宜”，乃自此始。该书稿后来散失。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周作人“寄区人民法院申请书”；二十八日，“得西四法院卅日上午九时往院通知”；三十日，“往西四法院，恢复选举权未成，亦听之”。他“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成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的幻想，再告破灭。——可以引为对比的是，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得民政局通知，信子国籍承认事已由内务部批准”。周作人则能以此身份隐晦未明地从事翻译、写作，更加隐晦地发表一己意见。

三

一九五八年十月，周作人重又从事翻译工作。“不过那所译的是日本古典作品，并不是说日本的东西比希腊为容易，只因直行的文字较为习惯些，于病后或者要比异样的横行文字稍为好看一点也未可知。”³首先译介的是安万侣的《古事记》。早在二十年代，周氏已经翻译了该书的部分章节⁴，一九三四年访问日本时又说：“我现在想翻译《古事记》。……这回翻译想根据《古事记》原文，译为现代的白话。”⁵直至“解放以后，介绍世界古典文学的运动发生，日本部分有《古事记》一书在内，这才又提了起来”⁶，于

1 《〈绍兴儿歌集〉引言》（一九五八年四月作，抄录在《童谣研究手稿》中）。

2 《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

4 《〈古事记〉中的恋爱故事》（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语丝》第九期，收《陀螺》）、《汉译〈古事记〉神代卷》（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八日、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十日《语丝》第六十五、六十七、六十九、七十一、七十八期）。

5 《谈谈日本文学》（顾志坚据一九三四年《改造》第十六卷第九期《周作人先生旅舍之一夕谈话》译出，载一九三四年十月《青年界》第六卷第三号）。

6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

一九五九年二月译完。尽管他说，“把《古事记》当作日本古典文学来看时，换句话说，就是不当它作历史看，却当作一部日本古代的传说集去看的时候，那是很有兴趣的”¹，然而“在那时候我对于日本神话的兴趣却渐渐衰退，又因为参考书缺少，所以有点敷衍塞责的意思，不然免不得又大发其注释癖，做出叫人家头痛的繁琐工作来了”，是以“这部书老实说不是很满意的译品”²。一九六三年二月，《古事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是周作人生前面世的最后一本译著。

一九五九年三月，周作人起手翻译式亭三马所著《浮世理发馆》（《浮世床》），旋得出版社函，要求先译石川啄木的歌选。周氏说，“其实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译过他的短歌二十一首，长诗五首，后来收在《陀螺》里边。”一九五六年，又曾向出版社提出相关翻译计划。然而现在却“译得很不恰意”：“他的短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与他的那风暴的生活和暗黑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几乎每一首歌里都有它的故事，不是关于时事也是属于个人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当初翻译几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译出来的时候，有些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觉得不好译，所以搁下了，现在一古脑儿译了出来，反似乎没有什么可喜了。”³所译包括石川一九一〇年出版的歌集《一握砂》（《一握の砂》）、一九一二年出版的歌集《可悲的玩具》（《悲しき玩具》），组诗《叫子与口哨》（《呼子と口笛》）和论文《可以吃的诗》（《食ふべき詩》），于当年五月完成。以后出版社又“嘱加译数首，皆俄文所有”⁴，周氏“后审性质不同，因

1 《〈古事记〉引言》（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作，收《古事记》）。

2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

3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周氏家属还保存未发表的《悲哀的玩具》译稿一册，共一百八十节，翻译时间不详。

4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诗歌集并非诗选”，未予应允。题为“诗选”的部分遂改由卞立强翻译，篇幅不及全书十分之一。一九六二年一月，《石川啄木诗歌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氏称：“是集编辑不良，故无可取。”¹

译完石川歌集后，周氏继续翻译《浮世理发馆》，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完成。“凡两编五卷，乃是全书”，属于“在翻译中间也有比较觉得自己满意的”之列。八至九月，再次补译《狂言选》。“此次增补系应出板社的嘱托，命将苏联译本的‘狂言’悉收容在里边，经查对俄译本三十九篇中有五篇已经有译文，乃将余下的三十四篇一一按照篇目译出补齐，又将额外的指定的一篇《左京右京》也翻译了，这才交了卷。”²对于所译几种日本古典作品，周氏尝自我总结说：“不过我有一种偏好，喜欢搞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有些正经的大作反而没有兴趣，所以日本的《古事记》虽有名，我觉得《狂言选》和那《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更有精采。”³然而《浮世理发馆》以后诸种译作，在他生前均未获出版，——最初当是困难时期纸张缺乏之故，继而大约如周氏自己所说“古典文学是冷货，所以不大印行”⁴。《狂言选》新增补的三十五篇，计十一万五千字，更已下落不明。

出版社一度安排周作人翻译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随即通知暂停；周氏谓：“知该社无此勇气也。”⁵一九五九年十月自行翻译该书，成第一章而止；改译出版社所约清少纳言著《枕草子》，于十一月十一日开笔，“试译耳”。早在一九二三年周氏即曾摘译《枕草子》片断，并说：“原书成于十世纪末，大约在中国宋太宗末年，共分一百六十余段，列举胜地名物及可喜可憎之事，略似李义山《杂纂》，但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雅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⁶然而这回却颇显迟疑：“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

1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日记。

2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

3 《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香港《新晚报》）。

4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

5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日记。

6 《歌咏儿童的文学》（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晨报副镌》，收《自己的园地》）。

超过自己的力量的工作。”¹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完成，日记有云：“即便溘然，亦已满足矣。”次日寄出稿件，又云：“任务完成，觉身体轻松，却又恍然如有所失，亦可笑也。”

从一九五九年起，周氏发表文章数量突然减少。最初或系忙于翻译，无暇写作；但也与国内政治气氛渐趋紧张有关。有关周作人的政策未必有所变化，然而他的文章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据佟韦说：“一九六一年八月，周作人写给周扬同志一封信，托贾芝、李星华转交。贾、李把信首先转给了我，同时贾、李两人写有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周作人做了不少好事，如保存李大钊遗稿、遗书，并掩护李星华同志去延安等，他们可以证明。周作人的信有个标题：《本人从不反对共产主义》。贾、李两人给我写一个条子，希望将两件转周扬同志。我于是便将两封信先给阳翰笙、阿英同志看，而后，同样照转请周扬同志阅。我不记得周扬同志有什么文字批覆，只记得让我转告周作人，他的信‘已经看到’，‘希望安心写作’。”²《光明日报》编辑黎丁亦说：“阿英极力怂恿我找周写稿。他说，国家出版社都可以出他的书（即《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什么报刊上不好登？周作人，要是让他写点启蒙时期文艺界情况，还是有用的，‘五四’以前，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非常缺乏。‘五四’则牵涉人太多，有些不便发表。但也不是不可以审慎地研究它后刊载的。”³其间仍有国内报刊约稿，周氏也主动投寄，但公开发表的只有一九五九年两篇，一九六二年两篇，一九六三年一篇。一九六四年《世界文学》第五期所载译作《宙斯被盘问》，乃是他最后一次在国内报刊露面。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允出版“杂文小品”，周作人选取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所作四十九篇，取名《草叶集》与之。

1 《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六》。

2 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周作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下午民警岳同志来谈，属写‘计画’，约二三日后再看。”十二月二十九日：“民警岳来招赴午后集会，下午一时半至公用库食堂，成立监督小组事，组长张桂英也。”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写声明文，午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另抄声明，拟予佟韦一阅也，午抄了，下午往街寄佟韦信。”一月三十一日：“韩姓妇来传老岳命，令写计画，因以声明二份属交予岳某阅之。”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作致周扬信，由李星华转交，付邮寄去。”佟韦文中所说《本人从不反对共产主义》，或即此“声明”，嗣后周作人另有致周扬信也。

3 黎丁：《编辑手记》（收《闲话周作人》）。这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阿英与他的谈话。

继而签订协议，“计千字以六十计也”¹，在当时是超出标准很高的稿酬。次年春，他曾预告“大约在三四月里也可以和读者见面了”²，然而未能如愿³。一九六二年，周氏方谋在广州另寻出路，百花文艺出版社却于七月寄来校样，准备付梓。他改题《木片集》，自谓：“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的用处，但恐怕是简牍上削下来的，那么这便没有什么用，只好当作生火的柴火罢了。”⁴双方重签协议，出版社并预付部分稿费。一九六三年四月，该社再次取消出版计划，周氏当月十日日记有云：“得百花社寄还校稿，已两次付排而终不能出版，亦奇缘也。”他将书名改作《枯叶小集》，复又托人在广州设法，“亦姑试之耳”⁵，终无结果。由“草叶”而“木片”而“枯叶”，适为周氏当时境遇之写照也。

周氏夫妇年老多病，儿子划为右派，工资降低，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均倚重此一没有正式工作、只靠翻译收入的古稀老翁。又逢三年困难时期，物价上涨，食品匮乏。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周作人“寄康生信”；次年一月十三日，“人文社江秉祥君来谈稿费事，三数日再作回复云。因与康生信故生效用，亦未知结果为何耳”。十六日，“得人文社信，允每月支四百元。虽不足亦不好要求加多，寄信答应”⁶。——周氏曾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说：“因为负担太重太多，加以病人，所以支出甚巨，每月要不足百余元以上，这是我拮据的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⁷只得变卖东西，以补亏空。一九六一年末至一九六二年初，先后将旧日记二十六册售与鲁迅博物馆，共得一千八百元。

1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

2 《〈知堂乙酉文编〉题记》。

3 谷林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来访，周氏示以“一册没有封面却已经装订起来的校样，说：‘这是天津排好的，眼下缺纸，不能付印，书名《鳞爪集》也欠妥，得改。’”（《曾在我家》，收一九九五年三月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边杂写》）。又《〈木片集〉小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作，收《木片集》）：“书名最初拟名为《鳞爪集》，但太是普通了，怕和别人重复。”

4 《〈木片集〉小引》。

5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日记。

6 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则说：“据周作人讲，他的收入不敷支出，生活困窘。……在他家看到他的吃穿用、屋里陈设等，都很简朴，看来困难是事实。我与阿英同志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阿英同志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来出版他的著作，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的生活费还是应作为支付、预付稿酬解决，但每月二百元是少了，可不可以四五百元？’阿英同志嘱我面见楼适夷同志解决。果然，我拜访楼适夷同志提出这一问题时，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直到问题的解决（后来说增加到每月四百元）。”

7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曹聚仁。

来自时居香港的曹聚仁的帮助,对于晚年周作人至关重要。曹氏与周作人交往已久,尝以周的“信从者”¹自称;一九五六年九月北上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特来拜访。“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我们也谈到写稿的事。”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热风》第七十七期所载《苦茶庵杂诗抄》,是周作人首次在香港报刊发表作品。周氏还以《乙酉文编》书稿相托。——一九四五年所写文章“当时预备结集,以一篇《过去的工作》的题目为名”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编订旧稿为一部二册,曰《乙酉文编》。”经曹氏安排介绍,香港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过去的工作》,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出版《知堂乙酉文编》。前者署名“知堂”,后者署名“周作人”,乃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出书唯一一次使用这个名字。“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⁴,编排难称精细,后一本名“乙酉文编”,却包括几篇并非该年的作品。香港《乡土》、《文艺世纪》等刊物所载周氏诗文,亦系曹聚仁代转。对于所得稿费,周作人有云:“旧作自寿诗中有‘未妨拍桌拾芝麻’之句,不期至今日而验也。”⁵周氏还曾删去《老虎桥杂诗》若干敏感篇目,改名《知堂杂诗抄》,谋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未能成功。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周作人得曹聚仁信,“介绍为《新晚报》作文,每万字百港元,价虽廉,其意可感也。”⁶次日,“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并于十二月十日动笔。——据周氏说:“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社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⁷此后计划不断变更,“能

1 曹聚仁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致周作人。

2 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九七〇年香港《大华》第一卷第四期)。

3 《《乙酉文编》附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作,印在《周曹通信集》中)。

4 《解放后译著书目》(一九七五年一月香港《南北极》第五十六期)。

5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曹聚仁。

6 当时汇率,二百五十港币折合一百人民币。

7 《知堂回想录·后序》(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作,收《知堂回想录》)。

有几多长目下尚未能定，‘五四’是一段落或延长至北伐，——或者一直写到解放时亦未可知，敌伪时期虽较难写，但亦可试为之，如能说老实话而不说类似辩解的话，则庶几其可，然而难矣。将来再说吧。”¹待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写毕全书，自己一生经历尽皆赅括其中。共三十八万字。以原定书名“稍嫌陈旧”，易名《知堂回想录》，“似较通俗”²。周氏有云：“以前常虑溘然不及竣事，今兹亦大幸也。”³

《知堂回想录》陆续写出，陆续寄往香港，在周作人仍然属于业余写作，——动笔时，《枕草子》尚未译竣；其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阅北京编译社所译《今昔物语》，自谓“事甚繁冗，且译似非出一人之手，厘正为难”⁴、“殊觉费事”⁵；《回想录》还没完成，又起手翻译《路吉亚诺斯对话集》。撰写此书在他显然还是“为稻粱谋”。而曹聚仁早有要求：“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新晚报》经济情况好，稿费一定有把握。……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积少倒可以成多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只要不太熟了。”此外正如曹氏所说：“右派报纸，你不能写，你交待不了的。所以只好写这几家了。”⁶《新晚报》属于香港左派报纸，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未必亚于国内。职是之故，就反思生平、揭示内心的深度而言，《知堂回想录》未能超出此前所作诗文。书中尽管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移用或抄引自家旧作究嫌过多。当然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⁷曹氏亦云：“只是阳春白雪，太高深了一

1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致曹聚仁。

2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二日致鲍耀明。周作人同时还为《文史资料》撰写回忆文章，或可视为对《知堂回想录》的补充，包括《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作，未刊）、《“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作，载一九九九年《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百三十五辑）、《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作，载一九八四年四月《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等。

3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4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日记。

5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日日记。周校《今昔物语》现已出版。

6 曹聚仁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致周作人。

7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曹聚仁。

点，尤其在香港。”¹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诸如与鲁迅失和、出任伪职等事，书中既无披露，亦不解释。这里“不写”比“写”可能更体现出他面对既往的态度，以及撰写此书的意义。周氏早有“不辩解说”，现在则是发挥到了极致。《知堂回想录》正如其所说：“……可是假如有人相信了我的这句话，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真实的记录在里边，想来找得一切疑难事件的说明，那未免是所愿太奢了，恐怕是要失望的。”²

周作人虽然从《新晚报》收到稿费——折合人民币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元，《知堂回想录》却迟迟不见刊载。据该报总编辑罗承勋（罗孚）说：“香港报纸习惯边写边登的做法，一般都不是等全篇写完才登。对于周作人这一著作之所以拖延刊出，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去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待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认为他很‘聪明’，没有想到他是另有自己的看法这才‘予欲无言’。”³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知堂回想录》才在《新晚报》“人物志”登出，周作人说：“在宣统废帝之后，又得与大元帅同时揭载，何幸如之。”⁴然而九月八日连载至第三十一节，即告中断。——罗孚说：“我是奉命行事，‘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上命难违，除了中止连载，没有别的选择。”⁵虽经曹聚仁多方努力，直到周氏逝世，《知堂回想录》未再发表，也没出版。

完成《知堂回想录》后，周作人继续为香港报刊撰写文章。“唯香港报刊情形复杂，因无所知恐致误投，特请曹君为我指导，特选定《大公报》系统之报为主，寄稿至《新晚报》，由他们酌量分配给《文汇》，为安全计，

1 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

2 《知堂回想录·后序》。

3 罗孚：《关于〈知堂回想录〉》（收《闲话周作人》）。

4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致鲍耀明。罗孚说：“《新晚报》这个‘人物志’副刊，是因为要连载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而创办的。这时这个专栏早已结束，正在连载一个字数较少的张高峰的中篇《绿林元帅外传》（？），是写张作霖的一生。《知堂回想录》开始登载时，它还没有连载完，两个连载就同在一个版面上刊出。”（《关于〈知堂回想录〉》）

5 罗孚：《关于〈知堂回想录〉》。

此外不另寄稿。”¹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共在《新晚报》、《文汇报》、《文艺世纪》发表文章近五十篇，仍以回忆之作和闲适之作为主。寄出而未见刊出者亦不在少数，“香港方面杂文也无销路，还存着二十多篇，我去给报馆写信请求稿费，半年来不得一字答复，所以只得算了。”²周氏尝云：“近日写文似已渐有随笔的意味，即加入滑稽趣味，然此道恐已无人能领矣。”³相比之下，晚期以此时所作水准最高。他曾谈及作文之道：“此类细工之秘诀，大概与写小文章相同，只是慳而已。这里不说是俭，因为俭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譬如说腹俭，虽然不至于凑不起四五百字，也总是储藏有限，只好量入为出，以免有匮乏之虞。慳则不然，他本来富有，却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说起慳或吝啬，大抵指的是守财奴，就是这个缘故。不过富翁的慳是想多留住点钱，也不顾体裁难看，而我们所说细工与文字的慳，乃是想把他弄得好看点，所以要减少装饰与累赘。……慳之外，或者还可以说有一字曰宽，即紧张之反对，又可云慢慢的。”⁴用以形容此时文章可，用以概括其一贯风格亦可。

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作者仍然隐晦但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譬如说：“在好多年以前我曾经有过一句口号，提倡伦理之自然化，因为封建道德有许多是歪曲的，不合于自然的正理。而且他们一半也因为观察不正确，反而竭力的把有些生物的自然现象拿去伦理化了。”⁵他又重提当年北京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婚姻法》做出的“名判决”，有云：“这件事虽然过去已经好几年了，可是记忆还是很新的。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往好的一方面转，那种看似异常而实出于常识的事情出现，这就是表示人世所自己造作的种种虚伪的渐就消灭了。”⁶——与在另一文中所引《荒唐思想的自然史》作者伊文思的话结合来看，或者更能体现他的真实想法：“世上没有比谬误更是强有力的东西了。一种论争决没有解决了，就消灭不见了的。

1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致鲍耀明。

2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周作人日记记载了“关于驮果子者”、“果子与茶食”、“推重汉字的旧论”、“说绥方教室的事”、“关于添田啞蝉坊之演歌者”、“记木村义乔者”、“说日本一月中年中行事”等题目。罗孚保存的周氏手稿有二十一篇未发表，计随笔十六篇，译文五篇。

3 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日记。

4 《慳的手法》（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新晚报》）。

5 《向日葵的神话》（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新晚报》）。

6 《关于通奸》（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新晚报》）。

即使看去是这样，也只是沉没在学识底下，实在是人心暗处，不可测知的洞穴里面，很好的生存着。”¹

周作人晚年家庭生活不幸；其译书作文，即在此种情形下进行。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羽太信子病重住院。周氏当日日记有云：“灯下独坐，送往病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信子于四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周氏写道：“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年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及至信子周年忌辰，周氏复云：“忆戊申（一九〇八）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四月八日也。”

有人拜访周作人，印象是：“看看相貌，很有点像相片中见到的鲁迅，个子矮矮的，穿着中式衣服，蓄的却是日本胡子。脸上没有笑容，有点冷冷的感觉。”²又有人形容周氏说：“初冬季节，穿一身绸质玄色薄棉袄裤，有些伛偻，神采则比十年前远胜。”——当年的印象则是“颜色枯黄，身穿同我一样的灰衣裤。我是从市场买来的成衣，下水便缩，袖不及腕，裤不掩踝，他也仿佛如此”³。另有人记述说：“六十年代初及稍后，我于八道湾不止一次遇到的有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徐耀辰（祖正），一位是钱稻孙。”⁴周氏还与海外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大量通信，这些原本未拟公开的文字，真实而充分地记录了他晚年的生活与心境。

当初译完《枕草子》，周作人即云：“倘有余暇，则拟更译路吉亚诺斯耳，岂非贪哉。”⁵此乃出版社“属选译”⁶，然未找到古希腊文原本，不能马上动手。其后校阅《今昔物语》，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上午校稿完了，计前后已阅二年矣。已后当译路吉亚诺斯散文，虽夙所喜爱，但未知有精力否耳。”羽太信子死后，周氏说：“内人去世，虽房中少了讲话

1 《亚当的肚脐》（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新晚报》）。

2 张能耿：《周作人印象记》（收《闲话周作人》）。

3 谷林：《曾在我家》。

4 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

5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日记。

6 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日记。

的一个人，未免寂寞一点，但是习惯了也好，因为精神上少了一重负担，可以安心的工作。”¹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开始译路吉阿诺斯”²。“拟定的对话选集目录共有对话十四篇，杂文四篇，一共十八篇。但是他的著作现在图书馆有的也只是六册，最重要的四种对话译本拟放在卷首的却是收在第七册里，还是无从去找。我没有办法，乃从第五篇译起，已经译到第十二《真实的故事》，乃是他的一篇重要作品，这时忽然想到这书中国没有，英国可能已出，随写信给一个在澳洲大学教书的友人，敲他一个竹杠，托他去买一本，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这书居然买到了，使我得以从头译起，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³这位周氏特别“表示谢意”的“替我买书的朋友”⁴是柳存仁。此项译事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病人现已去世，物价已经低下”⁵为由“减给”，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将预支稿费改为每月二百元，周氏虽然“因此稍为苦恼”⁶，翻译进程却未受影响。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计对话集全了，凡对话廿篇，共约计四十七万言，大功告成，炳烛之明亦殊可庆幸矣”。十八日《关于路吉阿诺斯》一文写毕，“已完全竣工矣，今日为三一八，亦大可纪念也”。

周作人说：“希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译出了十几种，可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后世的杂文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一直蛊惑了我四十多年，到去年才有机缘来着手选译他的作品，想趁炳烛之明，完成这多年的心愿，故乡有儿歌云：‘二十夜，连夜夜，点得红灯做绣鞋。’很能说出这种心情。”⁷《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被他列在自己“喜欢搞”的“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之列，然而其真实意义却不限于此；别种翻译具有文化价值或文学价值，此项翻译则另具思想价值。他曾介绍路吉阿诺斯说：“他是二世纪古罗马的叙里亚人而用希腊文写作者，用了学习得来的外国语，写出喜剧似的对话，而其精神则是‘疾虚妄’，正与他同时代的王仲任一东

1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致鲍耀明。

2 关于 Loukianos 的译法，周氏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稿所作说明云：“以前写作路喀阿诺斯，唯查‘喀’字从来系译 ka 字音，不能作 ki 字音读，所以改从普通的‘吉’字。”

3 《愉快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新晚报》）。

4 《关于路吉阿诺斯》（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作，收《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5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

6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致鲍耀明。

7 《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

一西遥遥相对。因此他的对话脚色大都是那些神话传说里的人物，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为适宜，此所以他的著作至今犹有生命，正与王君的《论衡》即在今日还值得一读。”¹ 在《关于路吉阿诺斯》中也讲：“不过作者因为揭发伪先知的缘故，因此身后很受到诽谤，在十世纪时苏伊达斯（Soudidas）所编的大辞典里，说路吉阿诺斯末年是群犬咬死的，算是他一生非圣无法的报应。”路吉阿诺斯说得上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流氓鬼”或“叛徒”。即如《关于路吉阿诺斯》所概括的，集中《爱说谎的人》“讽刺迷信”，《墨尼波斯》、《拍卖学派》、《渔夫》“讽刺哲学”，《宙斯被盘问》、《宙斯唱悲剧》、《关于祭祀》“讽刺宗教”，《伊卡洛墨尼波斯》“讽刺哲学与宗教”，《过渡》“讽刺权力的空虚”，《提蒙》“讽刺财富的空虚”，《公鸡》“讽刺财富与权力的空虚”，《卡戎》“讽刺世事一切的空虚”，等等，既有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都被颠覆了。这在思想方向上与周氏所说“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完全一致。其所以“一直蛊惑了我四十多年”者，即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有如一部“知堂晚年定论”。而最终归结于《爱说谎的人》一篇所说：“我们有那真理与常识这一服灵效的解毒药在这里，只要用了这个，我们便不怕那些虚妄的诳话会得扰乱我们了。”

周氏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未必有针对具体现实之意。——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引录“野老生涯是种园”一诗后说：“这是一九四二年所作，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这又比作妇人的生产，说这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难，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不过这乃是知识阶级的通病，他们忧生悯乱，叫喊一起，但是古今情形不同，昔人的忧惧后来成为事实，的确成为一场灾难，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救，正如经过一次手术，反而病去身轻了。”² 可见此时对于现实的认识，大致仍与当初给周恩来写信时相同。然而该书

1 《愉快的工作》。

2 《知堂回想录·〈小河〉与新村中》。

却与现实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后者无可避免也是“非圣无法”的对象。《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堪称那一时代精神领域的异数。周氏曾说：“西洋中古时代的上帝，与中国的皇帝一个样子，向来是最不好对付的。在宗教审判时期，有多少人因为说话不小心，犯了‘非圣无法’的罪名，以致身败名裂，所以当时的人有一种巧妙的说法，话是说了，却留了一条活路。”¹在《渔夫》中，路吉阿诺斯被称为“一切抢劫神庙里边的最不敬者”，周氏或亦以此自况；然而“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是“一种巧妙的说法”²。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完成后，周作人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写定遗嘱，有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即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此前一年，他曾作《八十自寿诗》一首：“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羨老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照土堆。”³现在则说：“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功，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馱字本意从甘犬肉），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

1 《一角兽之有无》（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新晚报》）。

2 集中最具思想锋芒的两篇之一《宙斯被盘问》（另一篇是《宙斯唱悲剧》，最初不在选目之列，翻译过程中与《关于琥珀或天鹅》一并添入），一九六四年发表于《世界文学》第五期。编者按有云：“路路阿诺斯对宗教攻击得特别有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此加以充分的肯定。”

3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作。二日后所作附注有云：“首二句系仿放翁作七十书适诗。日本有山父，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得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么？又怎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亦即知道了照学说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僵滑脱，正打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青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有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化也。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事多讽刺诙谐之作。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胡荽，因俗信播芜荽时须口作狼语，种始繁衍云。”

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¹其间心态变化，颇可留意。身体亦渐呈衰老之相。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往街买物，归到八道湾，足力不济，倾跌二次，经邻女郭扶掖而回”，乃致“卧病匝月”。五六月间，又以尿中有血，被检查出患前列腺肿瘤。

但他仍须继续工作，俾可从出版社预支稿酬；尽管两三年来，并无一本译著印出。周氏在前引遗嘱之后，特加一笔：“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版，则亦是幻想罢了。”遵出版社之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起手翻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平家物语》，自称“颇可消遣岁月”²。给朋友写信则说：“近来常苦无书可看。几经研究，近始获得一妙法，即以工作为消闲。因近正翻译《平家物语》，此书成于中国南宋末，却比《三国志演义》要写得好。以是一边看一边译，亦是一妙事也。”³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周作人给有一面之雅的徐訏写信，回顾当年滞留北平之事，有云：“……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即如希腊路吉阿诺斯（英国人叫他Lucian）的对话二十篇，总计有四十七八万言，这乃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在去年里总算完成了。”所说正与遗嘱相为表里。这年一月二日，孙伏园逝世。周氏三月四日日记云：“伏园化去，拟以一文纪念之，而为目疾所苦，每日只能写得一点，至下午始得约略完成矣，只须誊正。”对于这位曾对自己人生起过重要作用的老朋友略尽送别之意。他称此文“所用皆是‘第一手’的资料，比道听途说者略有差别”⁴、“似乎有点别致”⁵，然未获发表，原稿遗失。三月二十三日“观于人们之怕地震”，“偶作诸诗，用轱辘体”：“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是为现存最后的

1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写在日记“戊十三”册首页。

2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记。

3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致施蛰存。

4 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致鲍耀明。

5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致鲍耀明。

作品。当时政治气氛已趋紧张，周氏似乎暂未受到影响。

风暴随即降临。这年六月七日，“上午丰一为取人文社款来。”乃是他最后一次收到出版社预支稿酬。二十七日，“上午稻孙来访，云中[人]文社本月未送款，或是遗忘，因近日忙于搞运动也。”——据文洁若说：“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实在无能为力。”¹七月二日，周氏最后一次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出译稿。七月八日，“译书得二纸。”《平家物语》的翻译，也是周作人整个的翻译生涯，至此遂告结束。《平家物语》共十二卷，他翻译了七卷多，第六卷以后约五万字现已遗失。出版社不再付钱，又早无香港稿费，周氏只好求助于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章士钊²。七月十日，“下午作致行严函，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虽亦甚微，姑且一试耳。”十八日，“上午王益知君来，代行严致意，甚可感荷。”然而并未解决实际问题。三十一日，周氏日记有云：“此一个月不作一事，而辛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日思惟，亦不禁悯笑也。”八月四日，“下午刘满进来云，现因搞运动，故停止收购中外书籍，只可作破烂称斤卖矣。”

时已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对于周作人还仅限于断绝生活来源，继之便是灭顶之灾。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前来抄家，周作人遭到毒打。他坚持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就从这天停笔。之后九个多月，他先只被允许睡在洗澡间，后来才在厨房容身。“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

1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

2 周作人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曾作《口占赠行严先生》二首：“甲子年间旧甲寅，追怀琐事倍思君。闭门不管千夫指（不用鲁迅诗语），写出新论西棘文。侃侃当廷论冀东，书生毕竟是英雄。若将形迹求同志，绝倒汪江有二庸（江庸律师为汪庸斋辩护）。”后一首咏章氏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庭担任殷汝耕之辩护律师事，同时他还曾为周佛海辩护，——周、章晚年“化敌为友”，或与此不无关系。

很快就浮肿了。”¹有友人曾在岁暮来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那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是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在害着不轻的病；原先蓄着的长须也剪短了，与两年前他送给我那张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戏称为‘仿佛有点胡志明的意味’的相比，真有天渊之别。”²这大概就是周氏最后留给世人的形象了。

有学者指出，周作人当年在“非基督教运动”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的今天，它才终于为人们所重新地认识”³；而周氏从《小河》到《中国的思想问题》中所表示的对于“中国民族前途”的“忧惧”，至此已不幸彻底成为现实。不过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反应了。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递给张茱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用的均是皱皱巴巴、每张四百字的红格子稿纸。……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敝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此或系毕生绝笔，可惜今已无存。“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儿媳张茱芳闻讯“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⁴。终年八十二岁。八道湾十一号后院东侧的小厨房，即其辞世之地。遗体径付火化，骨灰未能保存。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⁵。死

1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

2 孙旭升：《我所知道的知堂》（收《闲话周作人》）。

3 尾崎文昭：《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原载一九八三年十月《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五集，李光耀译文载一九八七年吉林大学出版社《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

4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

5 根据周作人手稿重新校订的版本于一九八二年一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¹。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²、《老虎桥杂诗》³、《希腊神话》⁴、《浮世理发馆》⁵、《枕草子》⁶、《木片集》⁷、《路吉阿诺斯对话集》⁸和《平家物语》⁹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

1 《周作人早期散文选》，许志英编，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出版。

2 一九九七年二月文汇出版社出版。

3 二〇〇二年一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三年一月再版时，根据周作人部分手稿重校。又，《知堂杂诗抄》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由岳麓书社出版。

4 一九九九年一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5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重印的《浮世澡堂》合订一册）。恢复周作人译稿原貌的单行本于二〇〇一年一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6 一九八八年九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选》一书。恢复周氏译稿原貌的单行本于二〇〇一年一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7 二〇〇二年一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8 一九九一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题《卢奇安对话集》出版。恢复周作人译稿原貌的版本于二〇〇三年一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9 一九八四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启明、申非译的《平家物语》。恢复周作人译稿原貌的版本于二〇〇三年一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全译伊索寓言集》（一九九九年一月）、《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二〇〇三年一月）、《古事记》（二〇〇一年一月）、《狂言选》（二〇〇一年一月）和《浮世澡堂》（二〇〇一年一月），也根据周氏手稿恢复了旧版本被删改的部分。

结语

周作人一生著译在一千万字以上，加上未及整理的书信、日记，实在蔚为大观。就中大部分，或当视为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不少人对此无法接受。尽管有“人归人，文归文”一说，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因为“文”出自“人”之手，“人”又体现于“文”之中。周氏颇受欢迎的《苍蝇》、《喝茶》、《乌篷船》等，纯然抒写一己情趣，尤其如此。或者说“人归人，文归文”的真正意思，是将“文”与作者的一部分“人”分开。即如岳麓书社印行周著之“出版说明”所云：“周作人依附日本的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可是这“不得原谅”的部分恰恰与“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的部分最有关联。作者自己说，“我的反礼教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相关”¹；而“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²。所谓“行事”，即“不得原谅”者也。如果我们连这

1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来。

2 《两个鬼的文章》。

一部分“文”——周氏称为“正经文章”——一并摒弃，那么他就是一位只写“闲适小品”的作者了，如世间不少人的印象那样，但这显然不是其真实面貌。周氏尝云：“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¹对他来说，“人”与“文”关系并不简单，“人”和“文”各自都很复杂。

承认周作人的“思想”与“行事”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未必就要肯定其行事，也未必因此就要否定其思想。周氏一九四七年被南京首都最高法院法庭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一九五三年又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九五八年他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选举权未获批准。有关此案，迄无别种“定论”。上述判决，主要基于周氏在日本侵华期间出任本兼各项伪职做出。即如《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特复字第四三八一号）》所说：“此等事实业经原审根据声请人迭次所供认及其亲笔所具之自白书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附卷之罪行调查表予以明白认定，并于判决理由中详为说明，其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周氏之行事在法庭以及社会看来统摄于此，至于思想则在所不论。此亦不足为奇：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理解既不等于评判，更不能取代评判。讲到“当初想法”，还有一个问题，即对当事人所说如何看待。或以为无足采信，或以为真假参半，或以为大致属实，要皆理解不同，实与评判无关；评判的依据是事实。这又可分为“名”与“实”两个层面，而周氏出于“反礼教思想”，并不承认前一层面具有意义。此种与法庭及社会看法不同所造成的后果，最终是由周氏自己承担。

周作人将一己思想概括为“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虽然可以分别追溯到一九一九年所作《祖先崇拜》和一九三三年所作《〈颜

1 《〈苦口甘口〉自序》。

氏学记》》，但是“道义之事功化”，以及“伦理之自然化”的“化”，却与此前标举的“教训之无用”所体现的纯粹思想者的姿态有所背离。周氏的悲剧命运与此不无关系。思想的价值在于思想自身，无论是否诉诸行动，亦无论是否成为现实。周作人一生中不止一次有意回归纯粹的思想者，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作《闭户读书论》与《伟大的捕风》，一九三七年作《自己所能做的》，均是如此；及至一九四四年作《闭户读书论》，则为时已晚。周作人晚年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有云：“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仍然是取此种立场。相比之下，《知堂回想录》中所说“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¹，未始不能看作对一度未能恪守上述立场的反思。指出“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老鸦皆明礼教，其意虽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²乃至“人……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³与“伦理之自然化”；指出“董仲舒有言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话看去颇有道理，假如用在学术研究上，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是极好的，可惜的事是中国不重学问，只拿去做说空话唱高调的招牌，这结果便很不大好”⁴与“道义之事功化”，其间究竟有所区别。前者显然更接近他所说的“伟大的捕风”。

周作人说：“在好些年前我做了一篇小文，说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这如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但也不必那么说，所以只说是流氓与绅士就好了。”此意以后常为论家所袭用。然而“两个鬼”究竟涵义如何，分别要把主人引向何等命运呢。周氏自己说：“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这种态度当然不能为旧社

1 《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

2 《论小说教育》。

3 《〈百廿虫吟〉》。

4 《道义之事功化》。

会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只可自承是流氓的……天性不能改变，而兴趣则有转移，有时想写点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这便是绅士鬼出头来的时候了。”¹纯粹思想者的立场固然并不全由绅士鬼所决定，对这一立场有所不满进而要成为行动者，却与流氓鬼大有关系。周氏编文集时一再叹息“太积极了”，大概是绅士鬼所发声音，无奈对于流氓鬼约束不力。在他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有一事颇可留意：“二十七年冬有诗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旧友匏瓜厂主人其时在上海，见而悯之，示以诗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此种缺点非不自知，但苦于不能改，或亦无意于改。”²所谓“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乃至为之身体力行，也许即根植于“此种缺点”；而“苦于不能改，或亦无意于改”，则是未能由流氓鬼转向绅士鬼也。“以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³，流氓鬼更超越思想言论而进入行动的范畴，——对于周氏来说，这至少不是幸事。

思想是惟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本身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反观周作人一生，行事或因思想所致，思想却不为行事所限。假如要从他的话中挑出最具代表性者，或许可以选择以下两段：“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⁵讲到思想，其实分成两个层次，低一层次与思想者个人密切相关，高一层次升华而为人类所共有。这同样适用于周作人。在后一方面，倒真可以“人归人，文归文”了，说来非独周氏为然。

1 《两个鬼的文章》。

2 《《桑下丛谈》小引》。

3 《两个鬼的文章》。

4 《伟大的捕风》。

5 《灯下读书论》。

周作人生前出版著译作品

- 侠女奴 小说林社一九〇五年六月
玉虫缘 小说林社一九〇五年六月
孤儿记 小说林社一九〇六年六月
红星佚史 商务印书馆一九〇七年十一月
匈奴奇士录 商务印书馆一九〇八年九月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与鲁迅合译，一九〇九年三月
域外小说集（第二册） 与鲁迅合译，一九〇九年七月
炭画 文明书局一九一四年四月 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八月
欧洲文学史 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八年十月
点滴 北京大学出版部一九二〇年八月
域外小说集 与鲁迅合译，上海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与鲁迅、周建人合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五月
现代日本小说集 与鲁迅合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六月
自己的园地 北京晨报社一九二三年九月
陀螺 新潮社一九二五年九月
雨天的书 新潮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狂言十番 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九月
自己的园地 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二月

冥土旅行 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二月
玛加尔的梦 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三月
黄蔷薇 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八月
泽泻集 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九月
两条血痕 开明书店一九二七年十月
谈龙集 开明书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谈虎集（上卷） 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一月
谈虎集（下卷） 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二月
空大鼓 开明书店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永日集 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五月
过去的生命 北新书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艺术与生活 群益书社一九三一年二月 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儿童文学小论 儿童书局一九三二年三月
周作人散文抄 开明书店一九三二年八月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人文书局一九三二年九月
看云集 开明书店一九三二年十月
儿童剧 儿童书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知堂文集 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三月
周作人书信 青光书局一九三三年七月
苦茶庵笑话选 北新书局一九三三年十月
希腊拟曲 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一月
苦雨斋序跋文 天马书店一九三四年三月
夜读抄 北新书局一九三四年九月
苦茶随笔 北新书局一九三五年十月
苦竹杂记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二月
风雨谈 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十月
瓜豆集 宇宙风社一九三七年三月
秉烛谈 北新书局一九四〇年二月
药堂语录 庸报社一九四一年五月
药味集 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二年三月

药堂杂文 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一月
书房一角 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五月
秉烛后谈 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九月
苦口甘口 太平书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立春以前 太平书局一九四五年八月
希腊的神与英雄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一月（改题希腊神话故事）
希腊女诗人萨波 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八月
俄罗斯民间故事 大公书局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九月
乌克兰民间故事 大公书局一九五三年一月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八月
鲁迅的故家 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三年三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四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九月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四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四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八月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杨宪益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伊索寓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
伊索寓言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三月 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六月（注音本）
日本狂言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
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 与施蛰存合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 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二月
鲁迅的青年时代 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三月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二） 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明清笑话四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三月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三） 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
浮世澡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
过去的工作 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知堂乙酉文编 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

石川啄木诗歌集 与卞立强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一月

古事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月

周作人身后出版著译作品

知堂杂诗抄 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一月

如梦记 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

全译伊索寓言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一月

希腊神话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一月

古事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

枕草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

平家物语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

狂言选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

浮世澡堂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

浮世理发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一月

老虎桥杂诗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

木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

知堂回想录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一月

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一月

知堂遗存·童谣研究手稿 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二月

知堂遗存·周作人印谱 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二月

近代欧洲文学史 团结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七月

他人编辑周作人著作

周曹通信集（第一辑） 李吉如编，南天书业公司一九七三年八月

周曹通信集（第二辑） 李吉如编，南天书业公司一九七三年八月

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陈子善编，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一月

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之后 陈子善编，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八月

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 张挺、江小惠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
周作人诗全编笺注 王仲三笺注，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
周作人集外文 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一九九五年九月
周作人日记 大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周作人文类编 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鲍耀明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
周作人松枝茂夫往来书简 [日]小川利康编，早稻田商学同攻会《文化论集》
连载

其他相关著作

周作人论 陶明志编，北新书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周作人评析 李景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
周作人研究资料 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周海婴编，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月
鲁迅周作人比较论 李景彬著，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
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的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 赵京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周作人传 钱理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
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 黄美真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南京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
解读周作人 刘绪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
在家和尚周作人 萧南编，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
周作人评传 李景彬、邱梦英著，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

苦境故事——周作人传 雷启立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

闲话周作人 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 魏绍昌主编，上海书店一九九六年八月

周作人印象 刘如溪编，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

知堂情理论 顾琅川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六月

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 黄乔生著，群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

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 钱理群著，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鲁迅回忆录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 [新加坡]徐舒虹著，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四月

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与文体 黄开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

周作人评说八十年 程光炜编，中国华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

周作人 余斌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二月

周作人年谱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四月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 封世辉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四月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舒芜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九月

翻译家周作人 王友贵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六月

读周作人 钱理群著，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月

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学思想 [英]大卫·卜立德著、陈广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七月

苦雨斋识小 止庵著，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三月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 孙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七月

苦雨斋主人周作人 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八月

周氏三兄弟 朱正著，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九月

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 回望周作人·致周作人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 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 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 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 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 孙郁、黄乔生编，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
-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
- 周作人最后的二十二年 耿传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
- 周作人生平遗案 王锡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七月
-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 周作人平议 张铁荣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五月
- 被冷落的缪斯 [美]耿德华著、张泉译，新星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八月
- 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 钱理群著，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九月
- 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 江小蕙编，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十月
- 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徐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月
- 鲁迅与周作人 孙郁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月
- 翻译家周作人论 刘全福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四月
- 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 哈迎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月
- 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 顾琅川著 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三月
- 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八月

此外所参考者，尚有五四迄今多种个人著作、文章，以及首次发表周作人作品之报刊杂志等，兹不列举。承蒙好友收藏家谢其章君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周作人传》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

——止庵

ISBN 978-7-80713-686-6



9 787807 136866 >

定价：35.00 元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作人传

作者=止庵著

页数=313

SS号=12139034

出版日期=2009.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一八八五—
第二章	一九 六—
第三章	一九一一—
第四章	一九一七—
第五章	一九二三—
第六章	一九二八—
第七章	一九三九—
第八章	一九四五—
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
结语	
参考书目	
封底	